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 王力雄 ·

目 录

前言

……新疆……写下这两个字让我颇费踌躇，它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称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的名称。但是当我在头脑里面对这本书的可能读者时，会浮现我在波士顿经历的场面。那是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藏人、蒙古人、台湾人，还有大陆汉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维吾尔人代表，该到场的肯定不能算完整。当会议已经开始，才有一位维吾尔人从德国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向与会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参加会议。

新疆……一旦进入某种场合，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只要谈那片广阔土地上的事，总得用一个名称。最终我还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即使是东土人士谈具体话题也难避免用「新疆」），其实也能让双方都从中各取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用这么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仅为说明选择地名的困难，而是想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没有在新疆入狱，那写作应该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书也会在几年前就已问世。不过那样写出的书一定和这本不一样。它会像《天葬》有个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临下地概述，力图包容新疆问题的全貌。但是当我被关进新疆的监狱，被勒令从此不可再触碰任何官方资料，使我不得不放弃框架式的写作。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

官方数据内。没有官方资料，框架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却可以算作一种成全。入狱使我更深地进入了新疆的情景。当我准备继续写这本书时，已经变得踌躇渐多，不再觉得有资格搭建框架和居高临下地概述，更不敢轻易给出结论。入狱是这变化的转折点。当监狱之门在我身后锒铛上锁，进入新疆的另一道门却悄然打开。那道门内的新疆不再是文件、书本和信息中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血肉、情感乃至体温。我与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此有了脉络相通、呼吸与共的感觉。

于是，我不再为缺少官方信息而遗憾，也不再认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写新疆，重要的不在罗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展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这无疑非常困难。不错，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你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从一九八〇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虽然花费很多时间，耗费不少资财，但却比看见一个维吾尔人的内心要容易。可以说，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我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有权看文件，了解机密，见的人广，到的地方多，却唯一做不到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对此，海外维吾尔人的发言并非可以全部弥补。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内心想什么。在我看来，能听到一个维吾尔人的心里话，绝对胜过读一百本外人写新疆的书。

如果没有新疆入狱，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穆合塔尔是我的同牢狱友。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不同时间所写，但都和穆合塔尔有关。第一部分是我离开监狱后的追忆，记录了我被捕经历，包括与穆合塔尔的相识。

第二部分是我出狱后四次重返新疆的经历，是根据当时的旅行日记编写。四次我都和穆合塔尔见了面。新疆对我的吸引，穆合塔尔已经是主要因素。那四次游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没有机会自己游历新疆的读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尽管走马观花，却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我对穆合塔尔的访谈。那是按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除了理顺口语，基本保持原貌。你会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倾听一位维吾尔人敞开心扉。那席话将会带你直接进入新疆问题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对新疆问题的思考。写在我给穆合塔尔的信中。虽然被放在书的最后，却不是结论。本来计划等待穆合塔尔回应，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书。但是关系到维吾尔民族命运的话题，光靠写几封信是不够的，需要由穆合塔尔写出自己的书。

我为此书致谢的人可以开出长长名单，然而还是像以往在中国境外出书一样——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公开。我只能心怀感激，默念名单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穆合塔尔。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显而易见，那不能让需要防范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让对他无害的读者不知道他是谁。从这个角度，公开他的名字不会更有害，也许还能对他多一点保护。

不过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这样做不会是一个错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梦见，我和穆合塔尔又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恐惧，没有忧伤，好像那就是该有的命运，只是安静相对，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相逢穆合塔尔

——追记一九九九年新疆遇难

研究新疆问题

一九九九年，正是诺查丹玛斯预言「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那一年，我在寒冷的一月进入新疆。

我要讲的故事都是在新疆发生，因此在故事开始前，有必要先把新疆情况做个概述。新疆全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亚洲的中心、中国的西北，面积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对数字没感觉的人可以这样比较：新疆的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六个半英国；甚至新疆的一个县——若羌，面积也接近六个台湾，十个科威特。

新疆有三座主要山脉，北部的阿尔泰山是与俄罗斯，蒙古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边界，南部的昆仑山形成与西藏的自然边界。一千七百公里长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北疆有准噶尔盆地，南疆有塔里木盆地，新疆以此被概括为「三山夹两盆」 的地形。 其中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二千一百公里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二〇〇四年，新疆人口将近二千万。九百万人的维吾尔族是最大民族，占新疆总人口的 46%；汉族七百八十万人，占总人口近 40%；哈萨克族人数第三，一百三十八万；然后是回族，近八十八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为十几万人，其余民族皆在几万人以下。[①]

新疆的民族情况和边境情况非常复杂，五千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八个国家为邻（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中国各省区接壤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汉族以外，新疆当地十二个民族中有七个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新疆接壤的八个国家中有五个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新疆本土民族中有五个属突厥民族，多个毗邻国家的主体民族也是突厥族，并且通向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有六个民族跨界存在，其中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四个民族，相邻国界之外就是同民族的独立国家。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伊斯兰世界、泛突厥运动等很多因素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复杂异常。

近年，「新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过「西藏问题」，成为北京最头疼的民族问题。所谓的「新疆问题」，核心是「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疆曾两次建立「东土耳

[①]截止二〇〇五年底，新疆人口为 2010.35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60.4%，其中维吾尔族 923.50 万人，占总人口的 45.94%；汉族 795.66 万人，占 39.58%；哈萨克族 141.39 万人，占 7.03%；回族 89.35 万人，占 4.44%；其它民族都不到 1%：柯尔克孜族 17.15 万人；蒙古族 17.17 万人；塔吉克族 4.40 万人，锡伯族 4.15 万人，满族 2.46 万人，乌孜别克族 1.51 万人，俄罗斯族 1.12 万人，达斡尔族 0.65 万人，塔塔尔族 0.47 万人。（《新疆统计年鉴二〇〇六年》，中国统计出版社，88 页）

其斯坦国」。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疆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伊斯兰共和国」，维持了三个月；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疆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共和国」，长达一年半，后在苏联压力下以「三区革命」之名归顺中共。中共执政的半个多世纪，新疆发生的多数有关民族问题的事件，几乎无不打出「东土耳其斯坦」之旗；境外流亡的维吾尔人组织也多带有「东土耳其斯坦」之名。[①]

我在一九九九年去新疆，为的是进行研究新疆问题的前期准备。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对于一个国家，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只有领土分离覆水难收。中国历史上有过外蒙古独立，占中国领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西藏和新疆若再分离，中国将难以承受。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天葬》一书，就是希望以西藏为切入点，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搞清楚。

本来我没想接着搞新疆问题，但是 Q 在这时出现了。他是中国改革年代的闻人，有魅力也有建树。他的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使我们成为朋友。Q 欣赏我在《天葬》一书的研究框架，主张我一鼓作气把新疆问题也做下来。他主持的研究机构愿意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研究完全按我意愿，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我只多了花钱自由，却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真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别人的钱搞过研究，那感觉一定很愉快。新疆问题迟早应该做，不要过了这村没那店，我因此动心，最后接受了 Q 的建议。

Q在赵紫阳[②]下台后离开官场，他的研究机构不属于官方，不过似乎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这种「递折子」被自由派人士不屑，但Q认为那是「臭知识分子」的「爱惜羽毛」，本质是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社会状况与变化更多是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因此不能放弃影响当权者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看法。

深入维吾尔人

一九九九年元旦刚过，我怀揣 Q 的资金先到宁夏。那里有我在一九八四年漂流黄河时认识的回族朋友阿克。当时他在黄河水文勘测队当水手，最清楚黄河水情的险恶。他看到我的筏子简陋，送给我一件救生衣。他那时的眼神是认为我去送死。亏了那件救生衣，筏子在官

[①] 「东土耳其斯坦」是争取独立的新疆当地民族人士所用的中文译法，中国官方将其称为「东突厥斯坦」。我在本书使用「东土耳其斯坦」，引用文字时则遵照原文用法。

[②] 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1980 年到 1987 年任中国政府总理，1987 年到 1989 年任中共总书记。1989 年天安门事件时，因为反对邓小平的镇压决定被撤销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余生。

仓峡激流中翻覆后我才得以脱险，活到今天。阿克今天已不再开船，成了老板，但是仍然怀念当年浪迹天涯、以酒当歌的岁月。事先听说我去新疆，他一定要同行。我正好也想把回族同新疆问题一块考虑，阿克对此能提供帮助。于是我们约在银川会合，开着他为此行专买的桑塔纳 2000 轿车上路。

在宁夏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后，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那些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当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在冬日下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以前来过四次，走遍了大多数地方。不过那都是旅行，与研究无关。这次我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的「鸿春园」旅馆。我不跟阿克去其它地方玩，留在乌鲁木齐，到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收集文字数据——这是我此行第一个目的。我的计划是随后用几个月时间阅读资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考察做准备。

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人。在汉人圈里研究新疆问题无疑是荒谬的，然而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者正是如此，他们把维吾尔人看成不可接触。记得一九九三年我打算开车从乌鲁木齐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汉人无不劝阻，大肆渲染维吾尔人的凶险，列举汉人受到的攻击。为了求证，我专门去了新疆军区。接待我的军官强烈警告，一辆汽车不能单独去南疆，如果非去不可，要遵循「三不」原则——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军队人员全都遵循这「三不」。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循「三不」，我不知道去那里还有什么意义。

这当然有新疆汉人的夸张和自我惊吓，但现实中的确也能感受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这就是需要结交维吾尔朋友的原因。只要有一个维吾尔人愿意接受你，其它维吾尔人就会对你温和有礼。我计划夏天采访维吾尔普通百姓，靠自己闯是找不到门路的，必须有熟人相引。因此这次到新疆的目的，结识朋友比收集资料更重要。

这次我终于能够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是因为一位海外维吾尔人看了《天葬》，希望我能写出一本关于新疆问题的《天葬》，因此给我介绍了他的表弟。我在乌鲁木齐见到那位表弟时，他刚参加出国英语考试，一见面就向我感慨，填写考试表格上的民族栏时，列出的九十九个民族竟然没有维吾尔族，因此他只能在「其它」一项上打勾。

「藏族比我们人口少，表上却有藏族！」他说。「虽然我们有近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可是世界似乎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民族，更不要说知道新疆问题。」

从认识表弟一个人开始，我逐渐扩大接触范围——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介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在餐厅和酒吧里的一系列彻夜长饮中，为夏天考察的安排逐渐成型。

他们帮我联络关系，找翻译和车辆。有 Q 的资金支持，加上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对做出一个好的研究开始有了信心。

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相反的是，新疆汉人反倒和我保持距离。走前我找人介绍的关系，到新疆却发现基本没用。所见者大多冷漠疑虑，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问题需要由我搞。接触稍深的只有两个人，他们都和我随后的遭遇有关。

其中一个是某官方通讯社驻新疆分社的 L。北京一位朋友拍胸脯，L 是他当年的小字辈，不会不帮忙。L 的位置肯定知道很多新疆情况，因此我把他当作最重要的关系。但是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一口推脱忙，完全没有见面意愿。对此我虽然失望，但也不奇怪，我没有官方身份，遭冷遇是寻常事。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 L 的电话，要请我吃饭。我不免内疚错看了他。当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办公室，他马上叫来三个年轻记者一块去吃饭。他说年轻记者常在下面，了解情况多。但是在整个吃饭过程中只有别人讲话，L 几乎不开口。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些不安，似乎对我有种排斥。吃完饭我们就分手了，彼此都清楚地知道从此不会再来往。

让我重新想起 L 是在被捕以后，审问者重视每一个我接触过的人，唯独不涉及 L。L 属于「要害部门」，本该最被重视，这不合常理。正是这种不涉及让我产生怀疑，L 请我吃那顿饭是不是被指派的任务？在监狱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半带消遣地勾画那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电话窃听到我与 L 接触，想通过 L 了解更多情况。他们去 L 的办公室，亮出证件，客气地请他协助。L 也许并不愿意，否则吃饭时不会对我那样生硬，然而他也不敢拒绝。虽然他供职的机构牌子够硬，他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于是他约了我。对他而言只是应付一件讨厌差事，拉上几个年轻记者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也无需直接对我「刺探」，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就可以得到了。而在审讯我时，既然 L 见我的过程都在掌控之中，也就不必再问。

当然，这纯粹是我的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如果不是真的，我会非常乐于向 L 道歉。但即使真是如此，我也能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被卷进去。

兵团老战士

我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

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类型。它是共产党进军新疆后，改编国民党的投降部队，加上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形成的，保留军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功能类似古代中国在西域的「屯垦戍边」。发展到今天，「兵团」已成为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下属十四个师，一百八十五个团，总人口二百五十四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①]

兵团是新疆最大的汉人组织，被北京列属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新疆到处都有兵团「团场」——这个独特的词是指兵团的团级单位占有的「领土」。新疆基本每个县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兵团的「团场」，有些地名干脆就用兵团团场的番号命名，并且印在地图上。兵团有自己的城市乡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兵团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一九八一年视察新疆时把兵团说成「稳定新疆的核心」，而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对于研究新疆问题，兵团是最重要的方面。

J退休前担任兵团的高级职务，赋闲在家仍时刻挂念兵团。他对兵团现状感到焦虑，因为兵团地位比起「政治挂帅」的年代正在下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几千公里的中苏边境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百姓，建立起一条纵深十至三十公里的链状边境农场带。那时有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巡逻，被喻为「反修防修」[②]的「血肉长城」[③]。兵团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却拥有不退役的百万兵员，兵团领导人自夸「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④]。

兵团也许适合「屯垦戍边」，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四十多万[⑤]）。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这种民谣即是对它嘲讽性的描画。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而「兵团老战士」J 却认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 http://www.bingtuan.gov.cn/gaikuang/f_file_v.asp?p_index=25gk&p_id=64

[②] 「反修防修」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缩略语。其中的「修正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常用于针对苏联的代称。

[③] 「血肉长城」是毛时代常用的比喻，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之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④] 兵团创始人之一张仲瀚(1915—1980)如是说。

[⑤] http://www.bingtuan.gov.cn/f_search_v.asp?p_index=251020&p_id=186

兵团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由我们自己做了，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杭州西湖的水，宴席吃掉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 J 数次长谈，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很打动人，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兵团的确已经长成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治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要找出一条现代社会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宪法没有兵团立足之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非常复杂，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治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不断发生失衡，必须随时调整，修补局部，以求在夹缝中拓展空间。那些具体应对虽不乏巧妙，但是经年累月，层迭盘错，却变成整体的畸形，且牵一发动全身，越难改革，困境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状态和问题的症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着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位置，现实中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新疆全境，总面积达到 7.43 万平方公里[①]，超过一个宁夏或两个台湾；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任命的政权体系。在北京下发的各种档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中国宪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像新疆的石河子市，行政建制是新疆自治区的区辖市，同时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地盘和师部所在地。这座拥有二十九万市区人口的城市，一九五〇年还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今天的模样。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似乎不能说没理。但是法律却无法那样认可，它必须是属于新疆管辖的一座城市。目前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实行所谓「师市合一」体制，由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市长。这本身就有矛盾——作为师长，应该是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是由石河子市的人民代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 一九九八年》

表大会选举，到底按什么执行呢？遇到这类问题，兵团当然会坚持自己实质上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困境，兵团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挑战，兵团就会本能地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为了新疆的主权稳定。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 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也不能以开放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必然是要把新疆当地民族当作被看管的对象，兵团因此会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它受到当地人民敌视、遭遇地方势力抵制也就是正常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种研究可想而知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迭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就让人头大，那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既然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就有意识地开始收集与此相关的材料。

以作家身份窃取秘密文件

在中国做研究，没有官方身份无法得到官方信息，甚至进不了官方机构的门，在新疆更是如此。我离开「体制」二十年，Q 的研究机构属于民间，照样给不了我身份。但是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唯一能利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我在八十年代成为作家协会会员，那时的目的也是让自己有个身份，不过从来没用过，我和「作协」也一直没有过联系。

按照章程，作家协会有义务协助会员进行创作采访，别的提供不了，至少能开个介绍信。于是我拿着会员证去「作协」，办出来一张纸，上面的红色公章和正是我需要的。到新疆后，我与官方机构打交道、采访和索要资料，全凭这张纸。这是我加入作协十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不过，作家不是官，仅有作协会员的身份，照样无法接触「秘密文件」。所谓「秘密文件」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机关内部档。当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跟兵团有关的法规时，有一天喜出望外地在兵团机关

某个办公室发现了一本「文件汇编」。那厚厚一本装帧简陋的内部印刷物，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多数文件。如果能拿到那个「文件汇编」，对我可以省太多事！然而在我试图索要时，却被办公室的人严肃告知——「内部文件，不可外传!」。

「文件汇编」封面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中国当局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也就往往不是秘密。那个「文件汇编」成了我的一个心事，很想拿到，不是看一遍，而是自己有一本。从法律角度研究兵团，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个字。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兵团研究能不能搞下去，前提是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我去见「兵团老战士」J 时，事先就在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 J 的身份，肯定会有「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刚一坐下，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和 J 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写信，再加上作家协会的介绍信。J 没有下层官僚的习气，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希望把他的话传到北京决策层。我这个「作协」来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难免显得有点神秘，容易让人联想起「特派」之类的角色。J 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阅那本「文件汇编」时，J 爽快答应。我轻描淡写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要复印。为复印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有复印店，但是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被复印店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因此被新疆警方拘押。我若复印一整本文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好不容易辗转一番，最后是托熟人在办公室私下做了复印。

我把「文件汇编」还给了 J。因为担心邮寄丢失，没把复印本随资料寄回北京，而是带在身边。这样，我的新疆之行圆满结束，踏上回程，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开的罗网，丝毫没有觉察。

秘密警察的跟踪

事后想起感到奇怪，似乎被捕前的那段时间，我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照理说我刚出版《天葬》，同时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而官方正在加强政治镇压，我为何会在这时失去警惕呢？

进监狱后，想起来新疆前与两个外国人谈话，不免感到惭愧。我在谈话时这样解释中国政治——今日中共比过去聪明，虽然打击底层造反者依然强硬，却可以容忍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立场的知识精英。因为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产生的思想资源也可以为他们所用。我说那话时，显然把自己定位于能为当权者所用

的知识精英，似乎只要与底层造反者划清界限，就可以被恩赐持有异见的特权。我的安全敏感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这种肤浅认识的结果。

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明确否认，我自认研究可以对当局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可想而知，带着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记录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想过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可以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了解到，那是秘密警察的工作习惯。只要目标在他们掌控之下，就不会着急抓捕，而是要拖到最后一刻，让目标尽量多活动，以发现更多线索。

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进入中国内地的路虽有两条，实际等于是一条，因为从若羌翻阿尔金山去青海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绝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那条路的新疆甘肃交界处叫星星峡，新疆警方长年设有堵截抓捕的关卡。那里将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线。

懵然不知的我开车穿越天山，车内暖气融融，隔绝着外面的冰雪。听着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西域音乐，阿克在旁边座位沉睡。在孤独中欣赏窗外风景，是我喜欢的状态。一辆日本造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引起我注意。后来我才知道，那车里就是即将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时，日本吉普车又一次超过我，径直先进城里。前夜我打电话跟乌鲁木齐友人告别，说了今天会在吐鲁番过夜。十几年前我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希望故地重游。我向友人询问了吐鲁番旅馆的情况，因此监听电话的警察不仅得知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要住哪家旅馆。他们先进城，应该是提前去旅馆安排监控。然而我进吐鲁番后，看到满眼都是平庸陋俗的「现代化」，便一路往下希望找到当年的感觉，以不枉多年的怀念，结果穿过整座城市都是一个模样。我便失去了再进城的兴趣，干脆一踩油门开往下一座城市——哈密。后来听说，秘密警察在旅馆等不到我，着实忙乱了一阵，以为我布了个金蝉脱壳的迷阵呢。

傍晚到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饭后阿克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黑夜哈密迷宫般的小巷转了两三个小时。回到旅馆，阿克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却说刚来了一帮警察，把我们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理由没说，让明天去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阿克捉弄我。我和阿克讨论可能是什么事。车是在我到银川后阿克才买的，上牌照至少要十天，我们不想等那么久，就用新车的「移动证」上路了。所谓「移动证」是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买车时阿克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不用牌照就可以往新疆走，现在反着往回走就成了问题。交通警察如果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

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

后来在监狱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就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二百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关卡前下车，趁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行，步行三十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多了。不过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未产生，也就没有后悔的理由。何况阿克的车被扣，我也不能甩下他。

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先去哈密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那里挤满人，人手一只烟，个个都在谄媚警察，托关系走后门。警察们大权在握的模样，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等。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没人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穿毛衣的中年人向我招手，让我受宠若惊，总算有人理了，反倒没深想他为什么要理我，不理别人？那人不像其它警察，态度和蔼可亲，对我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轿车是一辆黑色桑塔纳 2000，无牌照，跟你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觉察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反驳。他又说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着就事故时间、地点等提出的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标明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照片上的脸却明显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从挂着「指导员办公室」牌子的房间里叫我，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当地人从门外路过打招呼，却称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我当时已经顾不得对此深想，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害死了一个人上。那是人命关天的事，使我深受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阿克在交通队旁一个清真小馆吃面时，我向他说了刚刚了

解的情况。阿克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阿克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却没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不休。

下午，总算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处理。于是我让阿克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编织出当时情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失去我的踪迹，虽然忙乱，但是并不慌张，因为我们只有星星峡一条路，一个电话就能布好堵截，我们插翅也飞不过去，同时沿途城镇的警察都会查找。哈密警察就是在对各旅馆进行检查时发现了我们。只是那时天已晚，执行抓捕的秘密警察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赶到哈密。于是哈密警察就编造了一个交通事故，先把车扣下，让我们无法跑掉。第二天在交通队也是继续拖时间，等待执行抓捕的警察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薛」姓的处长（后来再没有露过面），真实身份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来交通队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肯定一直有便衣监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从吐鲁番赶来的警察应该在下午二点就到了，那时我在交通队的走廊里看书，一个人看我的眼神奇怪，我以为是在交通队那种不读书的地方有人读书显得异类才被那么看。等到抓我的人冲进旅馆房间时，我发现那人也在其中，已经换上警服。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想也没想就去开门。黑压压一堆人随着门开轰然涌入。最前面是一个两米身高的大个（后来我知他是前排球运动员），把警官证亮在我眼前，随后宣布我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依法对我进行搜查。另一些人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如同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复印的「文件汇编」可能是他们的目标。我把那复印件从包里拿出，问他们是不是找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知道），就可以名正言顺拘捕了。随后一切按程序展开，检查物品，一一登记。他们扣留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搜查中间阿克回来，照相机和摄像机又一齐对准他。他愤怒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跟警察说，我做的所有事阿克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

慰——不会连累阿克，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我对他保密，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出发前他要我带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未完成的书稿，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的「反动内容」倒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阿克被分开带走，被捕期间再没见过面。后来听说几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胡涂被我利用了。

「反间谍支队」的罗网

被捕的第一晚我被关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中。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起初我没认为事情有多严重。即使复印的文件有「秘密」字样，但类似的「秘密」到处可见，无人在意，也少有人因此担上罪名。不过我没说复印文件是为做研究，也没有扯出 Q 的机构。虽然 Q 有言在先不需要隐瞒，但是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着中国作协的介绍信，扯出个民间研究机构容易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新疆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原稿从哪来，我知道警方一定已经掌握，要做的只是别让 J 担责任，便告诉审问者我如何拿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再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 J，因此 J 借给我「文件汇编」不属违纪，我进行复印他也不知情，一切责任在我。

我马上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正是审问者需要的。既然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有了进一步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写书，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的关系，以写书换稿费可以被视为间接出卖情报。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下子就让我能清楚看到。他们的审讯手法讲究迂回，不会让你猜到引向何方，以免你躲避陷阱。我开始担心，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会是仅为办一个复印文件的案子吧？

第二天才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我意识到事情可能比我想象得严重。发出拘传文件的单位栏里填写着「哈密地区国家安全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一九九九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在这一年里，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打压民主党组党，重判了民主党骨干，还有数位知识分子被捕，以及民间知识分子组织被禁等镇压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现在才开始认真面对，我会不会也是当局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要动的一颗棋呢？抓我可以

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惩罚！ 而对不久前出版的《天葬》，就更有直截了当的恫吓效果。

第二天，我被押上那辆一路跟踪的日本越野车返回乌鲁木齐。一栋外表看上去像老式居民楼那样普通的建筑，铁门紧闭，进出复杂。那是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展开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就是那单元房内一个小间，铁栏封窗，窗上结着厚厚冰花，不透视线。

专业屠夫的宰割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那间小屋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初期审讯者是一位哈密安全处的警员，完全用对待罪犯的方式。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便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员态度不好被撤换，着实让我心里温暖了一下。但是不久我就明白，先出场的人态度蛮横是一种有意安排，他们总是有人演红脸，也有人演黑脸，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在我还不能看懂这种手法的时候，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遇到了知心人——这就是黑脸先出场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坐在审讯桌后，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却给了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员小李动辄叫我「王老师」。可是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种方式比哈密那警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黑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地围着你聊天，说都是为了你早获自由，要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再问和乙又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丙？好，那再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对我形成极大压力。虽然我可以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我这次接触的人都属泛泛，没有实质内容，所以不会造成任何连累。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让我免不了有出卖的感觉。

除非是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当年对付审讯那样[①]。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却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真实目的是做新疆问题研究，复印文件不是为了写书，更不

[①] 张春桥（一九一七—二〇〇五），毛泽东选择的文革领导者之一，也是被否定文革者所称的「四人帮」之一。文革结束前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宫廷政变中被捕。一九八一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在整个法庭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一言不发。

会危害国家安全，相反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帮你解脱的幻想，就不会有勇气不回答审讯，顶多是不说对他人不利的话。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被审者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者的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审讯间歇除了看守者，其它人全退到另外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听得到人来人往）。我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在离我咫尺的地方，合伙算计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着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分不同步骤与层次，经常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目的。也许每次问的是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你觉得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害，然而分开来看无足轻重的问题，合起来却可能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钻进套中，而在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在每份审讯记录上都签下了「属实」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但他们并不相信：如果真是做有利于国家的研究，为什么一开始不说，而是说写书？何况你研究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也要写成书吗？我能感觉他们是在往这样一条路上引导：我多年一直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换取金钱。我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以写书换钱，直接窃取秘密出售岂不是更简单？

出版《黄祸》和《天葬》两本书的明镜出版社，在中国情治部门眼中一直是重点怀疑对象。我和明镜来往密切，明镜在海外出版的大量涉及中国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会不会有我提供的情报？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逻辑，甚至可以怀疑，我就是明镜出版社在国内搜集情报的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出版社的金钱往来上，明显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担心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在香港有一个账号，由明镜出版社一个朋友与

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为的是收明镜付给我的版税。按规矩银行每月会寄一份账单给我。在来新疆的前两个月，那位朋友的一笔钱被错打进这个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就不再把每月账单寄给我，而是寄给明镜的朋友，因此从我抽屉里存放的账单上，能看到有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又被原封不动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只能是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我怎么说清楚呢？可以作证的因素都在海外，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审讯又转向我的花销。我的回答更是混乱，因为我基本不理财，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特别像有鬼。在审讯者看来，我的生活方式需要不小的花费才能支持，如经常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能查证车属于阿克）。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不止于经济，还可以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模样呢？就凭我对他们的监控毫无防范，从未有过任何「反侦查」，也足以说明我不可能是搞「秘密活动」。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打消他们的怀疑，别往那种方向引导案情。

但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他们因此就会放你一马，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在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了解到对方不是坏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他们个人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比老一代温和，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说他们是职业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们完成工作，别砸他们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利益，取决的不是能否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我开始恐惧

当我明白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当局需要与否，就真的陷入了恐惧。早有人提醒我：当局不动我则已，动就会置于死地。今天是不是是不是到了跟我算账的时候呢？

曾有知情者告诉我，八十年代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在

「清除精神污染」[①]和「严打」[②]名义下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对政权有威胁，由此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在他们形成知名度以前，就把他们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锐气，不让他们为人所知，党国未来可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因此幸免于难。是否真有那名单我不能确定，但是对专制政权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八十年代就把我关进监狱，后来也就没有《黄祸》和《天葬》。现在他们是要亡羊补牢吗？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条文，我犯的罪应该判五到十年，数罪并罚就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从来无拘无束的我对失去自由的生活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恐惧便会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七十多岁的母亲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能在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跟我有关的事情，而是说：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反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着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是真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着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听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之后（甚至还在服刑期间），就没有人再提起他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的目的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着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始终提心吊胆。

被切断一切信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形成幻想。那幻想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经验。八十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

[①] 一九八三年，面对文革之后中国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开放，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发起的一场企图扼制中国变革的运动，但在中共改革派反对下半途而废。

[②]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简称，为了扭转混乱的社会治安形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从一九八三开始，开展对刑事犯罪分子“从重从快集中打击”的运动。运动历时三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因为在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从我这得到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谁定为我的同谋，断送其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我的猜测有合理成分，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中共以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专制政权而言，做出我猜测的事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从已公开的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一九八七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主管波普的公安部二十二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
>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网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
>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
>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
>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一九八七年三月。
>
>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过足以让人看到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二者都要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放你，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又怎么会放人？然而那时我像抓住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存在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有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是预料之中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是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消除了误会哈哈一笑，眼前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缩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是有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也算不上出卖。

再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我到外面采访用什么身份，我先为我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个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他给我开一封介绍信，但不要求我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活动颇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怕影响仕途和我断了来往，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我想象，这应该是早被情治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没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中间的兴奋如此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打击使我脑子整个乱了。

审讯结束后，姓任的警员让我在每页记录按下手印。我要求重看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沮丧。虽然理智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情治部门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新疆警察地处边隅，掌握资料不充分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见面已告诉我他受了警告。他在仕途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可维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一旦有影响仕途的可能，就只能和我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他那仓惶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着我的

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着怨我毁了她家前程，幼小儿子在后面牵着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黑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我的视野，那印证着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着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建议他们自己去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出卖」了。这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是否搜查不会取决我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着，杨科长坐在门口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自杀前的收支计算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状态需要做最坏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会抵抗不住。我必须知道那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因为我抵抗不住而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一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记得早年和女友在黄土高原搭车，卡车在冰雪坡路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不见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着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的念头是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向车轮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方向，撞上另一侧的土坡停了下来，那闪念究竟只是冲动还是会成为行动因此没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都会得到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自由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着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一些细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让她老年再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仁慈。还有一个声音说，你致力的递进民主制呢？如果你的目标是改变历史，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那声音被更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历史？！

这时有其它办案人赶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要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放松了警惕，没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

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一直信奉的无神论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希望宇宙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着我，他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常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道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摸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动脉。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肉里。手指碰到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下一步是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相信父亲完全有可能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他怎么会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在最短时间把我送进医院，血也会流得一滴不剩。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着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着扑上来抓我的手，其它人也都随之冲进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地。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一齐爆炸。我喊叫

「我不做一摊狗屎活着」！那话是想给现实世界留下一个最后声音，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星空软弱地求救，上帝啊，请给我勇气！

医院的日子

我被送进医院，据说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因此失掉的血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没有坚持。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人处长（我曾看见他出入）这回也走到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的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看到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级干部病房，因为那种病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自成一体，适于看守。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只要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我怎么肯付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者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应对审讯的说法不能是就事论事，必须通盘斟酌。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让被审者没有时间形成整体的自圆其说。而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会在不同问题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崩溃决定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期间每天从早到晚，我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自己，又能不连累他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同时对付失去自由和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模拟审问，所有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施展的手段，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做到左右逢源，不被击破。那是一种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前功尽弃。那种庞大工程常让我疲惫不堪。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同时也使我在办案者眼中更加可疑。如果不是有重大隐情，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我要给办案者一个能打消这种怀疑的解释，便告诉他们是因为心理崩溃。这种解释没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以自杀躲避，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一种崩溃。

我还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解释自杀行为，办案者也愿意接受这种解释，这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减小责任。

现在回头来看，自杀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我心理素质脆弱，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的新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恐惧死亡，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死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不能放弃的事物。

不管怎么样，医院的日子使我逐步恢复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紧张，即使我出不了病房也知道有事发生。主管我的维族处长来了，他自我介绍叫库来西，说是刚有一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枪击，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看来新疆并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我似乎闻到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库来西姿态豪爽，说话直率，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显得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很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拿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库来西的豪爽只是表面姿态，等待我的将是更多难关。

库来西要我「竹筒倒豆子」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随之又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外面世界。汽车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着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设在米泉县的看守所。即使对安全厅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路上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黑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

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杨科长再次展开纸张朗读，这回向我宣布的是「依法拘留」——比「监视居住」升了一级，随后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整个过程都有人摄像和照相，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这些场面的作用是什么，也许只是上级拨款添置了新设备，不能闲置？

我刚被捕时，办案者是防止走漏消息。那时允许我给家里打了一次电话，是因为没有电话家人会到处找，反而麻烦。通话时杨科长贴身站在我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那次我告诉母亲要下乡几天，不久就回，心里也的确抱着不久能回家的希望。

这回有了变化，向我宣布完拘留，便要给我家人寄拘留通知书。他们不再怕公开，说明已决定进入法律程序。而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也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这时早点让外界知道真实情况有好处，营救活动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家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日。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节日好过？于是我提出暂时不发拘留通知。办案者让我把这一要求亲笔写在通知书上，表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同意我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我向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整个春节期间都无法联络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进牢房前又进行了一次审讯。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使我感觉好像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面前有桌子，唯独我坐在一个孤零零的凳子上。

库来西第一次出席审讯。他比我年龄大一些，看上去挺能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书里引用的内部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书后全烧了；问我写完书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是从垃圾堆捡的，十分肮脏，无法保留。库来西这回不再亲切，眼光严厉并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中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着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孔，我心里浮出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 库来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早有人这样评价——中国所有用国家资金搞出的西藏问题研究，加在一起不如王力雄的一本《天葬》!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看守我的办案者疲惫不堪（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对付未来的挑战。

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是公安系统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那是一个大墙所围的院子，昼夜有持枪的武装警察在上面巡逻。院里有八栋一模一样的独立小屋，彼此相隔二三十米距离。每座小屋长宽大概各四米，附带半间屋大的小院，小院围墙上方扣着整体的铁栅栏，如同铁笼。

我的牢房是八号，里面已经有一个汉族犯人和一个维族犯人。牢房里有三个床位，加上我正好满员。待警察锁门离开，我和另两个犯人相互自我介绍。维族人名叫穆合塔尔，因为他的络腮胡子，我以为他有三十好几，实际只有二十七岁。他入狱的罪名是企图组织游行，在北京被捕后送回新疆关押和审讯；汉族犯人被穆合塔尔称为「陈叔」，六十岁左右，秃顶，戴眼镜，是个副厅级官员，因为经济案件入狱。

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安全厅看守所里，少数民族犯人一般都是政治犯，汉族犯人几乎全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管道，与外界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联系少一些，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安全厅看守所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还有一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主动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比公安系统的看守所条件好，犯人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地位。看守所也给他们一定优待，如允许亲人探望的次数多，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我的钱在被捕时叫警察悉数收走，因此进看守所的头两天没钱买东西。「陈叔」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放了多天，已不新鲜，美味仍然让我难忘，使我当时心想将来要还他一头牛（出狱后给他寄了五百元钱）。「陈叔」床铺下面是个大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看）。跟他关押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从他那里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过的伊犁熏马肠和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

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转了。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按我开的单子开车去买食品，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同样是犯人，当地民族与汉族相比境况却差得多。他们多数家不在乌鲁木齐，又是底层百姓，没有疏通关系的能力。我进去的时候，穆合塔尔已经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他母亲从南疆千里迢迢来了几次，希望看他一眼，却一次都没让见，给他带的东西也送不进来。只有送钱看守所愿意代收，为的是让犯人能在看守所内买东西，增加看守所内部人的商业收入。因此穆合塔尔只能根据收到钱知道他妈何时

来过，每次都让他情绪低落好几天。

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不幸的是民族犯人多数没钱。新疆当地民族的收入普遍比汉人低。汉人可以随手花的小钱，对当地民族往往是难事。以吃饭为例，按常规犯人一天两顿饭，每顿基本永远是两个馒头，早上的菜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几乎也不变化。只靠那两顿饭，要不了几天就会有顶不住的感觉。如果想吃饱或换口味，只有自己花钱买看守所提供的加餐。每份八块钱，大部分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日常面食），偶而是米饭和菜。加餐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着上缴，所以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积极。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 1 块钱，因此有很高利润。穆合塔尔的父母是干部，家庭条件还算好，都只能偶尔要加餐，大多数民族犯人则是长年吃两顿，总是处于饥饿状态。

民族犯人除了经济困难，处境也更不利。他们的案件往往与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当作真正的敌人。中国以往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恶行为的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只剩下民族主义被当局用于整合人民思想，不断强化。在民族主义煽动下，新疆汉人普遍仇视当地民族的反抗行为。安全厅看守所的警察更是要使用手中权力，让「搞分裂」的当地民族犯人尝到「国家铁拳」的滋味。

不知从什么年代延续下来，犯人对看守所警察都称「管教」。在所有「管教」中，我只看到过一个维族人，其它都是汉人。那位维族「管教」的姓名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不过我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所见的维吾尔人那样开朗。他对犯人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维语，也没有任何照顾与怜悯，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受极大的压抑。连跟汉人混得不错的维族人都常有受辱感觉，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有维族人，歧视和侮辱的话可以随时脱口而出。即便是对某个维族人表示好感，赞美的话也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维族「管教」不知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却只能压在心底。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狱中生活

我很快适应了环境。总体来说，牢房好于我原来的预期。「陈叔」说这里最早是情报部门的培训基地，用于训练派出当间谍的特工。只是那时卫生间是封闭的，现在暴露在牢房中，靠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遮挡入厕。我们牢房的马桶有问题，昼夜散发不良味道，好在闻长了，嗅觉也就变得麻木。屋内有一个暖气片，但是年久失修，名义上供暖，摸上去只是不冰手。还有一个火炉，看守所有时会发点柴和煤，

可以在最冷的日子生火取暖。让我高兴的是那个屋外小院，虽然几步就会走到头，毕竟可以随时呼吸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如同井口的天空永远衬映着倒扣的铁栅栏。

在这样的牢房里，只要「管教」不出现，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可以俯视院里的位置，就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牢房内有摄像头的「正规化」监狱，不知好到哪里。除了提审和有特殊事情，「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个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在铁门上「咣咣」敲几下，犯人就得以最快速度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在旁边看着。还有一个时间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来，带着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酒喝多时容易找茬，多数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也只能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明智，他们只是执行者，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当时背下的监规记录下来，存进计算机，再找时却发现没了踪影。后来才懂得那是「有关部门」的黑客所为。我现在能记住的内容，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如果保留下来，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

大年三十那一天，「管教」进牢房问谁会包饺子，我和穆合塔尔都说会，便被带到食堂。穆合塔尔一上手就露了馅，他连一个完整的饺子都包不出来，一看就从来没干过这活。「管教」骂了他，把他送回牢房。后来他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到牢房外面走一趟，哪怕是一会。去食堂的路上他看到了大墙外面的博格达峰，心里感觉非常舒服，根本不在乎「管教」骂不骂。

每个参加包饺子的人都往饺子里塞尽多的馅，因为每人只能分到固定个数的饺子，馅包得多就可以吃得多。但是明明包出的饺子鼓鼓，煮出来却变得瘪瘪。老犯人都明白，那是因为包进去的不是羊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在长久胃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会腻住。老犯人说，春节给犯人吃一顿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肉都被「管教」分了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在看守所里，「管教」克扣伙食是犯人不衰的话题。我听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连办案人员给我买的食品，送到我手里也发现有短缺。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院子里看得见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陈叔」情绪波动很大，因为一点小事与穆合塔尔发生了争吵。我劝开他们，拉穆合塔尔到小院里抽烟，向他解释汉人有「每逢佳节倍思亲」之说，「陈叔」肯定因为思

家心切才会一触即发。穆合塔尔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在维族犯人眼里，同狱的汉族犯人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也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不过，穆合塔尔对我倒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有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穆合塔尔的罪

穆合塔尔从小在南疆上「民族学校」。「民族」是「少数民族」的简称。新疆有两个独特的术语，一个是「民考民」，意思是民族学生考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另一个是「民考汉」，意思是民族学生考用汉语教学的学校。穆合塔尔是「民考民」。「民考民」学生汉语一般不太好。不过穆合塔尔后来到中国内地上大学，必须用汉语，因此他虽然口音重，用词不是很准，却不妨碍交流，他要表达的意思我都能明白。比如他经常说起「我的罪」，完整意思应该是「他们加给我的罪」。

穆合塔尔入狱的罪名，是他企图组织维吾尔人在北京进行一次请愿，抗议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想法，口头上做过一些讨论，并没有实施，而且已经决定不做，因此即使按照不允许人民表达意见的专制法律，也不该算有罪。但我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关了一年。他在法庭上虽然坚持自己无罪，却不指望法庭真会判他无罪，顶多是希望少判一些。

穆合塔尔要进行的请愿，正是维吾尔族与汉族关系不断恶化的一种反映。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关系多数时间都不能算好，现在应该算最坏的时期之一。即使是毛泽东时代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但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民族矛盾也没那么突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维族农民库尔班骑毛驴到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也许那是宣传，但我的确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融洽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那时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中国内地更是到处把少数民族当作欢迎对象。他们当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为了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在最近十几年，民族关系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的隔阂越来越深。甚至在同一住宅区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团伙，互相之间除了打架没有其它来往。

导致民族关系恶化的，主要是当局政策，与汉人行为也有关。新疆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九九七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为了防止炸弹，政府曾要求在公共场所对人们携带的包进行检查。但是检查者对汉人的包只是走形式地扫一眼，对当地民族人士的包却百般细查。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当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拦住盘问；新疆面孔的人拦出租车，到处都不停车；住旅馆也常遭

拒绝。

我见过一位乌孜别克族的大学教授，一副学者形象，很有风度。他讲去上海出差时，火车晚点，深夜下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没带雨伞，冒雨跑进车站附近一家小旅店，已是全身湿透。旅店值班的是个老太太，只因见他长着新疆人的面孔，便一口拒绝他住宿，说是按上海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捺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从此发誓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仅这种歧视就足以把很多少数民族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本地民族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对同样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都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又有什么值得奇怪？

穆合塔尔想请愿，是指望政府能出面改变这种歧视，应该还是对政府抱有希望，把政府当成解决矛盾的仲裁者。如果政府能够接纳请愿，调整政策，纠正汉人对新疆当地民族的歧视，本来可以把矛盾消除在萌芽，避免民族关系出现敌对。然而，仅仅因为一个维吾尔青年想为本民族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进行请愿，这个政府就把他关进监狱，而且处心积虑把他判刑。那么，维吾尔人还能用什么方法表达自己的不平呢？这个政府又还有什么权利谴责那些要用炸弹来说话的人呢？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导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我在西北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后又迁回原籍。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把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

在新疆，哪怕从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八十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疆实行乌鲁木

齐时间[1]，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来没有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却几乎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会真的越来越对立。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2]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3]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4]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其它分离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新疆统治表面稳定，却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维持一时，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埋设炸药。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把双方越推越远，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

---

[1]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一九八六年二月起，实行『新疆时间』，即东六区区时；当地称‘乌鲁木齐时间’，主要用于民用的作息时间，铁路、民航和邮电等部门，仍用北京时间。」（http://www.pep.com.cn/200503/ca692073.htm）

[2] 盛世才（1892-1970），1933 年至 1944 年的新疆独裁者。

[3] 王乐泉，男，汉族，1944 年生，山东寿光人，1991 年调到新疆工作，1995 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至今。2002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4]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率部进入新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75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委员。

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中共的椅子杂技

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这使我和穆合塔尔有大量的时间谈话。原来我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成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各民族相互斗争，而是团结起来改变社会的政治制度。我对穆合塔尔这样说，你看，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和你关在一起的命运。不过我也同意他的意见，毛泽东时代各民族是同样受迫害，但是从九十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明显超过了汉族。尤其在新疆，汉人已经与政府结成了压迫当地民族的同盟。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那一方面会缩小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给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将会带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杀。

新疆的情况目前正在在向后者发展。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蛊惑和煽动的精神工具，的确起到了把新疆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政权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民族的敌对。我一直奇怪中共一厢情愿，指望用「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它民族认同，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为我所用，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作为追求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造诣。几千年的权术文化在中共这里集大成，被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

与其权术造诣相反，中共权力集团却极少人文精神。中共执政的

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问题今日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七号文件」制造的民族敌对

在中共眼中，造成新疆问题的原因始终是来自外部的，不是国际势力的阴谋，就是当地民族极端分子的煽动，它自己是没责任的。但是事实上，由中共自己造成的新疆问题更多。

虽说「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思潮的确来自外部，然而这世界永远会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多数自生自灭，或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打转，掀不起大风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个民族所接受，说明现实一定是给那思潮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尽管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的旗号，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打着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在江西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导致以后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国古代小说《镜花缘》里写过一个伯虑国，那里的人把睡觉视为死亡，因此所有人都千方百计避免睡觉，如果有人熬不住睡了过去，其它人一定要把他搞醒，这样有人最终顶不住，倒下去再也不醒——被困死了，于是也就证实了睡觉即死亡，人们便更努力地防范睡觉，导致更多的人长眠不醒。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在现实中的例子还有，如果甲国怀疑乙国是敌人，扩军备战，进行防范，由此引起乙国不安，随之进行备战，于是就成了甲国怀疑的印证，导致甲国进一步反应，而乙国又会跟进。这样互动的结果，原本不是敌对的两国，最后会真的成为敌人。

新疆问题也是这样。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①]，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

[①] 虽然我在这里讨论七号文件，但我迄今为止从未看过七号文件本身的内容，只是靠把一些公开场合看到的只言词组拼凑起来——这是中国特色的研究。

际关系转向了民族关系。这一定性成为中共这些年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七号文件」发布后，中共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结果如何呢？

不妨把恐怖活动发生的次数作为指标来分析。九一一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篇题为《「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文章，其中列举了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一年新疆发生的主要恐怖活动。「七号文件」发布于一九九六年三月，按「七号文件」发布前后统计文章中列举的恐怖活动，如下表：

时间	死亡（人）	受伤（人）	爆炸(未遂)	暗杀	袭击机关	投毒、纵火	恐怖基地	暴乱事件
七号文件前	**12**	**73**	**13** (3)	**1**			**1**	**1**
七号文件后	**44**	**292**	**17**	**10**	**2**	**39**	**13**	**5**

注：死亡和受伤是人数，其它项目是发生次数

两段时间比较起来，「七号文件」出台之前的时间（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还要长一些，然而「七号文件」出台后（一九九六年三月到二〇〇一年）发生的恐怖活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之前的 3.67 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 4 倍，其它爆炸、暗杀、袭击、纵火、暴力等恐怖活动都有大幅乃至成倍的增加[①]。

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当北京用新疆出现恐怖活动来宣布新疆存在恐怖组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中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它的「预期」所造就的？

新疆的确可能已经存在恐怖组织，而且还将继续出现更多的恐怖组织。北京公布的情况肯定存在，然而它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呢？

恐怖活动永远只是少数人所为，如果没有生长的土壤，仅靠自身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更不可能越搞越大。「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汉族肯定不要分裂，同时汉族基本不信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这种路线无论用什么言词修

[①] 九一一之后，新疆的恐怖活动明显减少。当局归为加强镇压的效果，但东土人士的解释是，因为九一一之后的国际环境对穆斯林的反抗斗争不利，所以主动暂时偃旗息鼓，等待时机。

饰，都无法掩盖殖民主义的内含。仅仅存在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的，新疆问题可就真难解决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西部大开发」是否能稳定新疆

中共当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自然解决。这些年搞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感受，的确能感受近年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然而新疆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

以发展经济稳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不管资金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多大，都未见得有效，甚至效果相反。例如北京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当地民族的反问却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价值有多少？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北京认为是何等好心——都免不了会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中共高层也许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缩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结果却会相反，汉族一定会在发展中拿走最多好处。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占近四成的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他们有足够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经济依赖中国内地，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劣势。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会汉语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凡是高层次的职位，大部分都被汉人占据，而煤矿、砖窑、水泥车间的工人，则多数是当地民族。

新疆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当地民族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汉族青年至少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到处是当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打闹。看着那种情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同时不断积累仇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很难预料。

这里当然也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如工程招标只能给最符合条件的公司，不会考虑属于哪个民族。任何经营者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就不会招只懂维语的职工，

再给他们配翻译。新疆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人流民。有些汉人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交当地政府的税费，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种人，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着时间，他们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在当地扎根，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最后变成殖民者。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多少美好说法，在开发资源由汉人掌握、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必然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一位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百分之九十九是维族，百分之九十九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汉族，百分之九十九是公费！」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那里几乎就跟中国内地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地民族有少数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西部大开发」得到好处最多的，只可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沾到一点光，然而布满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迭加在一起，可能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已经接近临界点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高出汉人几个百分点（二〇〇五年维吾尔族占 45.9%，汉族占 38.81%）。二〇〇〇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比起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十年间新疆汉人数量增加 179.45 万人,增长比率为 31.5%，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 150.81 万人,增长比率为 15.9%[①]。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汉人的生育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但人口增长却超出当地民族一倍，只能说明增长的来源是移民。汉人移民多了，就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争抢当地资源，瓜分当地市场，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巴勒斯坦化的发生。

[①] 《新疆统计年鉴二〇〇六年》，中国统计出版社，76 页。

中共目前治理新疆的特点是只考虑眼前。这是中国权力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莫不如此。这同时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崇拜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当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之物，王震又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无法想象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会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要大肆宣传，让每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时，他们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会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不让清真寺开办教授古兰经的学校，原因是有分离主义者利用讲经进行宣传，学经学生也往往成为反抗活动的骨干。但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新疆不让办学，学经者就会去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最终可能在那里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再返回新疆从事恐怖活动，为新疆争取传教自由。

目前新疆当局的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后来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①]。这与中共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然而，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却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充分显示了当权者的蛮横和无知。这种处处置人死地的做法震慑一时，长远只能酝酿更大的爆发。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会真正消灭矛盾，而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和穆合塔尔「谈判」

随着时间，我和穆合塔尔成了兄弟般的朋友。我们最多涉及的话题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可笑，虽然我们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却似乎在充当各自民族的代表，谈论怎样解决新疆问题。

这种「谈判」总是背着「陈叔」，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担负汇报的使命。我们以散步为名，在严冬笼罩的寒冷小院里并肩踱步，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那小院狭窄如笼，尽量缩小步伐也是走几步就到头。每次散步都要来回折返千百回，很像关在笼里的动物。我们不是把「谈

[①]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164 页。

判」当成打发时间的游戏，相当认真，也有争论。只有在高墙上巡逻的武警走到上方，持枪身影投射下时我们才沉默一会儿。

我跟穆合塔尔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维吾尔人自己。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义看上去不如恐怖主义影响大，但今天这么多汉人迷恋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得到汉人理解，这反映了非暴力其实可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但维吾尔民族情况如何，维吾尔人到底在想什么，汉人却几乎完全不了解。这当然跟政府封杀造成的误解有关，然而西藏人的声音不也一样受封杀吗？新疆发生过的恐怖活动和激烈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汉人把恐怖活动跟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当年的《性风俗》事件[①]，也使汉地媒体从此远离跟穆斯林有关的题材，生怕稍有不慎造成事件。这等于中断了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结果使隔阂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性风俗》那本书。当穆合塔尔介绍了书的内容时，使我对穆斯林的愤怒有所理解。穆斯林的激烈反应有其道理，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当然的那样，只是出于极端和非理性。

穆合塔尔也批评汉人的国家主义。为什么汉人提起国家统一就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公理？为什么汉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能有？汉人民主派口说反对专制，但是其它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是否尊重？是用民主方式对待，还是会用专制手段解决？汉族精英动不动就用国家需要为统一辩护，什么台湾岛链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西藏高原是中国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然而国家是什么，只是一个概念，真实存在的是人。汉人为了满足自己需要，就可以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或者干脆牺牲少数民族，这是否就是要求统一的实质？

我跟穆合塔尔说，我同意国家概念应该退后，不过民族概念同样应该退后，因为民族和国家一样是抽象的，真实存在只是具体的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们，怎样能让每一个人都免于恐惧和匮乏，获得自由和尊严，才该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统一不是目标，独立也同样不是目标。如果维族和汉族能够和平分离，各自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对，问题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如果分离一定带来冲突和流血，造成战争、恐惧和匮乏，就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同样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那是不是比独立更好的选择？

穆合塔尔问，为什么不能和平地分离？只要汉族同意维族独立，维族绝对不会去和汉族发生战争。因此汉族民主人士应该去说服汉族人民同意新疆独立，就可以避免流血。我说，谁能完成说服十多亿汉

[①]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书刊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出版的一本书，被中国穆斯林认为以下流文笔歪曲污蔑伊斯兰教教义，诋毁《古兰经》，丑化穆斯林的朝觐巡礼，亵渎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物，导致各地穆斯林大规模抗议，要求处死作者和编辑。其中乌鲁木齐以维族为主的抗议演变成冲击党政机关，当局以武力进行镇压。被称为发生在中国的拉什迪事件。

人的工作呢？我不认为汉人的大一统情结是合理的，但它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也可以通过符合民主程序的绝对多数，要求政府以动武制止少数民族分裂。民主（尤其是当前通行的代议制民主）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维吾尔人足够强大，有和汉人进行战争的实力，最终打出个独立结果，也算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然而维吾尔人口不足汉人百分之一，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相差更远，战争结果必然是维吾尔人牺牲更大。因此我认为维吾尔精英不应该选择战争之路，相反为了避免战争，应该放弃独立，走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

这种逻辑看上去似乎有讹诈意味。穆合塔尔说，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不仅考虑利害，更重要的是维护尊严。如果把民族独立视为尊严体现，即使不能活着得到尊严，那就通过牺牲得到尊严。他这样说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自己不也是试图以死来捍卫尊严吗？难道别人就会因为惧怕战争而苟活吗？

这正是我对新疆前途格外担忧的原因之一。

新疆会不会血流成河？

民族矛盾一旦普及到大众层面，最容易变得无理性和难以控制。如果演变成民族冲突，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而且随冤冤相报不断升级扩散，变成种族仇杀和清洗。

如果新疆汉人比例小，有动乱的风吹草动，势单力孤的汉人就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如果汉人移民数倍于当地民族，占有绝对优势，则会使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就是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汉人数量上已是新疆第二大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几代，他们在内地一无所有，因此会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园来保卫；汉人集中在城市（如乌鲁木齐汉人占 73.7%[①]）和生产建设兵团，比较容易结成战斗单位和防卫体系——这决定了新疆汉人在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采取克制和退让姿态，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持，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虽然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 7:10），控制的资源却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即使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仅靠新疆汉人自己也足以进行战争。

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的确在等着中国出现动荡。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今天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转型就越可能以突然形式来临。突然转型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变局迭起，成为少数民族举事的最好时机。新疆多年积累不满乃至仇恨，一旦有那样的时机，爆发无疑将非常猛烈。

[①] 《新疆统计年鉴 二〇〇六年》，中国统计出版社，82 页。

那时汉人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安全厅看守所有位维族犯人，其它犯人私下里叫他「国防部长」。我一进看守所就听说了他。他已经被传成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参加车臣战争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之所以去车臣打仗，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来维吾尔人打起脱离汉人统治的圣战，其它国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一样投入呢？东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听到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新疆周边国家、地缘政治、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我经常为他们的广阔视野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未来新疆将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几十万海外维吾尔人会参与，国际穆斯林势力也会介入，汇合在一起，冲突必定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调动是无止境的，仇杀一旦疯狂，残酷程度难以想象。

回顾十几年前震动世界的波黑战争，很多情况，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维族、汉族的状况相象。甚至波黑的克罗地亚族和新疆的哈萨克族也是相似因素。波黑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战争持续了近四年，流了那么多血，犯下了那么多灭绝种族、集体强奸妇女的罪行。那场战争足以成为新疆的前车之鉴，也成为强烈警告——不要让新疆在未来成为一个三倍大的新波黑！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如果新疆真有一天变成波黑，在新疆土地上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数以十万，生活在新疆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留下难以胜数的痛苦。那时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震动苦难的新疆。

监狱使我对新疆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我开始走进了当地民族的内心，开始为他们的命运担心。这是我过去从未做到的。入狱前，即使我和维吾尔人有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是以研究者的心态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监狱使我和维吾尔的心贴到了一起，与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之感。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

在监狱里进行的「窃密」

和穆合塔尔的讨论产生的想法，我当时做了笔记。为了防备监狱

当局突袭检查，我写上了「古希腊城邦制度（复习提纲）」的标题，其中词汇都经过变形，像是在默忆早年学过的课程。

今天中国的人权问题与毛时代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强行进入每个国民的生活。今天阶级斗争难以为继，政权不再有那种能力，所以「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身处社会上层）平时可以不感受人权受到威胁，对人权只有抽象意义的理解。然而今日政权与毛时代有一个共同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剥夺任何人的人权，个人则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在牢房里，犯人之间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相互分析案情，讨论如何自我辩护，猜测最终的判决结果。「陈叔」从他的柜子底部众多物品之下，摸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到的指控和量刑。那本刑法是我们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但只要外面一有响动，「陈叔」条件反射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藏起刑法。他解释只要「管教」看见就会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陈叔」笑我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要家人送法律书进来，结果都被截下，根本送不进。这本刑法是以前犯人传下来的，如何带进牢房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关到牢里却仍然要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不过那本宝贵的刑法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包括的内容还多。它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判死刑，想轻也可以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狱中已经做好被判刑的准备。关于请不请律师，穆合塔尔和「陈叔」看法不一样。「陈叔」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结果，还是有可能争取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他的经验，钱少花不了，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票，住旅馆，打车，加上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也得十万八万。穆合塔尔的看法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请律师可能有用，但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1]程序走的，是由政法委决定。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

[1] 公检法是中国人对公安局、检查院、法院三个部门的简称。

一个机构，各级公检法都要归同级党委的政法委统一领导，公检法独立办案因此徒有虚名。既然如此，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等于白花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中国法治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仅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惩治谁或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则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利用。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律师不能代替。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无从「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的声援，但我犯法与否并非是问题的根本。按照现行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有「秘密」二字。然而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它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必须对民众开放。现实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这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权利是最高的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仔细打听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想到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库来西和我做交易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施展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

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恐惧使我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不敢施加太大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搜查我的住处后，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如何处理改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第一种可能让我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搜查得到的白纸黑字和计算机文件，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计算机硬盘上成百上千的文件和邮件，以及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能无懈可击、自圆其说呢？就是让计算机去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第二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这两种想象中，如同在交替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计算机和成堆文件上，虽然那是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比不做强。

一天晚上又一次提审。我以为跟以往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库来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库来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

库来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上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来新疆不就是做这方面研究嘛。毕竟我不爱党但是爱国。然而他要我做的显然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一个承诺——我同意和他们合作。

「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点忙。」库来西轻描淡写。

我一时没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曾对库来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对人有这样的心态是全然不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相信权力可以任意改变人呢？

库来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如果我同意合作，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要求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判决前，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他们会好好研究从我家查出的计算机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新的违法，将数罪并罚。如果发现还有其它人共同犯罪，也要同案处置。说完这些，库来西又给我描绘了一番新疆监狱的恐怖情景，告诫说那可不是文人能呆的地方。

库来西虽然是个维吾尔人，却很懂汉人那套攻心方法。他的话的确使我感到动摇，「不干」两个字几次就在嘴边，始终没说出口。我当然不会真去为他们工作，我的动摇在于头脑中产生的一个想法——这是不是可以一个利用的机会？

如果是，又应不应该利用？

我长时间沉默，一直没有表态。已经到了深夜，库来西说明天再听我回答。临走前祁师傅劝我好好想一想，要为自己想，为家人想。此时再听他这些话，我在以往对他的感激之上开始有了新的猜测，他过去对我的关怀，究竟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心，还是办案分配他扮演的角色呢？

那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地想。这无疑是个机会，至少可以让我脱离监牢的黑箱，和外面恢复沟通。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可以让我办好几件事：一是母亲、还有义父夫妻本来都需要我照顾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说不定是最终告别），为未来做一下安排；二是我虽然想好了不连累他人的说法，但是他人接受调查时万一口径不一样，免不了会被「各个击破」，有机会跟他们「统一口径」，对他们的安全是有利的；三是出去一段可以了解信息，做些活动，增加获得营救的机会；或者哪怕只看看我的计算机文件备份，也会使将来对付审讯容易些。

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但对我当时的心态却挺重要，就是希望利用这机会换个监狱。在新疆服刑，除了条件差，最主要的是家人探视负担太大，这成了我沉重的包袱。能换到北京或内地监狱服刑，这方面会好很多。如果我先答应库来西，换取出狱，把该做的事做完，再宣布答应是假的，那时重新办我的案，也许就会换在内地监狱服刑吧？

想清楚这些都不难，让我辗转反侧的不在这儿，而是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假？这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计策，邓小平当年信誓旦旦写下「永不翻案」，上台后不也照样不认？让我犹豫的是即使是做假，毕竟也是一种屈服，哪怕只有几天，也是人生一笔，要不要让自己书写的历史有这么一笔？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

仅以理性衡量，似乎没有问题，又不是真去做什么，只当调侃他们一下，却能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为何不做？但我怎么也无法消除一种心理，那跟实际问题无关，就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不应该，却说不出不对和不应该在哪。

几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报」（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过期报纸）一篇报导，韩国几名五十年代入狱的政治犯因为一直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被关押了四十多年，直到新上台的金大中总统特许他们不签悔过书，才解决了释放他们的障碍。我当时问穆合塔尔，签个字只是手指一动，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动那一下手指的代价是四十年坐牢，换了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都为此感慨。我不怀疑那几个政治犯出狱后会陷入茫然，因为他们不悔过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北朝鲜的向往，出来以后却会全部倒塌。然而我还是极度尊敬他们，因为理性、算计、识实务那些质量在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

不过想是这样想，我最终还是用理智说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够充分——你不能为一时意气放弃安排家人的责任和保护朋友的机会。采取看似高尚的姿态，实际却是一种自私的洁癖。但我无法确定这种选择是不是属于腐蚀了我们灵魂的实用主义变种，我当时已经有点想不清了。

第二天继续谈，我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对此并不出乎意料，也许以前就没有见过拒绝这种交换的。杨科长让我写一个保证书，实际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动地听写。因为不允许我留底稿，现在我已经不能完整地记住内容，大致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将来如果有新帐（可能就是指拒绝给他们提供帮助），我这次犯的事就作为老帐加在一块处理；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如我去外地前要向他们请示，写文章得让他们审查等。我冷眼看杨科长一板一眼地琢磨词句，他真觉得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并认为我会照做吗？其中最可笑的一条是要求我不许跟安全部门其它机构接触，哪怕是北京安全局也不行。我差一点就问：如果是安全部长呢？看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玩把戏呢。

杨科长口授完毕，请示库来西，再让我修改和抄写，最后按上手印。好啦，他们大功告成。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挨个传看我写的保证书。只有祁师傅没动，我在一旁观察他。杨科长第一遍叫他，他说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他接过了保证书，跟别人一样仔细读了起来。对此我当然不会奇怪，只是内心感到了一点惋惜。

后来又要我写一份悔过书，那是了结案子的必要程序。对于刚刚写了保证书的我，不过是小菜。共产党有一种文字崇拜，似乎只要是写成文字就成了真的，不会再变。经过那么多次运动，档案库里堆满了这种朝三暮四、充满谎言的千万吨废纸，为什么它仍然没有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呢？不过我还是避免亲笔写下过于虚假的话，只是谈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误，表示以后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让他们抓住。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 Q 心理罢了。

我被加速释放

离开看守所时天下小雪，阴得黑沉沉。我与穆合塔尔，还有「陈叔」告别，彼此神色凝重。「管教」站在一旁监视，我没机会告诉他们实情。走出大门之前，我对看守所所长说了句「下次再见」。警察们都笑起来，认为我是在搞幽默。

我并没有马上自由，被软禁在安全厅另一个据点，仍然有人昼夜看守。按照库来西的说法，还需要跟我谈几天。谈几天？难道有那么多工作要给我布置吗！第二天中午库来西设宴。送我赴宴的警察炫耀说那是江泽民下榻的饭店。席间有人拍摄库来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它办案人员也来合影。想必那些照片都会放进安全厅的档案。库来西大概认为这种反差会打动我，带着恩赐的优越感说：看，你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却是我们的座上宾，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回答说：没错，从此我就成了你的线人。这回答使他有点尴尬，做出不屑的表情反问：你以为你做得了线人？你不够格！我猜他的言外之意是我现在还不足够卑贱，得一直沉沦下去才能达到线人的水平。他虽然只是一个处长，口气中却总是充满决定他人命运的霸气。这也难怪，多少人从他手里走进监狱和刑场，命运的转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决他怎么下笔。我俩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个汉人，为维吾尔问题来新疆「窃密」，他是个维吾尔人，为汉人政府抓我审我，还要「发展」我。

吃完饭回到软禁处。下午一切突然开始加速进行。他们忙着办理释放我的手续，原来说好要进行的谈话也不提了。杨科长这回主动督促我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家人明天我就会到家。这反倒让我产生猜疑，为什么突然急于把我放出去呢？

当晚库来西告诉我北京安全局来人到乌鲁木齐接我，第二天一早带我飞北京。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回不再说不许我与安全机构其它部门接触，而是煞有介事地说「今后你就归北京局领导」，听得我毛骨悚然。

和库来西做最后谈话时我故作深沉，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斯大林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希望有这次经历，我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库来西神情异样地盯了我好一会，看得出对我失去了把握。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被捕后的第四十二天，北京安全局一位处长和他的助手带我上飞机。我做好下飞机会继续受审的准备，然而没有。飞机降落时那位年轻处长告诉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让人看到我和他们在一起。我说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休息。算起来一星期应该能办完所有的事，那时可以再回监狱了。

给江泽民写信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次出狱是暂时的，很快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我刚到家就报导我已被释放，并把释放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得知，我母亲的确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不该由我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把这一条捎上，因此有必要稍做解释。

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但当时那个厂有六万职工，如今都可以说与江是同事。我们两家当时就没有多少往来，江离开一汽后更无任何联系。倒是我义父与江的关系稍近，后来彼此也偶而见面。我被捕后义父给江写信，同时转去了我母亲的信。但是他们的信都没得到回音，至今也没证明起过作用。我在新疆牢房从未想过这种关系能帮什么忙，更不要说在以往写书时得到过江的保护。

对于我要在一个星期内告诉安全部门所答应的合作是假，家人当时都表示理解，但他们建议我还是亲自给江泽民写一封信。万一我这次出狱有江的作用，也许就可以避免再回监狱。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当我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两封信——一封给江，一封给新疆安全厅——也都写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气比较缓和，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明了我宁可重回监狱也不会与安全部门「合作」，当然更希望能够不回监狱。一位朋友像编辑一样做了审查，删掉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附上两封信的原文。我曾把关于新疆入狱的所有文件做成一个子目录，包括出狱后默写的监规和给新疆安全厅写的保证书。我自以为聪明地在计算机上把那子目录设为隐藏状态，当时对网络黑客全无概念。等过一段时间再查，子目录仍在，里面所有文件都消失了。看来将来只能去安全部门的档案库查那些文件了。

时间太久，已经很难回忆我在那两封信中的具体言词。现在能记住的，只有当时在新疆牢房墙上看到的一首诗。那是不知何时的犯人用维吾尔语所写（因此才没有被不懂维语的汉人「管教」清除）。穆合塔尔给我翻译出意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给新疆安全厅的信中，用汉语写下了这首诗——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我给江泽民的信先发了两天。等到该发新疆安全厅的信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发了，有给江的信已经可以表明我的态度，何必再

去惹安全部门。也许我不惹他们，他们也不再抓我，事情就可以这么了结。我当然希望能这样了结，可是万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万人给他写信。或者他收到没理睬呢？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寄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就等于没有正式宣布我签过的保证书作废，保证书因而就不是假的，成了真的。那种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必须没有半点含糊。因此不管会带来何种结局，我都必须把信发出去。只有发给新疆安全厅的信，才会被放进我在新疆的案卷，和我签过的保证书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才构成完整状态，对我这段历史做出明确交待。

我直奔邮局，用挂号寄出了那封信。我当时行色匆匆，其实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说服。我问邮局的职员，回答是信要一个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时间，应该还有十天左右。够我进行准备了。我开始收拾再度进监狱需要的物品，买了不用鞋带的鞋和不用腰带的裤子——监狱不允许有带子，买了适于劳动且耐脏的衣服。我想得挺细致，监狱里睡觉不允许关灯，我为此准备了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觉。我把那些物品装好包，可以随时提起走人。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我还不加节制地吃东西，为回监狱积累有用的脂肪。

头顶是灿烂的星空

发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其间北京国安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见面。我准备被带回监狱，然而没有。他谈话客气，我们之间却摆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做有助于国家安全的事，但国家安全不是党的安全，国家和人民安全在上，党的安全在下；那处长却立场鲜明，对他们而言，党的安全是第一位。我有点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叫国安部，应该改名为党卫军才对。从那以后，他再没跟我联系过。

那段时间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着不再进监狱；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重回监狱，自由好像就是「卖身」而得，无法坦荡享受。随着时间不断延长，越来越表明事情可能真会这样过去。家人悬着的心逐渐放下，我的神经也慢慢松弛，然而内心却有另一种痛苦同时增长。

有一度，那痛苦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动摇了我做人的信心。我无法摆脱灵魂的拷问。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出来一下再回监狱，那是占了便宜。写过的保证书和悔过书也都一笔勾销。然而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纸黑字的保证和悔过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记录和无法洗刷的污点。虽然我给新疆安全厅写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软弱。按照功利标准，我的选择没错，理由充分，结果也挺好。可是我为什么不感到满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种心态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德的名言——「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

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终面对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终极，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灵，必定烟消云散，人生的根本却是要由道德支撑，并且由道德进行评判的。

可以说，正是新疆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我和政权的关联。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评中共，渊源和它仍有相连之处。游离其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未遇明主」。如果有了「明主」，说不定我还真愿意去当「智囊」或「幕僚」呢。我的新疆之旅，其实已经有了那样的味道。因此若是按宗教信仰的思路，可以把我的被捕与其后经历视为某种冥冥安排——以此改变我的轨迹，拯救我免于沦为权力的工具。

「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在我最痛苦之时，曾想出一个洗刷方式——去安全部「自首」，宣布对它进行了欺骗，要求重回监狱。我克制了那种冲动，因为太有做秀之嫌。但从那时起我就做出决定，必须把我经历的一切全部公开，只有那样，我的内心才能平静。

有些人对过去的事不愿再提，认为重揭疮疤没有意义。然而历史不是只要有意遗忘就不存在，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历史就是历史，成为历史就永远不可改变。人需要反省，而反省首先就在于正视历史，敢说真话。这样的反省决不是庸人自扰，可有可无，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敢讲真话，那社会就既不用起义，也不用革命，再强大的专制暴政也会顷刻瓦解。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维持专制，很大程度就在于政权成功地做到了让人们不敢讲真话。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然而专制权力就是这样，怕它的人越多，它就越强大，人们反过来就会更怕它。要打破专制，就必须突破这种循环，而突破只能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开始。监狱的日子不好过，但是监狱总要有人去，自由是从监狱开始，追求自由也就不能回避监狱。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每当我默念这首诗，我都会感到力量。现在回头再看新疆的经历，距离和时间使我超越当初的激动与痛苦，开始感受到蕴含深层的收获。它让我在为尊严斗争的过程中彻底反省，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变成自觉；它使我设身处地体验少数民族的情感，清扫掉我内心深处的国家主义残余；我以自身的经验理解了人性脆弱，从而有了更多对恐惧与屈服的宽容，以及有了对专制暴政加倍的憎恶；生死边缘走过一

遭，使我万事看开；我在那时向上帝祈求的勇气，正在润物无声地渗入我的灵魂；我不认为从此就会没有软弱，但肯定可以更少恐惧，更多坚强，让我以更勇敢的姿态，去面对仍然张狂于这个世界的邪恶。

二〇〇一年 以《新疆追记》之名发表于互联网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重新整理

密访穆合塔尔

——四次重返新疆的笔记

一、（二〇〇三年夏）

决定到新疆以身试法

七月三十日。和卢跃刚、马立诚、陈敏见面时，他们都反对我去新疆，认为一定会有麻烦。尤其是我在网上发表了《新疆追记》，安全机构肯定恨得要命，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把内幕捅到外面去。回家跟唯色说起，她也害怕了，不愿意我去。我跟她说，我必须去。新疆的书我没写完，如果没有上次被捕，写不写完都无所谓，但是有了那次经历，就一定要完成，因为被捕使它变成了一种命定。除了写书，这次新疆之行还算是一次「以身试法」。我如果不去亲身验证，难道从此就永远不敢再踏上新疆土地吗？那对我，新疆不就等于被「分裂」和「独立」了！

二〇〇一年发表《新疆追记》时，我做好了再进监狱的准备。事前我把母亲送到居住美国的弟弟那，义父夫妻也已出国。我在美国把《新疆追记》交给多维网何频，约定等我进入中国后就开始连载。即使我因此被捕，即使我母亲亲自提要求，连载都不能停。何频开玩笑问：「如果是你自己打来电话说停呢？」我回答：「一样不停！因为一定是背后顶着枪我才会说那样的话。」那次多维网连载了几十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有人说，安全机构肯定记下了这笔帐，但不会当时就动手，太直接的挂钩从舆论上对他们不利，他们会很有耐心地等待算帐时机。那么我这次去新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呢？我跟唯色说，这次假如真有什么事，就算是我的还愿了。既然从新疆出狱后我一直觉得应该重返监狱，这次能兑现对我也算得上是正好。

晚饭和大辉、卫民、孙杰等聚会。大辉约了有「半仙」之称的乾坤到场。乾坤是一京郊农民，但据说有极强的预言能力。上次曾在香山卧佛寺见过一面，半夜才到的他说卧佛旁边的池塘有三朵莲花。第二天卧佛寺开门后，我和卫民还真在那里看到三朵莲花在池塘里绽放。这回乾坤说他非要等到子时才可与天通——也就是才能预言，并说等不等由我定。我在还差二十分钟到子时提出散席。回家路上唯色埋怨我为何不等到子时，她想听乾坤预言我去新疆是否平安。我说对预言要是听了，就不能验证是否发生。即使乾坤说此行不平安，难道我就会不去吗？既然一定要去，我宁愿不听预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回家已经快十二点，我写了一份声明：如果听说我在新疆被捕，所安罪名（吸毒嫖娼等）一定是假，即使看到我自己出面承认，也不要相信，那肯定是因为顶不住折磨所致。声明将在我一旦被捕后公开。随后又整理了计算机，把上面的文件和邮件做好备份后删除，免得被

捕后再遭搜查。

唯色突然想起白天我不在家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就我获赫尔曼奖进行电话采访，她把我新换的手机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家里电话肯定时刻是被窃听的，因此我的新号码也就被窃听者得知。我这么一说唯色才意识到，后悔得要哭。我安慰她，个人防国家机器，怎么也是防不胜防的，干脆就随它去吧。

该做的准备都做了，我决定就此不再想这些，就当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去进行一次普普通通的新疆旅行。

随处可见民族问题的城市

七月三十一日，我乘的北京飞乌鲁木齐飞机满座。周围没见到一个维吾尔人。也许飞机其它部位有，我没看到，但至少说明维吾尔人不多，几乎都是汉人。

乌鲁木齐机场和北京机场一样，候机厅里也陈列着汽车。出机场一路有众多旅行社柜台，青年男女从里面伸长手臂给旅客发广告。机场停车坪对面有花坛组成的字样「乌鲁木齐欢迎你」，矗立的广告牌上是姚明[①]大头像，写着「一切都在改变」，倒像是有什么寓意。

这次是我第六次来新疆。乌鲁木齐的确在改变，高楼林立，街两旁都是广告，看不出任何民族特色。太阳很大，但不热。当地人说今年气候反常，似乎始终没有夏天，雨也特别多。

在维族餐厅要了烤包子、拉条子和抓饭，吃得够撑。然后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山西巷。在公共汽车上向司机问路时，司机告知转车的站名后，加了一句「小心你的包」。不知他的意思是维族区治安不好，还是汉人去那可能被抢。公共汽车在汉人区行驶时，车上维吾尔人很少，街上也几乎都是汉人。

这是一个随处可以见到民族问题的城市。转车时见一对看不出是汉族还是回族的男女买路边小贩的煮玉米。男的已经在掏钱，女的问卖煮玉米的妇女：「你是汉民还是回民？」妇女回答是回民。女的立刻让男人不要买。卖玉米的妇女一个劲问，回民怎么了？但是没得到回答。那对男女走了。我也和卖玉米的妇女一样纳闷回民有什么问题。一般应该是汉民被忌讳，因为穆斯林不吃汉人做的食物。回民做的食物穆斯林和汉民都吃。也许卖玉米的妇女被看出是假装的回民？

山西巷很热闹，是维吾尔人天下，汉人变得少见。有些妇女脸上蒙着面纱。人们在街两旁做生意。手里拿一双皮鞋或两件衣服就吆喝着做买卖，还有小小孩捧着几个鸡蛋卖，全是廉价商品。即使是在以维族女商人热比娅命名的大厦里，也都是卖低档货的摊位。

我沿街步行。按照民族自治地区规定，商店招牌必须有民族文字。

[①] 中国篮球明星，美国的 NBA 比赛中引人注目的新人。

在维族区，招牌上维文为主，汉字较小，随着接近汉族区，维文逐渐减小，汉文变大，等到了汉族区，维文只剩下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如同花边，招牌几乎全部被汉文占满。

友好路夜市规模宏大，几百张餐桌摆成一片，人声嘈杂，烧烤食物的烟火缭绕。我吃了肺面子和胡辣羊蹄。

「国际大巴扎」

八月一日。乌鲁木齐。早餐在路边吃油条。夫妻俩摆的早点摊。炸油条老汉是江苏人，六十年代初支边[①]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问他为什么退休不回老家，他说回去不习惯了，老家冬天不取暖，夏天湿热，呆不住。

二道桥也是维族区。那里兴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大巴扎」，刚竣工不久，正在招商。「巴扎」是维语的市场之意。招商介绍上说投资 5 亿元，由民营宏景公司建造，老板是个新疆汉人，不到四十岁。

「国际大巴扎」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样式，有高塔、圆顶和新月标志，正面广场有喷水池，还有骆驼雕塑——大概是象征丝绸之路。被雇来助兴的维吾尔民间鼓乐队在门口演奏，虽然打的鼓看上去古老，鼓手穿着维吾尔传统服装，但遮阳伞是可口可乐的广告。「国际大巴扎」的外部店面被家乐福、肯德鸡等占据，正在装修。市场里面租出去的摊位不到一半，空空荡荡。

刚开张的热闹吸引了成伙维吾尔人，不过只是看，没人买东西。年轻人摆个姿势照张相，乡下来的人围在喷水池周围，珍惜地用手触碰波动的水。

这一带从外表看已经显得挺繁华。「国际大巴扎」对面是二道桥市场，刚开业不到一年，颇有规模。旁边正在盖一个大型维吾尔快餐厅。不知道这些建设是否能让维吾尔人平衡一些？他们一直说乌鲁木齐的汉族区建设日新月异，维族区却破败不堪。

维族区如另一个世界

走不多远是维族居民区，和商业区反差很大。无论房子还是道路，都是年久失修的模样。我在里面走街串巷，没看到一个汉人。乌鲁木齐的民族壁垒很强，其它地方少见。它的汉族区和内地城市几乎没区别，进入维族区却如同换了个世界。美国白人区和黑人区至少还有相同的语言，这里则是语言、文字、人的形象、味道、建筑，所有感觉都不同。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有时只隔几百米，中间没有铁丝网，且由一个政府管治，是典型的殖民地形态。

[①] 「支边」是支持边疆的简称，是毛时代移民新疆的一种动员口号。

在新华书店夜市吃烤羊心。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观察忙于挣钱的维族摊主。他对顾客不分民族，一律殷勤招待。周围摊位的维吾尔人都是这样，一片和平景象。但是一旦某种历史时刻降临，他们会不会一夜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呢？

乌鲁木齐堵车严重。看上去公交车司机是从收入中提成，每到一站尽量多停，争抢乘客，不让其它车进站。乘客上车自己投币，不找零。一位维族妇女没零钱，投进票箱五元，应找四元，她在票箱前等后上车的乘客投币时把钱给她。但她不跟汉人说，只跟维族说。因为维族少，她等了好几站才把四元钱要齐。

喝王书记女婿的「冰川水」

八月二日。乌鲁木齐。去 Z 家的路上专门绕道去看一九九九年住过的鸿春园饭店。当年我住在那饭店时，秘密警察一直在隔壁房间进行监控。鸿春园饭店正在拆，要在那块地盘上盖一座新大楼。对面的市公安局也在拆，临时搬到附近饭店办公，等待新大楼盖好。据说饭店也是公安局办的，相当于用政府拨款付高额租金给自己办的饭店。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被跟踪和监视的迹象。我希望这次能和穆合塔尔见面，但首先取决是否会有麻烦。暂时还不能下结论，需要多观察几天。

街边服装店的女模型不穿裤子，只有上衣。还有一些模型干脆赤裸。虽说只是模型，过去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记得一九八零年我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只要是穿短裤上公共汽车，维族妇女马上就会躲得远远。但是今天，维吾尔人已经对赤裸的模型视而不见了。看来真如机场的广告所说——「一切都在改变」。

到 Z 家。话从他给我端来水杯里的矿泉水谈起。矿泉水名叫「雪百真冰川水」。Z 说是从离乌鲁木齐一百多公里的天山「一号冰川」取的水，运到山下加工和装桶，在乌鲁木齐卖十二元一桶。饮用水生意是暴利。「雪百真冰川水」属于新疆中共书记王乐泉的女婿。他现在是新疆最大水商，拥有市场份额百分之七十。有「冰川活化石」之称的「一号冰川」近年加快退缩和消融，厚度减少了十几米，和这种人为开发不无关系。没有权力背景的人不可能被允许搞这种开发。

Z 住的小区是新疆最大的私人企业——广汇集团给银行抵债的。刚过四十岁的广汇老板创业十几年，个人已有几十亿元资产，手下二万多职工。他靠做房地产起家，在新疆所有银行都欠了巨额贷款，然后用盖的房子抵债，把房价抬得很高，又能一次脱手大批房子，精明得很。人们都说这个老板和王乐泉关系密切，尤其是和乌鲁木齐一个副市长关系好，通过那副市长得到廉价好地皮。当然副市长少不了好处。虽然乌鲁木齐人都议论那副市长给一个温州老板批了很大一块地，自己老婆儿子成了吃干股的股东，但那副市长不仅没事，还被提拔到自治区主管建设。这回全新疆的地都任由他批了。

谈到社会稳定，Z 说新疆这两年平静，没出什么事。不过即使有事他也不一定知道。天天上网的他，竟然不知道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上街游行要民主。外面那么轰动的事，对新疆人跟没发生一样。可见当局网络封锁之成功。

维吾尔人为什么不愿意与汉人为邻

我问 Z 的邻居有没有维族？他说整个小区只有个别几户。因为是单位买房分给单位的维族职工，他们不得不住。但维族人普遍不愿意和汉人住一起。这些年分民族聚居的情况反而比过去还多。一是因为维族人的宗教氛围越来越浓，与汉人更隔阂；二是生活习惯的排斥，比如汉人炒猪肉的味道，维族人闻到很恶心。Z 在新疆时间长，不太吃猪肉，现在他闻炒猪肉的味都觉得腥，因此他能理解维族人不愿与汉人为邻。反过来汉人也觉得维族人有长年吃羊的膻味，还有狐臭。

Z 楼下有一家回族人。女的去过沙特朝觐，回来后发生很大变化，出门都要头巾蒙脸，家里经常聚集很多人搞宗教活动。不过那家人的儿女却跟汉人一样，着装时髦，看不出任何宗教色彩。

我问 Z 的单位是否有维族人掌权。他说只有一个维族当副手，没有实权。处长中没维族，副处长里也很少。问原因，他倒没归于民族，主要说是教育。一般维族家庭经济条件比汉族差，孩子多，教育跟不上。加上各单位都以汉文做工作语言，维族先天不足，自然难以升迁。

他说当年同科室有个维族女孩，是民考汉，从小上汉文学校，能力不错，但是一结婚心思就全放在家庭，工作成了副业，不求进取。那女孩的丈夫（也是维族）能力很强，现在是高级工程师。不过得益于他爸是县长，早早把他送到内地读书，在北京读完研究生才回来。说到维吾尔人的聪明，Z 举了个例子：他和单位的维族副老总去香港。参加对方宴请前，副老总约定让 Z 在席上先尝每道菜，没有穆斯林忌讳成份的菜点头，有忌讳成份的摇头，副老总就不动他摇头的菜。Z 说好多菜他也吃不出到底是什么，干脆都点头。在我听来，Z 举这种例子倒像是一种调侃。

Z 已退休，每月退休金二千二百多元，他妻子一千八百多。住房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自己只花五万元。同样房子市场价要卖到二十多万。他们六十年代来新疆，在兵团呆了很久，后来调到乌鲁木齐。退休后他妻子想回老家上海，Z 不愿意。那里没有熟悉的人和事，没有共同语言，也不再习惯内地的气候。人一旦在哪扎了根，便很难再换地方。根扎在哪主要取决时间。让在新疆呆了大半生的人离开，和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土著离开性质已经差不多。主张独立的维吾尔人要求大部分汉人离开新疆，不管是否合理，已经不现实。不过现在汉人不想回内地，是因为新疆形势比较稳定。九十年代中期不少新疆汉人都想走，Z 当时也说过一退休就回内地。那时经常发生民族冲突，爆炸事件屡有所闻。将来再出现那种局面，很多汉人可能又会想

离开了。

兵团之城——石河子

傍晚去客车站，路上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乌鲁木齐有七千多辆出租车，挣不到钱，主要是政府部门各种收费太多。他的车跑了六年，除了剩下这辆跑旧的车，什么都没挣到。从生意角度他欣赏维族，说他们虽然钱少，但有钱就花，打车多，不像汉人，有钱攒着，尽量不打车。汉族司机现在也经常去维族区拉活。这倒是变化。当年民族冲突多时，汉族司机经常拒绝拉客去维族区。

坐最后一班客车到石河子，打车去旅馆。我问司机石河子有多少维族人，司机说基本没有。然后说整个石河子开出租车的只有一个维族，就是他。我这才发现他长着一张维吾尔人的脸，说汉话却跟当地汉人没有区别，因此我在黯淡天色中没发现他是维吾尔人。

司机说，他爸属于当年国民党的陶峙岳[①]「九二五部队」，随陶峙岳起义后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住下。所谓「九二五部队」显然是讹传。实际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率部归顺中共，被中共历史称作「九二五起义」，手下官兵也叫做「九二五起义官兵」，简称「九二五」。这种简称带有蔑视。文革期间「九二五」被当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受到很多迫害。现在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于是不清楚父辈历史的年轻人竟然把「九二五」当成了部队的番号。

怨气冲天的警察

八月三日。石河子。碰上一个受客户委托下乡做商业调查的小组，说好了跟他们去农八师的团场。早上六点半（新疆时间四点半）起床，我去约好地点等车。调查组的人说，新疆手机用户占人口百分之十八，属于全国最高之列。我奇怪为什么，调查组的人解释内地农村人口用手机的比例低，但是新疆农村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在兵团，虽然也种地，却自认为身份属于「职工」，有城市人心态。手机被当作城市人标志，因此人人都要有一部。

接调查组下乡的车没有准时来。一位休假警察在等回家的车，我跟他聊了一会。他在兵团。这也是兵团奇特之处，居然有自己的警察系统。警察认为兵团体制不顺。他从经济角度列举具体数字，如兵团职工工资普遍比地方低百分之二十；买断职工工龄兵团给八百元一年工龄，自治区机关给六千元一年等。他说普通职工都觉得兵团应该解散，只是兵团各级当官的不愿意，因为兵团一解散，他们就没地方当

[①] 陶峙岳（一八九二年-一九八八年），曾任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代表国民党驻疆十万官兵通电宣布起义。解放军入疆后，国民党驻疆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一九五四年以第二十二兵团为基础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陶任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官，也不再有特权了。

警察一面说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得多，路修得好，出门方便许多，搞了很多建设项目等，一面又怀念毛泽东时代。说那时涨工资，干部在后，让生活困难的职工先涨。现在的干部则是用国家的钱搞经营，有利润放进自己腰包，赔了钱是国家承担，无论经营好坏自己都得捞足。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比国民党还坏，举的例子是兵团一个连长去内地招工被杀。连长一般是包地大户，需要雇人干活，但是一般不用老职工或职工子女，因为那些人不好欺负。最好摆布的是内地招的临时工。那连长弄了一帮人给自己当长工，本来说好年终付工资，等到人家干满一年要回家时，却编个理由不给工资，而且使用恐吓手段。那些人身在异地，不敢对抗，只好白辛苦一年空手回家。等那连长又去内地招工，冤家路窄，被没拿到工钱的人碰上，就把他杀了。

说到石河子的八一糖厂，警察更气愤。八一糖厂原来是西北最大的糖厂，新疆糖业的摇篮，新疆几乎所有糖厂的技术人员都是从那里培训出去的。而如今，人家都干得挺红火，八一糖厂却破产了，几千职工下岗。现在内地有人来投资，搞了一个制造酸类化学品的工厂。警察认为和发达国家把污染产业建到发展中国家是一样道理——新疆就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不满的职工上访请愿，但是都到不了乌鲁木齐，因为上面有规定，哪的上访者到了乌鲁木齐，哪的官员就得下课，所以官们天天盯着搞「截访」。去乌鲁木齐的上访者都在半道被截回去。而警察的很多精力都消耗在这上。

欧式的团部办公楼

车晚到了一个多小时。下乡前先去石河子大学接调查员。那都是些家在遥远省区，暑假不回家的大学生。

农八师下辖十八个团场。调查组要去的是一四八团，离石河子市区八十公里。开车司机是安徽人，来这里十几年了，车是自己的，平时专跑石河子到各团场的线路，月收入三千元。一路上车一会进入玛纳斯县境，一会又开到沙湾县境内。他说兵团的地盘分散在各县当中，因此得给各县上税，负担重。

兵团每个团场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团部相当于管制这个社会的政府。团部所在地一般是个农田和林带包围的城镇，是团场中心。我们先到一四八团团部。刚竣工不久的团部大楼让人惊讶，竟然是一栋四层高的欧式建筑，有穹顶、拱门，装饰着西方神话的浮雕，楼顶还立着两尊欧洲骑马武士雕像。东南沿海地区的暴发户时兴把自己家盖成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这边官员没能力在自己家实现暴发户理想，就用公款盖办公楼来满足。不过那办公楼旁边就是个粪坑式的肮脏厕所，臭味扑鼻，感觉相当滑稽。

在团部街上转，和一个退休职工聊天。他是四川人，一九六零年家乡闹饥荒时「自流」[1]来新疆。那时兵团缺人，来人就收，因此就当上了兵团职工。老汉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看上去只像六十多岁。他在这边娶妻生子。一个儿子原来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另一个儿子是团部秘书，现在都去乌鲁木齐卖药了，已经置了房子和汽车。老汉去乌鲁木齐儿子那住过几次，总是过不惯，最终还是回来。他说乌鲁木齐到处都是人，但跟自己都没关系，这里全是老朋友，每天一块做做操，打打小麻将，日子好混，靠着每月八百元的退休金，过得不错。

连队特权者

跟调查组下到一四八团二营十一连。这种军队编制其实名不符实，所谓的「连」和内地的村没什么区别，只是人的流动性更大，或者应该叫移民村。

到连部联系时，有三个干部正围着切开的西瓜而坐。他们介绍十一连现有一百多户人家，三、四百口人。第一代老职工全都退休，死的死，老的老，病的病，第二代人也是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外出者占百分之二三十，用他们的话说：「留下的都是没本事的」。

原来兵团那种集体化组织已经解体，现在主要是靠出租土地获得收入。兵团如同一个最大的地主，前辈开垦出来的荒地变成了良田，后代靠吃地租过日子。一四八团有二百万亩地，每亩年租金二百五十元，也就是每年坐收五个亿，因此才能养活那么多干部和退休者，盖起模样滑稽的团部大楼。

租地大户都是外来投资者，往往一租就是几百亩，雇人耕作。连队职工一般承包几十亩自己耕作。跟地方农村承包土地签三十年的合同不一样，兵团的租地合同要一年一签，因此权力在其中的作用很大。地方农村还由村民选举村委会，即使是走形式，对村干部也有一些制约，兵团的连队干部则一直靠自上而下任命。

兵团最基层的单位是连。连干部在签合同时可以决定给谁好地或不好的地，差别很大；还有决定用水的权力——先给谁用水，后给谁用水，差上两天，收成就会很不同。所以连长都是当地一霸，也都相对富有，有不少捞外快、收贿赂的机会。连长、指导员、会计、水管员、农机员等，构成连队的特权阶层。

今日长工

离开连部进一家农户。男主人本地出生。父亲也是「九二五」（他用更简化的称呼——「老九」）。母亲一九六五年从四川来新疆。他今

[1] 「自流」是当地官方术语，指那些自己流浪来新疆而非有组织的移民。

年包了九十亩地。但是气温上不来，雪山的冰雪一直不化。这儿的灌溉全靠雪水，再有一个星期水不下来，棉花肯定大减产，今年就得赔本。这两天温度刚高起来，我们都嫌热，他却希望再热，好让雪山尽快融化。从父母到他这一代，已经在这干了半个多世纪，住房仍然很小，不过毕竟是砖瓦房，而周围多数是泥土房。他说这房当年是兵团给从河南招的移民盖的。那次来了十几户移民，两年后都走了，现在只剩两户。我问移民为什么呆不下来？他回答不知道。虽说在一个连队，人们彼此不来往，各过各的。

从十一连出来，路过二营营部。营部外面有几个卖瓜卖菜的摊子，一些没事人坐在那聊天。我也跟他们坐了一会儿。人们的话题几乎都是抱怨。一个兵团老职工说他每月只有五百元退休金。他同意今天生活比过去改善了，但强调不能因此就不看社会存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比过去多得多。他怀念毛时代，说那时天津的中共高官刘子善和张青山贪污几万元就被毛杀了，现在的干部贪污几百万却不杀，叫什么法律！他认为二十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从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中得好处的是官，不是百姓。

随后我去离营部几里地的十四连。在十四连村口和一个农工拉话。他一问三不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倒不是装的，因为他自己对此也不好意思，向我解释说这里和在老家不一样，人们一般呆个二三年就走，彼此很少发生关系。看来兵团连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共同体，不再有小区关系。倒像是庄园，除了少数连队干部和老职工充当庄园主的角色，其它人都是打工者，来此只为挣钱，挣了钱就走。

「长工」这个词过去只有在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时才听到，指的是给地主充当长期雇工的农村无产者。而今问这儿的农工在干什么，全都坦然地说给东家当「长工」。光是在十四连当长工的就有四五十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承包土地，自己种自己收，而是要给别人当长工呢？他们回答包地要交租金，还要投资买种籽、化肥、农药等，用水和使用机械也要花钱。如果包的土地少，根本挣不到钱，多包又包不起，因此只能给那些有钱多包地的大户人家当长工。

家徒四壁的付毛个

进十四连村口第一家，有两个半大小伙。大人下地干活了。小伙说他家是九十年代初到这的甘肃移民。算起来十多年了，住的还是泥土房，没有几件家具，看上去很穷。不过两个小伙都挺追求时尚，穿衣做派看上去像城镇街上的小混混。他们说平时都待在团部，偶然才回家。我问他们干农活吗？回答「从来不」，言表流露不屑。

再到另一家，男主人名叫付毛个，一个媳妇，一个老妈。他家比刚才那家还穷，可以用家徒四壁形容。床是板子搭的，灶上有一口黑糊糊的锅，其它什么都没有，连窗帘也是装面粉的纤维袋代替。

付毛个以前自己包地种，后来包不起了，给连长家当长工。干活季节只有五个月，每月工资四百五十元。算一算，没有休息日，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每天十五元工资，平均每小时收入只有一元多，是北京保姆的五分之一，劳动强度却要大得多。连长去年包了三百亩地，雇了六个长工。所有花销去掉后，净挣两万多元，加上当连长的工资，一年也有一万多元，收入是长工的十数倍。

付毛个反复对我说连长是好人，不知道是发自真心这么说，还是担心我这个像干部的人（他们认为城里人都是干部）和连长有关系，会把他的话转告连长。

付毛个去年生了一场病，把当长工挣的钱都花光了。说到这，付毛个的妈也插话进来，说她也有病，因为没钱一直不能治。她说的甘肃土话我听不太懂，于是她掀开衣服，可能说肚子有什么毛病。她暴露出来的身体瘦骨嶙峋，乳房完全是平的，只有从乳头看得出是女人。想起城里那么多人忙于减肥，这儿的人却如此缺乏营养。付毛个的妈大概以为我是上面下来的干部，发善心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什么好处，忙着给我搬座位、切西瓜，让我心里不是滋味。

一四八团如何多拿五亿元

离开十四连回营部，中途在水渠边休息，和一个乘凉人聊天。他是机械加工连的技术工人，状况比农工好一些。但他对兵团也不满，说市场收棉花不扣水杂（指棉花中的含水量和杂质），收购价是每公斤四元五角，兵团收棉花要扣百分之七水杂，收购价只给到三元五角。兵团每个连队都把通外面的路设上卡子，不让农工到市场卖棉花，只能卖给兵团。我算了一下，棉花平均亩产量二百五十公斤，靠这种强制征收，每公斤兵团多拿一元钱，一四八团二百万亩地，又有五亿元到手了。

回到营部，在小饭馆吃面。几个在饭馆里闲坐的当地人也说农工贫困的原因在兵团盘剥。承包耕地的租金是每亩二百五十元，加上其它费用，每亩地要投资七百元，还不算雇工花费。如果亩产棉花是二百五十公斤（在不受灾的情况下），收购价被强行定在三元五，每亩只能收入八百七十五元，最后剩不下几个钱。收成稍有不好就得赔本。

兵团仍然保留计划经济和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承包者必须按兵团要求的品种进行种植，产品由团场统一收购。农工不得自行出售，只能接受兵团规定的不合理价格。这势必使得农工不会安心。为了防止人员流失，兵团自行制定人身依附的措施，如不发职工该得的工资，等退休后当养老金给。同时给职工一些小便宜，如水电费相对低一些，有一定医疗待遇等，只要人离开，或者不承包土地，待遇就丧失。要是没有这些措施，肯定很多基层职工早就离开兵团了。

我独自活动时间太长，到团部发现调查组的车已经开走。好在赶

上了最后一班回石河子的客车。在戈壁滩上行驶，燥热的风从敞开车窗扑进。戈壁滩上不时掠过一片黄土坟丘，都是汉人的坟。有的坟前立块小小水泥碑，更多坟前什么都没有。离开故乡来这里的人们，异域土地成为最后归宿，不免让人感觉惆怅。

戈壁滩上的「园林城市」

到石河子车站，有各种交通工具抢着拉客。我坐了一个残疾人的三轮摩托，请他送我到他认为石河子最好看的地方。他把我送到市中心广场。那是一片巨大绿地，衬映着几栋现代化建筑。广场中心是兵团创始人王震的雕像。雕像前有一组音乐喷泉。夕阳下，晶莹的水在音乐中舞蹈。这里到处是水，喷洒着浇灌草坪和花卉。衣着光鲜的人们游玩、漫步、照相或乘凉。从基层连队突然来到这里，反差巨大。那里的农工在为水焦急，睡不着觉，晚一天灌溉都可能失去下一年的生存保证，这里的水却慷慨地浇在供兵团上层休息的绿地上。广场上的人似乎没人知道或关心下层疾苦，那一切跟他们没关系。但这里享受的一切，都是底层农工供养的啊。

石河子是兵团在戈壁荒原上从无到有造出的城市。看这个广场，似乎体现着一种用高度反差证明兵团能力的冲动。戈壁滩不是没水吗？这里就要充满水！不是没草吗？这里就搞一个全国最大的城中草地！石河子市政府门前有一块碑，自豪地宣称石河子获得国家评比的「园林城市」称号。的确，这座戈壁中的城市，比很多内地城市的绿化程度还高，遍布花草树木。然而这绿化的前提是消耗无数的水。搞这么一个「园林城市」，不知有多少农田失去本可以获得生命和收获的水。古代的「一将功成万骨哭」，在这里变成「一城园林万顷枯」。

除了「园林城市」，石河子还有「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街头有很多带着「八不准监督执岗」袖标的人。那是各单位按照市政府要求派出的。我不知道「八不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在那些戴袖标者的背后，似乎看到以大家长自居的政府在向每一个市民下令：「不准，不准，不准……」

如果说「流沙上的大厦」是今日中国的写照，兵团体现得最为典型。仅看石河子的中心广场，每个人都会惊叹兵团奇迹和发展的成功，越往上越辉煌，越有成绩。然而下面却是另一幅景象，越往下越贫穷、越衰败、越人心涣散。兵团基层的根已经枯死，老职工没有了，当年的信仰也荡然无存。兵团第二代身在农村，却不愿务农，想方设法离开土地。干活的人主要是新移民和所谓的「长工」，将来有点风吹草动，这些没产没业也没组织约束的人，最可能的结果是一哄而散，兵团大厦就会随之倒塌。

「兵团万岁万万岁」

兵团之所以成为如今这种怪胎，在于其功能已经变成只是为了维持两个集团——现任的权力集团和历史遗留的退休集团，因而导致极为不顺的体制、极为勉强的维持和极为尖锐的矛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兵团职工，在毛时代的艰苦环境干了一辈子，只有很低收入，现在几乎同时进入晚年（同时从军队转业到兵团的人年龄差不多），造成兵团的退休职工数量非常庞大（二〇〇二年离退休人员达四十三万[①]），每个团场的退休职工都占到在职职工一半以上，多的达到五分之四[②]。兵团当年没有为他们的养老进行积累，但现在必须担负他们的养老，于是只能对新一代农工进行盘剥。兵团的税费远高于地方，这是重要原因。兵团权力集团能把对农工的盘剥进行得理直气壮，维持计划经济的权力和法西斯式的管理方式，也往往以此为说辞。

其实，如果没有权力集团，退休集团并非太难解决。虽然包袱沉重，但是把兵团现有资产折价给新疆地方，或以招标方式进行处置，得到的收入应该够很好地安置退休集团。权力集团就不一样了。这个集团包括各级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连带他们家属，构成数十万之众的「兵团上层」。一旦撤掉兵团，权力集团面对的不是安置问题，而是丧失权力的问题。地方政府已经有一套臃肿的官僚机构，无法再吸纳另一套人马。而失去权力就失去一贯威风，还有权力带来的诸多好处，那是命根子，拼死也要保，所以权力集团最坚决地反对取消兵团。

他们放在表面的理由就是「反分裂」。新疆形势被搞得越紧张，这种说法越会言之成理，兵团的存在就显得越有必要。兵团官僚从上到下都把反分裂挂在嘴上，以此辩解一切。今天见到的一四八团十一连那几个干部，谈到兵团经济效益不好时说，再不好也得保留兵团，国家是让兵团人守护新疆，哪怕天天睡觉也是做贡献。与此一模一样的说法，我从兵团高层官员嘴里也听过。

在有人问到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张庆黎这样回答：「我估计骂兵团的就是坏人，骂兵团的就是西方敌对势力，骂兵团的就是民族分裂势力，好人是拥护的……只有坏人才仇恨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要存在多少年？……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世界上还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如果新疆还有民族分裂势力在那里胡闹，还有宗教极端势力胡闹腾，兵团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兵团应该万岁万万岁。」[③]

什么时候世界才没有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呢？要让兵团的权力集团来判断，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于是兵团只能万岁万万岁了。然而新疆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离不开兵团问题的解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站 http://www.bingtuan.gov.cn/gaikuang/f_filelist_v.asp?p_index=251020&p_id=1671
[②] 如农七师一二三团，全团职工总数为 5674 人，离退休职工 4586 人。（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网站 http://www.n7star.gov.cn/n7s-gk/tuanlian/123/zhuye.htm）
[③] 张庆黎二〇〇四年三月九日在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

决。从各种角度，兵团都是应该撤销的，不可能让它万岁下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大障碍就在兵团的权力集团。这是新疆问题的主要病源之一。

二十二兵团遗址

八月四日。石河子。上午去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那是当年人称「陶峙岳公馆」的一栋平房建筑。二十二兵团在石河子垦荒建设时期，作为高级将领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这是最好的建筑。据说房子还保持当年模样，只是把房间变成了展室。

当年归顺的国民党新疆部队改编成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从开始拥有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被逐步剥夺武装，更换军官，实施政治改造，到最后集体转业，开荒种地。为了防范二十二兵团作乱，当时把它部署到石河子一带，由解放军嫡系的二军和六军部署在周边，对它形成合围。今天看，二十二兵团却是因祸得福，它所在的中部地理条件最为优越，远比周边发展快，因此在新疆建设兵团中状况最好。而当年看守他们的解放军嫡系，处境则差很多。那些解放军老战士，今天为此忿忿不平。

博物馆只有几个小展室，就我一个参观者。展品中一件女式军棉衣给我留下印象，上面缝了个用红绿蓝三色毛线织的领子。那个时代女人的爱美之心只能用在这样微小细节上。并列的还有一件皮大衣和一件军衬衣，每个上面都有上百个补丁。

展览中有一张登记表。登记者是河北人，家有水田三亩，旱田四亩，房屋七间，还开大车店，成分定的是贫农。另一张表上，一家六口人有十一亩地，房屋两间，也是贫农。这样来比，今日兵团的农工（包括大多数中国农民）现在也没有超过那时的贫农。

陶峙岳在文革写的信也在展览中。文笔与当时社会对毛泽东的态度没什么两样。陶参加过北伐、抗日，身经百战，也算一代名将，可是在毛面前表现得那样没有自我，我不相信有过枪林弹雨赴汤蹈火经历的一代枭雄，仅会出于恐惧变成这样。读那信令人感慨。

送老婆让别人搂的「帕切诺夫」

中午去吃当地有名的「三十五连拌面」。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因为饭馆老板过去是三十五连的人。饭馆不大，人很拥挤，但拌面没给我留下特别印象。边吃边和一当地人聊天。他在邮政系统工作。父亲原来在内地老家当共产党的「交通」（地下通讯员），共产党掌权后便当了邮政局长。五十年代初借调到新疆，任务是帮助当地建立邮政，说好只干三年，结果呆了一辈子。先是在县里当邮政局长，一九六〇年调到石河子建立军垦邮政。可以说石河子的邮政系统就是他父亲创

办的。他之所以能到邮政系统工作，是因为父亲的关系。邮政系统有很多本单位职工子弟。不仅邮政系统如此，这里各行各业血缘关系都很紧密。

说到本地的职工下岗情况，他说石河子原来有三个以「八一」[①]命名的国家级企业——八一毛纺织厂、八一制糖厂和八一棉纺织厂，都是当年苏联援建项目，曾经是石河子乃至整个兵团工业的支柱和骄傲，可是现在全垮了。大量下岗职工流散社会，生活艰难。因为行业的血缘关系，很多夫妻、甚至连孩子在同一个企业工作。企业一垮，全家下岗，收入来源一块断。有些夫妻双下岗的家庭，为了谋生，男人傍晚骑脚踏车把老婆带到夜总会去陪人跳舞，半夜再骑脚踏车去接。他说只有穷得实在没办法人才会这样做，否则谁会把自己的老婆让别人搂呢？这边把那种男人戏称为「忍者神龟」，或是俄文名字「帕切诺夫」——「怕妻懦夫」的谐音。

不过他对石河子的城市建设显得自豪，说是现在各团场都在修建文化广场、音乐喷泉等。按过去的观点，那属于浪费，但是在今天形势下却属必要，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呆在兵团，大家都要往外走，只有改善环境才能吸引人留下。不过这也是兵团上层集团创造自己享受环境的一种口实。因为所有改善环境的建设都在师部和团部，被上层集团享受。下面连队是没人管的，普通农工享受不到。结果连农工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团部去混，更没人愿意呆在农村。

孔雀河边的红扇舞

八月五日。一夜火车。早晨到库尔勒。库尔勒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孔雀河，维吾尔语称「昆其达里雅」。「昆其」是皮匠，「达里雅」指河流。「昆其」和汉语的「孔雀」发音相近，于是汉族人把这条河叫成了孔雀河，其实和孔雀扯不上关系。之所以维吾尔语叫皮匠河，是因为过去这里集中着不少皮匠，从巴音布鲁克草原收购畜皮，利用这条河的便利水源和库尔勒的干燥气候加工皮革，制造皮鞋、皮衣、皮帽等。

库尔勒现在要把穿城而过的孔雀河建成风景区。富有的塔里木油田是以库尔勒为基地的，愿意为此出钱。据说花了六、七个亿，城内十公里孔雀河两岸全部砌上花岗石护坡，立起不锈钢护栏，还建了好几个公园。河岸铺上花岗石对河流生态的不利影响先不说，对孩子游泳倒是方便许多。几个十多岁男孩一丝不挂，一会跳进水，一会爬上岸，闹得不亦乐乎，全然不把旁边「水深二十米」的警示牌放在眼里。

一个文静的中学生坐在河边看水。聊天得知，他刚考上新疆农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开学前来库尔勒玩。他爸原来是四川三台县的兽医，一九九六年通过关系到新疆巴楚县当警察，在巴楚安了家。一个兽医

[①]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产党组织的南昌暴动后来被定为解放军的建军日。共产党执政后，很多与军队有关的单位都用「八一」命名。

换个地方就能变成警察，大概只有新疆办得到。他爸后来不干警察了，自己开商店。这个中学生在麦盖提县的兵团中学上学，因为那里教育质量好。学校里有维族同学，和汉族同学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言语中他看不起维族同学，说他们不愿意上学，学校得派车去接他们，没几天又不来了等等。

下午在库尔勒市里转，几乎全是新建筑，没有任何新疆特色。尤其是油田盖的大楼，一副财大气粗模样。街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汉人，但是扫大街的清洁工却全是维吾尔人。市中心广场有很多休闲居民，散步的、玩鸟的、健身的无一不是汉族。维吾尔人只有打扫卫生的女工。其中一群汉族退休妇女手拿红扇随音乐跳舞，一个维族女工清扫到她们附近，奋力地挥舞笤帚，扫得灰尘飞扬。那些汉族妇女只好闪到一旁暂时不跳。我仔细看这场面，无法判断维族女工是否故意这样做。

库尔勒大街两侧的建筑和门面看着崭新，铺张粉饰，但是稍微往里走，背后往往就看到一片破烂，如同另一个世界。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如此，美其名曰「形象工程」，也算一种「中国特色」。

李鹏[1]的题词——「把库尔勒建设成石油新型城市」被高高竖在市中心一栋大楼上。这话明显不通顺，却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让库尔勒人民天天看。只因为是李鹏所写，不通也得指鹿为马。

一个复印店门口贴着公安局通告，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国家秘密安全受到危害，都要及时报告，否则追究刑事责任。通告上还有谁经营谁负责的字样，以及责任承担者的签字。这使我想到上次在新疆被捕前，就是因为担心这种情况才托人在办公室复印文件，结果给复印者带来麻烦。但如果不是找熟人，可能我一出复印店就会被捕了。

即将属于王书记女婿的出租车

八月六日，从库尔勒上火车。对面座位是一个甘肃年轻男人，做土豆生意，到舅舅家参加表哥的婚礼。他的甘肃家族不少人都在这边做事。他说前些年土豆生意好，最多一年挣到过十六万五千元，今年时间过去大半，才挣了七八千，也就刚够电话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下午六点火车到阿克苏。进城路上，出租车司机说他的营运执照马上到期，但是政府不再给办。今后阿克苏的出租车都归王乐泉女婿的公司。想开出租车只能给那公司打工。车由公司提供，司机交二万元押金，然后一切运营费用自己出，每年上交公司五万元，剩下的才是收入，五年后车归司机。司机骂那简直是空手套白狼，公司提供的车用不着公司拿钱，有权力，银行自然会给贷款，王乐泉女婿其实就是坐地收钱。不用说垄断整个阿克苏的出租车，有一千辆计程车归到他名下，他一年也是坐收五千万。五年后车差不多快报废了，要那么

[1] 李鹏，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中国政府总理。

一个车有什么意思？等于五年辛苦挣的钱都被公司拿走，因此他决定不干了。

出租车司机对王乐泉特别有意见，说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山东进，难道我们新疆连水泥杆都做不出吗？新疆人都知道王乐泉的老家是山东，司机明显是指王乐泉给老家捞好处。他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和想当然，但看得出民间怨气。

问到阿克苏的汉族和维族关系如何，司机立刻大骂维族。说维族人在街上故意踩你的脚，然后说你踩了他，跟你打架，勒索钱。他说这里汉族和维族根本不来往。因为到了我该下车的地方，这个话题没来得及多说。

见到穆合塔尔

经过几天观察，确定我没被跟踪，决定和穆合塔尔见面。但是要避开去他家，我们约定在阿克苏见。按照电话说的，我先到了约定地点——一个饭馆门口。那里是维族区。穆合塔尔还在赶往阿克苏的路上。我坐在饭馆门口凳子上看街景。半小时后穆合塔尔从夕阳方向走过来，阳光晃得我看不出他，他已经重重抓住了我的手。

这是离开看守所我们第一次见面。在监狱他就显得比实际年龄大，那时他瘦，现在胖了许多，显得比原来魁梧。一般从监狱出来的人都会发胖，因为要补偿监狱的营养不良，吃得多。发胖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甚至已经有些沧桑感。

我离开看守所不久，穆合塔尔被法庭判刑三年。他虽然并不认罪，但选择了不上诉，因为上诉没有意义，不会改变结果。他不忍心让家人继续为他奔波，加上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等于刑期快过一半，剩下的日子忍忍就过去了。他已经厌倦在看守所无穷尽的等待，要上诉就得继续等，不如到正式监狱去服刑。毕竟那里人多，每天出去劳动，不会太闷，还能观察另一个世界。

穆合塔尔服刑是在乌鲁木齐监狱，那里的维族犯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政治犯。全新疆的政治犯都集中在乌鲁木齐监狱，据说从盛世才时代就是这样。按他的感觉，监狱比看守所好，正规化，吃的饱。最主要的还是心理安定，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日子会结束，过一天就少一天，每天数着日子就有希望，而不像在看守所只能面对未知，天天焦虑。看守所的日子遥遥无期，监狱的日子却似乎过得很快。

我记得穆合塔尔在看守所时头疼严重，有时疼得受不了，就是因为长期焦虑造成的。那时他在头疼中经常看女朋友的照片，到监狱后头疼好了。但是从监狱里出来时，女朋友已经离他而去。他现在仍然是单身一人。我们重新见面，没有交谈太多监狱生活。那种日子并不值得太多怀念。他虽刑满释放，但还不是完全自由，警察时常要找他询问和训话，出远门也必须报告。对我们两个见面是否会被注意，我

们都不得而知。虽然朋友见面不犯法，但我们还是像做特工一样，选择他家以外的城市秘密接头，打电话也是用街上的公共电话。

马克思、列宁的胡子没耽误他们做事情

穆合塔尔带我坐出租车看阿克苏市容。跟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到处都在大拆大建。很多街边的房子上面都写着大大的「拆」字。原本维族多数住在城中心，现在搞开发，被从城中心的黄金地带迁出。付给维族人的迁移费每平方米三、四百元，而开发商盖的新房子每平方米要卖一千几百元。维族人买不起，只好到城外自己盖房子。因此在阿克苏城外形成了一大片维族新区，人越聚越多。房子是新的，却是单调简陋，没有学校医院，也没有好的商店等，甚至没有上下水，用压井打水，污水则是满街泼洒。

郊区农田很多都包给了汉族菜农，修建起成片暖棚。旁边盖着一栋栋中国北方农村的汉式平房。

吃饭时穆合塔尔一个朋友 G 也在。问起来，阿克苏人似乎都知道王乐泉女婿办出租车公司的事。G 说不仅维族人不喜欢王乐泉，新疆汉人也一样。阿克苏等于是王家小金库。他们怕在乌鲁木齐搞腐败引人注意，名声不好，阿克苏偏远，既能避人耳目，又有钱捞。说起官场腐败，都说新疆的腐败没法治，即使中央知道新疆官员腐败，考虑一旦暴露会被少数民族当作反对汉官的理由，影响稳定，也就只好包庇下来，不进行查处，只求「以无事为大事」。跟新疆的稳定相比，腐败是小事。中央找到一个能把新疆管住的人不容易。王乐泉在新疆经营十多年，已经成了又一个王震、王恩茂一类的新疆王，因此尤其要保护。

上行下效，腐败在新疆是普遍现象。G 说阿克苏的所有建设项目都是通过一个副市长，那人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好项目都给自己，等于签合同的甲方乙方都是他，自己跟自己签。市政建设不断重复地拆和建，因为只有花钱才能带来捞钱机会，所以总是巧立名目上工程。

G 在学校工作，上唇留一撇小胡子。学校书记找他谈话，说留胡子是宗教信仰的标志，要他刮掉。他反问说马克思、列宁都有胡子，也没有耽误他们好好地做事情，为什么要我刮？因为穆斯林有男人留胡子的风俗，新疆就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不许留胡子。这种行为和当年满人逼汉人留辫子性质上没有两样，今天还做这种事，实在匪夷所思。

G 的学校，汉族占教工的三分之一，可是各级当权者汉族占三分之二。在学校里，维族教师要求通过汉语考试，否则不能上岗。汉族教师却不考维语。G 问这是为什么？既然是维吾尔族自治区，维语和汉语地位同等，都是官方语言，只考一种语言合理吗？有一次他看一份汉语文件，理解得不好，汉族主任便说他没有好好学中文。他反问主任为什么不学维文？主任回答他学英文，学的是先进语言。G 说你

的意思是维语落后吗？主任自知失言，匆忙离开。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跟这些人在一起，民族关系怎么会好？学校曾经有七十多名维族教师状告学校书记，上面派工作组下来调查，最后的结论是书记没问题，告状是因为民族情绪。做出这种结论的根据，就是参与告状的都是维族。结果书记照样掌权。

维吾尔人的政治笑话

中国是由各级中共书记执掌实权，新疆也是一样。因此新疆各级中共书记都是汉族，维族或其它少数民族只能担当行政职务。然而一些重要的业务部门，如公安局、国安局、财政局等，业务性强，必须局长掌实权，结果那些部门就变成汉族当局长，维族当书记，反正实权都得是在汉族手里。这不明明白白显示，维族只是摆设，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权力吗？

穆合塔尔说维吾尔人中流传一个政治笑话，当年李鹏还在台上时，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就是讽刺不让维族掌实权的状况。穆合塔尔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实权都被汉人把持，当地民族怎么会满意？

虽然九一一发生在美国，跟新疆没有关系，但是九一一之后当局对当地民族的压制却加重很多。以前至少还顾点面子，说话办事讲一点策略，九一一后则是什么都不在乎了，一点小事就可以翻脸，爱干不干，不干滚蛋，不服就收拾你。根本不再顾忌少数民族。G 说九一一以前我们还可以提意见，现在不能了。嘴不能说话，手不能写文章表达不满，连耳朵也要管，每次开会都说不许听外国电台，把我们全部管死了。

吃完饭穆合塔尔拉我去夜市吃烤羊腰喝啤酒。算时间，当年跟我们在一个牢房的「陈叔」也该出来了。他被控受贿六万元，判了六年。当时他常跟我们愤愤不平地解释那六万元只是朋友送的礼，因为新疆高层为了表现反腐败政绩，指定要抓一个副厅级腐败典型，他就是那个被完成的指标。我离开看守所后曾为他传过话，他要他妻子在外面为他活动保外就医。他妻子在电话里恨恨地骂他太天真，被人卖了都不知道。现在我早忘了他家电话号码，穆合塔尔竟然还记得。我对他的记忆力惊讶不已。在烤肉摊旁边的公用电话，一拨正好是「陈叔」接听。我原以为他会很高兴，因为在牢房时他总说出去后我们要在一起吃什么，这回当我们告诉他正在吃烤羊腰时，他只是哼哼哈哈，听得出完全不想再跟我们沾边，恨不得马上放电话，于是我们也就扫兴地结束了通话。

从夜市出来去网吧。开机第一个画面是个警察头像，警告不得在网上发表民族分裂的言论。

新疆多雨是好事吗

八月七日。早起下雨，感觉天气有点冷。街上积了很多水，上车都不方便。坐公共汽车去温宿。路上和邻座一个干部模样的汉人聊天。他说阿克苏近年生态变化很大，快成了南方那种多雨气候。他认为变化原因是开垦和绿化的增加。我倒不认为只要开垦和绿化就能下雨，如果那么简单，气候就太好控制了，应该还是全球生态变化的影响。我问在干旱的新疆下雨多应该是好事吧？他说那不见得，比如现在棉花正在开桃，雨水一灌进去，棉桃就会变黄，棉花等级随之下降。还有在玉米抽穗季节，雨下多了会影响授粉，也不利。

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张仲瀚认为新疆气候特别有利于农作物，就在于冬天雪多，夏天雨少。雪多能够供给地里充分的水，加上雪山如同水库，天暖后随着气温升高，融雪分批下来，保证水的持续供应，而新疆夏天的雨少，正好保证有充分日照，适于作物生长，所以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各种瓜果都长得特别好。如果气候变化，是福是祸就难说了。

民族中学墙上的文字

穆合塔尔的朋友住在一个中学院里。已经放暑假，校园没有学生。穆合塔尔去找朋友时，我楼上楼下看那些无人教室。每个教室墙上都贴着各种图——有中国地图，邓小平像，毛泽东和库尔班大叔握手，还有马恩列斯的头像、鲁迅和雷锋肖像。图上文字都是维文。不同教室的图不全一样，但黑板上方的中国国旗，每个教室一定有。

穆合塔尔来时，我请他翻译墙上写的维文标语。他的翻译是「我们要爱护各民族人民的同心和呼吸」，估计汉文原话应该是「珍惜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团结」。

每个教室前方挂着数个镜框，里面镶着打印的维文，有汉字标题，分别是「加强民族团结的条约」,「学生对国旗的誓言」和「学生言行十不准」。

穆合塔尔翻译「加强民族团结的条约」大意如下：

一、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党的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央的七号文件；认识到对新疆稳定的最大危害就是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因此要坚决反对；

二、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原则，互相信任、学习、

尊重和帮助，坚持两个离不开[1]，不说对民族团结不利的话，不做对民族团结不利的活动；

三、在汉人和汉族学生集中的地方，要加强交流、团结，推进互相的理解和工作；

四、加强学习汉语、提高汉语水平；

五、加强学校内的民族团结活动，对民族团结的好事要表扬，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要批评。

「学生对国旗的誓言」大意是：

我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民族团结，不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反对迷信，相信科学，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

「学生言行十不准」的大意是：

一、不准说和做对民族团结不利的话和事；
二、不准说对国家统一不利的话；
三、不拒绝接受马列主义的无神论；
四、不信教、不看宗教书、不参与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
五、不参与民族分裂活动；
六、不能看和宣传封建迷信的材料；
七、不能穿有宗教特色的衣服，做宗教特色的动作；
八、不能抄作业，不能作弊，不能撒谎；
九、不迟到早退，不无理由地旷课；
十、遵守法律法规。

这十条「学生守则」中，居然有七条是关于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给人的感觉是所有中学生都随时可能搞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

制造了两代文盲

中午在一个维族餐馆吃青椒西红柿烤包子，鸽子汤，还有抓饭。电视机在放维族歌舞的 VCD。穆合塔尔和他的朋友能认出其中每个

---

[1] 中国当局的宣传口号：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歌舞者，说出这个人那个人的故事，因为那些唱歌跳舞者都是本地歌舞团的人。

从 VCD 打出的字幕谈起维吾尔文字。传统维文是从右向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公式和演算，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向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类似传统的竖排中文也有同样问题，因此后来改成了横排书写。一九六二年做过一次维文改革，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八十年代初新疆民族意识回升，重新恢复了老文字。这种来回变化制造了两代文盲。实行新文字时，原本认得老文字的人成了文盲，看不懂报纸，不认识招牌。等恢复老文字，文革期间上学的一代又成了文盲。现在有人又觉得新文字比较适应计算机，更适应时代。但是再改又会再制造一代文盲。这种经验让人看到，事关千万人的决定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会造成多么广泛的后果。

不过按穆合塔尔的说法，两种文字形式上差别虽大，本质却是相通的，如果认真学，几个月就可以从一种文字转换到另一种文字。只是人有惰性，很多人没完成这种转换。尤其是文革成长的一代人，不认识老文字的很多。他们现在大部分下岗，生活艰难。有人想考个驾驶执照，多份谋生技能，就是因为不会使用老文字，无法参加理论考试而难以通过。

穆斯林墓地的丑陋瓷砖

下午我去看温宿的穆斯林墓地。墓地很大，据说有几百年历史，延伸十多公里，看不到头。我让穆合塔尔和他的朋友去办事，不要陪我，我自己转就可以。我想独自感受墓地意境。但是穆合塔尔不放心，说其它维吾尔人看到一个汉人在墓地瞎逛，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说不定会找麻烦，有他在会安全些。看到墓地墙根有一摊大便，穆合塔尔说肯定是汉人所为。在维吾尔人来看，不信神的汉人没有敬畏心，才会这样做。

有些坟墓修得很大，宽阔的穹隆，高高的门墙。见我拍照，穆合塔尔告诉我不要把那些墓当成代表，因为那样的墓并不符合伊斯兰思想。伊斯兰教认为人死后只应白布裹尸埋入黄土，埋葬后被风吹得没痕迹才是最对。之所以有人会修造这么大的墓，穆合塔尔认为是受佛教影响。

雨下得多，墓地泥泞。黄土修造的墓很多被雨水浇得变了形。传统老墓都是用黄土修造，一些贵族陵墓会在外表贴上维族传统手工瓷砖，有非常美丽的颜色和图案。但是在这个墓地里，一些新墓在外表贴上工业化生产的白瓷砖，显得刺眼和不协调。我猜测气候变化下雨增加，贴这种瓷砖是为了防止墓被雨水浸泡坍塌。所过之处，的确不少老墓已被雨水损毁。

看到远处正在进行葬礼，我想走近观看，穆合塔尔不让，只好作罢。穆合塔尔指给我看一块墓碑，葬在那墓中的老人，寿命是从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九六年，算来活了一百一十五岁。维族有很多特别长寿的老人。

穆合塔尔的朋友是个汽车驾驶教练。我们去他家喝马奶子。马奶子味道独特，据说对身体有诸多好处。现在价格涨的很高，因为汉人也要吃。城里已经买不到真的。教练家之所以有，是因为跟他学车的学员有山里人，送给他的。教练老婆在家，不怎么理我们。穆合塔尔告诉我她是教练第三个老婆。教练第二个老婆是个汉人，教练父母死活不同意，最后只好离婚。

教练说维族学员理论考试差，路考表现好，汉族学员正相反。维族学员不爱看书，但善于动手。教练对毛泽东评价高，说那时候大家都一样，现在变了，有钱人的娃娃一毕业就有工资，没钱人的娃娃同样毕业，但是得去当老百姓。他所说的有工资，意思就是有铁饭碗，能在国家单位工作。这的人仍然把吃官饭当作最好出路。

前警察向我透露的秘密

八月八日，和穆合塔尔告别。他送我上了去喀什的火车，然后回库车。我们拥抱告别，约定不久再见。

座位对面是个新疆出生的汉人，原来当警察，现在自己做生意。他父母是山东人，退休后在青岛买了房子，住了一年又回来了，因为子女都在这边，老人没有人照顾不行。原来三个子女协商派一个去青岛照顾老人，结果谁也不去，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能做的事情都在这边，到青岛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没有前途。

他说喀什正在拆毁维族老街区，主要目的不往外说，其实是为了便于控制。老街如迷宫一样，维吾尔人犯了事跑进老街，一万个警察也找不到。现在把老街拆掉，都搬进楼房，有事把每座楼一封，谁也跑不掉。他说维族官员内心都是分裂分子。警察抓了维族人，态度凶一点，维族副局长（维族只能当副局长）就会不愿意。抓捕疆独分子的时候，别看他们平时男女之间挺封建，真要把男的抓走了，女的就哭着搂抱男的，发誓无论他在监狱多久都会等，可就是没人出来制止，任凭他们嚣张，足以见到维族警察的内心。

这位前警察对维族充满殖民者的轻蔑。说当年汽车开进新疆，从未见过汽车的维族人拿出草来放在车前，把汽车当作牛马一类牲畜来喂。提到汉人皆知的香妃，他说哪是什么香，是因为皇帝闻了太多香味，从未闻过维族身上的味，于是就成了香妃。

他随后讲的两个故事更是反映殖民者心态。一个故事有关盛世才。他先告诉我他老丈人当过盛世才的营长，以加强真实性。故事说一个汉人在街上手提大肉（西北人对猪肉的称呼）蹭到了维吾尔人的

大衣，那维吾尔人说沾了猪油的大衣不能再穿，汉人必须给他换新大衣。这事闹到了盛世才那里，盛世才当场裁断汉人给维吾尔人买新大衣。等维吾尔人高高兴兴出门，盛让士兵跟出去往他脑袋上抹猪油。维吾尔人气得又回来告状，盛世才说既然衣服脏了换衣服，脑袋脏了就得换脑袋。警察说到这哈哈大笑，称赞盛世才为了镇住维族人，杀光了三个村庄。我问他讲的是不是民间故事？他说老丈人亲自参与，绝对真实。

警察讲的另一个故事是王震的。汉人到新疆后，发现维吾尔人在平时存水的涝坝（水塘）里洗澡，有意见，因为人吃的也是那水，便告状到王震。王震问维吾尔人时，维吾尔人说水是活的，打三个滚脏东西就没有了。王震便叫人接驴尿让维吾尔人喝，说驴撒尿打的滚更多，应该更干净，不喝下去就枪毙。这种故事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是当地汉族讲起来总是津津乐道。那警察炫耀道，不管新疆出什么事，只要王震一来就能摆平。在他心目中，不管是国民党的盛世才，还是共产党的王震，只要对维吾尔人残暴，就是好样的。

维族军官和汉族无赖在火车上争吵

火车到巴楚，一些人下车了，空出座位。一个到喀什搞传销的汉人立刻占了整条三人座，躺下装睡觉。巴楚新上车的人多，有些人找不到座位，那汉人一直装睡不起。一个上尉军衔的维族军人带着老婆孩子，转了好几圈没有座位，便拨那人请他让座。那人没法继续装睡，却不让座，和军人发生争吵，很凶的样子。其它一些维族乘客帮上尉说话，那人还是混不讲理，很让人讨厌。我相信如果在十年前，他一定会挨打（我当然不同情）。现在真是发生了变化，维吾尔人收敛了很多，汉人则嚣张了很多。后来虽然被劝开，上尉一家坐下了。但是可想而知，上尉心里会长久不舒服。很难让他不把那人和汉人整体联系在一起，进而想到在他们的家乡外来者为何会这样不讲理。而他漂亮的小男孩，也会留下汉人蛮不讲理的凶恶形象，长大后要把丑恶的汉人赶出家园。

大处镇压，小处放纵的民族政策

火车到喀什晚点一个半小时。见到小杜，带我去维族餐厅吃饭。想请我喝啤酒，饭店却不卖，也不允许喝，而且对问酒表示反感，弄得小杜很没面子。小杜是喀什出生的汉族女孩，言谈中也蔑视维吾尔人。她说跟维吾尔人基本不来往，他们素质太差。我请她举例，她说维族人到机关办事，明明有卫生间不用，却在走廊或楼道撒尿；明明是禁烟的地方，他们就是抽烟，不听制止；给等待者坐的沙发，他们会躺在上面不让别人坐。这使我想起刚在火车上见到的争吵，却是汉人躺着不让人坐。小杜跟火车上见到的警察一样，说现在喀什正在进

行的城市改造，目的是把维族放得远一些，和汉族隔开。

当局目前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政治上管的很紧，严厉镇压，而为了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平衡政治上的强力镇压，在民事方面管得松，甚至采取姑息态度。这种大处镇压、小处放纵的民族政策，其实会导致最不好的结果。政治镇压造成的民族对立，不会因为民事上的照顾减小，反而使得少数民族被政治镇压形成的挫折和怨气，正好借小处发泄。譬如小杜说的维吾尔人不上卫生间而要在楼道撒尿，是因为「素质低下」，还是因为要表达不满呢？当这种发泄因为有少数民族身份被纵容，则会模糊社会的法治概念，似乎对少数民族有另一套法律标准。反过来使汉族反感，又会进一步加剧民族对立。最后没有一方满意，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权利不如汉人，汉人则认为少数民族有更多特权，受更多放纵。

一位互联网上的读者写给我这样的信：「近年来，在京藏人商贩从无到有，从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堂而皇之的移师街道，甚至在长安街两侧、使馆区安营扎寨。城管队员巡查时，其它流动商贩惊慌失措、仓皇躲避，藏人商贩却安然自若,甚至手头的生意也不耽误。为什么城管队员会熟视无睹，肯定有来自上级的指示，可以给藏人商贩法外开恩。在京藏人商贩能够享受这么一种超公民待遇，其实也在不断侵蚀本来就极其淡薄的法治氛围，亲眼所见的公民由衷感受到法律的虚无。政府的政治考虑永远是压倒法治，‘依法治国’屡屡成为无稽之谈。」

这似乎是一种荒唐，被少数民族视为压迫者的汉人，却在为少数民族的「超公民待遇」不满。

正在被拆的喀什老城

旅馆后面就是喀什老城。站在旅馆楼顶俯瞰老城，一望无际的土房平顶相互衔接，曲折街道密如蛛网，绿色植物从天井似的庭院伸出，看上去极不规则，却又是非常完整的一体。最能反映这种一体性的是，个别新建筑立在老城中会显得特别扎眼，视觉上让人感觉难以忍受，强烈地破坏和谐，可以说明老城的整体性有多强。

在黄昏光线中进入老城。许多房子都有百年以上历史。老城千回百转，几乎每个角度都是一幅画，这种错落有致只有在历史的多样化中形成。我觉得要拆毁老城——把如此丰富的人类状态装进千篇一律的楼房简直是罪过，因为历史不可复制，尤其是具有多样化的历史，失去便永无再现。

艾提尕尔清真寺旁正在拆毁一片老房屋。挖掘机、推土机、重型卡车，各种机器的吼叫此起彼伏，灰尘遮天蔽日，太阳都变了颜色。施工的是汉人民工。已经有一大片老房子被推平。正在拆的房子暴露出内部，能看到原本贴在墙上的图画。几个小孩跑进废墟中，试图捡

点什么。一群当地居民默默站立，看着他们的房屋如何被夷为平地。他们头带维族小帽的背影如同雕塑。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是在惋惜祖辈的老屋，还在是憧憬未来的新居？

工地旁矗立着题为「喀什市老城区改造二号安置小区」的广告牌，是中共喀什市委和喀什市政府所立，上面写着自我标榜的「德政工程，得民心工程」。介绍小区可以迁入二千七百五十户，享受政府拆迁安置最优惠房价。广告牌上画出未来小区的模样，其中的建筑六层楼房最多。按工程规定六层楼无需装电梯。但维吾尔家庭一般都有老人，每天爬楼对他们显然是问题。在老城区，老人坐在家门口就可以和左邻右舍聊天，妇女们也在门外编织缝补，形成交往密切的小区。住进楼房后，老年人的交往增加困难，精神生活会受影响。虽然楼房增加了公用暖气，有上下水，但这种物质的方便能不能抵消精神生活的损失？

和古丽娜下乡

八月九日。坐车去疏勒。疏勒县距喀什市只有 7 公里，属于喀什地区。但历史上疏勒在先。两千年前这一带是疏勒国所在地，直到公元十世纪喀喇汗王朝建立后，才出现喀什噶尔之称。喀什是近代人对喀什噶尔的简称。清朝在新疆建省后，疏勒被当地维吾尔人称为新城，主要是汉人居住。民国时成为疏勒县。现在的疏勒是南疆军区所在地。县城内很大一部份都和军队有关。

古丽娜在疏勒客车站接我。她是个美丽、文雅的维族女孩，民考汉，从小上疏勒驻军子女学校，汉语发音非常标准。有意思的是，她身上甚至有我熟悉的感觉。我小学在东北的吉林上军队子女学校，时间相差这么多，空间相距这么远，背景如此不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通的呢？

到古丽娜家坐了一会。她父母是县里干部，家住平房，有院子。随后她带我去赶塔孜洪乡的巴扎。一个名叫艾力江的小伙子陪我们。每个乡都有巴扎天——相当于内地的赶集日。今天是塔孜洪乡的巴扎天。巴扎是个给人印象丰富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各种乡村交易物品，地方特色的饮食，以及城市早已见不到的手艺——打铁、剃头、磨刀等，可以拍不少照片。

我提出想看普通人家生活。古丽娜和艾力江认为我要访贫问苦，专门问了村里人，带我去了最穷的一家。在那家看到一位老妇，一个男子，还有一个蒙在襁褓中的婴儿睡在两棵树之间的自制吊床上。据说男子是老妇儿子，但看上去跟他妈差不多老。那婴儿是什么关系我就搞不清了。的确是很穷的一家。母子俩衣服肮脏，都打赤脚，身姿佝偻，院子里凌乱不堪。我没有进房间，但是从院里摆的床看得出房间里不会好到哪去。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农村很多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这家院子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人床。床上铺的毡子千疮

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被褥不迭，皆是几年未洗的模样，上面有厚厚油腻，也不用床单和枕巾。

男人看上去思维不很健全，谈不清话，也问不出事，所以看了一下我们就离开了。

参观村里的小清真寺。维吾尔人村庄几乎都有清真寺，有的村甚至不止一个。过去我看材料上写新疆有二万多个清真寺，还怀疑是不是写错了。但如果每村都有就不奇怪了。村里的清真寺不超过一个农户家的规模，只有一个经堂，一个小院。我们去的清真寺院门上方挂着维吾尔文铜牌，古丽娜翻译上面写的是「根据国家法律，不满十八岁不许进入清真寺」。

古丽娜说，为了防止学生去清真寺，除了平时严管，即使是放暑假期间也要求每个星期五学生集中到校，因为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礼拜日，学生在家有可能去清真寺。

古丽娜翻译村委会墙上的维语标语是「超生一个罚一万」。

中午在乡上小饭馆吃饭。饭后去巴合奇乡。古丽娜就在这个乡的中学当教师。学校九十多教职工，一千多学生。现在是暑假时间，学校没有人。古丽娜平时要花很多时间为乡政府做翻译，因为上面从来不用两种文字发文件，基本都是汉文，维吾尔人看不懂，必须翻译成维文。

艾力江是县劳动人事局的干部。他说疏勒共有干部六千人，其中教师就占了三千五百人。规模比较大的乡一般有二百多干部，小乡也有一百多。这两年调了不少汉人来南疆，分到乡里当干部。目前汉人在乡干部中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在几年前，一个乡顶多有五六个汉人。

进中学看了一下。教师办公室墙上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孙中山和邓小平的画像。每个教室黑板上方是国旗，两边是毛和邓的像，但是看不到江泽民像。全校有一台计算机，是香港捐赠的，说是为了远程教学，但实际从来没有应用过。

古丽娜说为了解决学生辍学问题，学校规定学生不到校，教师必须自己去把学生接到学校。九十多个教师中有六十多人买了摩托车，一个重要用处就是接学生。学生学杂费收不上来也得教师垫付。这使教师不得不逼迫学生交齐学杂费，加剧了教师与学生家长的矛盾。现在的乡村教师不好当。

从学校出来去十村。见到两个妇女，我们想搭话，她们有怀疑，因为不认得刚来学校不久的古丽娜。问了中学校长叫什么名，古丽娜回答正确，她们才相信。于是她们用维语对古丽娜不停地说了半天，都没法让她们暂停一下。古丽娜后来给我解释，她们抱怨村里要求每人必须交五元钱医疗费，一家就得几十元。说是医疗费，可是看病从来都得自己花钱，也不知道为什么收这钱，用到哪去，怎么用，没有人解释，只是要求必须交，不交的话就会随拖延的时间不断增加罚款。

村民这几天议论纷纷，都对此不满。

我猜测那也许是「合作医疗」项目，村民集资一部份，政府投入一部份，建设农村医疗的网点。搞得好，也许可以有作用。但专制政府就是这样，包办一切，却不管民众是否了解和同意，即使办好事，效果也如同办坏事。

在平静中述说的苦难

八月十日，和古丽娜继续去疏勒农村。路过一个院子，看到有个妇女，问我们是否可以进去坐坐。她给我们开了门。家里只有妇女和三个孩子。妇女说男人赶驴车去疏勒的巴扎卖柴禾，为的是交不知道为什么要收的医疗费。家里已经没有一点钱，本乡星期四的巴扎天都没有去买菜，这个星期原本准备不吃菜了。但突然要求收医疗费，晚交就要罚款，只好把家里仅存的柴禾拉到县里去卖。

女人三十多岁，高个，丰满但还没发胖，虽然双手粗糙，皮肤晒得黑，仍然算漂亮，少女时肯定是个美人。她和昨天见的那家穷人不一样，身上穿得干干净净，头戴花头巾，脖子上有各色石头串起的项链。家里虽然没什么东西，但收拾得整整齐齐。还挂着一些色彩鲜艳的廉价织物，尽量营造家的温馨。

我跟她聊，古丽娜翻译。她的谈话很日常，但正是那种平静，让人感到隐隐心痛。

她说自己丈夫没什么手艺，只能在家种地。她除了干家里的活，还给本村其它农户拾棉花、割麦子，挣点钱。家里的粮食够吃，不用出去买，就是没有钱。每年种地要投入二千五百多。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

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不知为何该由他们还贷款？去问村干部，回答是上面这样安排，其它的不解释。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村民们从广播里知道，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

年轻人分家后村里给的土地往往是后开垦的。她家也是这样。后开垦的耕地比较远，都在水渠末尾，水少的年成，在水渠前面位置的耕地把水放光了，后面的耕地就浇不上水，最后得不到收成。为此他们每年要交保险费，一旦没有收成，保险公司会给赔款。但是赔款却被村里收走，不给个人，而到交税费的时候，没收成的地也得照交，不合理。

土地承包给个人三十年，说是如何耕种由个人作主，实际却不是

这样。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就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等到收获，也必须交给乡里收购，不能自己运到外面卖。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如果县里有工作组检查，乡里收购价格立刻提高一些，工作组一走，价钱又会下来，说明乡政府不执行上级政策。

我问她最近一次买首饰和添置新衣服是什么时间。她说去年秋天买了一次衣服，但是首饰没有买。问她最近一次看电影的时间，是两年前县电影队来村里放露天电影。城里电影院从来没去过。最近一次两口子去城里逛商店是前年和丈夫去疏勒县城，其它就是去乡上巴扎买菜。她也想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三个孩子不能不管，因此除了疏勒、喀什以外，哪里也没去过。

她家有一个十四寸黑白电视，能收五个频道。她说好在还有电，电费是八角五一度（比北京贵一倍）。我们说话时，孩子在看电视里阿拉伯飞毯的电影。我问她每天可以看多久电视，回答闲的时候可以看两三个小时，忙的时候一点看不了。她说喜欢看的节目是喜剧。

她的孩子在学校属于贫困生，因此只需要交三十到六十元杂费，学费和书费都免了。问她想让孩子上学到什么程度。回答要看经济能力。她不想让孩子过自己这样的日子，希望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能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的事情，享受自己没有享受到的生活。说到这里她哽咽了，然后说即使不能让孩子上大学，也要让他们学会手艺。

她和丈夫是自由恋爱，所以容忍丈夫的贫穷。丈夫母亲是后妈，结婚时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只有一件小屋。成家之后，他们自己又在小屋旁接出一间。生第一个娃娃的时候，她不想再过这种穷日子，回了娘家，打算离婚。她有一个姐姐也离婚在家，劝她不能让第一个娃娃就是没父亲的孤儿，于是她回来了。等到后面两个娃娃生出来，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问她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贫困？回答一个原因是自己没有知识，只能干力气活。一个原因是只要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而且还有很多派工，必须无偿地干，如果迟到或者没去就要罚款。罚款不及时交，还要往上涨。另外一个原因是丈夫家没给什么东西，连一个碗一双筷子都没有，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添置。买电视是给人摘苹果挣的二三百块钱。等到情况刚刚好一点，娃娃出生，又把钱花光了，所以始终没有翻身机会。我问在这几个原因中，她认为哪个最主要？她把原因归于自己，说是没有知识。然而我想，如果没有那么多苛捐杂税，他们可能也早会翻身了。

飞毯的故事演完，电视里变成本地一台维族歌舞表演，歌颂祖国新面貌。一边听她的谈话，一边看电视荧屏中种种浮华和造作，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同时摆在眼前的对比，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假，再鲜明不过。然而对于外人，平时看到的却都是电视荧屏上的影像。

我问村里有多少家和她家生活水平差不多，她回答百分之三十五

到四十五。她说不少人家虽然困难，但是对外不说，自己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

她最高兴的事是前几年棉花价格特别好，有一年干下来挣到四五百块钱，因此买了一些砖加固院墙，还买了一个铁门换掉原来实在太破的木门。不过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那么多钱。

我问家里多长时间可以吃一次肉，边看电视边写暑假作业的儿子插嘴说，哪有什么肉吃！女人说在收获季节，卖了棉花粮食后一般可以买点肉，平时很少有肉吃。

至于看病，没有人管，全靠自己，任何一点药都要交钱。附近一个农民重病去医院，全家只有七百元，医院一定要他交二千元，否则不给治。那农民没有办法，就跳楼了。

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钱。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那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哭，她用手捂嘴，不想发出声音，泪水在她那维吾尔人的美丽眼睛中反射阳光。我赶忙走开，把她的哭声留在身后。半天我不敢面对身后的古丽娜，怕她看见我眼里也有了泪。女人的哭当然不会是为了钱（如果为钱是该笑），而是感到了有人同情吧，这种同情也许很久没从外人那里得到，才使在苦难中麻木的她有了这种反应。

似乎回到中国内地

又随意进了一户农家。那家人口很多，光是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孩就有五六个。我原以为是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后来知道是分家出去过的儿女星期日回来看爹妈。这家人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屋，没有怀疑和防范。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微服私访的有权者，不断说只有不跟当地官员打招呼直接下乡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全家人围着我，七嘴八舌，激动述说的中心意思是：他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国家政策，好像明天就能富起来，大家都为此高兴，可是基层真实情况全是反的。当官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麦子还没熟就强令收割，然后要求种玉米，玉米长出来还是青的又让割。古丽娜翻译这些话有些混乱，可能和她不太了解农业生产有关。我只能猜测当局所以这样做，也许是「科学种田」的安排，尽早收麦好能多种一季作物，而收割青玉米也许是要做青贮饲料？这些安排的动机不一定坏，但是对农民任意摆布，无视他们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好心也只能办坏事。

问村干部如何选举。他们说没有选举，村长由乡里指定，组长由村里指定，农民一点权力也没有。原来当了三十五年的党支部书记在没人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被撤了，乡里把十三村的书记调来。那人原来是这个村的村长，因为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有人要杀他，所以被调走。然而没有降职，让他到十三村当了书记，现在又调回来，权力比原来还大，根本不征求村民意见，大家都不满，也不服。他们认为要

是真能让农民自由选举村干部，情况肯定会改善，生活也会提高。

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竟然产生是在中国内地农村的感觉。虽然要经过翻译，面对的是突厥人的面容，可是谈话内容、关注的问题、表达的不满，和内地农村都是一模一样。我来新疆本是为民族问题，但是在这种谈话场合，民族却消散了，面对的是不分民族的同样百姓。

玩鸽子的人

八月十一日。今晚要离开喀什，白天又去老城和广场转。老城里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做手艺的店铺。做各种木器、炉子、水桶和灶具，还有制作门上的装饰、形形色色的老式工具……沿街一路走一路看，半天走不了多远。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内地几乎已经绝迹，我担心在这里不用多久也会消失。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美好有趣的事物总是敌不过庸俗和标准的批量产品，步步退后，最终消亡。

广场是喀什的中心。有一尊十几米高的毛泽东塑像，应该是文革遗物。毛面对广场，检阅一般招手。当地旅游手册介绍这里是全新疆唯一以毛塑像为中心的广场。但是当地人对这个塑像并不怎么崇敬。穆合塔尔曾讲过，维吾尔人称这塑像为「毛木提·达瓦提」，是维语的「玩鸽子的人」。因为当年喀什人养了很多鸽子。那些鸽子特别愿意围着塑像上下翻飞，停留在毛像的头顶、肩上或高举的手上。看起来，毛就像一个特别愿意和鸽子嬉戏的人，由此得到这绰号。后来当局认为那景象对毛过于不敬，干脆禁止居民养鸽子，今天的广场也就没有了当年有趣的景象。

我乘所谓的「红眼飞机」北京时间凌晨两点起飞，因此机票便宜。上飞机需要在机场步行一段距离。喀什噶尔的风干燥温热，拂在皮肤上像摆动的丝绸，非常舒适。登机后飞机检修又延误一小时。三点四十分才在乌鲁木齐机场降落。这时的中国内地已经快起床了。

二、（二〇〇三年秋）

哈密追忆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从星星峡进入新疆。这次仍然是开阿克的车，不过不是当年的桑塔纳 2000，是一辆国产越野车。除了我和阿克，还增加了阿克的新夫人杨萍，我的未婚妻唯色。我们像一个旅游团，从宁夏出发，一路去了内蒙额济纳旗、嘉峪关和敦煌。今天从敦煌出发，要赶到哈密住宿。

一九九九年进入新疆，警方设卡的铁栏横在星星峡，盘查每一辆从新疆出来的车。这次没看到关卡，敞开的公路自由进出。

戈壁滩上公路平坦笔直，可以开得跟在高速路上一样快。迎着夕阳到了哈密。哈密城比当年扩大了不少。我们先开车在街上浏览。唯色第一次到新疆，希望看到维吾尔人，却满街是汉人，每发现一个维吾尔人她都会惊喜地叫一声，并且感叹为什么在维族的地方看见维族人这么不易。

阿克很肯定地说当年他被拘押在哈密地区安全处，但是开车转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找到安全处在哪。好在当年住过的哈密迎宾馆还在，我们俩都能认出来。那旅馆是哈密旅游局所开，建筑样式是伊斯兰风格，是少有的外表贴瓷砖却不难看的建筑。

在旅馆安顿下来。我和唯色上街吃新疆的「大盘鸡」。所谓「大盘鸡」是鸡块和洋葱、土豆、青椒等烧在一起，再拌上宽面条。我跟唯色回忆，新疆安全厅看守所曾经卖过「大盘鸡」，为的是挣犯人的钱。外面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二十多元，看守所的「大盘鸡」用四分之一只鸡，却卖四十元，好吃部位还叫「管教」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热心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人要。我进看守所时那生意已经停了，只是听「陈叔」讲起。我还有点遗憾，因为当时我很馋，哪怕四十元吃到四分之一只鸡也愿意。

火焰山下采油场

九月二十四日，阴天。从哈密到鄯善，公路两旁每隔几公里就会冒出一个水泥动物雕塑。那些雕塑个头巨大，形象拙劣。除了骆驼是本地有的动物，其它袋鼠、大象、恐龙等，都不是新疆有的。一个个时空错位的巨型动物形象在戈壁上接连出现，给人一种荒诞感。我猜想做这些雕塑也许是为了促进新疆旅游吧。看得出新疆对旅游的热情

高涨，却实在不能算有品味。

一九八〇年我在鄯善住过。那时全城只有属于政府的一个招待所，简陋平房，没客人，也看不到服务员，院子里是当地维族青少年玩耍的地方。现在县城全变了，挤满建筑，特色毫无。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党校门上的硕大党徽，非常夸张，从没在其它地方看过，倒像是政治波普，故意制造反讽效果。

去吐峪沟的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问了几个人后，唯色总结出维吾尔人用汉话说「那边」，是不远；说「那——边」是比较远，说「那————边」就会是很远，总之表达距离的远近用「那」的发音长度。

经过吐哈（吐鲁番和哈密）油田采油场，到处矗立采油机，一起一伏地把地下原油抽到巨型储油罐里。我们在一个采油机前跟值班工人拉话，参观了值班的活动房屋。一个采油机一人值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桌，却配备了两台冷气机，还有电暖气和饮水机。

去吐峪沟的路沿着火焰山延伸。维吾尔人称火焰山为「克孜勒塔格」，意为「红山」。一百公里长的山都是红色，外表几乎寸草不生，夏天极其炎热，地表温度可以烤熟鸡蛋，加上沟壑形状使山形看去如同火焰，因此汉人称其为火焰山。《西游记》里写的唐僧受阻火焰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据说就是这里，也由此使火焰山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我以前多次到火焰山，还曾登到山顶。如果是阳光照射和蓝天衬映，山的颜色特别绚丽，但是今天天阴，光线不好，山的颜色灰暗平淡。

「中国麦加」吐峪沟

吐峪沟在火焰山最高峰脚下，藏在火焰山褶皱之间。之所以有名，在于吐峪沟是中国境内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被称为「小麦加」。 传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他的五名亲传弟子向东传教。走到这里，有位带狗的牧羊人成为第一个信仰者。五人便和牧羊人长住此地，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去世后都埋在这里，现存六座土坟和一个形似狗的石头，被称为七圣贤墓。维吾尔人把伊斯兰圣贤的陵墓叫做麻扎（据说是阿拉伯语音译）。这是我第三次来吐峪沟。一九八〇年那次既看不到管理者，也看不到朝拜者，感觉最好；一九九九年也比这次感觉好。现在已经成为旅游点，进去要买六元钱门票。我没进去。唯色是第一次进麻扎；阿克夫妇是穆斯林，当然要进去朝拜。不过杨萍说她没进圣人墓所在的洞穴，因为按规矩进入圣地必须净身，是很严肃的事。现在圣地被当地一个阿訇承包，给钱就可以随便进。

我在外面转了一会，陆续来了几辆车，都是维族朝拜者。不过目前这麻扎可能只是个意象，据说真墓在文革中已经被毁，目前看到的

是后来仿造的，只是当地人对外都不说。

离开麻扎去村里。村子建在火焰山沟壑中。虽然火焰山外表寸草不生，但是山体深处有些沟谷长年流水，植物茂盛，生机勃勃。吐峪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沟壑中的村庄高高低低，层次丰富，村中街道弯曲回转，走在里面，总是会有马上看到新景的期待。不过这次来，感觉村子明显比以前衰败，没有了过去那种生活气息。很多房屋被放弃，开始坍塌。人们正在陆续搬到镇上，去过一种接近城市化的生活。从城市来的旅游者喜欢看乡村，但是生活在乡村的人显然更有道理喜欢城市。

路过一个侧门，看到里面是个挺大的清真寺。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进，于是只迈进一步，站在门口往里看。刚拍了一张照片，院子一角做土木活的维吾尔人便对我吼起来，我赶快退出。因为听不懂维语，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是不应该从侧门进，还是不应照相？或是像杨萍所说没有净身？还是只因为我是汉人？

当年我和阿克夜间行车，进一路边小饭馆。推门第一眼看见昏暗灯下，一戴白帽的穆斯林男孩在读书，给我一种「一千零一夜」的意境。在男孩给我们弄饭时，我试图翻一下他看什么书，男孩迅速跑来把书收走，让我尴尬。穆斯林阿克知道是怎么回事，笑着说「他嫌你脏」。原来男孩在看古兰经。尽管从物理上我比那孩子干净，但是在他的理念中，异教徒都是脏的。

由于对伊斯兰教不了解，举止可能经常引起穆斯林不满。我在村里拍照时，迎面走来一对老夫妇。我把相机对准他们，老妇便停了一下，不知是为配合我，还是想看我干什么，立刻遭到老头的斥骂。我觉得自己又做错了事。肯定是我的行为引起老头骂老妇。

唯色以前从未到过新疆，但她显然更容易被维吾尔人接受。一群修房子的村民知道她是西藏人后，便把她围在中间仔细研究，议论她的首饰，用生硬的汉话说西藏和他们一样。一个粗壮男子用汉话说「解放军」，然后作出机枪扫射的姿势，在场的人当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原打算住在吐峪沟，深入体会一下维族村庄，但是正在荒芜的村子显然不适合借宿。修房子的人告诉我们有一条新修油路到吐鲁番，非常平坦，且距离不远。我们就走那条路去了吐鲁番。

吐鲁番夜市遇见买卖提

在吐鲁番找了个小旅馆，每间房的价钱砍到一百一十元。住下后和唯色去夜市。二十多年前，我在吐鲁番夜市喝蜂蜜啤酒吃掉过四十个羊肉串。那时没电灯，都是汽灯，还有喷火苗的电石灯，特别有气氛。夜市上人气沸腾，拥挤喧嚣，大部分是维吾尔人。羊肉串好吃得令人难忘，一串才一角钱。一九九三年住吐鲁番，也在夜市吃过烤全羊，那时变成了电灯，灯火通明，红红火火。这次来却全不一样了，

周围立起高楼大厦，夜市也没了合适空间，于是只能衰落。三三两两的摊位显得稀疏，顾客不多，吃的东西也乏善可陈，吊不起胃口。

在我们味同嚼蜡地吃东西时，来了一伙维吾尔青年，坐到我们这个摊上。一个小伙主动用汉语和我们搭话，自我介绍叫买卖提，今年十九岁。他和伙伴都是吐鲁番一个有名景点——葡萄沟的村民，今天到城里参加婚礼。在我印象中，葡萄沟是被文革期间一首歌唱红的。那时歌少，往往一首歌举国老少都会唱。其实无非就是个葡萄园，借着唱出的名气搞成了旅游点。买卖提汉语流利，说葡萄沟现有新老两区。老区是原本的葡萄沟，由当地经营。新区是在老区外扩大的葡萄种植区，由内地汉人公司经营。游客进新区要买二十元门票，进老区还得再买二十元门票。跟他一起来的两个漂亮维族女孩，在「维族家访」当招待和唱歌跳舞。所谓「维族家访」，是让游客到维吾尔农家做客吃东西。但那维吾尔农家绝对不是真的。两个维族女孩是给一个广东老板打工，所谓「农家」的维吾尔人都是雇工。游客看到的是维吾尔人唱歌跳舞，看不到的是广东老板在后面数钱。

买卖提之所以和我们主动搭话，应该是为了营销。他说由他带我们进葡萄沟，不用买四十元门票。他家自己开餐馆，还卖葡萄干等。他给了我电话号码，除了想拉我们去他家消费，是不是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希望我们把更多内地客人介绍给他？我对这个十九岁青年刮目相看，有如此素质，前途应该无量。他的同伴有七、八个，只有他跟我们说话。

买卖提说他从来不想民族问题，考虑的只有挣钱，图得就是生活好。他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还设想到中国内地做生意。不过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并不会全部暴露给夜市上碰见的外族人。我问他是否知道热比娅，他含蓄微笑，回答「他们说她想那个」，但是他不相信。「那个」应该是指新疆独立吧。他不相信吗？很多维吾尔人都有独立愿望，为什么他不相信热比娅会有呢？

唯色说跟买卖提一起的一个女孩眉目长得像汉人，买卖提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唯色要小声，说那女孩听到会生气。

世界第二低地——艾丁湖

九月二十五日。吃过早餐，阿克夫妇和唯色去交河故城。那一片土建筑群是两千多年前的车师前国都城，被认为是同雅典废墟一样伟大的遗迹。我没陪他们去。当年交河古城还没成旅游点时，我去过很多次，欣赏过那里日出日落，也曾在月下的古城徜徉，我怕败坏了当年那种神奇美感。

我自己去走吐鲁番市里的葡萄长廊。长廊入口处竟有举着葡萄的裸体女雕像，是西方风格的拙劣模仿。这在过去的维族地区是不可想象的。长廊笔直一条，几乎看不到头，十几米宽。两边葡萄树在头顶搭成遮阳凉棚，地面是光滑的水磨石。这么大的工程只有政府有能力

做，为的是成为吐鲁番的标志。可是长廊之内空空荡荡，行人寥寥无几，令人怀疑这占了市中心如此多土地的工程，跟当地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少关系。作用也许只是给吐鲁番官员的脸上贴金。

市中心还有一个大广场。广场是专制政权的特殊偏好。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搞这种广场。广场花池中，一群维吾尔女工在拔草。穿保安制服的维族男人站在旁边监工，令人想起古代奴隶干活的场面。

他们从交河城回来，我们出发去艾丁湖。艾丁湖是吐鲁番盆地最低点，海拔高度负一百五十四米，是中东死海之外的世界第二低地。我当年到过艾丁湖边，在湖边芒硝泥里赤脚走过，现在却根本找不到去湖边的路，问路又语言不通。

按地图找到了艾丁湖乡，却远未到湖边。总算遇到一个汉人，他和几个维吾尔人共坐驴车，给我们详细指了一条从兵团连队到湖边的路。他一九六二年饥荒时从甘肃随父母来这里，维语流利，说是和维族人处得很好，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他的村只有四五户汉人，其它都是维族。他们属于被维吾尔人接纳和救活的人。现在维吾尔人仍然接纳他们，给他们土地，视他们为乡亲。

我们按汉人指的路到了兵团地盘，离湖边仍然遥远。能看到艾丁湖的芒硝在远处反光，却无路可走。这里居民都是汉人，来这十多年，没人去过湖边。只有一个女人说曾有个小伙试图骑摩托车到湖边，但是没走通。

阿克不甘心，他热衷追求「到此一游」，哪怕差一米，都不算达到中国最低点。我们尽量往前开车，走不多远就全是大坑，再不能通行。GPS 显示是海拔负一百五十一米，我把 GPS 放到地上，变成负一百五十二米。我找了一个大坑，建议阿克跳到坑底，就会变成负一百五十四米，他的愿望就能实现。

在兵团五连见到有一座未完工的大房子，有四壁没有房顶。一农工说那是当年盖的集体食堂，还没盖完就开始实行土地个人承包，集体散了，食堂不再需要，因此一直停工到现在。

还有一片新盖的土坯房。只有几家有人住。多数房间门窗都没了。当地人说那是上级拨款给新移民盖的。从内地来的新移民多数又回去了。短的只呆几个月，长的顶多三两年。我进那些空房看了看，遍地粪便，已成厕所。

下午到托克逊，住县邮局宾馆。

「豪华拌面」

九月二十六日。从托克逊穿越天山去南疆。这段天山不是很险，但一路还是看到好几辆翻车。有一辆翻后重新上路的车，用纸板蒙着无玻璃的前窗，纸板在司机眼前位置掏了个小洞。车壳摔得瘪瘪歪歪，

远看怪模怪样，让人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但仍然开得飞快，好奇特。

中午吃饭。这是一个中间位置，公路两旁聚集长达两三公里的饭馆群。很多车都要在这吃午饭。好笑的是，几乎所有饭馆名称都冠有「豪华」二字，如「豪华拌面王」、「豪华面霸」、「豪华手抓肉」、「超豪华烤肉」等，可见中国的奢靡之风，连边陲戈壁滩上的小饭馆都要自诩豪华。我们吃了一个「豪华拌面」，却没吃出其中有什么「豪华」。不过叫这种名的饭馆，都是汉人和回族人所开。维吾尔人的饭馆，还是叫「民族风味饭馆」那种不豪华的名字。

正在修建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高速公路。新疆大肆修建高速公路令人奇怪。这里到处一马平川，公路笔直，行车稀少，车速随时可以达到百公里以上，已经等于高速公路。再在公路旁边投资修一条高速路，作用何在？目的可能并非为了交通，而是为了从工程得到政绩和捞钱机会。

轮胎漏气，换了备胎。到下一个镇子补轮胎，遇到一个来这十几年的四川老板。他一直给军队项目施工。这一带有导弹部队，还有激光武器试验场。他以掌握内情的口气透露，核试验现在仍然还在搞，不过是比原来更隐秘。

与穆合塔尔秘密接头

我们没进库尔勒，直接开往轮台。因为修路，随时要下便道。我不停打穆合塔尔的手机，却总是无法接通。用路边公用电话打也是一样。我开始有些担心，怕他出事。这次我们约好在轮台会面，然后一块环绕南疆。直到太阳快落时，穆合塔尔才用公用电话跟我联络。他已到轮台。一出库车他就把手机电池取掉，防止监控者发现他的踪迹。他的警惕性特高，在看守所时就教我，用完公用电话再乱拨几个号，免得别人利用重拨功能找到刚打过的电话。

在轮台县城约定的路口看到穆合塔尔，天光已所剩不多。他与唯色、阿克夫妇都是第一次见面。上车后来不及多寒暄，他长时间地回头观察有没有车辆跟踪。虽然这种担心和警惕可能多余，但说明我们生活的环境让我们时刻处于恐惧之中。

从轮台拐上塔里木油田公路，直到塔里木河边，一路都看得见灯火，还有各种建筑，矗立的油井和燃烧的「大蜡」——那是地下释放的可燃气体被就地烧掉。路也不像过去那样孤零零一条，而是四通八达。遇到几个维吾尔人问路，穆合塔尔和他们说话。唯色说听他们讲维语，想起伊朗电影中对话的音调。她爱看伊朗电影，因此倍觉维语亲切。

塔里木河边已经出现一个镇子，即使夜晚都相当喧嚣热闹。来往车辆在这加油、吃饭、修车。十年前我走这条路时，只有安静的河流和成片芦苇。原以为仍像当年那样安静，我的计划是在塔里木河边宿

营，现在只好临时改变，到河对岸的胡杨林里宿营了。

开始下雨。我们在胡杨林里搭起帐蓬。大家挤在阿克帐篷里喝酒。穆合塔尔在轮台买了熟牛肉，我们车上也带了吃的。几轮酒后，大家便一见如故。穆合塔尔多数汉话都会，有些普通的词却说不出来。比如他想说豹子，双手比划着形容：就是那个身上有圆点，猫一样的，会爬树的。我们放声大笑。从此以后，猫一样的会爬树的就成了他的代号。

喝酒时谈起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穆合塔尔说老人回忆，当年一有核试验，库车下午两三点天就黑，连续多日漫天刮黄土。新疆前后进行过四十八次核试验。不少人得的怪病都和核试验有关。一九八五年新疆各大学学生游行请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

睡觉时，雨点敲打帐蓬，煞是动听，雨水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雨中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九月二十七日。一夜风雨，帐篷进了水，但睡得十分安稳。醒来钻出帐蓬，看见穆合塔尔披着毯子在树林里溜达，样子活像个塔力班。昨夜让他睡在车中，越野车后座的靠背放平，正好是一张床。原以为那是最好位置，但可能给他盖的东西少了，他冷得不行，只好早早起来溜达。

收起湿帐蓬，装好车，开始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沙漠东西长一千多公里，南北宽四百多公里，总面积三十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在世界排第二，仅次于撒哈拉沙漠。我们走的沙漠公路从沙漠北缘的轮台到沙漠南缘的民丰，全长五百多公里，是一九九三年动工修建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由无数起伏的沙丘组成。公路在沙丘上时起时伏。沙丘本会随风流动，但公路工程采用了一种固沙方法，在公路两侧用芦苇草竖着插进沙中，排成横平竖直的方格，宽度在几十米左右。然后再竖立一米多高的尼龙网和芦苇，形成阻沙栅栏，以此把公路所经的沙丘固定住。阿克说这种方法是宁夏创造。宁夏很久以前就用这种方法给经过沙漠的铁路防沙。

穆合塔尔说维语中「塔克拉玛干」意思是「原来有人住的地方」，其它数据都说维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这两个意思是通的——原来有人进去住，但是没有再出来，然而两个不同角度给人传达的意境却大不一样。「原来有人住」虽然也是没出来，但可能是留恋里面的仙境，不想出来。「进去出不来」则完全是在渲染恐怖，和汉语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命名的「死亡之海」是一个意思。唯色喜欢穆合塔尔解释的名字，那更有诗意。由此也看出不同的翻译会造成多大差

别。

一路虽是茫茫沙漠，雨却下个不停。雨和沙漠在一般概念中不会并存，却一路同时陪伴我们。这是很少见的现象。如果在地图上看，穆合塔尔从小生长的地方离塔克拉玛干沙漠不远，但他却没见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曾经从沙雅县骑摩托车向沙漠方向走了六十公里，也没到达沙漠。不过因为他昨夜没睡好，加上冻得感冒，一路睡觉，只能偶而睁眼看看他的沙漠。

在沙漠中心，公路分成两条，一条去且末，一条去民丰。岔路口有个比较正规的加油站，路边零乱地盖了一排简陋房屋，有饭店，也有修车补胎的铺子。塔里木油田在这建了一个牌坊。上有对联「建设大油田视无私奉献为荣，寻找大场面以艰苦奋斗为乐」，横批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几个大字。这种毛时代流传下来的语言，恐怕也只能停留在这个孤零零的牌坊上。

加了油，继续前进，穆合塔尔也醒过来。因为我不爱聊天，阿克跟我在一起比较闷，就专门跟穆合塔尔争论逗嘴。比如穆合塔尔说世界各国只有新疆存在一个兵团，阿克就说这么大国家没国防怎么行；说到西域的称呼，穆合塔尔说凡是西边的都可以叫西域，中国是不是把欧洲也叫成西域，阿克就说西域的称呼挺好，历史上都这样叫；他甚至说民族越落后越好管，如果都是文盲，就会怎么说怎么是……我实在听不下去，插嘴说阿克你这个回族比我还像汉人，按你的说法，是不是该让回族人都成文盲？

我们这一车，两个回族，一个维族，一个藏族，就我一个汉族。

精绝国的毛泽东语录碑

到民丰时仍然下雨。民丰古称尼雅，县城现在也叫尼雅镇，历史上是丝绸南路的重要驿站。古代的精绝国据说也在这里。民丰县城不大，中心是个环岛，保留着一座建于一九六八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碑。上有汉维两种文字的毛泽东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文是现在已经废了的新文字。看那新文字，我至少能读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名字，而老文字对我则如天书。碑的顶部是毛泽东侧面像，底部环绕葵花浮雕。这座碑显然一直被维护。鲜红的碑体应该在不久前还重新上过漆。周围台阶用的仿大理石材料，也是当年没有的。这些在中国内地早不见踪影的遗迹，却能在新疆看到，不知说明什么？

在一个维吾尔小餐厅吃饭。刚出锅的油馍非常好吃。维吾尔饮食主要是面食。穆合塔尔每天都吃一次拌面，终生不厌。吃饭时的话题还是离不开民族。唯色讲到她的一个裕固族朋友，穆合塔尔说裕固族其实是维吾尔族的分支，裕固是英文 Uigur（维吾尔）的发音。不过

裕固族被叫做「黄维吾尔」——因为他们没有改信伊斯兰教，而是一直信佛教。

于田艾提卡清真寺为何缩脖子

民丰下一个县城是于田，维吾尔语称克里雅，由克里雅河而来。这里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中兵力最盛的扜弥国，后被于阗国所并。

于田的艾提卡清真寺有八百年历史。几年前盖了一座新建筑，整体用砖砌出漂亮花样，精美令人赞叹。但是建筑顶部的中央拱顶却盖矮了，从下面看，就像缩着脖子一样，感觉特别不舒展。穆合塔尔问当地老人，老人说原本设计的拱顶比现在应该高四米，但是县里不允许，说是那样会比政府办公楼还高。于田县的最高建筑就不是政府办公楼，而是清真寺了。政府不批准，清真寺没办法，只好把拱顶降低到现在高度。但是盖起来以后谁看都不顺眼，大家有意见，跟政府反复交涉，现在政府同意拱顶加高到原设计高度（我估计是换了领导人），清真寺准备不久就把拱顶拆了重盖。至于损失的费用，当然只能清真寺承担。

进入清真寺大门，院里还有一个经堂是老建筑，挂着一个维文牌，穆合塔尔翻译如下。

> 六不准：一、不准国家干部、学生和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参加清真寺的任何活动；二、不准搞圣战宣传，煽动民族纠纷；三、不准进行民族分裂的宣传；四、不准看和传播圣战方面的书、杂志、印刷品；五、不准干预行政部门的正常工作；六、不准搞跨区域的宗教活动。
>
> 三限制：一、星期五的主麻[①]不准超过半小时；二、乃玛孜[②]要按原来的风格和形式，不准变换其它形式；三、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准进入。

听着这些，「宗教自由」的标榜就像是在说反话一样，成了讽刺。

清真寺的老门现在成了后门。那门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文革中在上面竖起了毛泽东像。一个维族老汉说，文革时原本要把清真寺改成学校，当时一个汉族副县长竭力阻止，说这座清真寺是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没被改成学校，避免了对老建筑的破坏。我不知道老汉特别提出

---

① 主麻是阿拉伯语"星期五"音译，意为"聚会日"。伊斯兰教规定星期五为聚礼日，通称"主麻"。这一天正午后教徒举行的集体礼拜称主麻拜。穆斯林习惯称一周为一个主麻。

② 乃玛孜源自波斯语，指穆斯林的礼拜。穆斯林每天要做五次礼拜，分别在晨（破晓）、晌（午后）、日甫（即日偏西后）、昏（黄昏）、宵（夜晚）五个时间内进行，称晨礼、晌礼、日甫礼、昏礼、宵礼。

汉族干部做的好事，是不是因为我是汉人，鼓励我也要做好事？

库尔班大叔传奇

离开于田时，看到毛泽东和库尔班大叔握手的塑像。曾经传遍中国的维吾尔老汉库尔班骑毛驴到北京看毛泽东的故事，我当年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那故事到底是真是假，今天谁也说不清。按穆合塔尔的说法，真实情景是老汉骑毛驴碰到了政府官员，问他去哪，他开玩笑说给毛主席送瓜，其实他抱的瓜是给自己吃的，政府官员却由此有了灵感，便把库尔班制造成后来的故事，直到成为现在屹立的塑像。

塑像底座上刻着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写的一首诗：「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其中的「于阗」二字，一直被于田政府当作资本。

路上又逛一个乡村巴扎。巴扎上没见到一个汉人。和田地区的维吾尔人口比例最高，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了乡下，除了个别下派干部，几乎算得上单一民族。

唯色在巴扎上品尝不同食品，买了两个用苏联戈比做的戒指。她跟维族老乡处得不错，颇得他们欢迎。她还买了于田小帽。那种小帽只有于田有，是当地已婚妇女戴的装饰品，帽子如同一个小茶杯，据说作为世界最小的帽子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因为下雨，不少维族男人用塑料袋把他们的帽子包起，再扣到头上，不同颜色的塑料袋，看上去有点像印度人的缠头。

赶到和田，已经天黑。

最有特色的南疆第一巴扎

九月二十八日。早饭后先去和田地区新华书店。我想买跟本地有关的书。一个汉族退休干部模样的人跟我搭话，自我介绍过去是于田县委宣传部长，退休后住在乌鲁木齐。他写了一本介绍于田的书，这次旧地重游，顺便来书店看他的书销售情况。我和他聊了一会。他说当年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材料是他写的。库尔班和他个人关系很好，和汉族干部关系都好。我没问库尔班的故事真假，既然出自他笔下，他当然不会说假。我问他现在和那时比怎么样，他沉吟一下，有保留地说，现在过于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他搞不清我的身份，不愿意明说。我不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是说过去的集体领导比现在好？还是说现在汉族担任的一把手压制了维族干部？

离开书店去和田大巴扎。那被认为是南疆最有特色的巴扎，据说可以达到十万人之多，仅固定摊位就超过六千个。北京时间十二点以

后巴扎才热闹起来，人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光顾其中很小部分，有时走路，有时坐维族人的驴车，一路吃维吾尔风味的烤南瓜、烤鸡蛋，还吃不同品种的瓜。在我们按内地习惯叫哈密瓜时，穆合塔尔纠正说，明明是和田长的瓜，为什么叫哈密瓜？应该叫和田瓜。

昨天下的雨使巴扎的路泥泞积水。好在今天大太阳，很快把泥晒得凝结起来。卖肉的市场很壮观。血红肉块充满视野。满地摆着被砍下的牛头、骆驼头。大张牛油挂在架子上，强烈阳光把里面的筋络照得清清楚楚。

卖工具的市场有位长胡子老人骑在脚踏车改装的砂轮机上，用脚踏带动砂轮旋转给斧头开刃。我买了一个打地毯的工具，没有用处，只是好玩。有穆合塔尔在，从二十二元砍到十五元，我还买了一大把手工做的木勺，八角钱一个，非常拙朴。

卖玉石的人挤满一条街。多数没摊位，只是向过往的人展示拿在手上的玉石或玉器，让人真假难辨。还有一些人在地上铺块布，摆上各色石头，外行人对那种石头就更无法辨别了。那些摊位往往兼卖文物，摆着老地契，各国钱币，号称从沙漠深处找到的古陶器。还看到一个汉人一九五六年写的笔记。那些所谓文物到底有多少价值，可以从一个纪念章上看到。纪念章正面是蒋介石像，有星和光芒，背面字样是「国民党印纪局制　八年抗战胜利纪念章　1937」。那 1937 是颁发纪念章的时间，却是抗战开始年份，怎么会在开始就知道抗战是八年胜利呢？

在卖彩票的地方，穆合塔尔碰到了他当年的同学，那是个维族警察，也在买彩票。

墨玉农村的大喇叭

墨玉县离和田不到三十公里，古代属于于阗，本地名字喀拉喀什，意思是黑色玉石，汉语就取意译称墨玉。我们在「兵团十四师老陈宾馆」住下。不久穆合塔尔在和田遇到的同学赶来，还有墨玉的另一个同学，两人陪我们开车到附近乡下。

一路见到无数标语，横跨在乡间公路上方，比内地农村多得多。那些标语的内容，大都跟计划生育有关。我们到了一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子，进了一家农户。那家男人在村里管计划生育，应该比其它农户还强些，但家里看着也相当穷。我问他拿不拿工资，他说有工资，但是拿不全，因为乡里没有钱。

说话时，外面大喇叭响了，村长向村民喊话。对我来讲，这种喊话是文革时下乡岁月的记忆，久违了。我问喊话是什么内容，男人回答村长要求社员往地里送肥料。「社员」是人民公社时代对农民的称呼，现在这里还在用。我问土地不是已经承包，农民不是自己干自己的活吗？他回答其实还是上面说了算。

他家平时吃的一半是小麦，一半是苞谷。我问他认为是什么使生活不能变得更好些？他回答一是收费太多，一亩地一年要交七十五元；二是义务工太多，上级规定男劳力一年出义务工不许超过六十天，女劳力不许超过四十天，本身已经很多，但本地执行中还要超额，有时会出到三个月的义务工；三是来自上面的强制太多，种什么，上什么肥料，甚至每亩地上多少肥，都由上面规定，包括买肥料都得统一买，价钱比市场还要贵。

我们离开村子时，看到各家拉肥料的驴车正在陆续下地。看来村长喊话还是管用的。

穆合塔尔的同学带我们去看当地一个景点——神树。在外面敲神树院门时没有人理睬，但是一按汽车喇叭，马上有人跑来开门，因为坐汽车来的都是旅游者，可以收每人五元的门票。院里只有一棵八百年树龄的老树，六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牌子上写的汉文树名是法国梧桐。穆合塔尔说这明明是本地树，有本地名字（当地人叫「其那」)，为什么叫法国梧桐？一千年前维吾尔人根本不知道有法国，这种树当地也是有的，真奇怪。

回到墨玉县城天已黑，我把车开进旅馆院子。一辆警车紧跟后面，下来一警察，说我在黄线处转弯，违反交通规则。开始我还怀疑是否一九九九年那次抓捕重演，后来看警察只是要罚款，便很愉快地交了五十元。

穆合塔尔关于喝酒的争执

穆合塔尔的同学请我们吃饭。在一个火锅餐厅，老板是广东汉人。饭馆刚开张，被认为是墨玉最好的。穆合塔尔对汉人开的清真餐馆不信任。虽然名义是清真，操作者也是维族人，但决定买菜进货的是汉人老板，便不能保证清真，谁敢说不会把死牛羊肉重新加工呢？这几天在吃饭问题上，穆合塔尔常和阿克争执，也是因为回族饭馆有假，实际是汉人所开，用的肉混有驴肉之类，更没有经过阿訇念经。新疆发生过很多这种事，即使被发现，也是罚点钱了事，饭馆摘掉清真牌子还能继续开。不过碍着同学面子，穆合塔尔这次只好坐下，但是只喝酒，不吃东西。

维吾尔人喝酒方式是先定下一个「酒司令」，每次倒两杯酒，由「酒司令」指定哪两个人喝。被指定的两人互相要讲很多祝酒的话。他们这方面有天分，滔滔不绝，把简单的话说得富有诗意，手势和表情都很丰富，简直个个像演说家。这样喝酒比较文明，尤其是碰上节制的「酒司令」，会根据不同人的酒量掌握让谁喝几次，每次倒多少。我说明自己酒量不行，「酒司令」也就不太让我喝。这种「酒司令」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对饮者，说些合适的话，可以促进友谊，也可以化解矛盾。

不过喝到后来，还是发生了矛盾。一位后到的客人来敬酒，让餐厅的维族女服务员给每人倒酒，表示敬意。穆合塔尔当即反对。他说男人喝酒已经是违背了穆斯林戒律，让女人倒酒就更不应该。然而那客人也很倔强，坚持要这样做。他们用维语争论了很长时间，我虽听不懂，也感到气氛有些紧张。后来我问穆合塔尔说了什么，他说他对那人讲，这个服务员现在岁数小，但她将来会是我们后代的母亲。我们的女人不能是日本女人，给男人倒酒，未来的母亲必须现在就让她保持尊严。我们的女人是做妻子、做母亲的，在酒桌上给人倒酒，这样下去会堕落。要知道，这世界最伟大的是母亲，比母亲伟大的还是母亲，我们要爱护她们。面对那人的固执坚持，他碍于在场同学的情面，没有撕破脸皮，最后其它人喝了女服务员倒的酒，只有穆合塔尔一人不喝。那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客人觉得脸上无光，随即提前离去。

一块喝酒的人好几个我不认识，其中有个维吾尔人汉语不错，和我聊天。我问基层选举的问题，他先是说选举从来不是真的，都是上面指定；我问维族和汉族干部的关系怎么样，他回答好得很，一点矛盾都没有。还夸汉族干部都会说维语，人也好等。穆合塔尔当场讽刺他，问他是不是因为前面说了选举虚假，有些后悔，怕我这个汉族去告状，于是赶快夸一下汉族干部作为挽回？

虽然有「酒司令」的节制，但也要尽兴才止。八个人喝了七瓶白酒，直到三点才散。我喝得很少，只是坐在那里，感觉筋疲力尽。中间想提前走，穆合塔尔不让，大概那很关乎情面。终于等到散场，出来后好几个醉醺醺的人坚持把我们送回旅馆。等敲开旅馆院门，又在门口长时间跟我们道别，表示第二天还要再见，许诺了要安排各种活动。让我不免担心，他们会不会死活不让我们明天离开呢？

皮墨垦区的河南妹妹

九月二十九日。离开墨玉时，昨天所有喝酒的人没一个露面，肯定还醉在床上，昨晚的允诺也都扔到了九霄云外。

半途在写着「兵团石油」的加油站加油。旁边一个大牌楼有「兵团十四师皮墨垦区」的字样。我问另一辆来加油的车。司机说他们施工队就在皮墨垦区包工程。「皮」指皮山县，「墨」指墨玉县。兵团过去在和田只有一个农场管理局，二〇〇一年升格为兵团农业十四师，二〇〇二年开发皮墨垦区。垦区一部份在皮山县境内，一部份在墨玉县境内，目标是开垦三十万亩果园，然后从内地人口最多的河南引进移民，承包果园。前期主要是修水库，挖水渠。有水就可以移民，开始种植。说话时，操河南口音的几个女孩走过，穿喇叭裤，染黄头发，兴高采烈地打闹。看来兵团还在继续扩大。

我们车开进牌楼里面。看见水渠纵横，车辆往来，正在进行各种施工。已经有了高压电。穆合塔尔在水渠边徘徊，说目前和田一带河水大量减少，就是因为垦区截留所致。上游把水截走，下游就没水。

兵团总是吹嘘自己在沙漠上造出绿洲，但只要有水，人人都能造绿洲。而阿克却在旁边说，就是应该多向新疆移民，才能巩固边防，防止分裂。

在和阿克辩论的过程中，穆合塔尔说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奇怪，别人给他的东西叫上贡，他给别人的东西就叫赏赐。古代一般把占有他族女人看作征服和胜利的象征，中国却愿意把女人给出去，然后就说自己是舅舅，人家的领土就成了他的。谁也搞不清这是什么逻辑。

叶城街头演出

叶城是新藏公路（新疆到西藏）的起点。唯色在「零公里」处照相，看着西藏方向说那边是她家乡。穆合塔尔马上说叶城离西藏边界还有六百多公里呐，可不要把西藏扩大那么多。唯色笑得不行，说是吐蕃时代西藏占领过这。

叶城维吾尔语叫喀赫勒克，意思是乌鸦很多的地方。叶城是汉名，清政府置县时定的。这里现在看不见乌鸦了，是新疆到西藏的重要转运站。西藏阿里地区的军用和民用物资都经过这里。我当年也是从这里去阿里。

原本想在叶城转一圈就走，正好碰上了各乡农民在街头演出文艺节目。那是政府组织庆祝「十一」国庆节的活动。我们看了一会。也许我们的模样很像游客，来了一男两女，自我介绍是叶城县委宣传部的，要给我们拍录像，还想让我们在镜头前说话。我们当然不接受，他们真是找错人了。

阿克自己带了摄像机，要拍摄街头演出。穆合塔尔就领我和唯色去叶城清真寺。寺前广场现在成了大市场，人群熙熙攘攘。穆合塔尔说前几年还不是这样。世俗化进程真快。这里的清真寺不让游客随便进，穆合塔尔跟管事人交涉一番才把我们带进去。管事人告诫我们不许拍照。我们看了一下就出来。一个打赤脚的老乞丐坐在清真寺门口台阶上读古兰经，发现我给他拍照，怪叫一声跳起来跑掉，让我很内疚。

在清真寺对面的小街逛了一会，吃小店刚出锅的薄皮包子。小店电视播放讲维语的美国战争大片，穆合塔尔看得津津有味。直到街头演出结束，我们与阿克夫妇会合，然后赶往莎车。

傍晚到莎车。杨萍身体不舒服，阿克留在旅馆陪她。我和唯色、穆合塔尔到街上吃牛肉面。莎车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莎车国所在地，后来统治过新疆广大地域的叶尔羌汗国也在这里。莎车被认为是新疆保留民族特色比较多的地方，但也已经满街是汉人。

在十二木卡姆音乐中祈祷

九月三十日。穆合塔尔先领我们去一个麻扎。那麻扎对穆斯林是一个重要地点。麻扎在一片广大墓地当中。管事人给我们开门。一座光线幽暗的建筑物，里面有几个盖着墨绿色绒布的坟。建筑物顶部垂下密密麻麻的旌旗，笼罩其上。麻扎周围，一些信徒坐在不同位置，以沉思默想的姿势手数念珠。

从麻扎出来，我们横穿墓地，顺便参观了一些非常美丽的陵墓。尤其是一些老墓上面残存的古老瓷砖，美得简直不可思议。

到墓地另一端，穿过街巷，便是莎车王墓。叶尔羌汗时期的十数个君王在此入葬。但那些君王多数已不为人知，名声最大却是一个叫阿曼尼莎的王妃。她之所以被后人纪念，在于她组织音乐家整理了民间流传的「十二木卡姆」，使其能够传给后人。

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古典音乐，有三百六十首声乐曲和器乐曲，选用了四十四位古典诗人的作品及各种民歌民谣，共计四千四百九十二行诗，全部演唱完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在阿曼尼莎的陵墓旁边有个清真寺。我们进去时没有一个人。清真寺的墙壁顶棚绘满精美图案。旁边放了一些穆斯林戴的白帽，却是塑料制品。我猜是为给那些来做礼拜，但是没带帽子的人临时所用吧。在穆合塔尔指导下，我戴上帽子，做出祈祷手势，听着远处的十二木卡姆音乐，有一种很美好的感受。

随后穆合塔尔又带我们去了一个古老清真寺，因为已成危房，不对外开放。穆合塔尔让人找来管钥匙的老汉，给我们开门参观。这个清真寺的特点，在于整个房顶由几十个穹顶组成。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建筑。

原本穆合塔尔还想见一个在莎车的同学，电话里那同学说是要来，却迟迟不露面，也不打电话。我听说那同学在公安局国保大队供职，认为他并不真想与穆合塔尔见面，只是不好意思表示拒绝。穆合塔尔不说，心里也许已经想到。

英吉沙的刀和艾沙

路过英吉沙县，刚想停车，立刻过来一个维吾尔人，用很权威的手势指挥我们把车停到一个商店门口。我们还以为他是停车场管理者，结果发现他是卖刀子的。看来他惯于此道，装成停车管理者模样把游客的车引到他的刀店。

英吉沙的刀名气很大。我早就听说过。不过我对刀没多大兴趣。阿克他们看刀时，我到外面转。旁边店的中年维吾尔人跟我说，我们进的店是假的，他的店才正宗，是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厂，而且是国营的。我回去告诉阿克，引我们停车的人大为不满，说根本不存在四百

年老厂。

唯色跟我去了「四百年老厂」。为了展示刀的锋利，那位中年维吾尔人挽起袖子剃自己胳膊上的毛。如此直接的推销，促使唯色买了一把银身英吉沙小刀。她从八十元砍到五十元。刀子的确漂亮，像是贵妇人带的。唯色也当场仿效那男人，剃了自己一根手指的汗毛。

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穆合塔尔正和一位当地老人谈话。他问老人维吾尔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艾沙[1]，老人回答不知道。英吉沙是艾沙的家乡，国民政府时期艾沙做过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来后流亡海外，致力于东土建国，是流亡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穆合塔尔说那老人肯定不会不知道艾沙，只是不敢说，因为他这个跟汉人呆在一起的维族，看着特可疑。

当唯色玩她刚买的刀，说她现在知道了英吉沙有小刀时，穆合塔尔提醒她，别忘记英吉沙还有艾沙。

快到疏勒，路过一个水库。我们把车开到水边。看到一帮捕鱼人。他们在岸边搭了一群窝棚，晾晒着大片渔网，岸边靠着数条渔船。男人们划船下水，女人们在岸上补网。捕捞上来的小鱼被摊开晒鱼干。穆合塔尔不停地说：「他们就不能等鱼大一点再打吗？」

我跟打鱼者聊天，他们从山东来，已经在新疆境内打了多年鱼。这个水库叫东方红水库（肯定是文革中修建）。他们今年刚搬到这里。问生活如何，回答是刚够糊口。

假警察带走了恐怖首领

进疏勒县城，穆合塔尔同学 M 在街边等。M 是个诗人，职业是翻译。他文质彬彬，看上去性格温厚。上大学时他是维族班的第一任班长，后来因为太听老师话，班里同学自发选举了穆合塔尔。不过他和穆合塔尔的关系一直很好。

住下后，M请我们去麦西热甫餐厅吃饭。给我们介绍疏勒时，他说去年被联合国安理会列进恐怖组织名单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就是疏勒人。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是艾山·买合苏木的出逃。他当时已被警方控制，准备逮捕。他以有病为名，在乡下一个维族医院住院。医院工作人员已接到指示监视他，当地派出所也派了警察看管。半夜突然来一群警察，开着当地人称「沙漠王」的高级越野车，携带武器，很正规，拿出逮捕令，将艾山·买合苏木带走。几个小时后，又一拨警察来带他，才知道前面一拨警察是假的。后来发现艾山·买合苏木在阿富汗出现，再后来听说他成了本·拉登的助手。[2]

---

[1] 艾沙•玉素甫•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一九〇一—一九九五。

[2] 就在我听到这故事的两天之后，二〇〇三年十月二日，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军方对靠近阿富汗边

穆合塔尔的恶作剧

麦西热甫是个歌舞餐厅，吃饭时有演员唱歌，大家可以随意跳舞。维吾尔人的舞蹈很优雅，又幽默，不同气质和体型的人可以跳出不同风格的舞蹈，各有味道。中间来了一个官方单位的副主任加入我们一桌。他是疏勒当地人，也写诗。正在吃饭的一群中学老师，其中的教导主任给副主任的老师当过老师。他先是来礼貌地给副主任敬酒，随着酒精度提高，兴奋程度也在提高。老师的老师逐渐没有了师道尊严，频繁来我们这桌劝酒和邀舞。另一个身穿黑短衫的男老师约我跳了一场舞，曲终跟我拥抱，把他满头汗水沾了我一脸。老师的老师变得全场最活跃。一场不缺地跳舞，经常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谁来劝阻，他就动手打谁。他的脚踢得出奇的高，出拳迅速有力，却没有一下击准目标。副主任死活不给他面子再去跳舞。穆合塔尔自报奋勇出面顶替，恶作剧地来回抡那教导主任，非常滑稽。唯色前仰后合，笑得快喘不过气。还有一个醉醺醺的老师一定要给我们买这餐厅的特色菜——麦西热甫鸡。那道菜上来后，我们一致认为很好吃，但却不知道给我们送菜的究竟是谁，送礼人也再没露面——很可能已经不省人事。

餐厅里引我注意的有三桌人，老师那桌自不必说，全场都是他们闹；还有一桌农民沉默地喝酒，不唱也不跳，自始至终只是看；第三桌是一伙时髦青年，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偶然起身跳舞，男的倜傥，女的妩媚，让我百看不厌，也让唯色赞叹不已。

唯色说外人看到这种场合，会认为维吾尔人是最快活的民族。穆合塔尔回答她，我们哭的时候没人看到，因为我们的哭泣都是在心里……

疏勒两位维吾尔诗人

疏勒的两位诗人——M和副主任跟我们回旅馆聊天。副主任朗读诗歌。一首是古代维吾尔民间诗歌，据说已经流传了千年以上。我只记住一句大意——「天堂之轮也是把人间粉碎的磨盘」，很耐人寻味；另一首诗的内容是个民间故事，说的是清朝占领新疆的时候，一个名叫色依提的维族好汉与清军作战。清军将领发现不能战胜他，便欺骗色依提，让他带信去见喀什提督，进行双方谈判。但是信送到后，喀什提督却把色依提抓起来，原来清军将领的信是让喀什提督把色依提杀掉。行刑前喀什提督嘲笑色依提是文盲，自己送来了杀身的信。然而色依提死后，他的精神却活着，越传越广。清军将领这才发现不对劲，原来他写的信没有全送到。他让色依提带给喀什提督的信是两封，

界的南瓦济里斯坦地区执行反恐行动时击毙，年仅三十九岁。一个半月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经身亡的艾山·买合苏木被中国公安部作为第一号恐怖分子进行通缉，通缉令发出九天后，中国公安部才得知艾山·买合苏木已经身亡。

一封让杀死色依提的肉体，一封是让杀死色依提的精神。然而色依提只交出了杀死肉体的信，没有交出杀死精神的信，色依提的精神因此永远不死。

凌晨三点（新疆时间一点）时，副主任必须去机场接从乌鲁木齐飞回的上司。他谈兴正浓，说是灵感在涌现，明知去机场接上司的事毫无意义，派司机去就够了，但官场规则又不能不遵守，只能恋恋不舍地告别，约第二天再谈。

唯色的手指被蜜蜂当成了花

十月一日。M 早上领我们去喀什。他的孩子刚出生十天，今天所有的亲戚都到他家祝贺，他把我们送到喀什，又要赶回疏勒去待客，家里还在等着他宰羊呢。我们自己逛喀什。一个月前我刚来过，这次主要是陪唯色和阿克夫妇。穆合塔尔在喀什住过挺长时间，但也有几年没来了。

今天是「国庆节」。广场正在举办「喀什美食展」。大部分是下面各县的政府派人来摆摊，目的是做秀。用水果摆出各种花样，在瓜上刻出图案，然后把小型国旗插在上面，为的是吸引电视台拍摄，被上级官员注意。现场制作的当地小吃免费发放给观众品尝，一人只给一点。那种地方我们根本靠不近，人们挤来挤去，领完了再领，连领好几次。不过我发现这么干的基本都是汉人。

另一些摊位是喀什各饭店和酒楼摆的，提供的饮食要收费，就无人光顾，门可罗雀。有个摊位用新鲜石榴籽榨汁，榨出的石榴汁鲜红粘稠，在光照下显得晶莹艳丽，喝起来味道极好，当然价钱也不菲。

唯色的手指被蜜蜂蛰了，因为她不停地吃，手上沾了很多瓜汁，被蜜蜂当作可以采蜜的花。我想帮她把戒指从蛰肿的手指取下，费了半天劲也没做到，只能等待自然消肿了。

逛老城街道。一位在电动砂轮上磨铁活的工匠带着自己做的安全眼镜，是一片玻璃绑在一个缠着布的木框上，再用绳子系在头上。没进入消费时代以前，人可以如此节俭，这样的情景很快再也看不到了。

去了维族诗人玉素甫的墓。他在公元十一世纪写出八十五章、一万三千二百九十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被认为是维吾尔文学宝典。我们在诗人墓前的葡萄架下休息，眼前是阿拉伯式的穹顶，漂亮的瓷砖在太阳下闪亮，空气中弥漫着维吾尔的音乐和味道。

阿帕霍加墓被旅游者称为香妃墓，穆合塔尔很不以为然。墓的主人阿帕霍加当年是叶尔羌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颠峰时期统治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的广大地区，享有「世界的主宰」之称号，也是白山派伊斯兰教的首领。所谓香妃是阿帕霍加的孙女，她的墓在最边角的位置。但是因为她当过乾隆妃子，所有中国人就只知道香妃，不知道阿帕霍加。在爱拿萨义德说事的唯色看来，

绝对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翻版。

维吾尔人怎样抗拒汉语

晚上在旅馆与 M 和穆合塔尔聊天。副主任原本也要来，但是上司正在参加酒席，他必须陪同。

从维族语言变化谈起，原来维语中的汉语词汇，如「共产党」、「书记」、「电视机」、「录音机」等，现在都被英语词取代。原本汉语发音的「身份证」被维语的「你是谁」代替。这一方面与新文字改回老文字有关，新文字中有 zh，ch，sh 的发音，老文字却发不出这种音。相比之下，维语和英语接近，和汉语较远。采用英文词汇一是发音方便，另一个目的一般不对外说，就是为了避免被汉人同化。这是维族知识分子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逐步排除汉语，用英语和维语词代替，使之普及，被百姓逐步接受。这样的做法已坚持多年，收到明显效果。

维吾尔族的氛围排斥维语不好的维吾尔人。我有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维族朋友，曾想回新疆练习维语，但因为他维语不好，不被维吾尔人接受，只好还是和汉人打交道，最终也没学会维语。甚至在监狱里，谁讲话夹杂汉语词也会受同伴嘲笑，而夹杂英语词则没问题。这种氛围反过来促使知识分子进一步强化民族意识，进行纯化语言（也许是目前唯一可实践的民族主义）的努力。

这是一种没有串联的共识。串联不被允许也做不到。打的旗号都是用官方话语，做的事看上去没有政治性，如用维语翻译汉语电视剧，过去只翻译对白，唱歌的歌词还保留汉语，现在也译成维语重唱，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动听方面不亚于汉语的原歌词。按穆合塔尔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给汉语普及留下空隙。

军区门口遭盘查

十月二日。早晨起来，想到应该去南疆军区拍个照片，那是疏勒作为「兵城」的象征。南疆军区级别为省军区，辖区跨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与七个国家接壤，有三千五百多公里边防线和数百条通外山口，扼守通往南亚和印巴次大陆的通道。军区大门有兵站岗，挂着「庆祝国庆」的横幅，用盆栽鲜花摆了个大花坛。我担心被当作刺探军情的间谍，没敢明目张胆拍照，而是在街对面边走边拍。一个买了早点往家走的中年人发现我的动作，放慢脚步跟在我的身后，在我又举起相机按快门时，立刻冲到我面前严厉盘查。

他身穿便衣，手提油条，并不说明他有什么权力对我盘问。但我当然不会跟他较这个真。他肯定是南疆军区军官，如果我不息事宁人，他可不管什么法律，随便可以找麻烦。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

便装傻说来疏勒旅游，看到这个大门花团锦簇，很是美丽，拍个纪念照而已，由此才得以脱身。

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其它地方都碰不到了。九十年代我在西藏军区门口照相遭到过盘查，这两年也没人管了。当网上卫星图片能看到深宅大院里每栋房子、甚至每辆汽车的时代，拍一张大门照片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有人若是认为被怀疑成间谍的经历够酷，那就赶快到疏勒来吧。

墓地的魔幻场面

离开疏勒往巴楚方向走。路过一座沙漠中的墓群。千年胡杨下，两个维族女人一边唱歌一边造墓。墓是用土坯所砌，女人赤手抹泥，把一块块土坯粘结在一起。她们造好的墓会卖给死了人的家庭，这是她们的谋生之道。

一个红头巾绿上衣的维族少女牵一头幼小野鹿走到我们面前。她的胸前除了有胸坠，还用红绳挂着个小巧手机。穆合塔尔听她说这里埋有圣人，便让她带路指给我们看。

一株几乎伏卧倒地的弯曲老胡杨下，只有黄沙。女孩扒开沙子，露出一只干枯手臂，她说那就是圣人的手。野鹿凑过头去，想啃圣人手上干枯的皮。女孩打它的头，又把圣人手臂埋回沙里。这场面魔幻得让我感觉如在小说中。

下一个讨论就不那么魔幻了，而是非常现实。关于是否能在墓地外面的树丛解手，阿克认为那是亵渎亡灵。我认为既然已经离开墓地，只要不是在标志清楚的坟墓旁就没问题，否则在哪里解手都构成亵渎，因为所有黄土下都可能埋有尸骨。我们是走在丝绸之路上，千百年来多少人在这条路倒下，哪有什么坟墓？任何解手都可能是在他们头顶，甚至厕所也可能盖在古人的坟头上！

阿克说地震一次赤化一片

年初巴楚发生六点八级地震，死亡二百六十八人，伤四千余人，十余万人失去住房。目前救灾还没结束。当地的传统房屋不打地基，缺乏稳定性，泥砌的土坯相互不啮合；房梁过细，房屋跨度又大，几乎没有抗震能力。我们专门去了位于地震中心的乡镇，正在新建的房子都被要求采用抗震结构。到处写着「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反对分裂」的标语。还看到一个会场，红布裹起的主席台贴着黄色大字「党的恩情永不忘」。阿克评价说，地震一次赤化一片。

倒塌的废墟一路都能看到，公路涵洞也在重修，施工队都是汉人。学校重建是用组装的房屋，房顶和墙壁都是铁皮中间加充填物，老师

说不如原来土房冬暖夏凉。夏天太阳晒得很热。冬天怎样现在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过冬。乡医院仍然在救灾帐篷里看病，倒塌的医院尚未盖起新房。

几十名维族小学生在棉田摘棉花，是学校组织的。据说挣的钱归学校。很多学校都这样做，相当于使用童工。每年在收棉季节可以挣到不少钱。

色里布亚镇地处南疆几县的交汇点，是南疆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色力亚布的巴扎据说是南疆第二大，可以达到八万人。巴扎分两种，一种叫农民巴扎，卖的是牲口粮食土特产等，还有一种叫香港巴扎，卖的是城市商品。香港巴扎的名称出现在八十年代。那时香港概念刚刚进入，代表着繁华和商品众多，其实巴扎本身跟香港没什么关系。我们当然只喜欢看农民巴扎。一个老妇卖手工陶罐，造型拙朴，半米多高，才八元钱一个。每当看到我喜欢维族物品，穆合塔尔都会热情地期望我买。只可惜那陶罐太大，车里已经没有地方装。

傍晚到巴楚县城。巴楚在西汉时期是尉头国所在地。《汉书》上记载的尉头国有「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所谓的国，不过今日一个村的规模。

巴楚街道宽阔到不正常的程度，旅店非常多，基本都是汉人所开。

中国人哪怕信驴子都好

十月三日。早晨听到旅馆窗外有男声唱歌走过。歌的曲调我熟悉，是一首名叫「你不要害我」的维吾尔民歌。摇串铃的声音伴随歌声，唱得凄婉动人。我下楼跟随声音寻找，在旅馆后面的维族区小巷里，看到一个儿童牵着个中年盲人。歌是盲人所唱，走街串巷在乞讨。有维族妇女走出家门给他食品。我也给了一些钱。那妇女向我做出赞许的手势。

中午路过阿克苏，吃了极美味的抓饭。吃饭时和人聊天，听到干部职工被要求十一长假[①]不要外出，不要聚会。和全国鼓励十一旅游正相反，这里的主要任务不是促进经济，而是怕聚会闹事，外出串联。

饭后继续上路，一路闲聊。谈到广东人什么都吃，阿克给穆合塔尔绘声绘色讲了几道菜：一道是现场催生的小老鼠蘸作料生吃，放在嘴里咬时吱吱叫，因此名为吱吱菜；一道是赶活鸭子在烧热的铁板上走，然后吃烫熟的活鸭掌；一道是把活猴子脑壳打开，生吃脑髓；还有婴儿汤……穆合塔尔听不下去，感叹世上最可怕的野生动物就是广东人。他说他的老师曾经说，中国人总该信点什么，哪怕信个驴子都好，什么都不信的人太可怕了。

傍晚路过一片广阔的雅丹地。雅丹是地理学名词，指干燥地区被

[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宣布建国，把每年的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现在每个国庆日全国放假七天。

风吹蚀形成的土丘林。不同的土丘有不同形象，千姿百态。我们下路深入到雅丹地中，选地方扎营。搭起帐蓬后在雅丹地里散步，景色美不胜收。夕阳快落时分，我们静默地看金色日球一点一点接近天边。全部大地被染成金黄，庄严神圣。听到穆合塔尔喃喃自语「我的东土……」唯色后来告诉我，她差点落泪，觉得穆合塔尔「宁结」（藏语中表达悲悯的感叹），他失去了工作、女友、安定的生活，就是为了他的东土。唯色说，她再也不愿当着穆合塔尔说出新疆这个词。

穆合塔尔在克孜尔千佛洞做佛教姿势

十月四日。我起得最早，独自在台地中间散步。曲径通幽，吸引人不断往下走，走了很远。回驻地时他们已经起来。

到拜城县城吃早饭。惊讶的是竟然不容易找到清真餐厅，到处都是四川饭馆，几乎不像在新疆。要知道拜城属于南疆，当年是龟兹国属地，应该是维吾尔人最多的地方啊。开车转了半天，找到几个维族饭馆，被挤在城边，又小又破。阿克看不上。回到城中一个山东人开的回族饭馆吃，穆合塔尔认为可疑，坚决不吃丸子，可能是担心里面混杂不洁东西吧。

今天目的地是克孜尔千佛洞。此千佛洞名列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当年佛教自西向东传播，因此在四大石窟群中，它比敦煌、龙门和云冈形成得都早，从公元三、四世纪就开始建了。

参观必须由导游带领。洞窟内所有雕像都已毁坏。导游解释是后兴起的伊斯兰教反对偶像，所以砸掉了雕塑。今天存留的主要是壁画，画中人物眼睛大部分都被抠掉。不过经历了千年时光，能保存到今天模样应该说还算不错。要知道几十年前这里还没人管理，维族农民就在这洞窟下面耕作农田呢。

导游说国家给的拨款只是工作人员工资，修复洞窟要靠自己，这里门票收入每年只有一百多万元，远远不够。克孜尔千佛洞的知名度不如敦煌，游客少，也没有其它来源。唯一得到过一次捐款，是日本人小岛康郁推动，募捐了三百多万元人民币。

管理处办公楼前有座「克孜尔千佛洞维修捐款纪念碑」，由王恩茂题词。铭文写的是「一九八九年我国政府决定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全面维修，日本朋友成立了‘日中友好克孜尔千佛洞修复保存协力会’，并捐款一亿五百四十四万日元，用于克孜尔千佛洞维修工程。为感谢日本友人慷慨捐助，特竖碑纪念。」捐款者的名字是按钱数分档次。最高的捐款七百万日元，最少五千日元。让穆合塔尔不满意的是，为什么没捐一分钱的王恩茂名字那么大，而捐钱人的名字那么小？

在没开放的洞窟区走了走，那里修复程度很低，多数洞窟只是装个简单木门锁起，基本保持自然面貌，走在那里的感觉很舒服。

附近有个被叫做「千泪泉」的地方。在峡谷尽头有注泉水。据说过去曾有很大的佛教寺庙，现已不见痕迹。「千泪泉」之名也许是一种附会，但峡谷环境的确极好。用泉水洗过之后，在地上打坐，心旷神怡。穆合塔尔也盘腿坐在那里，学着唯色做出佛教手势。阿克斥责他是伊斯兰教的叛徒，气得先走了。

维吾尔人来这参观，一般只是看看树林和泉水，不进石窟，因为石窟是异教的。相比之下，穆合塔尔更为开放。我欣赏他这一点。不过他是把新疆的一切都当成自己民族的财产，听到高处一个没开放的洞窟传出说话声，立刻怀疑有偷盗者。他对洞窟喊话，里面人却不理睬，照旧说话。我说贼不会有这么大胆。果然，等他找到管理员反映情况，维族管理员说那是一个经过批准的意大利人在考察，有人陪同。

千佛洞门口有鸠摩罗什塑像。鸠摩罗什是公元四、五世纪之交的佛教高僧，十六国时期的军阀攻下龟兹后，把他带到中国内地十几年，然后被后秦王姚兴请到长安奉为国师，主持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端归功于他。穆合塔尔抱怨鸠摩罗什塑像上没有文字说明，游客因此不会知道这个高鼻梁的佛教高僧是维吾尔人。他认为这种疏忽是有意的。他说克孜尔千佛洞的文物研究为什么封闭进行，就是怕证实新疆曾是独立国家。穆合塔尔从每个事物中都能看出压迫者的意图，也许有过于敏感之处，但是我能理解这种敏感，而且他的分析不乏道理。

到库车之前经过盐水沟——这是旅游手册上的称呼，维吾尔地名叫「克孜尔亚」，是「红崖山」的意思。那片山形状丰富，地貌奇特。官方材料介绍东土组织曾经把这里当作军事训练的营地。

晚上住库车，穆合塔尔到家了，我们跟他喝此行最后一顿酒。

新烤好的塔里木全羊出炉

十月五日。穆合塔尔送我们出发。原本想和他多待一段时间，可是阿克有工程牵身，必须早回宁夏，所以一路都要赶。穆合塔尔开玩笑说阿克的车像特快列车，一个星期能到欧洲。但是阿克挣钱的机会不能耽误，只好匆匆忙忙转完这圈。

过了轮台，一路看到正在铺设管线。一条粗的黄管子和一条比较细的黑管子正在地面进行连接，旁边已经挖好沟。我猜想可能就是媒体一直炒作的「西气东输」工程吧。那工程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通过四千公里管道输往上海，年输气一百二十亿立方米。整个工程投资一千四百多亿。当年的总理朱镕基称「拉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新疆人却说是西部大掠夺。

库尔勒还是没停车，我不想在城市逗留。路过尉犁县城的农贸市场停车买水果。阿克不想从河南人那里买，但是走遍市场全是河南人，也只好买了。

离尉犁县城几公里是塔里木乡。那里有个远近闻名的烤全羊店。传统方式、传统风味，却挂着一个「新疆尉犁县司拉吉丁肉制品加工厂」的牌子。我们到的时候，正碰上一只新烤好的全羊出炉。一炉要四小时才能烤好。前面已经有好几拨人在等，因此我们没买到最好的部位。不过配上当地所称的「皮辣红」——洋葱、青椒、西红柿一起拌的凉菜，加上啤酒，美味无穷。

这条去若羌的路十年前走过一次。那时是土路，一路风沙遮天蔽日，没有人烟，有的路段让我感觉如同在月球行驶。现在全是柏油路，去年刚修好，路面平坦，车速可以达到很高。与公路并行的塔里木河当年几乎没水，现在水是满的，透过芦苇在路边时隐时现。秋天农田不需要灌溉，可能就是水下来的原因吧。

天黑时，在路边胡杨林宿营。

如同冻结了的时间

十月六日。一夜都听到过路车的轰鸣声，来往车辆比十年前多了很多。早晨起来，阿克发现宿营地不远处有个墓地，很是惊慌，立刻拔营，连声埋怨昨天宿营时间太晚，看不清周围环境。

塔里木河仍然伴随路旁。一个河边废弃的村庄如同风景画一样，典型的田园风光。然而村子已空，人都搬走。停车休息，我独自沿河走了一段，坐在河边吸烟。周围安静，只能听到虫鸣鸟叫，还有微风拂动植物枝叶。河水平平流淌，一点声音没有。村里房屋还算完整，房顶木料都没被拆，窗框钉的塑料布也有残留，看来搬走时间不是很长。不过很多房子墙上能看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有汉文，也有新维文，似乎又是几十年没人住。时间已经凝结。

阿克朗诵墙上的毛语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然后感叹这些话在今天看也不过时。又念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念罢他把现在的官们大骂一顿。

最长的红砖路和最大的平面

随后行驶很长一段没人烟的路。十年前我在这里走过一条红砖路，当时印象深刻，怎么会在如同月球的环境冒出一条用一块块立起红砖拼成的路呢？那条红砖路时有时无，延伸上百公里。给我的感觉算得上奇迹。现在红砖路还剩一小段，竖起一块碑，刻着「世界上最

长的砖砌公路」。从碑铭得知，红砖路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由北京到新疆的知识青年[1]用八千多万块红砖铺成的。现在只保留了五公里作为纪念。红砖路消失了，历史也只剩那几个文字。当年这里的千百北京知青的命运，已经完全无从寻觅。

塔里木河与车尔臣河都是内陆河，两条河的尾闾交汇在一起，形成的巨大湿地就在所经路上。当年路过这里时看不到水。多年断流的塔里木河已经无水可流，车尔臣河则在这里渗入地下。记得那时我看到了世界最大的平面。环顾三百六十度没有一点起伏，平齐的地平线形成和天一样大的圆面。我光脚走上那平面，盐碱土壤的硬壳随着脚踩破开，硬壳下的松土散发着大河消逝的湿气，脚的感受如同植物之根扎进蕴含养分的土壤。我那时身上只有一条丝绸短裤，在西来迅疾的热风中猛烈抖动，让我以为自己是根挂着半旗的裸露旗杆。

中午到达若羌——新疆的东南角，也是中国最大的县，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修车时，一个宁夏人看到我们车是宁夏牌照，过来攀谈。他长年在这收购瓜果，运往内地南方销售。旁边几个汉人正在用铁皮焊一条船，准备用于捕鱼。也许他们是受到了塔里木河终于来水的鼓舞吧。

若羌县城比十年前整个换了模样，盖了很多新建筑。街道拓得跟广场那么宽。真看出这里地皮多啊。

骑毛驴的兵团战士

随后我们开往青海。翻阿尔金山时，沟里的路大都被水冲坏，必须用四轮驱动才能通过。山口海拔四千米，覆盖着冰雪。

下山路上碰到一个骑驴汉人。小小毛驴，脖子上挂着个硕大红铃铛。骑驴汉人又瘦又小，头发蓬乱，皮肤黝黑。他是四川遂宁人，来这已经十几年，属于兵团三十六团，到山里放羊。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所谓的兵团不过是一群讨生活的农民。他们虽然被放进一个冠以军事化名称的体系，却不会有「兵」和「团」的意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又能看到这些汉族农民耐受苦难的能力多强，让人不可思议。他全部家当都在驴背上，走哪吃哪住哪。唯色从这个遂宁骑驴人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西藏草原上可能全是四川汉人在放牧！

金黄晚霞变红了，很快又变紫，然后从暮色苍茫转黑。下山的路还很长。我不主张住在高海拔处，天气冷，容易高山反应。我们在黑夜中不停赶路。我记得快到青海交界处有个湖，也许可以在湖边宿营。等到了湖边，测量海拔仍在三千米以上，而且风很大。于是决定再赶一百公里，去青海的花土沟住宿。

---

[1]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的中学毕业生多数不能上大学，又无法安排工作，便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让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劳动谋生。这种学生被统称为“知识青年”。

路上遇到一辆抛锚的货车，搭了上面一个人到新疆青海交界的芒崖石棉矿找救援车。我们赶到花土沟已是夜里十一点。跟十年前比，花土沟变得可以用繁华形容了。路上搭车者告诉我们「花土沟什么都有」。在街上转着找旅馆时，看到很多饭馆仍然开业，霓虹灯闪烁。色情业专用的粉红灯光和刚经过的广袤黑暗形成对比。搭车者所说的什么都有就是指这些吧。

至此，我们已经离开了新疆。

三、（二〇〇六年春）

政府主席是没用的

三月二十五日。乌鲁木齐显得很脏。好在雪化了，否则黑色的雪会显得更脏。在乌鲁木齐，雪只有在刚下时是白色的，两天过去满城煤烟中的灰就会让雪变灰，然后变黑。等到化雪时水蒸发了，煤灰留在地面，于是把全城染成黑的。无论多新的楼，每个窗台下面都有黑水流痕，也是被随化雪流下的煤灰染成的。

去机场的路上，司机骂警察想方设法罚款。他有一次超速三公里被罚了二百元。对新疆人来讲，高速公路限速一百二十公里等于不是高速路，因为其它公路都可以达到这种速度。司机刚从南疆回来，走沙漠公路时遇上沙尘暴，一米以外都看不清。路上有很多车撞在一起。

司机老家是山东，他在伊犁出生长大，会维语。维吾尔人喜欢会讲维语的汉人。一般维族人卖肉不让汉人用手碰，嫌汉人脏，他却可以翻来翻去地挑选。买刀时，维族人开价三十元，他用汉话还价十元不给，改说维语还价，五元就给了。

虽然他对新疆如此熟悉，但问他自治区政府主席是谁却不知道。按规定自治区主席必须由维族人当，一般没有实权。司机的说法是政府主席没有用，不需要知道。他说只有新疆两个自治区主席有过实权，一个是赛福鼎，一个是司马义·艾买提，后来都被中央调走架空了。当年中央指定铁穆尔替换司马义·艾买提，新疆人大两次投票仍然选司马义，最后把司马义调到北京，不算新疆人了，铁穆尔才通过。

天上下土的南疆

飞阿克苏是螺旋桨式小飞机。即使在这种支线上，乘客也是汉人为主。我的邻座是一川妹，内江人，看上去像妓女，但不确定。她说从广州表妹那来，到阿克苏看姐姐。姐姐七八年前到阿克苏开服装店。川妹爱说话，却不爱读书，把她从小逃学当趣事说。她在家里逼迫下好不容易上完初中，从此就过到处跑的日子。她侧头打量我正在看的书，说我不是旅游的。我在看戈德斯坦写的《达赖喇嘛的困境》。我问她认为我是干什么的？她说可能是开矿的。也许她认为达赖是一种矿？再问她是否知道达赖，回答很干脆——不知道。

飞过天山，从空中俯瞰，整个南疆充满浮尘。空中没有云，却看不到地面。视线都被浮尘遮挡了。报上说十五年以来持续最长的浮尘

天气已经结束，然而显然还没有。多数人只知道下雨、下雪，南疆还有一个词——下土。到处都是土，箱子往地上一放，立刻沾上一片土。放一会儿，摸一摸箱子表面，也会出现手印。

阿克苏机场建筑很小。门口挤着一堆出租车司机揽活。没人接川妹，我把她带进城。司机是甘肃人，在这当炮兵，复员后留下，在此安家。他说感觉比甘肃好。

住进穆合塔尔提前定好的旅店。房间不隔音，隔壁房间吵。我去交涉，服务员张口就说那边住的是维族，似乎不隔音不是因为房间，而是因为维族。我把房间换到走廊顶头，那里安静。阿克苏的旅馆几乎全是汉人经营，因为住旅馆的主要是出差者，以汉人为主。他们不住维吾尔人的旅馆，所以维吾尔人开旅馆挣不到钱。

柯尔克孜族女子为何让孩子转学

吃饭时和一柯尔克孜族女子聊天。她是个民营图书公司的推销员，负责在阿克苏片发行辅助教材。她是「民考民」，但汉语说得标准，几乎听不出口音。她丈夫是维族。原来他们把孩子送进汉语学校读初中，到上高中时又把孩子转回维语学校。原因是发现原来挺乖的儿子，进汉语学校后沾染不少坏毛病，如不尊敬老人、惟我独尊等。她说以前中国有好传统，现在已经没有了。转回维族学校后，孩子改善很多，现在已经可以用维文写作文。

不过总体上，少数民族孩子「民考汉」的更多。因为找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汉语水平。实行汉语考级已经几年。不少「民考民」因为汉语不好，找不到工作，大学等于白上。

记得北京语言大学一位教授当年曾就少数民族进行汉语考试向我征求意见，我说如果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得拿着汉语级别证书，他们的状况会变得更差。教授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汉人在中国找工作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汉人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温州人在阿克苏

穆合塔尔这段正好有时间，可以跟我待几天。一对维族父子跟他一块从库车来。儿子被判劳教一年，已经关了六个月，他父亲找关系办了监外执行，刚把儿子接出监狱。儿子之所以被判，是醉酒后发现前妻和一个警察在街头谈话，于是大怒之下打伤了警察。

和穆合塔尔到街上散步。新疆其它城市多少还搞一点民族特色，阿克苏却什么都没有。穆合塔尔指着那些高楼说都是按温州样式盖

的。内地来阿克苏的老板温州人居多。出一亿元，地方政府就会无偿给地皮，还从这边银行给几亿元贷款，由政府出面搞拆迁，扒掉老房子，迁走老百姓，然后盖起跟内地一模一样的大楼卖给当地人。穆合塔尔说，具备这些条件，谁不会做生意呢？什么人都能干。但是当官的就愿意让内地人做，因为他们和本地牵扯少，卖掉房子就走人，官员腐败就不容易暴露。如果工程是给本地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容易露馅。只是这种内地样式的楼一旦盖起来，至少几十年不能再拆，阿克苏已经无法恢复民族特色了。

市中心广场有大群汉人随汉族音乐跳舞。穆合塔尔说这里从来不放维族音乐。广场建成后他第一次来，因为这里不是维族的地方，维族不会在这里跳舞，也做不出汉人那些姿势（做出那种姿势会被认为有病）。现在广场周围都是新建高楼，但是每栋楼没有几个灯光，不知道是没有卖出去，还是有钱人买了不住。

广场原来是当地的铁匠街，居民都是维吾尔人。住在市中心的时候，维吾尔人可以靠出租房子得到收入，或是自己做小买卖，生活之道比较多。后来政府要在市中心搞形象工程，建广场，强迫维吾尔人拆迁，让他们到七公里以外的市郊盖房子。那里远离城市，没有挣钱的事做。进一次城公交车费来回二元，一家五口就得十元。失去城里的落脚之地，谋生之道都被堵死，只能变得更穷。这是非常典型的边缘化过程。

提高自己并不能获得平等

穆合塔尔说，八十年代的维吾尔人认为只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就可以和汉族平起平坐，所以那时把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出国深造，学习汉语等。后来失望了。他的朋友在日本留学几年回来，只能做最一般的工作，重要职位都被汉人占据，从中可以看出并不是语言问题。维吾尔人这样议论，如果以为学好汉语能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就错了，回族人生下来就讲汉语，用汉字，还不是只能拉牛肉面！

穆合塔尔带我进一家「阿尔曼连锁店」。「阿尔曼」是一个维吾尔企业集团，有很多制作清真食品的加工厂。这家集团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在于汉人做的清真食品不可信，维吾尔人不敢买。穆合塔尔说曾有内地生产的糖果写着清真，却被发现糯米纸原料里有猪油。维吾尔人相信自己民族的生产者，是阿尔曼集团得以迅速扩大的基础。现在，阿尔曼集团的老板已经是热比娅以外第二富有的维吾尔人。我看了一下店里经营的食品，从饮用水到乳制品、营养品、调料、糖果、果冻等，还有土耳其的进口食品，也卖其它维族品牌产品。对食品的禁忌是维系维吾尔人和穆斯林的重要手段。

强刮胡子，十倍收费

三月二十六日。穆合塔尔虽然和我同住，却拒绝吃旅馆提供的免费早餐，理由还是因为旅馆老板不是维族。我也不在旅馆吃，陪他去附近维族店吃面条和包子。

见到 G。他正在为学校让他教汉语烦恼。他只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学预科学了一年汉语，很不流利，发音也差，怎么能教好？本应该由汉族老师教汉语，可是所有汉族老师都一点维语不会，无法教维族学生。我问汉族老师就不能学点维语吗？他说这话讲了多年，汉族老师嘴上同意，实际就不学。其实那些老师都在本地住，学点维语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方便。二十年前工作的汉人大部分都会些维语，后面这二十年工作的汉人则基本不会，也没人想学。

三年前见 G 就讲维语汉语的问题。我看他还留着三年前同样的胡子，便问现在胡子情况怎样？他说只要是有工作、拿工资的，还是不让留胡子。他不是官，不是党员，因此拒绝刮胡子。有一点官位的，或者是党员，没人敢留胡子。什么都不是的，有的留了，上面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城市里管得松了一点，县里还是管得严。乌什县规定四十五岁以下留胡子的必须强制刮掉，还要收刮胡子费二十元，而市场上刮胡子只收费二元。

现在政治学习特别多。江泽民一九九八年来新疆的讲话，现在还要学。每次政治学习都必须写心得笔记，放进档案保存。还要看写多少页，少了不行，写的越多越好。农村教师更辛苦，工资少，政治学习多，基本没有休息日。

他说农民这几年比以前变得更穷了，原因主要在官员。比如乌什县的汉人书记让农民都种苜蓿，然后搞了一个加工厂。大家都知道那加工厂有书记的利益。收购时百般挑剔，长了短了干了湿了都不行。农民排队一两天，最后结果往往还是不收购。维族县长表示了一点不满，说收购这么困难就不要种苜蓿了，还是种粮食吧，粮食至少还能饱肚子。结果县长当了不到六个月，就被调到地区农机局当书记，什么权力都没了。农民现在越来越没有选择权，种什么都由当官的决定。名义是指导市场，其实目的在于官员或亲属搞个什么工厂，让农民给他们种原料。市场好的时候设关卡不让去外面卖，想方设法压低收购价，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不收了，风险全让农民承担。这种情况下，农民生活自然会比过去自主权多的时候更差。

再加上官员腐败。过去官少，即使有腐败，总量也有限。现在每级政府的几大班子正职副职加起来一大堆。个个配专车，每辆车一年消耗几万元。新疆很多县都是只有几万人口，仅养那些车，老百姓的负担都会很重。

新疆棉花比邻国贵

吃晚饭时见到T。他在国营棉麻公司工作，负责棉花收购。我向他求证各地设卡情况。他说各地不许农产品卖到外地，是为了保证税收、产值和产量留在本地，以成为本地官员的政绩。虽然上级规定不许设卡，但总是搞不过下边的对策。比如下边可以说设卡是为了检查禽流感，实际上还是为了卡农产品。

设卡也受到本地加工厂欢迎。如棉花加工厂干的活是把棉籽和杂质取出。棉籽外面包的短绒可以做最好的纸，棉籽能轧油，轧油后渣滓可以做饲料。T在的县有三十多个棉花加工厂，绝大多数是私人开办，其中温州老板最多。属于国营棉麻公司的厂只有六个，也都承包给私人。这些私人企业背后都有官员，因为开加工厂得乌鲁木齐批，没有官场关系根本做不到。官员给老板方便，老板也会给官员好处。那些温州老板开的厂，如果检查不合格被关闭，五分钟后就会重开，因为检查组马上会接到上级官员打来的电话。

设卡使本地收购价压得低于市场价。政府倒手赚其中差价。而本地官员又可以批条子，把本地收购的便宜产品按收购价卖给老板，得到便宜货的老板当然会有好处给批条子的官员。

T说新疆棉花现在比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贵，原因就在于收购环节太多。从棉农到用户中间有各级政府关卡，各种加工厂、公司的中间环节，层层加码。目前新疆棉花的优势在于质量好，国外是机器采棉，杂质多，而新疆是手工采棉，杂质少。新疆的手工采棉者，很多是从内地来的打工者。

因为在维族餐厅吃饭不能喝酒，饭后穆合塔尔想喝一杯，我建议买两瓶啤酒在旅馆喝，便到旅馆楼下小商店。一对中年维族男女也在那买了食品进旅馆。穆合塔尔认为他们是到旅馆开房的苟合者，因为男的说买啤酒时，女人说她在家从不喝啤酒，一家人显然不会这样说。

中国研究论文库中的假报告

三月二十七日。到G家。G的父亲退休前是政府部门处级干部，现在一提起民族问题就牢骚满腹。他说维族法院院长根据一个汉人老板玩弄维族妇女的真实案例写了文章，发表在维语刊物上，结果被调到地震局当调研员，等于闲置。我说汉人都不学维语，怎么会知道有这种文章？G笑了，说有全心全意为汉人服务的维族呢。有些人是为了当官，有些人是为了钱。譬如谁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私下搞了什么宗教活动，当局都知道。可是在场的根本没汉人，只能是维族人告发。这种人挣两份钱，平时工作挣一份，安全部门领一份。哪个单位都有这种人，农村也有这样的人，只是搞不清到底谁是。人们只能互相猜，随时提高警惕。

我这回要完成一个小调查。在新疆搞具有专业水平的民族问题调查，没有官方配合是不可能的。但吊诡的是一旦有了官方配合，再专业的调查也不会有准确结果。我查找数据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网站的中国问题论文库中，找到一篇名为「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的报告。是由广东中山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历时一年，覆盖南北疆，对近四百名新疆维族和汉族人士所做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这个调查的专业水平照理说无需怀疑，报告里的表格、计算、术语和引经据典连篇累牍。问卷提出下列问题征求被调查人表态：

在工作单位中形成的同事关系很好
维汉朋友之间交往非常密切
十分愿意结交民族朋友
维汉朋友在过年时候相互走访、拜年
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愿意向民族朋友寻求援助
得到和经常得到民族朋友的帮助
对方民族不值得信赖
领导干部认为对方民族在工作中容易合作
干部感到与对方民族同事一起工作是愉快的
认为目前新疆族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
新疆各民族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
新疆实现了各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平等权利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新疆各民族经济发展一样快
族群之间家庭收入的差距不大或没有
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高兴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政府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势力和活动是必要的

但报告对问卷汇总分析得出的结果，让人感觉与现实相差实在太远，甚至可以说相反。例如「认为目前新疆族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维吾尔人达到近百分之八十，比汉族人的百分之七十二还高。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高兴」，维吾尔人的认同也比汉人高两个百分点，令人更加奇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哪里还需要搞什么新疆问题研究，哪里还存在新疆问题呢？如此堂而皇之的研究，在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后，得出这样荒谬的结果，令人不耻。然而它和网上愤青的帖子不一样，它披着学术外衣，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库中。那论文库关于新疆问题的论文一共只有三篇，一篇是英文报告，一篇是御用的新疆社会科学院所写，能让中文读者抱有信任阅读的只有这篇报告。因此这种「学术」比官方御用文章的危害还要大。

我对维吾尔人的调查

我不是指责上述报告造假。它的问题在于，当调查人员由官方配合，把问卷交给被指定的维吾尔人填写时，已经注定不会真。如果维吾尔人连相互之间都得提防，他们怎么会在有官方参与的问卷上白纸黑字地写下真实态度，而不担心成为证据受到惩治呢？我做的小调查，只是是把上述问卷问题向维吾尔人再问一遍。我的区别在于配合我的不是官方，是穆合塔尔。穆合塔尔在阿克苏有很多熟人，只要是他带我见的人，信任他也就信任我，回答会是真实的。

因为这种方式接触的受访人不可能太多，我变通一下，要求每个受访者回答的不是他自己对问题同意与否，而是他认为他周围的维吾尔人对问题表示同意的百分比有多大。这种定量当然不精确。比如 G 的父亲动不动就回答「没有一个人同意」。他虽然是老人，以前又是政府官员，态度却最激烈。G 的母亲比他态度缓和些。我希望调查不出现互相干扰，最终只收录 G 母的表态，没要 G 父的表态。但不管怎么样，也可以对比出上述「学术报告」有多大偏颇。

下面表格是每个问题在上述报告中的结果（分为维族和汉族）和我调查的结果（只有维族），可以看到二者差距。

问卷调查内容	报告中维族同意	报告中汉族同意	我调查的维族同意
在工作单位中形成的同事关系很好	34.1%	33.3%	10.0%
维汉朋友之间交往非常密切	49.7%	23.4%	7.5%
十分愿意结交民族朋友	78.8%	78.0%	3.8%
维汉朋友在过年时候相互走访、拜年	56.0%	71.7%	18.8%
当遇到实际困难时，愿意向民族朋友寻求援助	65.1%	65.4%	21.3%
得到和经常得到民族朋友的帮助	72.5%	77.5%	8.8%
对方民族不值得信赖	7.1%	3.30%	81.3%
领导干部认为对方民族在工作中容易合作	68.5%	56.3%	18.8%
干部感到与对方民族同事一起工作是愉快的	44.4%	34.4%	22.5%
认为目前新疆族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	79.5%	72.2%	16.3%
新疆各民族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	77.9%	90.1%	7.3%
新疆实现了各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平等权利	73.3%	82.9%	6.3%
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新疆各民族经济发展一样快	68.8%	65.5%	10.0%
族群之间家庭收入的差距不大或没有	65.9%	77.4%	18.0%
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高兴	87.1%	85.0%	17.5%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85.0%	85.0%	9.3%
政府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势力和活动是必要的	93.0%	95.0%	8.8%

「批发女郎」与艾滋病

回旅馆时服务员正在打扫房间。她是四川人，来了十多年。丈夫在这搞施工。家有两个孩子。女孩去福建打工，男孩还在上学。她认为这的经济条件比四川好。全家户口都迁来了。她说往这迁户口容易，也不收钱，不过仍然是农村户口。他们迁户口主要是为孩子上学便宜，否则一个学期要多交几百元。

晚上见到二〇〇三年在温宿见过的汽车教练。一伙跟他学开车的乡下人请吃饭，他让我和穆合塔尔也去。那是一个装修廉价俗气的饭馆，一群敦厚的维族汉子已在里面等待。他们是从乡下到阿克苏来参加驾驶考试的。每个人交了几千元钱学习费，就是为了拿到驾驶执照，多份谋生手艺。也许对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份手艺上呢。他们这次来阿克苏，是因为通知他们来考试。但是他们到了，乌鲁木齐来监考的人却说有事不能来，考试因此而延期，什么时候考再听通知。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从来不会想一下这些放下家里活计，乘车几百里赶来的乡下人怎么办？他们不但要花钱住店，明天要奔波回去，等下次通知考试还要再跑这么一趟。

农民们很老实，除了给我们劝酒，不多说话。我问他们乡有多少汉人，回答是农牧民中没有，干部中有，能批条子的干部都是汉人。他们说的批条子就是指有决定权，或是能调配资源。汉族人最多的单位是公安派出所，二十七个人中只有七、八个少数民族。

问他们村长怎么选？回答是当局让老百姓选上面指定的人，选不上就再选，还警告农民，只要上面指定的人选不上，就会不停地开会，一直选下去。所以农民就不去费劲，上面指定谁就选谁好了，免得不停地开会。

酒喝得热闹起来后，教练告诫那些农民喝完酒不要去找「批发女郎」。阿克苏的艾滋病数量是全新疆第二位，卖淫者是主要传播渠道。教练所说的「批发女郎」，指的就是做皮肉生意的内地暗娼。因为「打一炮」只需要十元二十元，非常便宜，被形容成「批发价」，因此叫「批发女郎」。穆合塔尔说那些维族农民进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会嫖娼。阿克苏当局对妓女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穆合塔尔认为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打工者有解决性欲的地方，才能安心留下变成移民。而这种自然流入的移民，比行政移民便宜得多，不用政府拿安家费。

体育教员为何自称流氓

喝酒中间，来了个穿一身牛仔服、脸上有疤痕的中年男子。他是个体育教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知情达礼，跟我喝酒时告诉我可以不喝白酒，不要勉强。但是喝酒中间听他讲的事却又是个「爱惹麻烦」的人。学校分配他下乡两年「支持农村教育」，走的那天他拿出一直

没给他报销的八千元单据，说是报了销才走。乡下来接他的车那时已在外面等，校长没办法，只好在报销单上签字。学校会计说眼下没那么多钱，等他下次回来再给钱，他说不行，不拿钱不走。学校只好想办法给他凑起了钱。不过他有他的理由，学校管钱和报销的都是汉人，平时去报销，动辄说需要研究，总是拖延时间，然后不是这个不给报就是那个不给报，为这事经常吵架。

体育老师说校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长得漂亮，是高层哪个领导的「马子」，才给她安排了这个位置。学校三分之二的老师是民族人，都是本科、研究生出身，为什么不能当校长？整个学校没有一个汉族学生，为什么几十个汉人在学校里当官？

体育老师的身材并不魁梧，但气质剽悍。在生活中遇到和汉人的冲突，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诉诸暴力。二〇〇四年，一个和汉人乡书记有关系的汉人占了他表弟的土地，村长和村书记怕得罪乡书记，不敢按真实情况在法庭作证。输了官司的表弟没别的办法，只会哭，找他这个城里表哥帮忙。他出面再打官司。那汉人先是在法庭上骂他，他就做出一副暴徒形象，发誓要杀死那汉人。结果汉人被他的气势压倒，答应把土地还给表弟。他说还不够，他帮表弟打官司耽误的时间必须给工钱，一个课时五十元钱（实际是二、三十元），一天算下来是四百，要赔一万多。最后汉人给了四千五百元。他全给了表弟。表弟分出二千元给他，他不要，让表弟拿那些钱刻块界碑立在地界上，还要拍下照片，防止汉人移动界碑。

体育老师的另一个「恐怖活动」是在一九九八年。他亲戚的三岁娃娃在商场里玩，被三个汉人说偷了东西。他去了，一个人打掉三个汉人。商场里众汉族保安治服他，他脸上伤疤就是和保安搏斗时受的伤。保安把他一手在背后一手在脖后铐起来。他知道保安没这个权力。把他押到派出所时，警察让保安把手铐去掉。他就是不让取，要一直带下去（虽然疼得要命）。维族警察批评那些保安——知不知道这是老师，你们却让他当众丢了脸！保安哭着向他道歉。他说道歉不行，赔一万元，还要登报道歉。后来商场方面赔偿了五千元给他（他现在觉得五千元就让步不应该，因为脸被破相了，应该可以要得更多），同时保证登报道歉。直到商场经理把钱放进他口袋，他才同意摘手铐。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的确注销了道歉。

体育老师不是不讲理，他这些打架都不是为自己，但事实让他看到讲理没人睬，没有用，而不讲理，把自己说成流氓，使用暴力手段，人们反而怕，对他的态度反而好，问题也能解决，因此只有暴力才有用。我想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一定程度也是出于同样认识吧。

维族老师面对的汉语关

三月二十八日。跟穆合塔尔参加一个聚会。他的中学同学有一个要去河南郑州学习，大家给他送行。我发现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

为聚会理由。聚会地点是一家烤鱼店，主要内容当然是喝酒。聚会者中有两个中学教师。一个教汉语，一个教维语。他们在民族学校，过去全部用维语教学，现在开始要求用汉语教学。全校四十几个班，已有十几个改为双语教学。目前还叫实验班，但很快所有班都要变成双语教学。除了民族文学、历史和政治用维语教，其它课都改汉语教。因此学校要求教师必须能用汉语授课，做不到的就下岗。学校分批送教师去内地培训汉语。但对年纪比较大的教师，即使在内地呆上半年一载，又怎么能真正掌握好汉语？那位教汉语的老师都考了三年才拿到汉语八级，遑论其它老师。而上岗授课，要求必须达到汉语八级。

不过他们也说，最终大部分人还是能通过。主要方法是找人代考。穆合塔尔就常给人帮这种忙。他的汉语水平不但日常交流没障碍，还可以深入讨论政治问题。不过即使以他的水平，最初为别人代考也只考了四级，听力只得六十二分。穆合塔尔说那些考试题目非常奇怪，譬如给出「爸爸回家，带回家的礼物对家人没有用」，让从爸爸是商人、法官、外交官中选择答案？正确答案是「外交官」。穆合塔尔问这有什么道理？其它人就不会带回家没用的礼物吗？给出「下雨了」，选择答案是「把雨伞放在门口」、「把衣服收起来」，「盖被子」等，哪种可能没有呢？结果正确答案是把衣服收起来。不过他现在已有足够经验，即使一夜不睡觉，也可以轻松考出七级来。而且能根据对方需要，说考几级就几级。我问为什么不直接往最好结果考呢？他说那些汉语不太好的人，一下考分太高会被看出是代考，所以需要分几次，每次提高一些，最后再过关。

那位中学汉语老师的妈妈也是教师，在一所维族小学教书。那小学一九九七年有一千五百名学生，现在只有四百五十名了。多出来六十多名老师，要把他们安排到别处去。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安排，因为他们一辈子用维语教书，不可能去汉语学校教书。学生锐减的原因是父母们为了孩子将来好找工作，都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读书。参加聚会的那位维语老师也把孩子送进汉语学校，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既然民族学校也要改成汉语授课，而民族学校的老师汉语都不好，孩子学的汉语不正规，就不如直接上汉语学校。我问孩子都上汉语学校，会不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语言水平下降？他们回答好在多数孩子在农村，上完初中就不再继续上学，还会使用维语。不过这在我看并不能保证语言水平，因为保留下来的语言只在初中程度。

对「维族学生调戏汉族女教师事件」的分析

那位维语老师讲了一件事：一个汉族女教师在课堂讲到香妃，班上一个汉族学生说香妃身上不是香味，是维吾尔人常年吃羊肉的膻味，一个维族学生对此不满，让老师来闻自己身上的味。老师认为那维族学生对她构成调戏，告状到学校，学校便决定开除那维族学生。维族学生的父亲到学校打了女教师两个耳光，并扬言儿子被开除就会杀了女教师。学校担心闹出人命，最后没敢开除维族学生。

这事可以引伸出进一步分析的线索。一是汉族学生何以会当着维族同学的面，重复从父辈那里听到的侮蔑维吾尔人的戏言？如果是他没意识到会伤害维族同学，说明他所受教育中缺少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如果他明知有伤害还要这样说，说明的便是殖民主义的强横已成为他的行为方式，那只能来源父辈的传承。

二是维族学生是把矛头对准老师。侮辱的话虽不是老师所说，但老师代表居高临下的权威，可当作殖民统治的象征。那汉族学生的骄横，应由与他同民族的老师负责。维族学生对老师的侮辱，因此便具有民族反抗的意义。

三是学校当局正因为看出民族反抗性质，因此对学生做出开除的惩治；对一个即将高中毕业考大学的学生，开除等于彻底断送他的前途。

四是维族学生的父亲明明在政府教育局工作，照理说和学校有很多关系，却没有采取其它方式，而是使用暴力。这也许是他的一种选择，但更可能是别无选择。因为熟悉学生家庭情况的学校既然能做出开除决定，已经说明并不在乎教育局的父亲，也知道那父亲不可能奈何学校。

五是父亲把矛头对准女教师。其实女教师不应该是焦点，但因为卷进来的每个方面都不愿意触碰问题的实质——民族问题，所以不约而同地具象化到女教师身上，女教师才会成为焦点。

最后说明，恐怖主义的确能够起作用。之所以弱者采用恐怖主义，是没有别的有效方法。合法范围内所有努力都不可能赢，只剩暴力是唯一力量。而当事件没有公开化为民族矛盾，限制在「调戏」层次，按照当局历来实行的大处镇压、小处放纵政策，学校当局是有退让空间的。而一旦上升到民族矛盾，就不能退步，此事也就不会和平解决。学校当局之所以绕开民族矛盾，是因为事情的起因是汉族学生当众侮辱维族。如果恰恰相反，恐怕就不会这样结局了。

喝猪奶的羊

不过那位维语老师现在却想让自己孩子离开汉语学校，回到维族学校上学。我问为什么，他列举的原因有，维族孩子疼了会叫「哦加」，自己七岁的孩子现在只上了一年汉语学校，疼了就像汉人一样叫「啊」，怎么说都改不过来。还有在汉语学校里，值日扫地的总是维族学生。他不是不愿意孩子多劳动，而是孩子如果处于不公平和受歧视的地位，心理成长将不利。

穆合塔尔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父母是「民考民」的让孩子「民考汉」，而父母是「民考汉」的让孩子「民考民」。前者是看到了「民考汉」的好处，后者是看到了「民考汉」的坏处。

新疆人的一种说法是，「民考汉」是新疆的第十四个民族（官方说法是新疆有十三个主要民族）。维族孩子一旦上了汉语学校，就会变得既不像维族，也不是汉族，成为比较怪的一种人。或者说，他们的模样是维族，灵魂却不是。有一个故事，维族爷爷和孙子俩放羊，小羊羔有时去汉人邻居那吃母猪的奶。孙子发现后告诉爷爷，认为这样的羊是个问题。爷爷说没关系，这样的羊可以给「民考汉」吃。

不过，「民考汉」也不全一样。按穆合塔尔的说法，「民考汉」中有百分之四十会变成汉人，百分之四十是中间状态，百分之二十反而变得民族意识特别强。

半道来了一个胖胖的年轻医生。他曾经在沙特待了一年，所以不抽烟喝酒，只是比较能吃。他说原本想从沙特去西方，但九一一后从中东获得去西方的签证很难，因此决定回新疆。按他的说法，在沙特朝拜和学习使他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为还是应该服务于自己民族。不过穆合塔尔认为只要有机会，他迟早还会去西方。

聚会者都算是当地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尤其美国的崇拜是全面的，甚至是无条件的。他们让我谈美国监狱的情况，我在二〇〇二年参观过洛杉矶的监狱，我主要说的还是好话，但是谈到美国监狱鸡奸问题严重，中国监狱这种情况少。他们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的老二（男生殖器）不好使。

和平时期的战争景象

四月一日。T 带我和穆合塔尔去柯坪县，那是 T 的老家。下车第一件事是吃羊羔肉。T 说柯坪的羊羔肉最好吃。路边墙上张贴着阿克苏地区公安局发的通缉令。通缉二十三个「暴力恐怖犯罪嫌疑人」。我看了一下，其中只有一个超过四十岁，其它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所属组织有「正义党」、「学经文学生联合会」、「伊斯兰改革党」、「加玛艾提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等，很多都去阿富汗进行过训练。不过所有案子都是二〇〇二年以前的。

T 雇了一辆当地的车带我看周围农村。正在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分显示了工程师治国的特色。工程师本性在于物的建设，规范和秩序，根据蓝图制造世界。「建设新农村」就是把原来农民自己盖的住房拆掉，按照统一规划重盖新住房。新住房要求每家统一样式，横平竖直，排列整齐，便于水管、电线的接通，还能空出一些地皮。对那些靠近城市，可以利用土地搞开发的地方，这是重新规划的积极性主要来源。空出的地皮可以让当地政府卖不少钱。

然而对于农民，这种「建设新农村」却近乎灾难。走过的村子，老房子几乎都成废墟，新房子还没建成，一片破败凋敝。到处是成尺厚的浮土，孩子跑时像马跑一样身后腾起一溜烟。按穆合塔尔的话说，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破坏，简直是一场战争过后的景象

T 的姐姐在其中一个村庄。她家老房还在，但很快会拆。他们对所谓「新农村」忐忑不安，不知会有什么结果。这本是他们的家园，但家园怎么安排完全由外人做主，他们自己没有权力。很多人不想搬，却没办法。政府强迫搬迁的办法之一，是把老村庄原本纵横流淌的渠水掐断，引到「新农村」去。老房子没了水，世代种下的果树都枯死，生活也不便，只好搬。我看到有的人家从自来水接水管浇果树。但那只是救急。过去渠水流淌，终日不断，因此能够保持丰富的地下水，对果树和植被的好处是靠自来水浇灌达不到的。

政府给每家农户补贴三千元盖新房，但要求必须盖成政府规定的样式。每家至少还得拿二万元才能盖起那种房。大部分家庭拿不出那么多钱，因此成了老房子不让住下去，新房子又没钱盖的局面。不少家庭只好先盖政府规定样式中的一间，暂时住进去，等有钱再盖其余部分。

当年的维吾尔村庄有潺潺流水、白杨、葡萄架，干净的院落和清真寺，给人留下诗一般的印象。那时没有政府统一规划，是历史年积月累形成，最符合小区功能、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现在这种人为规划完全不顾历史的文化积淀，破坏了原本的自然景观。传统的生活细节、奇妙的差异、方便的安排、独特的布置都消失了，多年的邻里关系也被强行拆断。缺乏人文素养的政府官员完全不明白，从小区建筑角度，最佳状态是「错落有致」——既非整齐划一，也不杂乱无章。文化传统、历史沿革是小区过去的管理资源，决定着「有致」，自由的选择和功能的需要则导致了「错落」。保持那种错落有致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也是对小区功能的维系。而目前这种政府统一重建，凸现的是专制权力对人民的侵犯，对自由的干涉，对小区的破坏，同时也是把美变丑的过程。

深夜警车鸣笛

原以为 T 的父亲在乡下姐姐家，结果他已回柯坪县城。我们到柯坪去看 T 的父亲。他搞了几十年教育，认为八十年代的教育状况最好，因为那时的学校是真正为了传授知识，学生也是为了学习知识，而现在一切都是为了钱。学校是为眼前挣钱，学生是为将来挣钱，进学校的目的就在找工作。他很不喜欢目前的教育状况。

现在一个严重问题是教师不敢管学生，因为管严了学生可能辍学，导致义务教育考核指标下降，教育局和学校的政绩都受影响，老师因此会受批评，扣工资，因此老师也就不管学生了。

T 父住的是小区楼房。房子里有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这种密切的家族关系在汉人家庭已不多见了。睡觉的房间没有床，地面铺满地毯，躺下就可以睡。一个房间足可以睡十多个人。T 本来想让我们也住家里，不过我和穆合塔尔还是到外面找了旅馆。

入夜的柯坪，街上亮起灯光。学着内地城市，竟也做出火树银花的形象，到处是五彩灯闪烁，树上挂着成串小灯泡。柯坪是个小县，只有四万多人。县城按照现在政绩标准的模式改建，街道宽阔，中心有广场，四周建起住宅小区。当地人喜欢这种变化，愿意搬出平房住楼房。能够统一烧暖气，有上下水，方便很多。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直被争论。当地人当然有权追求舒适，他们没有义务为满足外来人的猎奇审美，停留在已经厌倦的生活状态。

不过以失去自身魅力为代价，到底哪个损失更大？过去来新疆，提到每个地名都令人浮想联翩，期待进入新奇环境。现在全都变成一个模样，和中国内地毫无二致。这种千城一面对外来者失去吸引力，对本地人则失去文化传统的资源。其实二者不一定只可选其一，方便舒适不意味一定丢掉民族特色。哪种民族特色也不排斥方便舒适。好的城市建设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把文化传统、民族特色与现代化统一在一起。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执政者的过失。

在街上散步时，T 的姐夫碰上熟人，非拉我们去喝酒。那是一群进城办事的乡干部，其中有个人弹都塔尔唱民歌。我听不懂他们之间谈话，专心听民歌。但是窗外不时有警车开过，闪着灯，响着警笛，却开得很慢。这让我感到奇怪，如果它不急的话，为什么响警笛呢？喝酒的人们对我这个问题笑起来，告诉我那是为了震慑呀。这里已经习以为常。每天深夜，警车就在深夜空荡的街上响着警笛来回转悠，人们在这种震慑之声中进入睡眠——当然是在没有神经衰弱的前提下。

唱歌者每唱几曲便喝上一轮酒。屋里空气浑浊之极，人人手里有支烟，吸完一支再接一支。喝酒也是一样，每瓶倒光时我都以为要结束了，结果又会有新开的酒摆上桌。最终我实在呆不下去，便提前退场。这大概是不礼貌的，出饭馆大门时被一个醉酒者拉着手说了半天，认为是看不起他们。直到穆合塔尔出来才解围。穆合塔尔也是受不了，借口上厕所跑出来，和我一块回旅馆了。

欠赌债的弟弟

四月二日。早起去 T 的另一个姐姐家，给我们做了一种特别细的面条，很可口。吃面时他们一直用维语谈一个感觉不那么轻松的话题。等我们离开，T 和他姐夫共骑一辆摩托车，匆忙先走。穆合塔尔告诉我，T 的弟弟在外面赌博输的钱今天中午到期，必须付，但是 T 的弟弟却不见了。债主来找，是个职业赌徒，就靠赌钱讨生活，轻易不会罢休，曾经把别的欠债者告上过法庭。他用的手法是让赌输的人写欠条，不写欠赌债，而是从他那里借钱，所以打官司肯定赢。T 不敢跟债主闹翻，一是怕弟弟单位知道，如果债主去单位，弟弟赌博的事曝光，会对弟弟不利；二是怕父亲知道，如果债主闹到父亲那，父亲会生气，对身体不好，对家庭也不好。因此好言稳住债主，保证中午之

前回话，就到各种可能的去处找弟弟。

这事我帮不上忙，便去逛巴扎。所有巴扎都大同小异。一对维族夫妻看我带着相机，让给他们拍照。拍完后他们从相机屏幕上看到自己形象，跟我说谢谢。我想他们谢我什么呢？如果是谢我给他们拍了照，他们并没有得到照片呀。

从巴扎出来，我跟穆合塔尔去看他一个朋友。到处是「形象工程」。街面的房子正面都贴了瓷砖，变成白色，但房子的其它几个面仍是泥墙。白瓷砖只是给坐汽车经过的上级看。穆合塔尔的朋友是新疆大学教师，因为母亲生病，请假回来照顾。他在新疆大学已经教了十八年课，工资只有一千四百元。我不知道他在乌鲁木齐的家状况如何，他母亲的房子却实在简陋，甚至可以说贫寒。

新疆大学兴办的时候，说是主要为了少数民族的教育，但是现在全校四万名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不到一半，教职员工中少数民族不到百分之四十。目前继续推行汉化的重点在于要求用汉语教学。所有教师都得通过汉语八级考试，连国外回来的博士也不例外，否则有多高学位都不承认。为了通过汉语考试，有些教师考了十次十五次。而新疆大学原本大部分课程都用维语教，非逼着改成汉语教，用意可想而知。

柯坪县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走一走就能看见每个想见到的人。我们出来看到了 T，说是已经找到弟弟，因为无力还钱，不敢露面，只好由家里人为他承担欠债。好在兄弟姐妹多，大家一块凑。已经跟债主说好，T 晚上回阿克苏后还钱给他。

我们一块去当地书店。大部分都是维语书，这里汉语书没人买，而阿克苏的书店大部分是汉语书。由此也看出汉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至少南疆是这样。

穆合塔尔拒绝可口可乐

回阿克苏的路上，先是下雨，快到阿克苏又变成风沙茫茫。穆合塔尔说前些日子经久不散的沙尘，使他认为又搞了核试验，直到看到中国其它地区也有沙尘暴，才放弃猜疑。

到阿克苏后，穆合塔尔陪 T 去找一个在三教九流中有威望的老大，请他出面为 T 弟的欠债说情。那人出面后，事情和平了结，欠的四千赌债免掉五百，T 用家族凑起的钱还清三千五百元。

随后我和穆合塔尔上街。天已黑。在路灯下看街两侧标语牌。那是中共阿克苏市委宣传部制作的。其中一副画着中国陆海空军三个士兵，一群维族青少年围绕他们，穆合塔尔翻译上面的维文标语，大意是「做好语言文字工作是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穆合塔尔问为什么维族青少年围绕的是中国士兵呢？士

兵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另一个标语牌画着两男三女五个维族少年，蓝天白云，和平鸽飞翔，标语文字是「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穆合塔尔给我进一步分析，意思是只要学好普通话，和平就有了。还有一个标语是「普及各民族的共同语言，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能力」，穆合塔尔说共同语言当然就是汉语。总之，这批标语都是关于语言文字的，明显看出强化汉语的用意。我不奇怪穆合塔尔对此表现的反感。

因为我明天就离开，和 T 见最后一次面。碰头时 T 带着七岁儿子。儿子从幼儿园就上汉语班，汉话说得相当好。上小学前，T 曾想让他上维语学校。家附近各有一个汉语学校和维语学校。但是儿子大哭，坚决不上维语学校，原因是维语学校不如汉语学校漂亮，设备也不好，于是就让儿子上了汉语学校。穆合塔尔不认同 T 的解释，其实 T 夫妇是出于让儿子学好汉语将来便于找工作，否则仅是儿子要求不能决定学校的选择。

我们找喝酒地方时，T 的儿子对类似麦当劳形象的汉族咖啡馆最感兴趣，但是穆合塔尔不同意，儿子看上去好失落。不过他比汉族独生子要好，没有哭闹，听话地跟我们走了。我们最后选了个回族饭馆，喝当地传统方式酿造的土产葡萄酒。那种酒特别甜，我以为一定加了很多糖，但穆合塔尔说半点糖都没有，全是葡萄含的糖份。

让儿子选饮料，儿子立刻点可口可乐。穆合塔尔对着儿子滔滔不绝说了一番维语。儿子脸上显出不情愿的神色，接受了穆合塔尔为他选的黑加仑饮料。那种饮料是维吾尔企业生产的。我问不让儿子喝可口可乐的原因，穆合塔尔说可口可乐是犹太人的企业，对以色列进行很多援助，所以喝可口可乐等于间接帮了以色列，很多维吾尔人为此拒绝可口可乐。

临别前 T 送我两把维吾尔小刀，一把给我，一把给唯色。我和穆合塔尔步行着穿过深夜人稀的阿克苏市区回旅馆，明天又要各奔东西。

四、（二〇〇六年夏）

新疆如何丢掉了一个大油田

七月六日。昨夜在冷湖附近的风蚀台地宿营。风很大，风蚀台地适于隐蔽，却都是风沟，不但没有避风之处，反而风更强，把车横过来挡风才能扎帐篷。这次还是和阿克夫妇同行，跟三年前不同的是唯色没来。

早起风停，天是阴的。路平车少，开得很快。阿克以前走新疆没去成阿尔泰，因此这回主要目标是喀纳斯湖。他不愿意走重复路线，我便建议他从若羌进新疆，走沙漠公路到库车，翻天山到伊犁，然后去阿尔泰，再走星星峡出新疆。这条路线对我的好处，则是可以再到库车见穆合塔尔。

快到花土沟时天变晴。比三年前路过时，油田规模明显扩大，多了不少油井，成百台采油机在抽油。在花土沟给车加油时听当地人说，本来柴达木油田主要是在青海冷湖和老茫崖一带，那里已经没有油，职工大部分都撤了，突然又在花土沟发现新油田，于是这片原本无人感兴趣的荒原一下变得值钱了。

新疆则后悔当年把花土沟划给了青海。新疆与青海现在的交界叫芒崖。芒崖是维语「走」的意思。但是冷湖和花土沟之间还有个地方叫「老芒崖」，「老芒崖」离芒崖有一百好几十公里，据说那里原本才是青海与新疆的分界。为什么省界挪到了现在的地方，而且也叫芒崖呢？当地传说是原本两省的界碑立在老芒崖，有个维吾尔人看到那界碑可以当拴马石，便用绳子拖在马后，一直拖到了现在地方。后来青海和新疆发生边界纠纷，中央来人裁决，结论是界碑在哪儿省界就定在哪儿。那时花土沟还没有发现石油，于是新疆就让了，从此失去这一大片领土，也就失去了今天这个油田。

好在那位只认得拴马石的维族老乡到此为止了，如果他再往前拖几公里，中国最大的石棉矿也会随之被划给青海。因为刚刚进入新疆地界，就是那个石棉矿。

第五次翻越阿尔金山

我是第五次走这条路。第一次是一九九三年，一晃十三年过去。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进新疆不远有个湖，湖水碧蓝，植物茂盛，野生禽

鸟或游或飞，极安详的景色。此次再见那湖，湖面小多了，暴露出红色湖底和白色盐碱。植物也多数枯黄，不知道是枯死了还是没到该绿的季节。不过刚刚下过雨，车在土路上行驶不起灰尘，颇为惬意。

另一次走这条路是一九九六年。在阿尔金山下的荒原远远看到路上似有一只黑色大鸟，车开近才看出原来是个骑脚踏车的老外。他飘动的黑色衣服和带在脚踏车上的行李，远看如大鸟形状。当然也是因为没想到这条路上会有人骑车。我对那大侠老外深感佩服，这路有上百公里不见人烟。

这次倒是看见一辆汽车和几个士兵，在用仪器和标尺做某种测量。无从得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一路车辆很少，虽然地貌和青海差不多，但因为无人无车，显得更加荒凉辽阔。阿尔金山很多山头都覆盖积雪，大概要到八九月才化完，然后再开始覆盖下一年的积雪。

在阿尔金山山口停车吃了西瓜。再发动车时却发动不起来了。还是三年前和穆合塔尔同游南疆的那辆车。当时是新车，一路还出问题，现在又跑了二十万公里，车况只能更糟。好在停一段时间又能打着了，估计是油路气阻。我们赶紧下山，免得再出情况。

遇见一处塌方，众多大块石头堆在路上。只有把石头搬开，才能让车通过。为了防止塌方继续滚石，让杨萍盯着上面，一看见滚石就喊我们赶快躲开。正好有个放羊的维族青年路过，我请他帮忙，说是给钱。他帮我们搬完石头就走了。喊他回来拿钱，他只是摆摆手，我只有冲他背影喊谢谢。

车通过了，很幸运，如果塌方规模再大些，靠手清理不了，就只有原地等公路段来人清理了。那也许得等几天才能通车，或者就是调头走敦煌到星星峡。一九九三年我在阿尔金山遇到洪水断路，就是那样绕行，要多走上千公里。

阿尔金山北麓最容易遭水毁。远看山中黑云聚集，大雨滂沱。我们走的一路雨下得不大。不过山沟里的路大多都被水冲断，汽车必须靠四轮驱动才能通过。

汉人之间的实在话

翻过阿尔金山，走上平路。看见一辆路边抛锚车向我们招手。阿克停车询问。对方说是若羌县政府的车，一车五个汉人，到阿尔金山做扶贫调研。出门不久先爆了一个轮胎，换了备胎走到这，又爆第二个，无备胎可换，请我们帮忙把轮胎拉到米兰的兵团三十六团去补。

两个车胎放到车顶绑好，一个年轻干部跟我们到米兰。阿克一直向往去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但那年轻干部说现在不让进，花钱都不行。下乡干部原本可以跟公安局借枪，这次县长特地告诉公安局不能借枪给他们，怕他们打猎。

年轻干部老家在河南，从兰州军校毕业到乌鲁木齐部队。转业后分配到阿克苏工作。找了个女朋友，父母是从广东到若羌工作的干部，因此结婚后他也调到若羌。岳父母退休后一度回深圳，妻子的弟弟在那给他们买了八十万元的房子，但是住一段气候不适，雨多闷热，还是要回来，现在跟他们一起住在若羌。

我知道搭车人容易讲话，不过我需要做出汉人的姿态，用官方术语提问题，比如问稳定情况怎么样，反分裂是否有成果等。他回答稳定情况这些年大有起色，措施一是学校教育自二〇〇〇年以来百分之八十必须用汉语教学，由此迫使维族人认同汉人和政府。另一个措施是各种会议，包括人大、政协都用汉语，不翻译，即使是代表，只要不会汉语就一边坐着，没你事。下各种文件也不用维语，不会汉语的就别想当公务员。过去要求用双语，现在没有了。这种措施使得维族人认识到，未来想发展，只有学好汉语。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连维语都不会说了。年轻干部说到这一点时言表得意，总结性地说：「软化很见效」。

我心想这是软化吗？法律规定民族语言是自治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必须和汉语同时使用，现在赤裸裸地把法律抛在一边，应该说是「硬化」才对。当然我没表露，否则就不会再从他那里听到什么了。他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国家公务员，照理说应该特别注意跟民族问题有关的言论。要是在公众场合，或是有维吾尔人的地方，他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现在他只把我们当作过路的汉人（他不知道阿克夫妇是回族），而汉人在对付少数民族方面是一致的，对他所说的只会表示赞赏。

果然他又接着说下去，二〇〇〇年以来，村一级党支部书记也由上面下派公务员担任。各级书记都是汉人，掌握实权，维吾尔人只能担任行政职务，没实权。汉人村书记一般也会用当地汉人当村里的其它干部和村民组长。那种汉人往往是祖上就来这里的，有的甚至汉话都说不好了，但心里还是认同汉人政权，同时他们也能被维吾尔人接受。

我问公务员们是否愿意被派到村里当书记呢？他回答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进步」有利，是提拔的快捷方式。另外收入也高不少，派到村里的比在机关的同级干部工资高两级，多四百元，有一定吸引力。

能催孕的米兰子母河

车开到子母河边，拐上去三十六团的路。三十六团团部所在的米兰镇靠近古楼兰伊循故城。据说伊循故城也曾经做过楼兰都城，但现在提起楼兰，都以为就是罗布泊的楼兰古城。不过那边也是若羌县地

盘。当年彭加木[①]失踪的楼兰考察，就是从米兰出发的。

从年轻干部口里知道，楼兰现在已经不是死寂无人的区域了。一个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的钾盐厂在那里建成开工，有一千多名职工。前不久二炮部队[②]还在那里演习，来了上万军人，据说任务是从东海潜艇往这试射导弹。

阿克到三十六团的目的，主要是看离米兰五公里的伊循古城。那里我曾去过两次，还在古城废墟里露宿过，所以这次就不去了，自己留在米兰镇。年轻干部把轮胎放在补胎铺子，带阿克去伊循古城。门票现在是二百元一张，他去说一下，可以便宜些，就算还了阿克人情。

米兰镇不大，建起了新宾馆。当年我住过的三十六团招待所是平房，仍然在。这里的饭馆基本都是汉餐，街头小摊卖的是凉粉之类，还有大笼屉里的馒头，跟陕西、河南的风格差不多。

《西游记》里有一段讲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路过一个女儿国，猪八戒喝了名为子母河的水怀上了胎。流经米兰的河也叫子母河，当地人说这就是西游记里那条子母河。当年我见过三十六团的一个业余考古学家老洪，他解释因为楼兰王是女王，所以楼兰国就被传说演变成女儿国，后被吴承恩写进《西游记》。

说子母河水使猪八戒怀孕，当然是故事。但是老洪说子母河水的确能促进怀孕。他是有数据的。仅三十六团可以查证的就有四十七对不孕夫妇喝了子母河水而生育。还举了具体实例：一个干部早年在河北当兵，结婚数年夫人不孕，不得已收养了一个孩子，没想到转业来三十六团，喝上子母河的水，竟一连生了四个，把收养的孩子还给了原父母，夫人接着又生下第五个。

子母河水催孕名声在外，甘肃、青海、西藏有车来这，都带着大桶小桶灌满子母河水带回去。老洪讲，几年前有研究机构考察过子母河，结论是子母河由阿尔金山的冰雪融化形成，在阿尔金山矿层中反复渗透，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可以增强动物的生殖系统。老洪告诉我，米兰一带的双胞胎特别多，用子母河水灌溉的庄稼和果树，产量也高。

百岁库万的小故事

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子母河水有助怀孕，而是老人库万的故事。米兰当地维吾尔居民普遍长寿，首屈一指就是库万。一九九三年他一百零六岁，那次老洪带我见过他本人。

老库万两眼有神，形态只如七、八十岁，据说仍能劳动和自理生活。我见库万时，有位老妇在扫他家院子，看上去不比库万年轻多少，

[①] 彭加木（一九二五—一九八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一九八〇年五月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遇难。
[②] 二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简称，是以战略导弹为主要装备，担负战略核打击任务的军种。

但老洪说她只有七十多岁，是库万刚结婚的新老伴。库万年初死了老伴。到了七月，做了几个月鳏夫的他受不住寂寞，便独自从米兰跑到百里外的若羌县城，不知道施展出什么魅力，吸引了这位小他三十多岁的妇人答应和他结为夫妻。

库万去若羌县民政局办结婚登记时却碰了钉子。他的户口所在地是米兰，属兵团管辖，不属若羌县。若羌县民政局因此拒绝给他登记。正当库万不知如何是好时，恰好碰上三十六团的团长到若羌办事。他把情况跟团长一说，团长连叫好事，亲自去找若羌县长。团长和县长平级，彼此经常相求，县长当然要给面子。一个电话打到县民政局，好事就办成了。

然而过不了几天，团长就为他的热心后悔了。库万喜解良缘一个月后，一位黄姓港商到米兰，看中了子母河的开发前景。黄某在三十六团官员陪同下「考察」了库万，谈话中问了库万一个问题：还有没有性交能力？库万回答说他有，但是新老伴身体有病，总是拒绝，他也没办法。

考察结束，黄姓商人向三十六团许诺了一系列投资：要建厂生产子母河矿泉水；用当地一种壮阳中草药制作提高性功能的补养液；要建高档别墅群，供海外有钱的不孕者前来求子等。他预示的投资规模使三十六团与若羌县官员心动不已。有了这等规模的「外资」进来，若羌这个新疆死角不就开启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吗！

然而黄姓商人话锋一转，提出一个条件，上述一系列投资许诺是否兑现，就取决于此。黄某条件是，要给库万找一个确保有生育能力的新妻子，最多不超过四十岁。假如库万能使那新妻子怀孕，第一笔投资马上就会到位。那钱主要是为库万的种保胎。他会派一个摄制组来拍摄整个过程。等到库万的婴儿一出世，大投资就正式启动，滚滚而来。黄某进而还要求得到孩子的抚养权，他将从香港派高级专家和护士来对婴儿进行哺育保健，同时大做广告，向全世界推出这个人类奇迹。同时，所说的建厂建别墅等工程也会一道快马加鞭干起来。

从生意角度，黄某的主意可算得上奇想。但是三十六团和若羌县的官员却犯了难。找个四十岁的新娘，年龄差距倒算不上大障碍，多做点工作，给些好处，总能找到愿意献身的妇女。问题是老库万刚刚结婚一个月，难道能逼他离婚不成？库万换个小媳妇也许很高兴，可怎么处置他那位七十岁的新老伴呢？要是老库万当时能多忍一个月，或者是团长没在若羌县城碰上他，现在岂不是皆大欢喜？怎么这么不巧！

当时我问老洪最后是怎么决定的，他说上了门的外资不能让它飞了，暂且绕开婚姻问题，先给库万找个年轻女人，就算当偏房也可以，重要的是让她尽快怀上孕，才能把外资引进来。至于怀孕以后给那女人什么名分，库万现在的老伴怎么办，到时候再想办法。找女人的事由若羌县的地方官办。他们管辖的维族妇女多，可选择的余地大。总之要尽快行动，及早给黄先生一个满意回答。

我虽然很想亲眼看到那出人间喜剧的结果，但考虑即使有子母河水助威，一百多岁的老人弄出儿子也得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所以当时没有等下去。我难以确定对库万这到底是喜还是悲，却由此更清楚地看到金钱的无边法力。即使人活到一百多岁，它也能把岁月给人的尊严买去，弄成配种的动物为它的增殖效力。

一九九六年我再到米兰，听说老库万已经死了。老洪退休离开了米兰，我找不到人打听详细情况，只能猜测是不是为了完成「引进外资」的使命，导致了老库万的早夭。看来他的使命肯定没有完成，因为港商允诺的矿泉水厂、别墅群等都没有踪影。子母河照旧无遮无拦地流淌。而米兰镇的人们，还是靠搓麻喝酒消磨时光。

一夜卡车轰鸣

阿克从古城回来特得意，一是每人只收了五十元，当然都进看门人自己腰包了。我在米兰跟人闲聊时就知道，即使没有那位若羌政府干部去说情，游客只要不要门票，都能花几十块钱就进去。管理部门是根据卖出的票查帐，因此只要票不少，看门人自己收的钱就不会被发现。阿克另一个得意事是和看门人拉上了关系，看门人允诺将来带他去楼兰古城。按规定楼兰古城是禁止去的，但若路熟，也没有人阻挡。茫茫戈壁，哪都能进。看门人说车可以一直开到楼兰古城，来回一星期足够，只收一千元向导费。

看来当古城看门人也是肥差。一九九三年我去古城没见到看门人。一九九六年见到的看门人是维族。阿克说现在的看门人已经是汉人了。是不是肥差最后都会被汉人拿到呢？

米兰正在修公路，一头连接若羌县城，一头连接花土沟。修路使米兰热闹了许多。我们去路边一家商店打水，那商店就是因为修路才开的。开商店的两口子是若羌城出生的汉人，说是如果没有修路，商店生意做不了。米兰去若羌现在有两条路了，新路虽然已经能走车，但还有不少工程没完。于是我们仍然走老路。

老路靠近阿尔金山。一路有多处路段被山上下来的水冲断。天空无云，夕阳宁静，但是大水从远山而来，在干燥的戈壁上流淌，冲断道路，让被阻隔在两边的汽车和乘客望水兴叹，给人的感觉很怪异。只有越野车可以涉水而过，显示出优越，让人羡慕。

今晚不想去若羌住旅馆，于是半路露营。下路行驶很远才找到合适营地。月光皎洁，用在米兰商店打的水擦掉全身汗和灰，立刻感到清爽舒适。阿克带了啤酒在车上，已是热的，如同喝汤。我没搭帐篷，露天而眠，比旅馆简直好得太多。不过关键是要有那一盆擦洗的水呀。

正在修的新路和老路平行，虽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在平坦戈壁上远远能看见新路上的车灯，听见发动机轰鸣。新路一夜车不断，不知道那么多车是修路的，还是演习的军车，或是钾盐矿的运输车？总

之如此多的车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昼夜行驶，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现象。这里正在天翻地覆。

汉人现在可以养猪吃猪

七月七日。七点半（新疆时间五点半）从宿营地出发，行驶约二十多公里进若羌县城。在清晨阳光下进入绿洲的感觉相当好。路两旁绿树成荫，渠水流淌，空气里充溢水和植物的味道。早起的维吾尔人有的做饭，有的下地劳动。我感受到当年旅行家从漫漫大漠进入富有水和植物的绿洲时所体验的那种感动。

县城里面就不一样了，全是倒胃口的新建筑。阿克去修车。我去买新出炉的维族烤包子。当年来若羌就对这儿的烤包子印象深刻，这次仍然很好吃。我不能肯定是否还是当年那家，位置像，但人不一样了。当时烤包子的是中年人，现在是青年人。也许是中年人的儿子长大接班了？

卖羊肉的维吾尔人向我推销，说他卖的「羊娃子」是没结婚的羊，还说别人卖十八块钱，他卖我九块钱一斤。他是用内地的度量衡习惯开玩笑。这儿卖十八元是指公斤，而内地习惯讲市斤，所以他卖九元是一样的。但是真想和他攀谈，会发现他并不愿意深入接触。他的幽默只是市场行为。假如不买他的羊肉，他根本不想理你。

羊肉摊对面的卖瓜妇女就不一样了。她是汉人，坐在轮椅上。她愿意和我聊。她从小得小儿麻痹，一九六六年和父亲到这。按她的说法是被困在这，回不去老家了。真实情况却应该是从闹饥荒的内地流浪来这找饭吃，从此留下。她家在维吾尔人的村子，从小和维族人在一起，会说维语。但是现在村里一百多户人家，汉族占了五、六十户。她说和维族关系处得不错。汉人现在可以养猪吃猪，过去维族是不让的。现在开放了，谁也不管谁，自由有了，就是没收入。昨天见的政府干部说若羌人均收入四千多，她说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个数，至少对他们是这样。我看出她家比较穷是从她父亲身上。我向她买的瓜吃不了，便把多余的给她父亲。看那老汉很渴望并且很珍惜的吃相，猜得到即使是种瓜的他，平时也舍不得自己吃，都送到市场上来换钱。

我给阿克送去烤包子。碰到湖北一个棉花打包机厂的维护人员。他吃完早餐坐在街边闲呆，看上去无事可做，非常寂寞。因为销到这边的打包机多，工厂派他常年呆在这里搞服务。另一个吃饭的四川人，当年父母来这工作，他从小在若羌长大，后来到芒崖石棉矿上班。他说那时人都不愿意去政府机关，因为机关收入低。县长的工资才五百多，职员只有二百多。但是现在不同了，职员工资已是二千多，而且是铁饭碗。过去工资高过政府机关的企业，现在纷纷破产下岗，很多都吃不上饭。因此他离开企业，自己收购猪和屠宰，给各饭馆送猪肉。这能成为一种生意，说明这边汉人多。他说若羌的汉人至少达到百分之六十，然后说自己的经济实力一旦壮大，还是要回内地发展。

像照片那么薄的印象

一九九六年那次从若羌到且末，是难走的碎石搓板路。汽车常常甩尾跑偏，方向失控。现在公路铺成油面，好走多了。不过可能是为了提早完工，凸现政绩，当时没修涵洞。现在又一段段挖开油路修涵洞，汽车需要不时下路走便道。一路很少有车，感觉这条新铺的油路是给我们专用的。

一路阴霾，虽有阳光但朦朦胧胧。天空充满浮尘，应该是沙漠地区特有的景象吧。休息时见一汉人农民在路边舀下雨的积水兑农药。他是四川人，三十多年前家乡苦，来了这里。来时村里维族、回族、汉族各占三分之一，现在只剩两户维族，其余都搬走了。说是去他们父母那里，我想应该是不愿和汉族混居才搬走的吧。

路两边很多段落都是沙漠。刮起沙尘暴，深灰路面一片片白沙急速飘过，如同在风中展开的白绸。汽车似在波动白绸上行驶。我一边想象古人骑在骆驼上看这幅景象的感觉，一边担心开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是否会因能见度太低无法行车。

一个名叫塔提让的乡镇正好有巴扎。这一带虽是新疆死角，巴扎上主要是维吾尔人，仍有汉人做生意。光是卖菜的河南人就排了一串。没有穆合塔尔在身边，我只能跟汉人说话。一个甘肃天水的卖鞋汉人，在且末已经六年。他告诉我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双军用胶鞋过去批发价是八块八，卖十块。现在批发价提到九块八。提高零售价老百姓不接受，不提价每双鞋只赚二角钱，你说卖不卖？现在什么都涨价。油料一涨，运输费就涨，其它都跟着涨。他家住且末县城，来这个巴扎，要花五十元把货运来。交六块钱管理费可以摆一天摊。他会说一点关于生意和数字的维语，别的不会说。他说爹妈在天水，生意做不下去就回去。问他跟维族处得怎么样，他说维族好的比汉族好，哪里都有好人坏人，天下都一样。

在巴扎拍照片。跟以前见的巴扎感觉几乎一样。取景框里看到的画面也差不多。想想我拍的新疆照片，很多都是巴扎的内容。如果仅仅是这样开车走，无论走多少地方也只能掠过表面，深入不到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巴扎的照片最多（我相信很多来新疆的摄影者也是这样），因为只有巴扎是对外的、开放的，外人可以进入。巴扎虽然形象丰富，但都在表面。外来人可以拍出一些照片，却也只停留在照片那么单薄的层次，后面一无所有。

到且末县城吃饭后，开车在县城转。这里和其它县城一样，都是毫无趣味的新建筑。街道宽阔。给人留不下印象。

离开且末县城，刚在回族饭馆吃过饭的阿克陷入沉思。他说有个现象值得考虑，回族人历史上一直做生意，很多人从小就做生意，到处都看见回族人做生意，为什么没见回族人做大，都是小生意？回族

人几乎没有大富豪？阿克想了半天，自己得出的解释是，回族人一盘散沙，稍富即安，没有远大追求。我觉得这解释不令人信服，谁不是追求富了更富呢？不能说回族人没有这种追求，只是没做到。不过他说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值得思考。

昂贵的公路固沙

离开且末几十公里，上沙漠公路支线。这段路我原来没走过。大概有一百多公里，便和轮台到民丰的沙漠公路主线汇合。支线和主线的汇合处有塔里木油田一个基地。加油时问油田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加油工说现在人的承受能力强了，所以原来的很多补助都被取消。这话听着有点怪。可能是说过去国有企业对劳保有要求，现在是竞争上岗，人们不再敢提要求。不过他说去年花了二千多万元盖了一个现代化公寓，全部是标准间，有中央空调。这却是过去只讲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人不敢想的。

三年前走沙漠公路，路两侧还是用干芦苇固沙，现在被种植的活沙柳取代。绿色沙柳夹在公路两边，遮蔽了大漠景象。据说干芦苇固沙效果不如有根的沙柳。当然除了追求固沙效果，可能还因为钱多了，要追求外观效果。在中国体制中，只要能给视察的上司留下深刻印象，就有利主事官员的升迁，因此在「形象工程」上是舍得花大钱的。

路两侧的沙柳之所以生机勃勃，全靠金钱支撑。我们路过一个泵房停车洗脸。值班人是一对甘肃夫妇。他们说几百公里的沙柳都要常年灌溉。用于滴灌的胶管每米三十元。每隔四公里花十几万元打一口水井，建一个泵房。每个泵房需要二个人看守。每人月工资一千四百元。从三月值班到十一月，冬天撤回。整条沙漠公路有一百多个这样的泵站。

汽车开动时，车内温度三十六度，一停下马上达到四十二度以上。身处沙漠中心，用从地下抽出的水冲洗，感到十分奢侈。看守泵房的甘肃人说，能来这里工作是要托关系的。我也觉得这工作不错，除了水泵噪音有点大，倒是很适合写作的地方。

泵房附带值班人的宿舍。我进去参观。房间面积狭窄，小小卫生间被当作储藏室。对值班夫妇来讲，室内面积是宝贵的。解决排泄可以在沙漠上，洗澡也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不需要卫生间。

继续上路。阿克感叹共产党体制厉害。一个石油部管所有油田，需要的话可以把各油田力量集中起来，很快见效。这和共产党自己宣称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调子。

傍晚下路开到沙丘边扎营。登沙丘，看壮阔沙漠、夕阳和彩霞，赤脚走在沙上，身心舒适。露天而眠。清风习习，月亮皎洁，星空深远。看到天边有乌云闪电，没有在意，认为雨不会下到沙漠中心。但是在睡梦中被狂风吹醒。风卷沙粒打在身上如针刺一般。睁眼看，黄

沙已遮天闭月。赶快逃进车里，关好门窗。听车外风吼，一会变成雨打，又睡过去。

让人恐怖的广告

七月八日。早起风停。夜里雨不大。不过我两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都遇到下雨，也算难得。装好车，继续前进。接近塔里木河时，看到当年没有的汉式农舍和新开垦的农田，让人想到是不是新来了汉人移民。

十几年前经过这里，胡杨林高大茂密，车行其中，遇到维吾尔人赶着羊群，得停车让羊通过。这次却怎么也看不到那种胡杨林，总以为就在前面，但最后也没有见到。塔里木河水很少，似乎不流动了。好几个泵站在给两岸农田抽水。

天时而落雨。塔里木河到轮台的公路颠簸不平，路面状况跟沙漠公路没法比。轮台附近的乡政府盖成花花绿绿的积木式形状。多处看到这样的广告牌：「手指（肢）断了怎么办，快到轮南神农医院」。令人恐怖，似乎这里断手指很普遍。是轧棉花经常造成事故吗？

在轮台县城看到这样的标语——「把森林引入轮台」，另一个标语是「打击民族分裂是公路巡警的神圣职责」。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一路的广告和标语都是汉文，没有维文。包括废品收购站，回收报废车，电缆、修理厂、厨具、邮政电子汇款、学校招生广告等，仅剩个别的老标语有模糊不清的维文痕迹。看来维吾尔人在这里已经不再被当作「受众」。

终于看见一个维族老汉蹲在路边晒杏干。他旁边是高大的储油罐和烟囱，还有加油站和油田的大标牌。这画面似乎在预示着，最后的维吾尔人也要被挤出去了。

穆合塔尔发现国安便衣

到库车。穆合塔尔事先已经开好旅馆房间。我进房间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闻得到浓重酒气，一看就知道是醉了。我没叫他。拉上窗帘挡住晒在他身上的阳光。直到傍晚他才醒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一个朋友去乌鲁木齐学习半年，于是从昨天晚上喝到今天清晨。

阿克夫妇已经先出去。我和穆合塔尔上街，选了一个饭馆的街边座位坐下。烈日已落，空气变得清新凉爽。穆合塔尔告诉我热比娅三个子女被抓，罪名是偷漏税和拖欠债务。热比娅一九九九年被捕，后判八年徒刑，二〇〇五年中美两国交易，批准其赴美国保外就医。然而热比娅在服刑期间仍然是公司董事长，中国政府批准她保外就医

时，并没说偷税漏税，她的公司还获得过「纳税标兵」称号。现在安上这种罪名，一下抓了她三个子女，穆合塔尔认为是因为热比娅出国后积极参与了维吾尔政治运动。当局要以此给热比娅施加压力。

吃完饭起身，穆合塔尔突然发现隔着几张桌子坐着一个国安的便衣，那人曾经办过他的案子，他立刻警觉起来。我在街边打电话时，穆合塔尔又发现有辆车停在路边观察。他记下了车号，随后他试图带我去看那车，但是没有找到。倒是在街边新楼的后面看到一片正在平整的土地，马上要做房地产开发。只剩一户孤零零的维族老房子挺立，可知是正在抗争的「钉子户」。不过没人相信它能挺到底。

生活的愿望是种的东西能卖出去

七月九日。去苏巴什古城。古城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曾经发现过一本无价古书。一八九〇年，英国中尉鲍尔在库车以两套毛驴车和可以买十头毛驴的价钱，从一个维吾尔挖宝者那里买下一本写着无人认识的古文字书。当鲍尔回到印度，把书展示给英国学者赫雷恩时，赫雷恩只看了一页就跳起来。那是一本用古印度梵语抄写的关于巫术和医术的书，年代至少在公元五世纪左右。不久，各国学者一直认为，它是世上最古老的书籍之一，被称为「鲍尔古本」。

我们没进古城，因为古书已经不在里面，而残存的建筑遗迹在铁丝网外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不需要花一人十元的门票。我们又爬到旁边山上看了一下，河对岸是苏巴什古城的东城。

沿山沟继续往里开车，进入维吾尔人的村庄。遇到一个小伙子，不知穆合塔尔跟他怎么说的，他邀请我们去他家，从他家后院的杏树上摘杏吃。库车白杏有名，的确很好吃。小伙子十八岁，初中毕业就不再念书了。他稍懂汉话，但是多问几句就听不懂了，只能靠穆合塔尔翻译。问他将来希望过什么生活，回答说没有明确目标，可能就是种地过日子吧。他母亲在家，告诉我们政府正在准备修建一个水库。等水库蓄水，原本每家四、五亩的耕地就会只剩一亩到一亩半，很多家的房子也会淹掉。现在只是听说水库建起后他们要搬迁，但究竟搬到哪里，怎么搬，没人知道。

这个村没汉人。不过乡书记是汉族。村长由村民选举，村书记由乡里派。权力是在书记手里，这大家都知道。人均年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不过她挺想得开地说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村里只有一两个小商店。还有就是每个星期五赶巴扎。从这里乘大货车去巴扎买菜，来回要花七元车钱。最大的花销是孩子结婚得花一万多，是家庭的大负担。我问她在生活中有什么愿望，她的回答朴素得令人难过——希望自己种的东西都能卖出去。

村子外面的农田里，人们正在收割打场。穆合塔尔和一个长胡子老汉攀谈。老汉已经八十五岁了，还在劳动。休息时大家围坐在一起

吃西瓜，用手抓着打出的粮食，谈论收成和粮食的品质。

非法宗教活动二十三种表现

乡村学校大门上方，挂着「反对非法宗教活动及民族分裂」的红色横幅，门前贴着通缉恐怖分子的布告。现在学生放暑假，但教师还在学校。看门人告诉我，即使是放假期间，教师也被要求每周四天集中到学校政治学习，主要是反分裂。前一段学的是关于热比娅问题的文件。现在教师的政治任务太多，政治学习比业务学习用的时间还多。

校园里面，墙上挂着一排宣传板，标题是「关于非法宗教活动的二十三种表现」。每种表现画成一幅图画，配有维文和汉文两种说明。二十三种表现归纳起来分别是：

一、强迫他人信教；二、强迫他人封斋；三、私办经文学校；四、按传统方式主持婚姻；五、纵容学生礼拜；六、以传统方式干预社会生活；七、在官方之外组织朝觐；八、按传统收宗教税等；九、擅自兴建宗教场所；十、没有官方证书主持宗教活动；十一、跨地区宗教活动；十二、印发宗教宣传品；十三、接受国外宗教捐赠；十四、到国外进行宗教活动；十五、随意发展教徒；十六、攻击爱国宗教人士；十七、国外的宗教渗透；十八、教派纷争；十九、传播邪教；二十、散布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二十一、集会示威游行等；二十二、建立反革命组织；二十三、其它妨碍秩序的活动。

真够巨细无遗啊。我拿相机拍摄宣传板时，学校办公室里出来两个维吾尔人，一男一女，看样子是学校负责人。穆合塔尔用维语跟他们说什么，大概解释我们来旅游之类。我抓紧拍完照片，便和两位负责人友好地告别了。

钉驴掌比艺术表演好看

回到库车去逛老城。老城是维族人居住区，还保持不少传统风貌。光是在一个铁匠炉看钉驴掌我就用了好长时间。这种手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阿克和穆合塔尔又开始争论。话题是到底北京给新疆的钱多，还是从新疆拿走的多。阿克的观点当然是前者，穆合塔尔坚持是后者。但二人都是估计。我觉得应该由中间立场的经济学家做一次定量计算，是应该能算出来的。

阿克对宁夏有特殊的自豪，说汉人在宁夏不敢歧视回族，而是反

过来的，比如他就经常当面叫汉人「卡非尔」，那是异教徒的意思，汉人却没脾气。穆合塔尔说如果在新疆这样叫，一定遭处罚。虽然这个词并无贬义，只是泛指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今夜是世界杯足球决赛，虽然中国到处火热，老城却丝毫看不到与此有关的迹象。晚上我和穆合塔尔住一个房间，原本说好共同看电视转播的决赛，等比赛开始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叫他，他都沉睡不醒。

穆合塔尔的婚事

七月十日。早起下雨。气温有点凉。和穆合塔尔谈话。这次我俩总共只有不到两天的见面时间，今天我就得上路。我跟他谈的主要是他的婚事。他父母当年替他着急时，他总是拿我当挡箭牌，说我那么大了还没结婚，他有什么可急。我说现在我已经结婚，他该怎么办？这回他没再开玩笑，坦白地告诉我他的难处。对维族人来说，男女可以密切交往是在二十岁左右，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不再能和年轻人玩到一块。而年龄稍大的维族女子基本不进入社交场合，也不和家庭以外的异性交往，他同样接触不到。现在唯一渠道就是靠亲戚朋友介绍。但是他这种坐过牢的身份，条件较好的女人一听就不同意见面；而那种没文化只求过日子的女人，又引不起他的兴趣。将来到底怎么办，他也没想好。要么是家里介绍哪个就要哪个，就当婚是给父母结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安心。要么就这样走下去，过一天算一天，不去想那么多。听他这样一番坦白，我倒说不出什么了。难道我能劝他为了父母，不加选择地结婚吗？而我又无法给他介绍一个能让他情投意合的女子，因为那只能是一个维族女子。我只好说要不让唯色介绍一个藏族姑娘给他，他做出高兴样子连声说好。我们便中断了这个话题。

离开旅馆，我去打听从库车翻天山到北疆独山子的路况。那条路被称为「独库公路」。结果一个本地司机告诉我，今年独库公路就没通过车，去伊犁的车都是走库尔勒到巴伦台，然后走巴音布鲁克。不过那条路也在修，不好走。好走的是从乌鲁木齐到伊宁，不过那个圈绕得就大了。为了求证这信息是否准确，我们又去客车站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于是只好绕路走了。

一九九三年我从伊宁到巴音布鲁克，走了独库公路北段到独山子。原想这次能走库车到巴音布鲁克一段，独库公路就算走全了。看来此愿难圆。不过也让我有一份轻松，因为独库公路是新疆最险的路，我对阿克的车一直不放心，如果在独库公路出问题，麻烦就大了。

穆合塔尔送我们上路。相互挥手告别，他的身影在雨中逐渐远去。他现在不能成家，工作不稳定，收入很低，生活也乱七八糟。我总觉得应该对他尽些责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这就是为了争取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出了库车不远，正行驶间，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盖掀起来，打

坏了前窗玻璃。好在玻璃只是裂了，没有碎。停车检查，原因是早晨阿克检查车时没关好发动机盖。阿克决定到轮台保险公司报案。

阿克报案时，我无事可干，站在街上数了一下路过眼前的汉人和维吾尔人。大概十分钟，眼前过去了五十四个汉人，二十七个维吾尔人，正好是二比一，可以大致反映这个县城的民族比例。

轮台没有我们这种车的玻璃，只能去乌鲁木齐修车。

在天山上抛锚

我们不走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没趣味，收的过路费也多。走老路到巴伦台，然后翻天山。巴伦台是个小镇，但居然能看到卖南方香蕉的小贩，价格比北京还便宜。市场的力量真是渗透到每个角落。

天山南麓是大晴天，阳光灿烂。爬到山口，高度四千二百八十米。一过山口就是浓重大雾，能见度很低，路有冰雪，车外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过往车辆都开着大灯，缓慢行驶。

发动机发出异响，停车检查，是水箱移位，水箱上的风扇罩卡住了发动机风扇。阿克拿出藏在车上的大刀，把风扇罩割掉一大块，临时解决了问题。虽然可以继续前进，但是水箱到底为何移位没搞明白。好在已经翻过天山，一路下坡，车大部分时间可以滑行。路上看见大雾中出现作为旅游点的哈萨克人蒙古包，有人招手，示意我们住宿吃饭。我们担心车还会出问题，要尽量赶路，靠近城镇才安全。

山上一直有雨雪，气温很低。等下到山底，天彻底黑了。开始出现村镇。在这种地方，即使车抛锚也无大碍，便停到一块农田旁。我睡车里，他们睡帐篷。

亚洲中心点的放羊妇

七月十一日。夜里狂风大作，好像还下了雨。早上已经是好大太阳。一个上身穿西服、头戴迷彩帽的放羊人端详我们。他老家在河南。父亲当年被国民党抓兵来这里，后来就留下当农民。他的村都是汉人，没有维族。问他觉得什么时候最好，说是毛主席那时最好，干部是为群众，现在的干部是为自己，把集体的搂进自己腰包。

汽车故障没有扩大，可以正常行驶。有个「亚洲地理中心」的标志在我们所经路上。拐进去看了一下。那里早年曾被测绘部门立过一个木牌，标定为亚洲中心。后来被一个民营公司承包下来，开发成旅游点。十元钱一张门票。进去要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一个金属架构下标定的亚洲中心点。进去一路处处显示经营者的捉襟见肘。两边雕像是用水泥做的，外表掉漆，斑斑驳驳。好多雕像空缺，只有底座。

介绍亚洲各国的图文也不全。几乎所有材料都是简陋廉价，透出当代典型的急功近利。至今虽已开业几年，亭子的水泥地还没抹平。

当地老乡说，这个观光点建成后一直不挣钱，多数人慕名来这，在大门外拍个纪念照就走，只有少数人愿意花钱买门票。挣不到钱，公司给当地百姓的承诺就无法兑现。当年给百姓盖的搬迁房质量不好，漏雨。前两天房上掉下的瓦砸破了一个老太太的头，百姓正在向公司要说法。

和一个放羊妇女聊天。她是从甘肃来的回族。刚来时这里条件不好，没有电，吃的是下雨积水，水里泡着羊粪蛋。那时把户口迁来很容易。现在条件好多了，通了电，水也引来了。村里现在有四十多户人家，其中回民十几户。没有维族。她十八年前来这就没有维族，而且周围方圆多少里都没有维族。我觉得有点奇怪，维吾尔人难道从未在这亚洲中心点立过足吗？

旅游点是一九九七年开始建设。政府出面，拆掉了原本分散的村民住房，让村民搬进统一盖的房子。村民不喜欢集中住在一起，巷子窄小，赶牛羊不方便。但是谁不搬，政府的人就把谁铐到树上，直到同意才放人。我问是乡政府来人干这事吗？妇女回答乡政府不敢，是市上来人干的。说话时，我们就站在那妇女当年房子的位置。妇女拿放羊鞭从树上打下一些杏给我吃。说杏树是她十八年前种的。这片地当时只有三家人，都是回族。她带着怀念神情说，那时多敞亮，出门就看见草原和山。自由的选择是人们最珍惜的，恰恰不能由政府给予。

妇女有五十多只羊。她说现在价格跌得厉害，一只羊只能卖二百多元。过去价钱好的时候一只羊可以卖到四百多元。现在养羊赔账，但是还得养，否则吃啥呢？这里的人也出去打工，她儿子就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卸货。她说那太苦了，一个月挣八百元钱，可是房费、水费、电费什么都要钱。城里连上厕所都要钱，是不是？一百块钱花出去，见不到啥。东西值钱，钱却不值钱了。现在日子难过得很，不像过去钱好挣，人也好做。

乌鲁木齐「市民广场」如何算计市民

到乌鲁木齐后，阿克去修车。他们夫妇就住在汽车修理厂附近的旅馆。我住到了 Z 家。

晚上和 Z 逛附近的南湖广场。市政府大楼在广场旁边，是一栋很大的新建筑。Z 说凡是最气派的建筑，不是政府就是法院，反正都属于官家。我们散步的广场，原来是市民可以随便进入的公园，多年前挂出一个「南湖广场施工指挥部」的牌子，但是不动工。直到开始动工建设市政府大楼时，广场也随之动工。虽然广场被叫做市民广场，却是算好了要挣市民的钱。第一年似乎完全供市民使用，没有任何商业色彩。大家都以为是政府做的好事。第二年便露出真面目，开始搞

市场。今年是第三年，整个广场已经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夜市。

这时才看出来，搞广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夜市。这里是乌鲁木齐的黄金地段，周围住宅区很多，可以吸引大批夜晚消闲的市民，因此是生意宝地。广场属于市政建设，名义上属于市民，土地属于国家。可市民和国家对广场而言都是虚的，控制权是在同时代表着市民和国家的市政府手上。市政府下面成立了一个广场管理公司，用经营市场的方法，把广场分割成块，租给各种摊位，收取租金，成为市政府的灰色收入。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典型作为。在市政建设旗号下，广场占用的土地无需出钱，建设也是财政拨款。然而口说为民，却是有政府背景的人搞自己的商业。等于是纳税人给他们拿本钱，利润却归他们所有，还不需要纳税。过去形容暴利是说一本万利，这里干脆成了无本万利。

广场上有游戏机、木马转盘、碰碰车、钓活金鱼、射击、钩玩具、可以驮小孩走的电动动物等，还有手工制作陶器、雕塑、给工艺品上颜色、自制 MTV、印个人肖像日历的摊位。每个摊位要交的租金都不少。摊主们怨声载道，抱怨辛辛苦苦做生意，等于是给占有广场的政府打工，钱都让政府拿走。政府除了收钱什么都不用干。

广场偏僻之处有个冷饮摊挂出原价转让的招牌。两年经营权是二万元，大约四平方米面积，不许换地方。这个冷饮摊因为偏僻，生意相对清淡，因此比较便宜。地点好的摊位租金更高。广场招商还在火爆进行中，看上去是希望把广场能利用的地方全部租出去，把每一块空间都利用充分，都能生钱。

广场和南湖连为一体。原来市民可以在南湖自由钓鱼或操纵舰艇模型，现在湖面被分成好几块，租给不同项目的经营者。有的钓鱼，有的划船；有碰碰船，还有那种人钻进去在水面滚动的密封球。当然都得花钱。过去一到晚上，很多人在岸边操纵舰艇模型，大家围在湖边看热闹，兴高采烈地评论，现在再不能自由使用水面。市民自己带录音机来这里放音乐跳舞，现在也得交钱。

政府嘴里说着为市民服务的动听话，实际上处心积虑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捞钱，处处算计百姓。过去市民消闲没有多少物质需要，是一种家庭活动、朋友见面和精神娱乐。现在广场搞成市场，把市民消闲变成消费。名义上进广场免费，实际让人花的钱比买门票还贵。政府等于是用纳税人的钱再挣纳税人的钱。

有意思的是广场上卖盗版书的摊位特别多，仅我经过的就有五个，一律十元一本。在别的地方卖盗版书，工商、城管都要查，而在这里卖，是市政府地盘，交了摊位费，就有保护伞。工商、城管都不来，可以堂而皇之地卖。这和上交保护费便可违法有何区别？这样的政府又如何能够真正保护知识版权呢？

广场有个大屏幕在放电影。Z 说开始还诧异，谁会花钱建这屏幕

给老百姓放免费电影？后来发现原来也是生意。大屏幕的经营者是有政府背景的金鹰广告公司。免费放的电影画面两侧始终同时播广告片。电影屏幕下端也随时变换广告条。而且电影几分钟一中断，插进广告。每种广告的收费标准不一样。这种放电影，目的是要把市民当作广告受众。Z 说从来就没看过这屏幕放过一条公益广告，放的电影除了好莱坞的打斗片，就是港台电影。总之只是为了吸引受众。

做贼不心虚的维族小偷

七月十二日。在国际大巴扎与阿克会合。我决定跟他分道。因为他在北疆要去的都是旅游点，我却要看日常社会，不去旅游点。他的车已修好，北疆人烟稠密，再无险路，没我陪也不会有问题。我们这样说定了，随后一起逛。国际大巴扎已成乌鲁木齐一个旅游景点。说着标准普通话的维族青年男女导游带着内地旅游团，一路介绍国际大巴扎。我听到一个维族男导游介绍说这里的清真寺是开放式的，因为真正的清真寺不许女人进，这里可以。不过当然要买票。我们在巴扎小吃城吃了点东西。里面没有几个摊位，看上去相当萧条。原来的一些摊位牌子还在，但已无人。继续经营的摊位也找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旁边座位有几个维族年轻女子，边喝啤酒边抽烟——也算是现代化现象吧。

从大巴扎到山西巷，路两边做小生意的维吾尔人熙熙攘攘。一个维族妇女有个两层推车，上层摆着出售的小百货，下层是她的孩子躺在里面睡觉。我举起相机照相时，觉得一边裤兜被人触动，我摸了一下，手机还在。过会儿摸另一边口袋，才发现录音机被偷走。杨萍说早看见有几个维族小伙子在我的身前身后晃。他们偷错了，因为录音机对他们毫无用处，市场上也卖不出去。他们想要的是手机。而我宁愿用手机跟他们换，因为录音机上有不少我随时录下的想法。

回到 Z 家，跟说他起这事。他说他经历过数次。偷东西的都是维族青年。几人一块下手，分工合作。最常用的方式是声东击西。有人明显地碰你一边，在你注意那边时，另外的人对你另一边口袋下手。Z 有一次发觉四个维族青年合伙偷他的手机。手机虽没被偷走，但那四个青年若无其事，全无所说的做贼心虚，而是有说有笑，直到汽车停站后漫步下车而去。Z 不敢说话，车上售票员也不敢声张。说到为什么维族青年三五成群偷东西，Z 认为和就业困难有关。年轻人如果没有正经工作和体面收入，做贼就成了一条谋生之路。

谈到贼，似乎中国不少城市都听到维族少年搭伙偷盗的事。这种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搞坏了内地汉人对维族人的印象。我见过几个对异族文化情有独锺的人，有人甚至热衷于长年在民族地区旅行，唯独对维族印象恶劣。追问原因，结果都是因为有过被维族「贼娃子」偷或抢的经历。

穆合塔尔那个当中学老师的朋友说过，现在双方都是把不好的送

给对方。维族去内地的是贼和毒贩子，汉族来新疆的是底层移民，结果互相留下的都是坏印象。

毛时代，中国内地去新疆的多是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底层移民是少数。而新疆当地民族能到中国内地的，大都是服饰漂亮、能歌善舞、可以被拍进电影的「花瓶」。那年代绝大多数汉人只能从电影里看到新疆少数民族，真是个个美若天仙哩。

国家必须让新疆接受补贴？

七月十三日。和 Z 聊天。他单位有一年轻女子，丈夫在国税局工作，几年前已经在国税局分了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小两口住。最近国税局又给了他们一套一百六十平方米的新房子。原来的住房仍然属于自己。新给的房子顶着集资建房的名义，但每人只是象征性地出点钱，连装修都是单位出钱。国税局人人如此，局长说第一套房是脱贫，第二套房是小康。由此看，将来保不准还有第三套住房呢。跟普通百姓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不同的单位，待遇非常不一样。国税局之所以有钱，在于横征暴敛。当局为了多得税收，规定只要征税超额完成，征税单位就可以在超额部分提成，所以各级税收部门的征税积极性特别高。而得到的超额提成如果都被长官享用，会被视为个人腐败，如果变成集体福利，则成为领导对群众的关心。领导个人从中多分多占也就不会有人反对和揭发。这形成单位全体成员共同分赃，导致单位的福利水平不断高涨，也使得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然而为了部门利益而强化的横征暴敛，对经济健康发展肯定不好，对社会和谐也肯定有害。经营者因为不堪重负普遍逃税，导致了今天中国在税收方面几乎人人犯法的局面。

Z 说他的一个同学在外省当银行高级主管，劝他离开新疆。因为国家内定不能让新疆经济水平提高太多。同学对此的解释是，人生活好起来就会想别的，生活困难则只会想柴米油盐。我觉得不会这样简单。如果真有这样的「内定」，一定还有另外的想法。比如说新疆一旦在经济上无需依附内地，自我产出超过政府补贴，就可能产生更强的独立意识。因此让新疆一直保持依附性经济，会让当地民族觉得离不开中国，从而消弱分离的动力。不过真是这样，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一样会使当地民族产生不满。

Z 认为目前而言，国家从新疆拿走的超过给新疆的。新疆人用的天然气和上海一个价，而上海天然气是从新疆送过去的，几千公里输气的成本都在其中。国家宣称自己是一切资源的主人，任意在新疆开发，新疆只能得很少的残羹剩饭，却要承担污染、生态破坏等诸多坏处。即使是新疆汉人，也认为不公平。

汉人自我感觉很良好

晚上去新疆大学附近的「米兰餐厅」和一个朋友吃饭。朋友同时约了一个新疆大学女教师 Y。Y 介绍「米兰餐厅」是乌鲁木齐最好的维吾尔餐厅，挺有格调。里面吃饭的也多数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长寿者多，我想一定和饮食有关系。这方面进行的研究似乎不多。我唯一听过的定量数字来自一个维吾尔官员。他统计他家一年吃了十三只羊、一头牛、两匹马，还有两千公斤水果。从这组数字看，应该是水果起到了最好的作用。

Y 出生在新疆。说小时候她家也是吃羊杀马。不过她的形象和风格改变了我的观念。以前我总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哪生长就会像哪里人，但长在新疆的 Y 却是地地道道汉人小女子的形象。清秀，乖巧。听她谈话，总觉得言不由衷，随时回避遮掩，而且是按自己的幻觉塑造新疆，尤其是民族关系。她刚给我描述了一番新疆汉族与维族关系多么融洽，我请她介绍几个维族朋友，她立刻又会说汉人几乎无法进入维族人圈子。她似乎感觉不到其中的矛盾。比较奇怪的是，问民族关系如何，新疆汉人回答多是融洽，而维吾尔人如果真实回答，一定是说不好甚至是很不好。当然这并不意味汉人是在故意撒谎，他们的确就这样认为。也许是优越感造成的错觉吧，看到维吾尔人收敛或逢迎的一面就以为是真的，无意再去看看背后的另一面。

现在是要死不要活

七月十四日。早上六点打车去机场。路上跟司机聊。他老家在浙江。父母是当年来新疆的知青。他赞扬维族，说他们坐车总是给钱，顶多该给十块的时候给八块，汉人则经常到了地方说没钱，一分不给。他还说维族人老实，警察吼一声腿就软，因此新疆并没有外面传的那么恐怖。不过我问开出租车的维族人有多少时，他说不多，因为只有维族人坐他们的车，汉人都不坐，而打车的大部分是汉人，维族司机因此生意不好。

到伊宁时地面下雨，气温只有摄氏十三度。伊宁在伊犁河边。离伊宁不远的惠远城曾是清朝中国经营新疆的中心，统辖新疆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扎这里，是当时新疆的第一大城。清代重量级的人物林则徐、邓廷桢、洪亮吉、祁韵士、徐松等，都曾发配来惠远，在这里写出过不少文字。

住进一个叫「热西亚酒店」的旅馆，房间宽大，比乌鲁木齐便宜。房间里有关于艾滋病的宣传页和自愿调查表，卫生间里放着有偿使用的安全套。这是我第一次在旅馆里看到这些。看来艾滋病已经波及到伊犁。

街上吃了早饭。在街对面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跟新疆有关的书。下雨不能外出，呆在旅馆看书。伊宁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从行

政区划上说，伊犁州比较特殊。中国其它自治州都是地区级，伊犁州是唯一的副省级，下辖两个地区（塔城、阿尔泰）、十个县市。一方面是这些地区都是哈萨克人的地盘，另一方面应该也和「三区革命」的沿革有关。

「三区革命」是指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的民族起义。起义从伊犁地区开始，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建立了军队，随后攻占塔城和阿尔泰地区，维持独立政权数年。其间前后有多种势力介入，错综复杂。最后是在苏联压力下，起义当局放弃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入中共夺取政权的进程，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语），被称为「三区革命」。

中午雨停，上街。跟一老汉问路时顺便搭讪。老人一般无事，愿意和人聊，知道的情况又多。老汉是山东莱州人，因为父亲当年做生意，一九五六年老家开展反资本家运动，他处境不好，便当"盲流"[①]跑到新疆。来后一直在监狱当工人——他特地强调不是被关进监狱，而是当监狱的工作人员。他说伊犁监狱有三千多犯人，百分之七十是少数民族。伊犁监狱只关十年以下刑期的犯人。十年以上的都会送到乌鲁木齐监狱。

听说我要去民族区，老汉警告我那里小偷特别多，三五成群盯着你，不偷到手决不罢休。我问是否会抢？他说现在不敢了，因为政府镇压得力。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要活不要死，现在是要死不要活，因此少数民族被吓怕了。我问是什么意思？他说过去政府一般不敢杀人，把闹事的抓起来关一段就放，结果出去的反而成了英雄，等于鼓励了闹事。后来改变政策，哪里闹事就团团围住，把各种武器调上去，不投降就开火，全部杀光，再用挖掘机就地挖大坑埋尸体，用压路机压平，让人找都找不到。有时一个村的人就这么干掉，人影都不剩。

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在美国，见到一位哈佛的维吾尔博士说过类似的话，那时我还不相信，现在听曾在监狱工作的人这样讲，倒有些相信了。

没有火车一样变

看着地图在伊宁做长途步行。先去了汉人街。「汉人街无汉人」是伊宁几大怪之一。那里是当地民族做生意的地方。沿着汉人街往东走，便是当地民族聚居区。各方面设施都比伊宁市区差很多。我往里走了很远一段。想到一九九七年的伊宁事件，那时不可想象一个汉人孤身进入民族区，现在却不需要顾虑安全问题，强硬路线一定会认为是镇压带来的成果。

青藏铁路刚刚通车，媒体上正在热闹。但伊宁的状况说明通不通

[①] "盲流"在中国是一个长期使用的概念，指盲目流动人口，但所谓的"盲目"只是从政府角度而言，凡是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流动人口，都被称为"盲流"。

火车并不起决定作用。喀什十年前就通了火车，伊宁现在仍未通。可伊宁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保护，甚至喀什还保留着一个老城，伊宁却连老房子都看不到了。两个城市隔着几百公里宽的天山。如果通火车是决定性的，二者差别一定很大。事实上却没有，城市形态完全一样。因此在飞机和公路已经打开边疆大门之后，通不通火车只有量的区别，却无质的不同。无论有无火车，西藏和新疆的殖民形态及世俗化进程都一样不可避免。

在拜图拉清真寺对面吃薄皮包子。新出锅的包子撒上黑胡椒面，咬一口满嘴羊肉鲜汁，美味极了。我吃完了又加，连加两次才罢休。两个州审计局的汉族职员也在吃包子。闲聊中说通往伊宁的铁路正在修建中。不过他们不认为通铁路对当地全是好事。比如过去伊宁的煤是一百元一吨，现在涨到了一百八十元，就是因为交通方便了，内地煤价高，本地的煤卖到内地更值钱，于是煤都被运走，当地的煤价也就涨起来。如果火车通了，更多的煤运走，本地的煤价将会更高。

围绕厕所的经济群

七月十五日。早晨到伊犁河边。对岸能看到天山。这个季节的河水不小。现在有桥，过河不成问题，徒步十分钟便到对岸。过去没桥的时候，旅行者们要用怎样的方式、费多少力气才能过河呢？伊犁河边有几座维族餐厅，可以看着河景吃饭，不过我来的时间太早，都没营业。有的工作人员还睡在用餐厅椅子拼成的床上。

我走一条小街从伊犁河回城区。小街居民大都是当地民族，住的是平房。个别有新盖的小楼，带点民族风格，但整体是现代的。有钱盖那种小楼的人不多，整条街只有几栋。

中午离开伊宁去精河县。全程不到三百公里，要走将近六小时。客车开得很慢，司机说因为警察罚款太凶。果子沟口有个客车管理点，所有客车都得在那停车办手续。停车时不少旅客要上厕所，于是唯一的厕所成为中心点。围绕厕所形成了一个经济群，各种小商店、小饭馆众星捧月地挤在厕所两边。厕所的建筑最高，写着「公共厕所」四个大红字。厕所里面设施简陋，但只要进去就得交五角钱。如果平均每辆客车二十人上厕所，收入十元，一天五十辆客车（应该是低估了，我们停的那点时间就有四辆车前后到来），一个月的收入就是一万五千元。管厕所的是个汉人，已经有了掌权者一般的态度和口气，不耐烦地对待进出旅客，兼卖手纸、卫生巾还有矿泉水。这个肥差看来没背景的人搞不到，而且还是垄断的，周围没有第二个厕所。从这个厕所，简直看得到中国的缩影。

果子沟被认为是新疆西部最美丽的山谷。伊宁到乌鲁木齐的公路正好从山谷穿过。据说这条路是成吉思汗的二太子察合台汗时修通的。我一九九三年走过果子沟，感觉如入仙境。这次却差了很多。不知是真发生了变化，还是记忆中的落差。很多山沟成了干枯的，而在

记忆中到处都是水。修路导致两侧山体剥离，显得残破。人也比过去多了许多。不少地方变成了卖票的旅游点。连一道小瀑布也被栅栏围上，要花三元钱才能靠近。

一路地名叫二台、三台、四台、五台，是按古代驻军烽火台形成的地名。赛里木湖被称作「三台海子」（当然只是汉人这样叫）。当年我曾开车环绕赛里木湖，夜宿湖边。那时湖边放牧着成群骆驼。现在绕湖路已经被拦上大门——收钱。只有靠公路的湖岸开放（因为无法封闭），然而又脏又乱，已无吸引人之处。

邻座是个四川人。一九九二年就来伊宁施工，已经在伊宁安家，全家户口也办来了。他说只要在伊宁买房就可以进全家户口，而且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在兵团包地种也可以转户口。看来从内地往新疆移民一直是受鼓励的。

说到施工，那四川人看不起当地民族，说他们只能盖个人住的小房子，大楼根本盖不成，脑子不够，技术也没有，只能是内地人做。我不怀疑当地民族的施工水平目前比不过汉人，但水平提高的关键在于有实践机会，如果因为汉人水平领先一步，就总是用汉人施工队而不用民族施工队，当地民族的水平永远也不会提高。要消除这种差距，就不能单纯用市场规则衡量取舍。如果当地民族可以自己做主，会宁愿用自己民族的低水平，也不用外来的高水平。真下了那样的决心，不需要多久，当地民族的施工队就可以盖起大楼了。

甘肃老汉变成新疆人的历史

精河县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到精河县城天还早，我上街转。问坐在街边的一个汉族老人哪里有古迹？他说在精河住了四十多年，从没见过古迹。问他哪里有老房子？他反问是政府的老房子还是「社员」的老房子？政府的房子都是新的，社员的老房子哪里都有。他还是按照公社时期的称呼，把农民称为「社员」。

他是甘肃平凉人，一九五六年就开始到处闯荡，打工糊口。青海、宁夏、内蒙都去过。一九六一年大饥荒，他在流浪途中碰到一个甘肃人。那人从老家带了一些女人到新疆。那时新疆女人少，甘肃人挨饿，于是有很多甘肃女人愿意嫁到新疆，条件是娶她们的人要养她们的父母兄弟。他跟着那甘肃人一块来了新疆。走到乌鲁木齐饿得不行，把身上毛衣卖了七元钱，只能买两盘拉条子和那甘肃人吃一顿，盘查他的警察还说他投机倒把。

新疆农村那时是大队核算[①]，好处都叫干部得了。老百姓挣不到钱，因此都不干活。这边地广人稀，粮食不缺，收下来堆在场院没人

[①] 毛时期的人民公社之下是生产大队，大队之下是生产小队。大队核算是在全大队范围进行平均分配。按当时观点，核算范围越大越靠近共产主义。但平均分配难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后改为小队核算。邓小平时代搞的土地承包到户，相当于进一步退回到家庭核算。

打。他是农活好把式，外来人又好指使，于是生产队给他饭吃，让他干活。后来到公安局登个记，说清楚是从哪来的，也就留下了。

大队核算实行不下去，改成了小队核算，马上改观。第一年每个劳动日就可以分到两元多钱，第二年又涨到五元多。那时社员不用队长叫，都会抢着下地干活。

他是在这儿娶的老婆。二婚的老婆带着个孩子嫁给他。当时要娶丫头（指未婚处女）的话，得养丫头一家人，他那时能力不够。老汉今年七十六岁，身体不错，只是老伴瘫了，在床上需要他天天伺候，今天是在县里工作的孩子回家探望，他才有机会出来转转。

我问老汉村里有没有维族人，他说很少，大部分是汉族。所以村里汉人基本不会维语。如果村里有一半维族人，肯定得学维语。现在是维族人学汉话。不过维族人和汉族很少来往。

他说跑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这里好。缺点只是维族人动不动爱闹事，他们头脑简单，如果对他们强硬镇压，就会老实一段。他认为只有王震、王恩茂能管住新疆。但他认为维吾尔人心好，见到落难的人总是会帮助，而汉人大多却会躲着走。

乌苏城里的椰子树

七月十六日。十点多上客车。司机是维吾尔人，一路揽客，很多人上车后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车上播放香港电影的录像。我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没有一个维吾尔人看。为什么在维族地区，维族司机开的车不放跟维族有关的电影呢？

乌苏市属于塔城地区。我之所以选在乌苏下车，是因为这个地名有异族味道。但是看到的乌苏却无话可说，实在太无特色。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住宅小区，草坪上竟立着多株假椰子树。这的少数民族从装束到气质都跟汉人差不多。

在一个抓饭店吃抓饭时，为了肠胃消毒，问服务员有没有蒜。女服务员是民族人，说他们不吃蒜，因此饭店没蒜。但她们之间聊天是用西北话，还不时骂出「日你妈」，不是少数民族说汉话的腔调，而是地道的西北汉话。

回到旅馆，问开房间门的服务员是哪里人，她回答是奎屯人。我以为她是汉人，问她老家在哪。她说老家就在奎屯，她是「民族人」——哈萨克族。我夸她汉语说得好，她说她会哈语、维语、蒙语和汉语，都说得好。我对她肃然起敬。

维吾尔精英的视野

七月十七日。太阳很热。客车上的邻座小伙刚从职业高中毕业，去石河子看女朋友。他说他的同学只有三个找到工作，多数可能最终只能失业。目前很多年轻人都闲着，因为是独生子女，家里养着，一时也养得起，至少眼前没问题。

他的职业高中有维族同学，平时不来往，只是有时在一块踢球。他说维族人踢球特别野。汉族学生和维族学生之间时常打架。规模大的，双方各出动上百人。他称赞维族人团结，只要是维族，不认识的都会帮着打，而汉族经常连认识人之间都不帮。

经过独山子。回忆起一九九三年那个夜半时分，我驾车在漆黑一片的独库公路翻上天山最后一道山口，猛然看见山下独山子和奎屯两座城市的大片灯火，感觉特别辉煌。

公路一直与天山平行，一路雪峰绵延起伏。现在再看这样的美景，已经没有毛泽东诗词那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心境，而是体会维吾尔民族精英眼见河山被占、资源被掠、本民族日益边缘化时的心境，尤其是那种只能眼睁睁目睹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新疆汉人会认为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给新疆建设了好的道路，新的建筑，先进的通讯。但是在维吾尔人眼中，在新建筑中活动的是汉人和为汉人工作的维人，公路上跑的车里乘坐的多是汉人，手机、计算机等也多为汉人所用，因此这些被汉人夸耀的建设是为汉人自己所做，而不是为维吾尔人所做。

为马仲英自豪的回族人

玛纳斯县离石河子只有十五公里，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是蒙语巡逻者的意思。新疆很多地名出自蒙语，包括乌鲁木齐，看得出历史上蒙古人在这片土地的影响。

玛纳斯民政宾馆开在县民政局三楼。二楼是收费的健身房。看来民政局已经把大部分办公建筑用来谋利了。这种用财政拨款盖的楼，出租收入却归自己的现象相当普遍。旅馆房间简陋，什么都没有，好在比较安静。窗外是树，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闪动。

玛纳斯街上绝大多数是汉人，见不到几个少数民族。进回族清真寺参观。大经堂是二〇〇三年才盖起。看门人说原来的老寺有七十八年历史。闲聊中，看门人熟知当年的西北回族军阀马仲英和马步芳，而且颇以他们为自豪。他叫马仲英「尕司令」，那是当年回族人的叫法。回族清真寺旁是维族的清真寺，有上百年历史，正在维修。看门人说维修比重盖还费钱，但是现在政府不让拆旧盖新了，要求保留旧的，倒算是一个进步。

新疆每个县城都在搞小区化。拆掉旧房建新楼，实行物业管理。小区化使县城失去特色，但可以空出大片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增加产值、税收和经济活动，同时也为县官政绩加分。因此各县政府必定有极大积极性。至于文化特点和独特生活环境的丧失，急于现得利的官员是不管的。

呼图壁一次成功的合谋

七月十八日。路过呼图壁县。特地下车在县城转了几个小时。呼图壁的地名令人遐想，却发现又是一次上当。几乎看不到任何与民族和历史有关的痕迹。我转遍市区主要街道，一共只见到一家卖馕的和一家卖抓饭的，还有一个在居民区叫卖牛奶的汉子是维族人。北疆城市看来已经完全是汉人天下，少数民族被彻底排挤出去了。

上了去乌鲁木齐的客车。车主是一对汉人夫妻。呼图壁客车站限制严格，出站有好几道验查，不允许超载。但是车一开出客车站大门，就开始一路招揽在路边等车的旅客，根本不管超载多少。一出县城，要进高速公路入口之前，两口子拼命安排所有站着的人蹲下，把自己缩到最小。高速公路入口处有个负责检查客车是否超载的交通警。他的检查方法是在下面看每辆客车的窗，如果车内过道有人影，就指令停车检查，对超载车主进行罚款，还要让超载乘客下车。车主两口子让没座位的人下蹲低头，目的正是不让下面的警察看见过道有人，再加上女车主用旅客行李放在窗口遮挡，站在客车正面的警察虽然伸头往车里看，却没有看见车里至少超载十几人，于是客车顺利通过，开上高速公路撒欢似的跑起来。

这个过程给我的感觉相当奇特，在客车和警察相交而过时，我和警察之间的距离顶多不到两米，而我的座位前后都蹲伏着超额乘客——法律就这样被轻易地蒙骗了。过关之后，全车人看上去都挺高兴，似乎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合谋。女车主也不再是过关前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变得态度和蔼，谈笑风生，说昨天车从乌鲁木齐回来时只有四个乘客，似乎是解释她必须超载的理由。

路过昌吉市，那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首府。我没下车，从车窗往外看，满目皆是政府官员追求的暴发户式形象。中国政府官员在这方面有最大的本事，会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无趣味。今天时代的特色是到处一个模样。整个中国好像只有一个头脑，在任何角落都看得到那个头脑的意志、方法和语言，连毛病都一样。当今的全球化也有同样特点，区别只在一个是权力主导，一个是资本主导，一个是强迫方式，一个是诱导方式。今日中国这双重方式都在起作用。在权力没去占领或放弃的空间，就是资本诱导下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维吾尔人隔在栏杆外面看

到乌鲁木齐后，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傍晚又去了二道桥一带。没什么特殊目的，只是这次北疆行一路很少看到维吾尔人，感觉似乎不是在新疆，让我希望在离开新疆前再体验一下维吾尔人的氛围，

乌鲁木齐高楼不断增加。过去维族人抱怨高楼都盖在汉人区，维族区见不到改观，现在不能这样说了。这几年维族区的新楼和公寓楼也盖起一大片，原来的小巷纷纷拆迁，只剩不多的遗迹。新盖的公寓外形带有维吾尔特色。更高的大厦则是银行和机关使用。维族区占据乌鲁木齐的黄金地段。新的房地产开发都在打这个地段主意。在帮助维族人改善居住条件的名义下，把原本的平房建筑拆掉，居民集中到公寓楼中，空出的地皮可以增值很多。

路上有持枪警察和武警列队巡逻。警察是维族，武警是汉族。维族警察把枪夸张地拿在前面，枪口朝下，做出随时可以举起射击的样子。这在其它城市还没有见过。汉族武警不拿枪，只拿电警棍。形象上的恶人让维族警察做，也算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式吧。

我在观察警察的时候，突然见他们迅速围住几个维吾尔青年，遵循一套训练过的程序，把几个青年逼在墙边。汉族武警也按程序围成半圆，面向街面防备来自其它方向的攻击。维族警察在半圆内盘问被围的青年。一股恐惧气氛顿时在空气中弥漫。来往维吾尔人不敢驻留围观，都是边走边回头。也许警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制造恐怖气氛，形成威慑。几个青年经过一番盘问后被放了，脸上带着仓惶神色匆忙离开。

国际大巴扎的中心广场被开辟成吃自助餐看歌舞表演的地方，用铁栅栏围起。栅栏内摆满餐桌。进去每人要交二百一十八元。里面已经坐了几百人，边进餐边等待表演开始。仔细看一下，除了少数外国游客和个别维族导游，基本都是汉人。汉人仍在陆续进场。栅栏外面却是当地少数民族百姓。他们扒在栅栏上往里看，也在等着看歌舞表演。栅栏外的效果当然差，却不用花钱。这种场面让人感觉有些怪诞。本地人看本民族的歌舞，只能站在这种位置，以这样的方式。少数民族女郎穿着代表新疆各民族的盛装，列队在入口处欢迎有钱买票的汉人入场，笑脸迎对。留给本民族同胞的只有背影，虽然婀娜却无表情。

我和栅栏外的维吾尔人站在一起。一个女人把男孩尽量举高，让男孩能看见里面。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维吾尔语音阶，我突然产生一种幻觉，似乎穆合塔尔就在身边，和我比肩而立。我在想象中回头看他，并且想象着，在这副当代新疆的典型图景中，他会有什么感受？又会说些什么呢？……

穆合塔尔如是说

——访谈实录

民族仇恨比任何时期都高

不满现状的三种人

王力雄：在你来看，「新疆问题」是什么？

穆合塔尔：「新疆问题」的核心是民族问题。

王力雄：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样的民族问题？根源在哪里？是维吾尔人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吗？

穆合塔尔：维吾尔人眼中的民族问题可以从三种角度看，一个是民族主义角度，要求国家独立；第二个是宗教人士的角度，他们不接受异教或者不信教的人统治；第三个才是你说的受到不公平对待，社会地位低下，这部分人本身的民族意识或宗教意识不强，但是出于对现状不满，他们会跟着前两种人。

王力雄：能把这三种人分别说一下吗？

穆合塔尔：民族主义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了解本民族历史，从民族的历史来源和历史发展看，赞成民族独立，要求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第二种是宗教人士，因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政府对宗教实行打压，同时中国本土信仰佛教和道教，跟伊斯兰教合不来，互相不认同，因此宗教人士希望有自己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宗教；第三种人一般只关注自己安定太平，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别的方面要求不多，这些人一般不太从宗教意识考虑问题。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主要来自失业和政治地位低下，由此引发出种族问题上的不满。

王力雄：在这三种人之外，有没有对现状满意、跟汉人相处得好、愿意留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呢？

穆合塔尔：在我见过的人里面，满意现状的人不多。现在希望留在中国的人，我估计比例总共就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

能不能对比例最大的人群搞「统战」

王力雄：这样算，你说的三种人应该占到维吾尔人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那么这三种人各自又占多大比例呢？

穆合塔尔：民族主义意识的大概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宗教意识的占百

分之五十以上。因为我们维族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村人口，他们的意识以宗教为主。城市中普通市民也是这样。

王力雄：这些有宗教意识的人，他们的意识能不能改变？

穆合塔尔：他们的意识可以改变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我们的宗教就可以受到保护。是吧？就算中国那种无神论国家，对本民族佛教道教混合的文化还是会进行保护和研究，说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那和人民生活、风俗习惯联系密切，否认了就等于把自己的民族特征都否认了。所以只要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本民族的宗教和意识就可以得到保障。宗教意识的人因此会变成民族主义者。不过这种宗教意识的人大多数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

王力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层次的人主要是在农村，没有很多和其它宗教接触的机会，并没有站到所谓文明冲突的前沿。他们接触的汉人多数不信教，不会从宗教角度威胁他们，因此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宗教人，并不是站在宗教的角度，为了保护宗教而反对汉人……

穆合塔尔：你说的意思是只有面对不同宗教，才会从宗教角度出发？可是你没有看到吗？根本没有宗教的人更可怕！他本身没有宗教意识，却把宗教意识看成是不文明的或者是落后、没有受教育的表现，经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会侵犯对方的宗教意识。这样会使信教的人更容易气愤。反而有宗教意识的人，对和自己不一样的宗教也比较尊重，因为他至少知道宗教是必要的。

王力雄：那是不是可以这样修正一下——你说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宗教人，对目前民族问题的不满或要求改变的，主要不是对汉族传统的佛教、道教不满，而是对于无神论的不满，因为道教和佛教他们并不了解……

穆合塔尔：是的，我们这里的伊斯兰教没遇到过佛教、道教的排外或冲突，所以他们没有对道教和佛教反对或不满的意识，主要还是对无神论。

王力雄：现在是一方面中国政府奉行无神论，另一方面汉人大多数也接受无神论。而只要是真正的宗教，即使宗教不同，根本上的东西也有很多是一致的。

穆合塔尔：嗯，应该这么认为。比如说，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也是阿拉一派的书，只是改变了很多，没有按照原本的执行。最完整的是古兰经。伊斯兰教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和穆罕默德一样，是上帝的差使。犹太教也和伊斯兰教有联系。佛教从根本

上没有和伊斯兰教一样的地方，但是新疆、阿富汗这些地方保持那么多的佛教文物，最起码在一百五十年前还都在保护那些东西。改信伊斯兰教以后，佛教城市没有毁灭，只是放弃了，所以古城的佛教文化艺术遗产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王力雄：其实佛教相对来讲比较温和，攻击性比较小，从历史上来看，出于佛教的战争不多，因为佛教反对杀生和暴力。冲突最多的还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他们是同根，但同根有更多的地方不兼容。历史上的基督教似乎侵略性更强一点，伊斯兰教过去表现得比基督教宽容……

穆合塔尔：宽容得多！奥斯曼帝国统治欧洲的时候允许基督教存在，只是信教不同喝的水不一样。但是基督教教徒到了哪儿都是不停地宣教，宣教对基督教教徒来说是一个使命。伊斯兰教虽然也这么看，可是要求并不那么高。

王力雄：我把话题扯到这，是想搞清楚你说的占百分之五十有宗教意识的人，是不是其中只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是真正出于宗教目的，要通过独立建国保护和壮大自己的宗教，是从这个角度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而更广大的民众，实际是和你说的第三部分人更接近，也就是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占一部分，他们主要是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受到各种限制和民族歧视，才产生不满。如果能使他们受到好的、公平的待遇，信教真正自由，民族歧视也不存在，他们就能够和汉人共处。是不是这样？

穆合塔尔：你的意思是说，汉人可以对那百分之五十的人搞「统战」，是吗？（笑）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大部分老百姓，任何年代、任何国家，主要是出于对现状不满，如果现状对他们的利益没有损害，他们一般能保持中立。

维吾尔人没有可能与汉人共同发展

王力雄：我的意思跟你这个结论一样。那么百分之五十有宗教意识的人是不是可以再区分一下？其中只有一部分宗教界的骨干，对异教和文明冲突很敏感，因此坚决排斥中国。对大多数人，只要你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良好的民族关系、宗教自由和好的生活，就能够保持中立。你觉得这种人可以占到多大比例？

穆合塔尔：我估计有百分之七十。因为现在我们民族的宗教意识相对比较弱。共产党掌权到现在，宗教发展很慢。文革时期广泛宣传无神论，宗教人士、宗教意识受到打击。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是宗教宣传活动、宗教意识最活跃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越来越多。

我们维族人虽然都把自己当成穆斯林，但你也看到现在大部分人喝酒，这按伊斯兰教义是不允许的，可以说不能称为穆斯林。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一代人没受过的严格的宗教教育。我们的民族意识也受到很大削弱。

改革开放以后，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间，大部分维吾尔知识分子都认为我们要在科技领域和知识领域发展，要耐心地学习和研究，如果我们在各方面都能有成就的话，我们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就会和汉人一样，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年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本地人生活的提高远远跟不上汉人，差距不断扩大，产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大批汉人移民来新疆，占用了当地人的土地，使本地农民的土地数量减少。这些问题出现后，我们的民族意识重新形成。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那些知识分子认识到维吾尔人和汉人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这个目标永远也达不到，改革开放的速度越快，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差距越明显地扩大，我们根本得不到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也不给我们创造这种环境。

王力雄：跟一九九六年的「七号文件」有没有关系呢？

穆合塔尔：「七号文件」让汉族领导干部抓到了一个王牌，原来不敢说的那以后敢说敢做了，在会议上做报告就可以大胆地提倡大汉族主义，动不动说我们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会议上，报纸上，还有国家领导人，都开始提黄帝炎帝的子孙。

王力雄：现在每年还到陕西黄帝陵拜陵呢。

穆合塔尔：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哦，这个国家已经慢慢地转变为民族主义国家，这个党也代表民族主义的方向。原来人们还看不太出来，这些活动一开始，人们就明白了，更会担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一个无神论的党，放弃自己原本的原则，正在用民族意识凝聚汉人，保住他们掌握的权力。那我们也必须用自己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把自己人民凝聚起来。

王力雄：就是说，当政府开始用汉族的民族意识作为凝聚因素，自然也会刺激别的民族用本民族意识保护自己，宗教人士则用民族意识保护自己的宗教。这有连带关系。

穆合塔尔：对。正是因为这一点，宗教人士会站到民族主义一边。

领导造反的教师

王力雄：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讲，历史上是否有独立的理由并不是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于现实。我们来看一下你说的第三种人，他们是因为现实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民族歧视等，产生了离心倾向。

你能不能把这方面情况详细说一下，这批人是怎么想的？

穆合塔尔：他们想的就是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

王力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即使是你说的前两种人——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意识者，也都在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中受到了不公正或歧视，才导致他们提出独立的要求。

穆合塔尔：宗教人士中的大部分，民族主义中的一半人，是这样的，出于不满现实。改变现实的出路是什么？他们要么选了民族主义，要么选了宗教主义。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他能得到的待遇和生活空间跟汉族人一模一样的话，他们也会变成中间派，要么就变成我们说的第三种现实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的，只要日子过得好就行了。

可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本地民族在国家公务员里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十。在教育行业，现在的开始实行双种语言。从小学开始，维语课程以外任何课程都用汉语教。学校现在实行竞聘上岗，结果肯定是本地民族的老师会被淘汰。民族老师即使知识多，可是他不一定讲得比汉族老师好，毕竟不是用他的母语上课。一大批维族老师都是民考民，岁数大了，给他五年、十年时间，也不会用汉语讲课。他们肯定会下岗，被淘汰。一旦淘汰，他们会把这看成是种族问题，是想把我们同化了。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损害的时候，他们会煽动别人，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有很多学生。比如说哪个乡的一二十个老师对社会不满，他们底下一大批学生，那些学生已经把他看成是师父，很崇拜他，听他的话。那时学生也会改变自己的思想，变成民族主义者，这种局面不到十年就会出现。

王力雄：这些教师除了念书，别的都不会……

穆合塔尔：不会，找不到别的工作。这样的人不少，估计有三十到四十万之间。

王力雄：他们再影响学生，学生会回去影响自己的家长，面儿挺大的。

民族教育到了灭亡地步

穆合塔尔：民族教育现在可以说已经到了灭亡地步了。实行双语教学，竞聘上岗，明确的意思就是对民族教师说，你们回家去吧。

王力雄：双语教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穆合塔尔：一九九七年左右吧，那时是试验阶段。

王力雄：什么时候正式实行？

穆合塔尔：二〇〇四年还是二〇〇三年。重点学校去年已经不招民考民了。老师被分批送到内地培训用汉语上课。但是半年一年的培训，能教汉语课吗？口音能标准吗？根本不可能！学生就会提意见，因为他们年龄小，没有什么民族意识，他们会说民族老师讲的不行，口音不好。有的学生从小学汉语，口语比那些老师好得多。他们会说，啊，我们听不懂，我们去汉族学校上学吧。学生一有意见，学校就会说，那就竞聘嘛，让学生来选择。看着很合理，可是民族老师就被淘汰了。现在大学也开始不能用维语，要用汉语上课了。

王力雄：过去大学用维语讲课吗？

穆合塔尔：民族学生全部用维语上课，不讲汉语。现在大学已经开始不能讲维语。目前是试验，过上两三年一落实，大学老师也得下岗。听说以后当老师要签合同，一年两年签一次合同，不是定死的国家公务员，不行就下岗。有些东西刚提出来的时候挺合理，说一句话挺合理，再说一句话也合理，三句四句之后才看得出来，哦，原来他要搞的是这个。（王笑）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说啥呢？他们希望中国早一点把全部维族都下岗，都没有饭吃。现在失业还不够，步伐太慢了，政府应该搞得再快一些。等到百分之百的人都失业了，享受国家待遇的人全都失去待遇，对民族主义更好！现在有些人工作还可以，待遇也可以，就说「挺好的，闹啥呢？」因为他切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所以政府应该把这个过程加快点，不要慢慢地拖。让全民族尽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尽快地看到将来，都认识到，哦，我们已经不行了，没有出路了，到时候才能团结。

我听到一个新疆大学的教授这么说过：如果全部维族上街游行，一句话不说，新疆问题也不用提，我们在国际上的位置可以提高一步。如果百分之五十的维族人上街不说话，也不喊，静坐三天，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可以提高两步。

王力雄：不用三天，百分之五十的维族人能出去坐一个小时，那就不得了。

穆合塔尔：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能不能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这些东西？发展是放在后面的，因为生存不了哪来的发展呢？你发展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

王力雄：发展不是一切。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不全是这样。发展什么？就是一个经济吗？就是一个钱吗？人的文明是一个全面系统，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苏联失败的教训中国没吸取

穆合塔尔：现在当局认为自己聪明，可是他们没看到会出现哪些问题。他们正在学苏联。苏联以前搞的活动他们现在搞着呢。苏联在中亚地区强迫学俄语的手段，历史已经证明失败了，中国还要搞，失败的教训没有吸取。前苏联的中亚国家虽然是穆斯林，可是他们那时连猪肉都吃，还辩解说信仰不能看吃的是什么。前苏联来的很多人对我讲：「我们当时猪肉都吃，毫无疑问地吃」。你看，现在他们的信仰还是没有灭。一旦他们有了自己的空间，就重新开始保护自己的宗教，政府出钱培养宗教人才，到沙特、埃及的学院培训，到土耳其培训，送大批的人朝拜。所以苏联那种手段是不会成功的，最终还是失败的。现在失业和下岗的问题，对每个个人来说会觉得是可怕的，但是从全民族的角度来，可能有更好的作用。

王力雄：失业下岗的问题，除了你刚才说的教师以外，其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穆合塔尔：其它方面，国家行政部门现在不收维族人，除非家里有当官的，有后门，或者特别有钱，四万五万的给，否则一般进不了。法院、检察院规定必须要维族的，要的人数有限，可是交通局呀、粮食局呀、林业局呀、银行、邮电局、航空公司、铁路，好多地方，他们不要维族人。

王力雄：理由呢？一般都是说维族人汉语不好吗？

穆合塔尔：他们有的干脆很明确地说，我们不收维族人。不用说各单位，就是政府招聘的时候，出现一个副处级干部考试竞聘上岗，出的文件会明确写，旅游局要提升一个副处长或者副局长，后面加上「汉族」，外办一个副主任，明确写着要汉族或维族，这是种族问题呀。哪怕你是民考汉，在汉人堆里长大，一句维语不会说，可是你身份证是维族，也会告诉你，我们招的是汉族！这种专门要哪个民族的情况只有中国有，任何国家没有吧？可是他们还有理由，说：哎，农牧局的副局长，专门管农村的种地工作或下乡工作，需要维语，所以我们要维族。可是现在这个职位是管业务的，没有汉语水平看不懂文件，怎么可以？他们可能给你讲很多理由，他们自以为很有理。这边的人有一句话：汉族人把「讲道理」这句话用得太多了，「道理」这个概念翻译过来就是「我说得对」，所以汉族人一说「讲道理」，人们就烦了：他妈的，又开始了！说来说去就是为自己辩护。他嘴上说讲道理，可是讲的却不是道理。

哪种维吾尔人愿意当中国人

王力雄：那么一些什么样的维吾尔人对现状满意呢？是融入了中国上层的精英和官员吗？

穆合塔尔：对，当官的，一些生意方面有发展的人，还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是不喜欢受到任何宗教和民族意识约束的人，他们可能认

为目前这样好。

王力雄：不受任何宗教和民族意识约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维族人。

穆合塔尔：这样的人认为人不应该受到任何约束，他们认为这样过比较舒服或者是快乐，一旦有约束，就会觉得很不自由。

王力雄：嗯，是完全自我的人。这种人是这些年出现的还是以前就有？是越来越多了呢，还是一直差不多？

穆合塔尔：一直有，历史以来就有这种人。现在比以前多了一些吧，稍微多了一些。

王力雄：但是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这样，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呢？

穆合塔尔：不会！人数增加的可能性有，但不会成为社会的趋势。

王力雄：举例说，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有工作职业吗？信不信教？

穆合塔尔：这样的人大部分有工作职业，是城市人。表面上说是信教，但是他们本身不想信教，也不信任何东西。他们认为人生价值是活一天就应该快乐一天，人不可能活到一千岁，今天高兴就好。他们大部分人就是这样认为。

王力雄：哦，所谓的及时行乐嘛。这种人主要是年轻人，还是各年龄层都有这样的人？属于哪种文化层次？

穆合塔尔：年轻人里稍微多一点。相对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来说，有些人的文化可以说比较高。

王力雄：跟「民考民」、「民考汉」有没有关系？

穆合塔尔：没有直接联系。

赛福鼎与列宁像

穆合塔尔：不过只要是维吾尔人，不管对中共多忠心，做了多少事情，即使是像赛福鼎[1]那样的人，也是不受信任的。赛福鼎的办公桌上有

[1] 赛福鼎·艾则孜（一九一五—二〇〇三），维吾尔人。一九三五年赴苏联留学。一九四五年，担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疆自治区主席等职。文革期

列宁的铜像。可能这种现象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吧？说明他的思想是「左」的。可是他在自己的房子谈话也不放心，要说一些心里话就会说，我们还是去花园聊天吧。他的花园里养了一只是凤凰吗？那个很多颜色露出来的？

王力雄：孔雀吧。

穆合塔尔：对，孔雀，他花园里有孔雀。那个孔雀拉屎的时候，经常跑到隔壁李鹏的院子里去拉，拉完就回来。李鹏很生气，可那是动物，咋办？（笑）

王力雄：赛福鼎后来是不是有转变？……

穆合塔尔：他应该有后悔。他写作，写伊斯兰教怎样进入新疆。当时喀喇汗王朝一个皇帝的儿子，是头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他继承皇位以后，把国教改成了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取消佛教，让全部国民改信伊斯兰教。赛福鼎把那个人的历史写出来，书名是《布格拉汗》。他还写了关于三区革命方面的书。还做十二木卡姆的研究。维吾尔突厥语文化研究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他要改变自己的形象，对民族文化能做到的都尽量做了，可是还是没改变形象，很多人很同情他，可以理解他，可是不能接受他。

王力雄：不能原谅他？

穆合塔尔：嗯。

王力雄：他桌上放列宁像，我觉得是有一种想法。共产党内的民族人士都比较尊重列宁，因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有很多论述特别符合共产党的民族人士，包括列宁当年说要把沙皇占领的土地还给中国，要让民族独立等，说了很多这类话。他们认为列宁的政策是被斯大林改变成了民族镇压——其实列宁活到后来也会一样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不是也说允许独立，后来一样镇压。我估计赛福鼎放列宁像的意思，是表达对现在民族政策的一种不满，是希望实行列宁所说的民族独立、民族自主，而不是出于「左」的思想。他有可能还是说他会信仰马列主义，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的一生呀……

穆合塔尔：嗯，他如果否定马列主义，他一生就否定了。他写自己一生的书，两册出来了，第二册刚好写到三区革命爆发那时。第三册是三区革命和和平解放那一段的事情，但是没出来。

他写维吾尔的历史，是像汉人从黄帝炎帝写起那样，他也从头开始写。他说过，很多维族人写的历史书，受政府限制或者材料短缺、知识的因素，写得都不全。而他有条件，分头安排不同秘书（他有七个秘书）

间任新疆自治区中共第一书记。一九七八年后调离新疆，任无实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不同的内容，可以很快写出来。他不看电视，天天看书。

王力雄：七个秘书中有没有维族？

穆合塔尔：没有一个。

王力雄：都是汉族？那他用维文写作还是用汉文写？

穆合塔尔：维文。不要说秘书，连他的司机，也维文说得一流。

王力雄：是为了监视他吧？

穆合塔尔：肯定的。因为他是三区革命和新疆和平解放的一个见证人，最保密的问题只有他知道，因为和毛泽东单独谈的人就是他，和苏联第一次单独谈的就是他，他是单独一个人去的嘛，虽然带了别人，都是陪他去的。

能拿走的都拿走

王力雄：不过从数字上看，新疆经济这些年还是发展很快的。

穆合塔尔：但主要是掠夺资源。中国现在对新疆的石油天然气使劲开采，能拉走的拉走，控制不了的就烧掉。其实现在用不成的，可以以后再开。他们盲目地开采，好像是现在拿不到就来不及了，赶快拿走。你看库尔勒到库车一路中间，不停地看到那种烧天然气的火。那是可以使用的，为什么烧？因为把它用起来的设备还没有齐全，也没有资金，于是把天然气烧掉，然后把石油拿走。烧掉的天然气也是财富啊！俄罗斯的外交武器都用天然气，今年冬天你也看到了很多报导，他们靠天然气出口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搞外交。很多国家没有这种东西，这里却烧掉，不是浪费资源嘛！这种行为看上去就是急急忙忙来不及的样子，赶快拿走，好像再过五年十年就拿不走了，给人就是这种感觉。

前不久王乐泉和中国石化公司的总裁来了。中国石化公司表示要在新疆找到更多的石油资源，可你现有的天然气还没控制住，也用不上，你少丢点嘛，慢慢开采也可以吧？现在可以进口嘛。海外的石油产量也是有限的吧？再过十几二十年或三十年，也有用完的时候是吧？你那个时候开采新疆的石油也来得及呀。你现在使用不了，控制不了，一个井被白白烧掉的天然气，可以满足新疆的一个县居民的需求。地下的天然气是有限的，你这样白白烧它就烧完了，以后需要天然气你去哪儿找？一看他们的心理就是，哪怕这边以后都变成沙漠，什么都不管，反正能拿走的就都拿走吧。

当年的盛世才、金树仁、杨增新不都是这样吗？内地来新疆的官，目

的就是挣钱，弄财富，别的事不管。现在跟那时候一样。当官的最后全都要回内地，一退休就往内地跑。处级以上的干部没有一个留在新疆，全都往内地走。

国家拨款在新疆修路、搞建筑或者什么工程，地方官员根本不用本地的建筑公司。他们是从内地请建筑公司过来。那些公司把干活的人一块儿带过来，所以国家拨的款都被内地包工头和民工拿走了。资金在新疆没有循环，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他们在这里一般不消费，那些民工每天就是吃一大碗面或两三个白菜，那么大碗的米饭，只要一点咸菜啪啪啪的就吃掉了，把钱全寄回了内地。当地有没有可以干工程的公司呢？以前有，现在都下岗了，破产了，因为工程不给他们。为什么不给呢？因为官员要是从他们那里吃回扣，容易暴露，出事以后也容易找到那些建筑公司。把工程给内地公司，就不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政府投资到新疆搞西部开发这些话，全都是废话，当地人没得到任何利益。像搞高速公路一样，本来有三、四年以前新修好的路，现在再搞一条高速公路，占用和损坏了很多耕地。修这个高速公路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南疆、发展经济吗？有没有国防的想法，加快速度运送物资？目的是什么？一条高速公路最起码几百万亩可以种的土地损坏了。外国那么窄的路那么多车都可以走，他妈的中国那么大的路那么少的车，路还不够用？哪个国家的路比中国宽？美国的路可能宽，他是一个新兴国家，可是欧洲那些国家以前的路那么窄。这里一个县城的路，可能欧洲很多大城市都没有那么宽的路，有那个必要吗？修了那个路以后，那个地就用不上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就用不上了。

胡萝卜加大棒成功吗

王力雄：现在当局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已经定型，也被他认为比较成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经济上尽量发展，让人们一门心思去追逐利益，他也给一定好处，投资、拨款呀等等；另一方面是在政治方面实行打压，而且态度坚决，所谓露头就打，决不手软。这样一种政策在新疆主要应该是从七号文件以后比较明确。这么多年他认为是很成功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你前面讲的那些政治方面的反抗，或者是恐怖活动都被镇压下去。这些年如果还有的话——我基本没听到——也已经越来越少，社会变得稳定了。因此当局认为把这样一种方式持续执行若干年，反抗的人慢慢老掉或者是丧失了奋斗意志和能力，新一代人在这种环境成长，都是一门心思追逐利益，新疆问题是不是就会被化解掉？

穆合塔尔：他们说经济发达，经济情况越来越好，可是差异也越来越大了。新疆经济的发展不是没有，可是人们感受到不同民族的差异扩大。你说七号文件以后，新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一个重要原因是反抗的人现在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方法。

二〇〇〇年以后的国际形势，周边国家的态度各方面有一定的变化。尤其是一九九七年以后中亚国家和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后，以前在新疆内部反抗的人能得到中亚那边人的帮助，现在那边的路已经断了。更重要的是九一一以后，国际形势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是不利的。很多人看得出来，在这种环境中搞反抗活动，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可和同情。新疆的穆斯林也属于伊斯兰社会，国际上很容易会认为是恐怖性质的，得不到同情。

当局要把人心转移到经济上，效果的确有一些，我们一部分人也认识到了，看得出这种做法的目的。可是汉族人和当地民族的经济发展步伐不一样，差距越来越大，产生了另一种不满。现在成长的这一代人是失业的一代。毕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失业。这代人在经济社会长大，没有接触政治的因素，可是他们就业方面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看到了种族主义的倾向，很明显地看到了。不同民族的就业机会不一样，各个单位现在不要民族人。比如说新疆现在这么多企业，大部分是内地来人办的，他们根本不找本地人，他们从内地或者是新疆汉族人里面找员工。所以新一代人可能宗教意识不高，但他们不会不考虑政治或者是民族问题，他们会变成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这样带来的好处，可以使以后的新疆内部矛盾缩小。

王力雄：你说的内部矛盾是指的普通人和宗教人的矛盾吗？内部矛盾会减少是什么意思？

穆合塔尔：宗教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肯定会出现一些矛盾，关于建国问题在立场上、看法上、道路上会有不同。但是如果到了在种族不平等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人，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都会变成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不过，现在农村推行的那个义务教育，其实是让娃娃形式上上九年学就可以了，学不学到东西，及格不及格都不管，不停地上，九门课全都不及格也是跳班。你看这个乡那个县，说是义务教育工作抓得好，年年奖励。其实不跳班不行，如果有学生跳不了班，或者义务教育的任务没完成的，学校老师到年底就不合格，两年不合格就下岗！这样他们每年都得合格。九年以后任务就完了。那时候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学生仍然还是文盲。这种娃娃不会遇到失业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农民娃娃就是农民。这样的娃娃受到的教育不高，回家种地，他们还是容易受到宗教人士的吸引。

现在安静是反抗者在等待

王力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反抗活动越来越少，你认为是在寻找新的道路呢，还是现在没有道路？

穆合塔尔：不是没道路。

王力雄：在等时机吗？

穆合塔尔：时机，主要是时机。不用说国内的环境，九一一后的国际环境对伊斯兰世界是很不利的。伊斯兰宗教不是文盲，它也考虑周围很多因素。经济发展是分散人心的因素，的确，可是也能培养出来很多民族主义者，比如前面说的那种享乐的人，吃喝好了就好，不关心政治，那种人也在慢慢地向民族主义转。

王力雄：你的意思是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绪还在增长，社会不满还在继续增加吗？

穆合塔尔：对。

王力雄：但是我有一种亲身感受，比如十来年前，我在新疆如果独身一人到维族聚居区，多少会有害怕……

穆合塔尔：这是你的看法问题，你来的时候别人跟你说过：哎呀，维族人都带刀子，怎么样一捅就杀掉人。胡说！可是七八年、八〇年来的汉族人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呀。

王力雄：对，早期来没有，我在八〇年、八一年来新疆的时候，完全没有担心，随便哪儿都可以去。可是到了九〇年以后吧，九〇年到九七、九八年之间，感觉非常紧张。

穆合塔尔：那是新疆问题最多的时候，九六、九七年。

王力雄：是呀。现在这种恐惧的感觉好像没有了，没有太多担心。很多汉人原来是想退休就赶快离开新疆，现在也觉得安定了，决定就在新疆养老了。你觉得安定是一种表面现象呢？还是原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恐惧？

穆合塔尔：本来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恐惧，普通老百姓之间本来互相没有不信任的感觉。可是，我跟你说吧，一九九〇年巴仁乡[①]那个事出现以后，政府大力宣传民族之间不信任的舆论，然后出现这样的局面。那时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其实还是很温和的，都是人嘛。现在不一样了，别看现在好像很稳的样子，可是一旦出事，出现暴力的暴乱局面可能性很大。现在没有出现，主要的是各方面情况很不利。

王力雄：你认为如果出现暴力局面，比过去还要严重吗？

穆合塔尔：因为以前稍微有点事的都被抓了，可是那些人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出狱了。他们失业。政府对他们不停地监控。比如我，

[①]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境内。一九九〇年四月，当地维吾尔人武装起事，后被镇压。

已经出狱六年了，每个月还监控一次——去哪了？见面什么人？有什么事？你说他烦不烦？社会对他不信任，他就更不信社会了。一旦出现什么事情，他们马上参与。

那些人思想改了吗？坐牢十年五年，他们在监狱里没受过任何思想教育，更加受到压迫的感觉。监狱是种族现象很严重的地方。国家已经取消了政治犯，是吧？法律上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可是监狱里面明确称呼政治犯。对政治犯的态度、管理、待遇，和其它犯人都不一样。强奸的、偷东西的、抢劫的，那些犯人比政治犯好得多，自由。他们一看，我们比那些强奸犯都不如！他们的仇恨就更厉害一些。出来以后社会对他的不信任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他出狱一看，他妈的，我反正就是这么个人了，这个社会我没有价值，我的价值还在我的以前的路上，所以一旦出现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参与。

王力雄：这些人都是属于骨干。但是普遍的社会情绪跟他们是一致的吗？

穆合塔尔：对！社会上很多人比较同情他们，信任他们。现在这种政策延续下去时间越长，这种民族不信任、民族仇恨就会更加严重。

民族仇恨比任何时期都高

王力雄：你觉得现在的民族仇恨比起……？

穆合塔尔：比任何时期都高。一年比一年高！

王力雄：比九六、九七年还高？

穆合塔尔：还高。因为九七年那个时候很多国家职工、国家干部是保持中立的，他们说不应该搞爆炸，把政治搞好生活好了就可以了嘛！就这一两个人炸得了什么吗？现在呢，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不公平，看到他们的后一代前途很黑暗。一想如果政府这么做下去，我们的生存环境这么压缩，我们的娃娃怎么办？他们慢慢地思考这些问题了。八十年代，汉族人和民族人过年时候互相拜访是很普遍的行为，到了九十年代，只有公务员、国家干部有互相拜访的，平民百姓没有。到了现在，只剩领导之间有，普通工作人员之间都没有互相拜访的行为了。

王力雄：我记得你说小时候机关宿舍院子里的汉族孩子和维族孩子还一块玩？现在跟你过去一块儿玩的汉族人见面，互相打不打招呼？

穆合塔尔：只有两个汉族人跟我打招呼。

王力雄：其它那些不打招呼的你们过去也都认识？

穆合塔尔：小时候在一块玩的。

王力雄：现在互相不理了？

穆合塔尔：不理。我们出生长大是在一个院子里，你也看了，那么小的一个院子里，在一起三十年了吧。

现在维族和汉族小娃娃不在一块玩。山羊绵羊分开的那个样子。有个古话说，一群山羊里面，放进去两三个绵羊，绵羊全都在一边，其它山羊在另一边；一群绵羊里放几只山羊，还是山羊在东边，绵羊在西边，现在就是这种局面。

王力雄：现在这种看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不能说没有镇压的效果吧？

穆合塔尔：效果不是没有。效果是出的事情少了，但不是不会再出事。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国内环境、国际环境都不利，牺牲不值得，所以暂时不做什么。要等国际环境气候变，内外合作、联合行动才有效果。他们已经看得出来，哪个国家的民族独立，伊拉克也好，车臣也好，波黑、塞尔维亚，都得内外联合才可以。现在的国际社会，单独干的没有，那付出太大了。

现在中国的内部环境也比较稳，可是他们保证不了这种局面能延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国内环境一定会有变化，

维吾尔人心里的历史

新疆独立的历史根据

王力雄：你说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主要是民族主义者，要求成为独立国家。能不能讲讲他们要求独立的理由？维族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状态？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希望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

穆合塔尔：因为新疆历史以来就是突厥族的土地。维吾尔人是匈奴的后代。匈奴是很多部落的团体，突厥是其中的部落。中国历史说张骞到了新疆以后，新疆就属于中国了。可是张骞那时候带了七、八十个人过来，在这被当成间谍扣了十年，后来带上一两个人跑回家了，新疆怎么就因此属于中国了呢？（王笑）张骞第二次来带了一百多人，那些人没有武器，他们知道自己是到别人的家乡，只能以生意人的名义或者是外交使节的名义来。这种历史可以说明的只是那时新疆跟内地有了经济上、政治上的来往，而说新疆在那个年代就属于中国了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现在的外蒙范围成立了突厥王国。突厥王国占领的土地是很广的。后来突厥王国分成两个——东突厥王国和西突厥王国。唐朝的时候，内地爆发了内战，唐朝的国王跑到洛阳那边去了。那个时候的安禄山是突厥人，唐朝邀请西突厥国协助帮忙，因此那时唐朝和突厥存在隶属关系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唐僧出来的时候，唐朝限制本国人不能出国界——也就是不能出长城以外。唐僧是偷偷摸摸跑出来的，不是现在写的唐朝皇帝给他送行什么的……真实的历史是他是跑出来的，到了哈密以后，他的白马是哈密一个农民给他的。唐朝时我们这里都是小国，都信佛教，每个人都希望能去印度，因此人们同情唐僧。

王力雄：这是哪儿记载的？

穆合塔尔：我们的历史学家吐尔贡·阿勒玛斯。他是乌鲁木齐人。新疆在一九九一年批判的三本书，都是他在八十年代写的。[①]

王力雄：突厥人那时都信佛教？

穆合塔尔：对，信佛教。唐朝的时候，新疆这片土地和唐朝没有任何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唐朝任何年代势力范围没有超出长城以外。其它年代，中国人也没有管过这里。比如说，元朝的时候新疆属于蒙古，这是没有异议的。成吉思汗是外蒙的人，可以说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是外蒙，他建国的地方也是外蒙，现在外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独立国家，怎么能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呢？另一点，元朝不是成吉思汗成立的国家，是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可是忽必烈成立元朝的时候，成吉思汗把新疆封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察合台[②]。察合台与忽必烈之间没有服从的关系，因为到了成吉思汗死的时候，中央政府已经不存在，下面成了各自的国家了。他们没有互相侵略，因为他们都是兄弟。所以元朝对新疆的管理也是不存在的。即使说有存在，那也不是汉族人的管辖，而是由蒙古管辖。成吉思汗到新疆以前，新疆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佛教为主的高昌国，一个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公元九百三十年传入伊斯兰教。

元朝以后是明朝。明朝时，新疆北部是蒙古人的管理范围，而南疆有个莎车王国。随后一二百年全疆范围内宗教冲突不断，刚好那个时候是乾隆年代，准格尔服从了清朝。可以说新疆到了清朝的时候，属于清朝的管理范围，那是历史，我们也认可。中间各种各样的起义，短时间四、五年五、六年的独立也出现过。一八六〇年代，阿古柏成立

[①] 一九八六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十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一九九〇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展对三本书的批判，将其定性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斗争」，「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

[②] 察合台应为成吉思汗次子。

了自己的国家。一八七三年嘛[1]，左宗棠到新疆来，新疆那时又开始属于清朝。可清朝也不是汉人的国家，是满人侵略中国后进行统治。满人不是历史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王力雄：所以现在官方说法才要强调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说法就是要把这些历史事实都容纳在里面。

穆合塔尔：可这是很近的历史，才二三百年，人人都知道，忘不了。清朝皇帝最起码不能娶汉人当老婆，只能娶满人和蒙古人，正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至于中国占领新疆，是从清朝瓦解以后才开始的。新疆的军阀那时表面上是要服从中央政府的。一九三二年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国[2]，四个月后苏联和盛世才连手，把它消灭了。一九四五年在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3]。一九四九年苏联和中国协商，共产党的军队开进来。

这就是历史，人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而不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历史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即使有属于中国的时候，那也不是汉人的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有一二百年变成别国的附属国是常有的。比如朝鲜也当过中国的附属国，可那时中国不是汉人王朝，是清朝。元朝的时候也管过菲律宾，菲律宾国王的头是被一个维族将军割下来交给忽必烈的。可现在也没说菲律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朝鲜也不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把东欧的东南部管了五百年，今天不能说那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呀。整个阿拉伯世界也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五百年，不能说阿拉伯世界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或者是土耳其的一部分。而中国到现在仅仅管了新疆一百年嘛，怎么就能说属于了中国？所以我们的知识分子从来认为我们历史以来就是独立国家。

三区领导人是怎么死的

王力雄：从你的角度，或者是从维族人的眼光，怎么看待的共产党统治新疆后的现代历史？这段历史基本是被流亡维吾尔人否定的，但是从一些老人嘴里，也经常听到有肯定的方面，包括对早期来新疆的汉人，汉族和维族之间的关系，那时也认为比较好。那么，为什么在总体上被否定的大历史当中，会形成这样一种关系？
穆合塔尔：对于所说的那个「解放」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当时中国政府邀请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到中央讨论建国问题，可是这个中间操纵的还是前苏联。当时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应该可以从新疆直接飞到北京，肯定可以去的。因为宋美龄一九四二年到新疆的时候，是从重庆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到乌鲁木齐。可是为什么三区革命的领

[1] 左宗棠军队进入新疆的时间是一八七六年。
[2]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喀什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被回族军阀马仲英摧毁。
[3] 即今天中国历史所称的「三区革命」。

导人要先到阿拉木图，然后从前苏联到内蒙方向到北京？这是很不合理的。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当时并不赞同加入中国，因此他们去北京以前，首先是跟苏联协商，跟斯大林协商。如果他们一致同意和中国是统一国家来谈判建国问题的话，没必要从苏联绕一圈到北京。

他们去了以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号，飞机空难，人都死了。在这个问题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怀疑。当时当过阿合买提江秘书的人，一九九二年在哈萨克斯坦写了一篇文章，在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维语报纸《新生》上发表，说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到了莫斯科后，斯大林告诉他们，必须接受中共，要把三区革命的立场放弃。他们当时表示反对。

三区革命刚爆发时，农民起义开第一枪的是一个叫艾尼的人，维吾尔族，他当时是一个团长，文化不高，只能打仗。有人建议他也参加去北京的建国谈判，因为三区革命是从他那爆发的，头一枪是他开的。他说，如果我去的话，我不会上飞机，骑驴去可以，但是不去苏联那边，不会上他们的飞机。

王力雄：他是怀疑苏联的飞机吗？

穆合塔尔：他怀疑。

王力雄：农民的智慧。

穆合塔尔：因为他想：哎，我们为什么先到苏联呢？当时去了五个人，全都死了。

王力雄：那五个人都是最主要的领导人吗？

穆合塔尔：主要谈判人是阿合买提江[①]。阿合买提江是亲苏联派。一个是阿巴索夫[②]，他和赛福鼎是亲戚关系，他是中共派。他娶了两次汉族老婆，也是中共党员。一个是伊斯哈克伯克[③]，他是军队的最高领袖，其它两个人我忘了[④]。

王力雄：他们比赛福鼎的位置都高？

穆合塔尔：都高。赛福鼎当时只是一个厅级干部吧。三区革命不用部长，是日本的那种厅。一九九二年阿合买提江的秘书写的文章回忆说，

[①]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维吾尔族，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伊宁，曾在苏联学习，先后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委员、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等。

[②]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一九二一年生，祖籍阿图什。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委员兼内务厅长、宣传部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

[③]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一九〇二年出生于乌恰县。一九二八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市学习。盛世才时期曾任旅长。「三区革命」时任民族军中将总指挥。

[④] 另外二人，一是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一九〇六年生，民族军少将副总指挥。另一位是罗志，汉族，曾为东北军，后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成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副书记，当选民主革命党中央委员兼迪化区委书记。

他在苏联解体以后找到了一些绝密材料，是出钱买来的，那上写的，三区革命去莫斯科的人不接受斯大林的意见，因此把他们放在麻袋里打死了，在莫斯科就已经死了，空难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假像。后来在一九九八年还是二〇〇〇年，有人在阿拉木图杀掉了这个秘书。

阿合买提江他们死了以后，中共邀请赛福鼎到北京。因为赛福鼎和阿巴索夫这两个人一直是中共派。三区革命里面有三个派，一个是亲苏共，一个是亲中共的，亲苏共的是主要的，亲中共的就是阿巴索夫，可是他的威望并不大。

为什么再不纪念三区革命

王力雄：你说有三派，还有一派是……？

穆合塔尔：还有一派是中立派、民族派，就是谁都不靠。苏联和中国都不联系。中层干部，下层的人全部这么想。

王力雄：这一派在上层有没有位置？

穆合塔尔：有。张治忠和三区革命谈判的时候，这一派是很主要的。当时三区革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麦斯武德的弟弟。

王力雄：麦斯武德是亲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吗？

穆合塔尔：不是，麦斯武德和国民政府关系好。他的弟弟热合木江•沙比尔在和国民政府谈判时是主要的谈判人，一九四七年签署和平协议头一个签名就是他，后面是阿合买提江，再后面是阿不都海依尔•吐烈，现在宣传的主要谈判代表是阿合买提江，可是公布的文件上头一个签字的人还是热合木江。那次谈判没成功，因为他们主张独立，张治忠说不行。

张治忠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我看过，上面讲喀什和平协定签了以后，他在一个演讲中说：你们现在独立，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一旦要独立，可能苏联会吃掉你们，迟早会吃掉你们，那样的话我们中国边界受苏联的威胁更大，边界更接近内地，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第二点，你们现在独立的话，印度也有影响，因为两国边界有矛盾，你们也抵抗不了印度的侵略，所以你们要暂时保留在中国国内，我们给你们自治，高度自治。我们该给你们的待遇都给，你们把独立的问题将来再说。张治忠一九四七年初在喀什的演讲中这么说过。

后来和平协议出现了矛盾。雅尔塔会议把外蒙独立和新疆问题做了交易，苏联插手解决三区革命的问题。就这样，一九四六年年底斯大林邀请三区革命的领袖艾力汗•吐烈会谈，把他带到阿拉木图软禁起来。

阿合买提江那时是个宣传科的工作人员，一下就成了三区革命的领袖了，这是苏联发出的指示。在赛福鼎写他自己一生的两本书上，第二册的后面加了这么一句话：「斯大林在三区革命爆发以前，派阿合买提江等十一个人到新疆做地下工作。」那肯定就是这个阿合买提江。阿合买提江在苏联时反对盛世才独裁政权，给斯大林写过信。当时盛世才是苏共的党员，因此斯大林认为阿合买提江反对共产党，把他逮捕坐监狱了。后来说现在考验你们的机会来了，把阿合买提江这些人送到新疆来，为苏联做地下工作。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安装玻璃的人，艾力汗被软禁以后，一夜间，一个子弹都没打过的阿合买提江就成了三区革命的领袖。

王力雄：三区革命是不是杀了很多汉人？

穆合塔尔：士兵里面有些人做过这种行为，农民起义形成的一个军队，刚成立时，也许这种错误会出现，可是那不是三区革命的政策。当时还把乱杀汉族人的赦布德（音）枪毙了。说三区革命杀汉人是现在的政府为了破坏三区革命的形象。本来毛泽东说过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可是现在不纪念三区革命了。为什么？

王力雄：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纪念的？

穆合塔尔：我长大到现在就没听说纪念过。

新疆「和平解放」

穆合塔尔：当阿合买提江看到革命前途有希望了，思想改变了，开始跟斯大林合不来，因此他也被暗杀了。一九四九年他去苏联和斯大林协商，立场是我们应该独立，并且提起斯大林曾经答应帮助新疆独立，可是后来苏联给的枪和子弹全要付钱，一支步枪三只羊，一只冲锋枪两头牛。他质问你们当时怎么说的？我们失去那么多人的性命，为了什么？跟你们玩游戏？于是他也被暗杀了。

等赛福鼎去北京，他和苏联政府还有中共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我们不知道，到现在还没透露出来。赛福鼎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了吧。当时国民党的新疆军区司令陶峙岳表示坚决不投降，因为有十万军队在他手上。他说要把新疆跟中国隔离起来。可是包尔汉给中共写了一个和平统一的电报，欢迎中共管理。陶峙岳一看，政府主席比我先表态，我不表态怎么能行呢？这个历史很清楚，包尔汉写了和平解放新疆的电报的第二天，陶峙岳就写了。如果包尔汉不写，陶峙岳根本不会写。因为他对国民政府特别忠诚，特别崇拜蒋介石，他是没有办法。[1]

[1] 能够查找的资料与穆合塔尔所说相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国民政府军队由陶峙岳率领发布起义通电，第二天新疆省政府以包尔汉为首通电欢迎解放军进入新疆。

包尔汉这个人不是维族，他是个鞑靼，不是新疆出生的。现在的俄罗斯境内有一个鞑靼斯坦。那的喀山有一个小阿克苏，是一个镇。包尔汉出生的地方就在那。小时候包尔汉的爷爷给他讲过，我们的老家在那个很远的阿克苏。他在一九四八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家乡」，就是写那个阿克苏镇，并且说他是维族。包尔汉这个人跟苏联有很密切的关系。就这样，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大部分死了，赛福鼎接受了中共的立场，包尔汉也接受了，陶峙岳也接受了，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了。

王力雄：三区革命到底是以维族为主还是以哈族为主？

穆合塔尔：刚开始是维族为主，后来是哈族维族一块儿，回族也包括在内。专门有一个回族营，是独立营。

三区将领被清洗

穆合塔尔：当时我们的老人说，王震带兵进来以后，在乌鲁木齐大十字[①]演讲：「历史以来，从清朝到现在，满人和汉人对新疆人很对不起。我们到新疆来的目的不是侵略，是在新疆搞社会主义，我们会回去的。」那时的宣传，贴的标语也写着我们会回去，新疆我们会还给你们，我们来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完以后，我们会退兵回去。他们这样宣传。到了一九五一年，三区革命的那些团长以上的都在，他们一看，开始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哎，要回去的人怎么搞兵团呢？他们是要长期定居下来吧？有五十一个人，都是团长以上的三区革命的将领，秘密开了一个会，觉得局势不是原来他们说的那样，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研究应该怎么做？这事后来被透露了，把这五十一个人全部逮捕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以开会的方式，或是叫几个人到某个地方去考察，分头逮捕。

王力雄：那时候民族军已经编到解放军里面了吗?

穆合塔尔：衣服没换，可是统一管理了，变成新疆军区五军团。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宣传社会主义什么的，土地改革，把富人的土地分给穷人。很多人，像那些没地的农民会觉得这个党对人人都平等，老百姓就接受了。你把富人的土地抢过来给我们，好的，这个政府好。一般老百姓主要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嘛，很容易就接受了。所以，宣传方面共产党把人的心已经拿过来了。把那些将领抓了以后，说他们是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勾结，要推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很多老百姓就说，共产党给了我们土地，怎么能够反对呢？他们肯定不是好人。还有一些将领当时跑到苏联去了。

[①] 大十字是乌鲁木齐市内的一个地名。

王力雄：苏联收他们了？

穆合塔尔：收留他们了，因为有一部分将领是苏联培养的，中共不敢轻易把他们逮捕枪毙。当时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很深。从乌鲁木齐建筑你看得到，老房子全都是苏联式的。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将领到苏联去了。

王力雄：是自己跑过去的呢？还是这边同意他们出去了？

穆合塔尔：有同意出去的，自己跑出去的也有。快要逮捕时，发现了，跑出去的也有。一九五二年成立了一个东土解放联盟，主要的活动是在新疆的高干[①]里，后来暴露了。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赛福鼎。赛福鼎当时当了新疆的主席、新疆军区司令员，最大的官嘛。中共对他很欣赏。他对中共的效劳确实不错。三区革命和全新疆的命运让赛福鼎出卖了，到现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这么认为，还骂他。

娃娃不听话就说王震来了

穆合塔尔：到了一九五五年，新疆成立自治区，那个时候赛福鼎做了一件好事。中央的意思就叫新疆自治区，可赛福鼎说必须加上维吾尔三个字，在这方面他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中央考虑后同意了。在自治区成立的过程中，三区革命的一些将领和一些知识分子有很不满的。中共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是以被东土分子利用的理由抓的。王震以搞社会主义、反对迷信的理由抓了一大批宗教人士。听说王震以各种手段在新疆杀害了六万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所以，到八十年代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娃娃不听话，只要一说王震来了娃娃就不哭了。「王震来了」成了口头语，像鬼来了一样，娃娃不知道王震是什么，可是从大人的脸色可以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东西。他的重要手段就是把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全部处理掉，判到监狱里面，让这个民族没有代言人。

到了八十年代，新疆写文章写书的，还有新疆大学的教授，全是当年被关进监狱，一九七八、七九年出监狱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反右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一九七八年活着出来的可能还没有三分之一。因为他们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最少的二十年，长的有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不是在监狱死去，就是出来以后没活多长时间就死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反对修正主义，把到苏联学习的，或是参加三区革命的全部逮捕了，因为他们跟苏联有关系，他们跟苏联有通信。三区革命有很多俄罗斯人。他们是顾问，斯大林派的。而且这边的哈

[①] 高级干部的简称。

萨克族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有很多亲戚关系，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互相有来往。关系一不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以后，把这些人全部逮捕了。一大帮知识分子也被抓，因为当时新疆有一半以上的知识分子到苏联去学习，在那儿念过书。就说他们学习的时候已经是克格勃的人，以这样的名义，把他们逮捕起来。可以说除了中共进来以后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以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逮捕了。反右、反对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宗教人士也被逮捕，不让他们搞宗教活动。

古代文献和文学书统统烧掉

穆合塔尔：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们烧掉新疆的教科书。因为从共产党进新疆到一九六二年为止，我们用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出的教科书。

王力雄：乌兹别克斯坦也用维文？

穆合塔尔：我们之间互相理解不了的话，可能一百个单词里面出现一个，或者都没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民族习惯，包括我们的表情都一模一样，说话也都一样。所以他们的教材可以拿来用。一九〇八年的鞑靼斯坦（就是包尔汉的老家）的数学书，我也可以拿来念，我能理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词，那是鞑靼语。一九六二年改成维文新文字以后，老的教材书、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全部烧掉了。

王力雄：不是文革干的吗？

穆合塔尔：从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了，要反对修正主义，脱离修正主义的影响。文革是达到了高峰。他们把古兰经都烧掉了。那时候有些年轻的维吾尔人也参与了，自愿参与的也有，他们全心全意信任毛泽东。年轻人有一半或者百分之四十的人心理上崇拜毛泽东，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真心乐意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古兰经都烧掉了。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任何人不能躲开，任何人都不能讲宗教方面的话，也不能看那些书，那些书一被发现就会被烧掉。还有古代留下来的一些文学、数学或历史方面的书，那些年轻人不管，也看不懂，他们是新文字培养起来的人，把老的东西全都烧掉，说那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财产，不要这些东西。现在新疆很多古代文献和文学缺的原因就在这，统统烧掉了。

一九五七年新疆自治区成立前，王震的路线特别左，所以中央把他调走了。文革的时候新疆组成了两个派，一个是保护王恩茂[1]的派，一

[1] 王恩茂（一九一三—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国共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二军政委。中共建政后，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个是保护伊敏诺夫[1]的，伊敏诺夫是三区革命的中将，一九五五年的将军，是毛泽东给封的。他是南疆军区司令。他的主要基地在文革就是新疆大学，保护他的是知识分子，保护王恩茂的是农民和工人阶级。

为保王恩茂而受伤的维吾尔人

王力雄：那时维吾尔人中也有保护王恩茂的？

穆合塔尔：有。我家有个熟人文革就是保王恩茂的，还在武斗中被枪打伤了。他现在是坚决反对中共的人，嘴巴说得流水都不管，叭叭叭叭没完，说话声音特别大，一公里以外都能听见。我说你现在说那么多干什么？当年你为了保护王恩茂挡住了我们的子弹，这种局面是你造成的嘛！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当时王恩茂派的实力比伊敏诺夫强，因为拥护他的是工人和农民，是兵团。汉人大部分拥护他。新疆文革主要就是分这两个派。维吾尔知识分子保护伊敏诺夫，汉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农民工支持王恩茂。王恩茂在兵团里面的威望比较高，因为他是王震一手培养的人。兵团对王震是很怀念的。王震在的时候，他们随便把哪个阿訇，把哪个人打死，王震不说，反而赞赏，可是王震走了以后，他们就做不了了。

新疆文革的时候，民族情绪也有。可是新疆文革跟内地比好一些，批斗也不严，比内地轻。新疆参与文革的只有兵团的人多。本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和工人，还有一半的工作人员保持中立，没有参与文革。

可是年轻一代的人还是特别崇拜毛泽东，他们还步行到北京。有些人从家里走了大概一百公里左右，地方的人员把他们拉了回来。告诉他们太远了，去不了，在这好好干，把批斗工作做好，等你们有了文革的代表身份，就可以到北京。那些人就更积极了。想见毛泽东就要把文革抓好，把批斗工作做得好。挖出来的人数越多，工作就做得越好。他们就盲目地干起来了。那些人就是现在五十到六十岁的这一帮。他们现在的思想是那种为生活而生活的。

王力雄：你的意思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多？

穆合塔尔：不多。新疆现在掌握权力的还是这一代人。他们的腐败很严重。年轻时候什么都没得到，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什么都看到了，享受那么多，他们想得到财富，有了财富才有一切，没了钱什么都不是。这一代的女人对孩子在道德方面、宗教方面的培养很差，宗

---

[1]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一九一三—一九七〇）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三区革命游击队排长、连长，伊宁三区革命政府农业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三区革命民族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骑兵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南疆行署主任，中共南疆区党委副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教意识也比较弱。

王力雄：除了年轻人以外，那时岁数大一些的没有信毛泽东的吗？比如说分到土地的农民？

穆合塔尔：年龄大的有，农民里面有。可是他们看到了，五八年公社的那个什么计分[①]，干来干去他们得不到分，吃不饱，还是乡长、县长他们过得好，一大早就要把他们叫醒：干活去，干活去！一直干到晚，他们就失望了。

库尔班不知道哈密瓜会坏吗？

王力雄：当年是不是有库尔班大叔这回事？

穆合塔尔：确实有这么个人。库尔班是于田人，想见毛泽东，当年骑着驴可能往和田方向走了吧。因为去北京必须经过和田市，然后到喀什到阿克苏、乌鲁木齐这样去的嘛。至于他到了和田没有还是一个谜，顶多到了现在的和田市内吧。这中间可能有一百七十公里的路。他一路走一路跟别人说要到北京去见毛泽东。和田地区的专员碰到他，问他去哪儿，他说我要去见毛泽东。专员跟他说北京很远，那是几千公里的路，你骑一个驴不够，再带上两三个驴，中间也会死掉的。你去不上。只要你好好干，然后我们把人民代表的身份给你，以模范的身份派到北京，那时你肯定会见到毛泽东的。那个家伙听了以后，可能辛苦地干了几年吧……当时为了政治气氛可能要创造一个什么人物，五七年还是五八年就把他以人民代表还是劳动模范的身份派到北京去了。

这个人是确实存在。不过说他当时骑着驴还带着哈密瓜上北京，肯定是编的。哪有可能把哈密瓜带到北京去？可能他怕路上渴就带了一个瓜吧。人家问起，他开玩笑说是带给毛泽东的。难道那瓜带一个月两个月就会坏他不知道吗？是开玩笑。以后的画上出现了一个瓜，其实是没有的事。他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还专门接见了他，拍了照片。见面毛泽东问老汉有什么要求吗？他说：「我们村子需要一辆拖拉机，还需要一些布。」毛泽东还确实给了他一辆拖拉机和一车布。他就成了全国人都知道的人物了。

有些老年人过去贫困，也吃不饱，但大部分都是懒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确实崇拜。但是文革一结束，那些被打倒的地主，当时说的什么巴依[②]，坐监狱的，地主的孩子，又想法富起来了，先富起来的还是他们。那些穷人分地的时候拿了一块地，到现在还靠种着那块地，富不起来，还是穷。

[①] 指人民公社按劳动量计算酬劳的工分制度。
[②] 巴依是维语富人、有钱人的意思。

那时维族跟汉族关系好的原因是新疆汉族人少。一九五六年新疆的汉族有十五万，这十五万里面有十万是军队，那五万人也是做生意，或是军队的亲戚，地方干部什么的。他们在这里学会了维语。毛泽东让他们首先要学维语，要学当地的语言。陈叔不是跟我们说了吗？一九五三年他从上海到新疆来的时候，库尔勒有汉族学校，可是讲维语，让那些汉族孩子必须学维语，民族学校却不要求学汉语。那时毛泽东说没有大汉族主义就不会有民族分裂主义，所以有很多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政策。那个年代的干部和汉族人比较尊重少数民族。但是慢慢的汉族人口多了，移民来得多了，一九五一年到五四年是一个高潮，文革时期，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是移民到新疆的最高潮。

王力雄：一九五一年到五四年主要是军队方面来的人和干部？

穆合塔尔：还有兵团。然后是上海青年。陈叔的父亲就是从上海以在校青年的名义来的。来了一大批，把工人、农民各种各样的人带过来了，还有一些中共的知识分子，也带到新疆来了。不停地扩大建设兵团。那些当兵的全是单身汉，没有老婆，快变成同性恋了。那时候把全国的妓院都关掉了，就把妓院女人全拉到这，以在校青年的名义嫁给当兵的。现在这边卖淫的女人大部分是兵团的。兵团的女人失业了就出来卖淫，因为她的母亲也在这个行业里做过，会说：「没关系，当年我也这么做的，大家都做吧，这也是一个职业。」

维吾尔老人唱的京戏

穆合塔尔：一九六一还是六二年的那个「全国自然灾害」，那不是自然灾害，是假的，是因为赔偿苏联的贷款，从新疆拿走了很多东西。甘肃、青海的自然灾害比较严重有可能，新疆没有自然灾害。

新疆当时粮食生产情况很好，于是一大批甘肃青海的灾民都跑到新疆来了。民间那时候有个调子，是学着唱京戏的方式，唱的是六十年代甘肃青海自然灾害你们来这里啊啊啊……维族老汉碰到汉族一问你是哪的？甘肃的。啊，就是六十年代甘肃青海自然灾害你们来这里啊啊啊……就唱起那种京戏调子。

文革的时候是内地知识青年来。当时管新疆军队的人是第二炮兵的司令员，来新疆军区当了司令员，还是革委会主任。那个人也从甘肃、陕西带来一大批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另外内地文革比较严，新疆比较温和，一些人避难来新疆。乌鲁木齐人口在文革翻了两倍。到文革结束时，新疆的人口百分之三十已经是汉族人了。

清真寺养猪

穆合塔尔：我说过老年人当时跟汉族关系好的原因，就是那时提倡汉

族人学维语，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当时汉族人也特别注意。如果维族人在领导面前说哪个汉人不尊重我们民族习惯，比如说邻居家养了一头猪，它的味道我不习惯，领导就会告诉那个汉人不要养猪了。可在文革的时候变了，强制要求养猪。

王力雄：因为毛泽东号召养猪嘛。

穆合塔尔：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当权派什么的全都养猪。

王力雄：包括维族？

穆合塔尔：包括维族。那时强制养猪是改造思想的一个标准。很少有人反抗。人的意识状态还是比较崇拜毛泽东，或者是人心已经散了吧，都害怕了，不敢搞什么活动。比如文革期间赛福鼎把库房里的枪支弹药全发给了维吾尔族民兵，如果那个时候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有民族意识，趁着文化革命的混乱，就是起义的有利时机。可是他们没有做，还盲目地参加了文化革命。后来有人告诉赛福鼎说，维族人对你的看法不好，意思是新疆民族是你卖掉了。赛福鼎回答说我把弹药武器都发出去了，我还能做什么呢？

王力雄：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当时可以起来造反吗？

穆合塔尔：可是他当时没说你们起来。那些民兵都是那种思想上搞文革的年轻人，他们会把武器拿出来针对中国的军队吗？他们还要针对老百姓呢！

王力雄：文革中清真寺是被毁掉了，还是做了仓库什么的？

穆合塔尔：做仓库，养猪。

王力雄：文革以后又重新恢复成清真寺？

穆合塔尔：恢复清真寺。阿訇也开始教徒弟，教经文。

维吾尔学生运动比内地早

穆合塔尔：到八十年代，在监狱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出狱了。一出来他们首先告诉咱们，语言同化的速度太快了。因为一九六二年改的维语新文字是按汉语拼音改的。很多单词直接把汉语拼音拿来用。比如「国务院」维语现在都说「国务院」，「总理」我们也说「总理」，「路线」我们也说「路线」。这是新文字的作用。当时一些新的工业品一出来，就用汉语拼音发音，越来越适应了那个拼音，用的都是拼音字母，这样就往语言同化的方向走了。我们那些知识分子出监狱的时候，正是中国要把文化革命的东西去掉，提倡百花齐放，老知识分子们首

先提的意见就是把老文字恢复过来。他们的出发点是要保护民族语言和传统的民族文学。

现在一部分年轻人说还是用新文字好，新文字适合计算机化，适合学英语。但你不懂新文字也照样可以学英语呀，是吧？那是两码回事。从一九八〇年开始，那些出狱的老一代文学家开始写历史书，或者是历史小说，根据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写小说，逐渐在民族中培育一种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开始出现了。

从整个中国来说，第一次学生运动是在新疆爆发的，那是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号。当时的口号是反对核武器试验，反对移民政策，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地位。当时新疆教委第一号的头是个哈萨克人，他说新疆的风是往东刮的，因此核武器的影响不会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而是往内地去的。大家说那不是你们哈萨克养的羊，风往那吹就往那跑，那是核武器。它的影响是会扩散的。

那时民族意识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只是学生运动，没有别的行业的人参加。那一代大学生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号，新疆大学一个教学楼门上写了一个标语，意思是把维族男人当成咱们的奴仆，把维族女人做咱们的妓女。当时政府说那可能是维族人自己写的，可是中间有一个字是唐代哪个诗人用过的，别人没用过，维族学生里没人达到那个汉语水平。

写标语的事件出来以后，自治区教委的主任，就是那个哈萨克人吓唬不满的学生说，你们干嘛呢？咹，有胆量上街嘛！没想到学生听到以后说，哎呀，他叫我们上街，上街，走啊，上街！一下学生都上街开始游行。搞来搞去，新疆师范大学，工学院呀，医学院呀，农大呀，财经学院这些都上街了。

王力雄：有多少人呢？

穆合塔尔：估计有一万到两万人吧。他们的口号就是：「反对种族主义，实现民族平等！」

巴仁乡想搞全疆范围的农民起义

穆合塔尔：到了一九九〇年，巴仁乡出现了政府说的暴乱，也就是当地说的农民起义。政府镇压了起义，当时派了坦克、直升飞机，对一个小乡，他们派了大概五万到六万军队。全疆都处于战备状态。一个乡可以说是打平了，能活下来的很少。那以后就是大力宣传反对民族分裂。

王力雄：巴仁乡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穆合塔尔：当时主要是计划生育问题。他们接受不了计划生育，因为妇女怀孕了，过了三个月以后，肚子里的娃娃可以动了，那个时候我们把他当作人一样对待。你把他淘汰了，那和杀人没什么差异，一码事，伊斯兰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政府强迫做，强迫妇女打个针什么的把他流产。大汉族主义对民族风俗习惯不重视，当作封建思想对待。共产党反对的所谓封建思想，本身是民族习惯。一个民族信了一个教，几千年宗教环境和民族环境混在一块的情况下，很多宗教概念已经形成民族习惯了，哪个是民族习惯，哪个是宗教，分不出了。你反对那个宗教概念就是反对民族习惯。巴仁乡农民起义是宗教人士为主的行为，主要是宗教人物带头的。

王力雄：宗教人士搞了什么？

穆合塔尔：他们本来想搞一个全疆范围的农民起义，阿克苏、和田、喀什、乌鲁木齐同一时间开始。

王力雄：他们已经串联了吗？有响应的人吗？

穆合塔尔：嗯，串联了。准备工作做好了，他们本来打算一九九〇年那个斋月的第十七天，就是伊斯兰教的阿里被暗杀的那一天，那是伊斯兰教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就这个日子，全疆各地统一起义。

王力雄：他们策划的起义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穆合塔尔：独立。

王力雄：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穆合塔尔：独立国家。他们当时的总指挥是一个乡的副书记，还是党员。

王力雄：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到吗？能打过解放军？是不是不太了解情况……？

穆合塔尔：当时的活动不是只有巴仁乡，是全疆农民统一发动起义。

王力雄：他们可能想得并不长远，就是表达一个反抗吧？

穆合塔尔：他们希望每个地区、每个县、每个乡统一一个时间爆发起义。可能一下子解放不了，可能要像毛泽东一样打一个长期的游击战。他们可以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山区，那里可以后退，也可以进攻。

王力雄：当时苏联还没解体呢。如果他们的眼光远的话，可能是看到六四之后国际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

穆合塔尔：可能他们当时这么想。参与过那个活动或者参与过他们组织里面讨论的人我没见过，所以我不能乱猜。可是当时他们的目的是新疆各地同时起义。但是暴露了，他们只好提前……

王力雄：因为什么暴露？

穆合塔尔：因为一个马的原因。他们想买一个马。那个马在跑马赛上跑得特别快，他们需要这样一匹马。

王力雄：为了传递消息吗？

穆合塔尔：他们是什么目的不清楚，买马的时候，那个马主提了一个价，很高，好像是一万五嘛，他们没还价就买过来了。

王力雄：不正常。

穆合塔尔：咦，卖马的老汉想这是什么事？这些人的钱那么多吗？他就……他可能不是想得太多的人吧，就把这个事说了。当时巴仁乡的一个清真寺被火烧了，谁烧的不知道，农民包围了乡政府，要求把烧火的人找出来。当时就利用这个事提前起义了。那一次一个多星期嘛还是十五天才摆平。当兵的也死了有一二百个人。起义的人利用了一些技术，解放军的一个报话机被他们得到了，他们就穿上解放军的衣服，这边跑过去那边打，然后让解放军互相打起来。最后大炮呀，飞机呀都出动才摆平。然后各地方以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的名义大规模地抓宗教人士。

「断桥行动」杀维奸

王力雄：那之前是宗教复兴高潮的时期吗？

穆合塔尔：最高潮的时候就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宗教恢复最快。巴仁乡事件之后，从一九九〇年开始镇压不停，反暴力也不停。那时一年最起码出现三四次，和田哪地方又暗杀了哪个和政府关系好的乡长，或者哪个清真寺的阿訇说古兰经上就提倡计划生育。有人听到以后说他妈的阿訇还说这种话，就把那阿訇暗杀了，这种事例太多了。

一九九五年在和田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和田开的。当时中国政府紧张得不得了，他妈的我们共产党的一大是在小船上开的，他们在和田城市里面开这个会议！他们本来想在喀什开，全疆代表过来，可是政府已经知道了，他们也知道政府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一夜间赶到和田开了。

尤其是一九九四年、九五年、九六这三四年，没两三个月，哪个地方就有爆炸、暗杀。和田的会议决定了一个决策，头一个任务是「断桥」，指的是在政府和民族之间当桥梁的那些人，给政府工作，把民间事情告诉政府的那种桥梁作用的人，要把他们杀光。就是断桥行动。

王力雄：是所谓的杀维奸吗？

穆合塔尔：嗯，杀维奸。那时新疆这地方暗杀那地方暗杀，好多暗杀，是一个有策划有组织的行为——断桥行动。

皮大衣扔到伊犁街上

穆合塔尔：到了一九九七年，伊犁出现了二月七号的事情。他们本来想用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对抗，一方提出用和平的手段。反对的人说我们用和平手段当局接受吗？但宗教人士说伊斯兰教提倡和平，我们宁愿用和平的方式来跟政府表达意见，用和平的方式来对抗。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因为古兰经提倡和平。

上街的时候，人人都把衣服脱了。二月份伊犁那么冷，脱掉衣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大衣、西装都脱掉，光穿一个衬衣？目的就是向当局表达我们没带任何武器。因为穿着皮大衣，看不出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别人怀疑你，一看是衬衣，光光的是吧。他们就是念古兰经上街游行，到政府去。他们说砸东西、打汉人不是我们的行为，是政府派进去的人干的，我们是用和平的方式。我们游行连大路都不上，走的是人行道。五千块钱六千块钱的皮大衣就扔到路上了，他们把两个手放到耳朵后面，就这样念着古兰经游行。但是到了第二天把他们全部镇压了。

当初的社会混乱，砸车呀，碰到汉人就打的事情，是混进人群穿便服的警察干的。政府这么干，是可以利用这个进行镇压。便衣警察做这种事，带动了那种情绪不稳或是性格不好的年轻人，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呀，还有那种爱打人的家伙，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就出现了混乱。

政府镇压以后，出现了不赞成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人，开始策划暴力。他们的方向指向移民，爆炸移民住地、暗杀移民……因为他们抵抗不了政府。他们开始做武力抵抗，连续不断地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延续到一九九八年。出了七号文件以后，政府明确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意识、非法宗教活动。新疆报纸上宣传，反抗者的目的是暗杀汉族人，赶走全部汉族人，建立东土尔其伊斯兰共和国。很多汉族人脑子里面想，噢，他们的行为是直接针对咱们民族的。这样民族矛盾越来越凶，民族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现在形成了基本上互相不信任的局面。

民族之间的矛盾

新疆汉人会赞成新疆独立吗？

穆合塔尔：新疆如果独立，百分之八十定居在新疆的汉族都会赞成，因为他们相信政治上独立对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好些。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说内地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就业难了。七、八十年代新疆的生活水平比内地好，现在人多了，生活质量就下降。目前发展水平提高，那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差距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估计新疆的汉人赞成独立。

王力雄：汉人的赞成还是要有区分吧？他赞成在汉人统治的前提下新疆比较独立的政治，如果变成以维族人为主的政治结构，他可能就不愿意了……。

穆合塔尔：一般老百姓会愿意。他会衡量怎么样能让我的生活好。一衡量的话，他肯定觉得政治独立比较好。政治独立生活肯定会好。现在煤气价格一瓶六十二元。对这一点都不用我们说，汉族人就会说：我们新疆（他们这时说「我们新疆」）出的东西还那么贵，他妈的！他们比我们还气愤，因为我们用煤气的人不多，农民根本不用。新疆汉人大部分是在城市，都要用煤气，只要切身利益受到侵犯，他一定不满。

汉族猴子教维族猴子吃核桃

王力雄：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中国从国家安全考虑是无论如何不允许失掉新疆、西藏、内蒙那些广阔的领土。如果失去的话，百分之九十几的汉人只剩下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任何一个国家从安全角度都不会允许。

穆合塔尔：那样的话，应该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有理的。日本的国土按人口的比例来说太小了……。

王力雄：是啊，问题是你不能让中国老百姓这么想问题，他就是别人不能打我，我能打别人。所以不能认为有民主就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回避一千万人的维族去对付一个十三亿人的民族所面对的差距。你说中国人爱说他们自己人多，他就是人多，对不对？你说车臣让俄国麻烦了那么多年，但是仅仅是个麻烦，他说你还能怎么着？顶多炸死点人，弄点什么事，损失我承担得起……

穆合塔尔：不是，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核算了。俄罗斯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中亚国家的石油管道过俄罗斯的边界到欧洲，必须通过车臣，没有车臣不行，因此俄罗斯当时不能让车臣独立。但核算以后，损失了六千亿美金，把全部车臣拿到国际上卖出去，都不值这些钱……

王力雄：但你这说服不了中国人，中国人说：「车臣多小啊，新疆多大啊。」（两人笑）

穆合塔尔：那中国也没有理由责备日本啊，他必须要朝鲜和东北。

王力雄：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胜者为王啊！美国不也一样吗？印地安人不是他消灭的吗？加拿大、南美洲那些地方不都是白人到那儿去把当地人消灭掉的吗？

穆合塔尔：西方认可他做的事，他承认是侵略，占用了你的土地，你又能怎么说呢？那是过去的事，可是他已经在这生存了两百年了，无法离开了，他去哪儿？回到英国岛上去吗？可是中国人呢？说的是没有这么回事，我们两千五百年以前或者三千年以前就是统一国家什么的，说一大批难听的话。新疆大学开会经常说这些，还让参加会的教授表态。一次让一个副教授表态，他说：「唉，你们说的真没意思，哪里是几千年以前的事，几万年以前，猴子还没变成人的时候，汉族猴子就到新疆来教维族猴子怎么吃核桃、怎么吃桑叶了！」但是你看西方人拍的电影说当时他们怎么镇压土著，他们认可。

王力雄：但是他们却不走嘛。

穆合塔尔：最起码他们认可，可中国却不认可。二战的时候日本人炸了美国的珍珠港，可是，战争一结束，日美的关系还挺好的。美国一直扶植日本，正视现实。在德国的东德、西德统一问题上，西方国家也协助过德国，可是南北朝鲜的问题，我们周围的亚洲国家，中国有协助吗？我估计是制造麻烦吧。北朝鲜的靠山是中国吧？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欧洲是做了后说对不起，中国是不会这样说的，历史上就是这个样

王力雄：我也承认，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批评中国的文化，但在民族问题上仍然是大汉族主义，大一统的思想很严重。不管是民主派、自由派，还是专制的，都差不多。

穆合塔尔：这从中国的电影或文学书上可以看到。总是天下第一什么的。汉人对伊斯兰的东西了解得不够，也不想了解。现在西方的东西他们很流行了，内地也好，新疆也好，都是盲目的跟从，因为没有信仰。可以说没有信仰的话，民族文化就会瓦解。他们一看，哎哟，西方这么发达，他们生活习惯可能是最先进的。但是不一定。苏格兰男

人还穿裙子，这是女人穿的，要是男人穿会哈哈哈笑得不行。可是苏格兰男人也有个理由吧？难道他们不知道裙子是女人穿的东西吗？全世界任何地方裙子是女人穿的，是吧？苏格兰男人穿，是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汉人对外界的理解很弱，所以很容易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全面，只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思考问题，一说就是孔子怎么说的，或者是唐代诗人怎么说。

王力雄：就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来不考虑。

穆合塔尔：我们一谈这个问题就被看成民族主义者或分裂主义者。看成是民族主义者是可以的，但他一定要说你是分裂主义者！其实他们本身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知道国家的宣传。关于新疆的历史，只看过政府的教材。可以说中国人对外面的了解特别少，就是只要自己的，把自己的东西无限赞美、夸张。外面比你好的东西有没有？比你美的东西有没有？他们不考虑这些问题。跟汉族知识分子相比，维族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和各国情况，各民族的情况，种族问题上知道的比较全面。

汉人公务员多是退伍兵

穆合塔尔：新疆汉族人总是说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低，可是他们本身文化素质比我们低得多。像国家行政部门干的那些人，新疆那些国家公务员，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以前当兵的，当兵回来就当公务员。新疆退伍兵参加工作的比重最大。要么就是中专毕业、高中毕业的直接找工作，然后再念大专、本科的文凭。

新疆教委出资培养了一大批汉族学生，他们一到内地就不回来了。能从新疆去内地上大学的汉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去了不回来。在新疆境内上大学的，可能一半留在新疆，另一半还要跑到内地去，当局总说新疆教育方面花了多少多少钱，每年国家拨款几十个亿，可是送出去学习的人不回来了，这个钱能算成新疆教育的投资吗？如果这个钱是投给民族学生，他们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九都回来了。上海那么高的工资他不干，宁愿回新疆拿一千多点的工资。国家拨款新疆教育的钱，现在百分之六十是给汉族学生的，他们毕业了还会留在内地。十个汉族学生里面可能回来一个，九个不回来，基本不回来。

既然汉人上学不回来，政府就把内地各地方中专毕业的学员招过来，以西部大开发，青年志愿者的名义。说是来搞西部开发，就跟当年从上海来的「支持边疆」青年一样，给他们也起了一个名字，好像是叫「为西部开发做贡献的人」，给他们在这里安排工作。他们是在农村长大的娃娃，不想留在家乡，中专学校毕业或是拿了一个很普通的大专文凭，听说到新疆以后给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去不去？他们一想自

己父母是农民，没有靠山，自己的学的东西也不多，现在找工作这么难，还是找个工作吧，就过来了。一到这里，给他安排工作，国家公务员，那样他就会留下来。而新疆大学本科毕业的民族学生却找不到工作。

现在单位里汉人教育程度、文化程度高的很少。新疆汉人整体的文化素质、教育程度比不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教育、文化水平程度，比他们高几倍。国家公务员维族人里面百分之八十是本科以上，汉族人里面不到百分之二、三十，其余百分之五十是退伍兵，百分之三十是中专毕业或者随父母来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学历都是自学方式来的，看着好像是大专以上的，可是问哪个学校毕业？嗯，电大[①]呀，党校呀，或是交钱拿文凭的。哪个大学来开一个培训班，也算文凭？！可是他们还说别人文化素质太差。他们说文化素质表现在语言上，可是他们连一句维语都说不上。

维吾尔人和汉人不能共处的制度原因

王力雄：从你的角度也好，还是从维族的角度也好，能不能谈谈对汉人的看法和评价。维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是因为社会制度的问题，还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民族性就不能共处？对汉人的民族性，从你们角度看有什么问题？

穆合塔尔：维族和汉族共处是本来是可以的，现在互相不信任是制度造成的。因为这个制度提倡无神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约束的民族和一个信教民族共处是很难的。这个原因导致了不能共处。

九十年代，中共开始鼓吹民族精神，提倡民族自尊心，以此来保护自己。大部分汉族人也跟着搞中华民族这一套，以华人利益为中心的观念很深，所以汉族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在内，把这些利益放得太高，对其他民族其它文化的了解不够，或不想了解，现在变得更难共处。

现在经常看到，比如一个华人在美国当了议员或什么官，他是美国第二代华人，他父亲早就是美国公民了，其它国家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会不会在媒体上专门宣传？他们可能不太重视。可是中国的媒体就使劲吹。

中国政府的宣传攻势，正在宣传的民族精神，出发点是和古代那个大帝国的统一思想连在一起的，往往是从那种历史角度出发来宣传民族精神，这样很容易出现种族概念，出现不能共处的局面。这还是制度问题，如果中共存在，改变这种局面很难，他们现在只能靠这个了。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放弃了。为了保住自己地位和党的存在，就把党的名义和民族的名义连在一起。这种宣传的效果，会出现二战时期德国的那种国家社会党的形式。当时的德国人和欧洲任何民

[①] 以函授方式教学的广播电视大学。

族不能相处，要么由他统治，要么就要被消灭，没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共处空间越来越小。

王力雄： 你认为无神论是在政府宣传主导下出现的状况，还是说……？

穆合塔尔： 政府的宣传。因为汉族人本身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比如说道教是只属于汉族人的一种宗教。他过去有这种信仰，可现在没有了，任何信仰都不存在了。这是政府的原因。

维吾尔人为什么不喜欢汉人

王力雄： 要是问维族人是否信任汉人，大部分都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光是因为政府控制和制度形成的吧？是不是对汉族的民族性，或是汉文化本身，也有合不来的地方？

穆合塔尔： 我能注意的一点是，汉族一个主要特点是盲目地服从管理者，有个人立场的不多。生活中的评价都是书上的标准，哪个书上怎么说、怎么写的，不是按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思考评论问题。你争论一个问题，绝大部分汉族人使用的是公元前哪个人怎么说的，或者怎么做的，使用自己的成语，孔子呀，老子呀。政府现在也正在抓这些，在世界范围宣传也是这些理论。他们习惯使用有威望的人的理论或者例子。自己的东西看得太重太重，把别人的东西看得很微弱，很多文人把中华民族文学、文化、历史说个不停，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

汉人对别人不信任。比如说我在办公室找东西，汉人就说不要乱翻，不要搞乱，他认为我一碰就会搞乱这些东西，会弄坏。只要是他做的事情，别人一参与就会弄坏。他们总是不信任别人。另一点，汉族人大部分比较内向的，比维族人内向。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很容易能了解的。维族人不是那样，大家见到两三次三四次，基本上就可以了解了。汉族人在不同的场面上很容易改变自己的面目，经常追逐时代潮流，形势怎么样他就怎么做，就怎么想。这是维族人与汉人的差异。维族人也有这种人，可是不是大多数人，汉族人大多数人是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脸色或者行为，不一致。

还有，汉族某个人如果管理一个事情，会尽量把自己的位置提前……

王力雄： 提前是什么意思？

穆合塔尔： 就是想让你求他。他把这当成自己的权力，汉族人权力意识强，业务意识特别差。比如说本来我们都是打工的，可是他往往把自己的岗位看成一个很重要的岗位，或者自己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他没想过他只是一个打工者，忘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总是想让领导

把他看中，认为他干得多好，多美。

王力雄：你说你动他的东西，他不信任你，是因为你是维族吗，还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会不信任？

穆合塔尔：我估计对所有人都不信任。汉族人和别人关系很密切的少，他们尽量是在自己家中或是很小的圈子里过日子。可是维族大部分人不习惯这种环境，他们会发展广泛的社会关系。

还有我所看到的汉族人，他们大部分做错了一件事情或是自己的行为不道德，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他还找个理由，说这么做不碍大事。

还有，汉族人爱看人的位置，你是哪个位置的就怎么样对待你。你位置高嘛，态度很温和，如果他面前的是很不值的人，他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总是把别人看得很蠢或者很简单，跟别人一说话，口气就是教育你，教你。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批评别人，你这么这么做是不对的，这样做不行。可是他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的事情吗？反正不管怎么样，按你的缺点比的话，他的缺点就不值得提。

一般情况下，维族同汉族出现摩擦，吵架了，汉族人就是很肮脏的话骂人，大声的喊啦，反正就是气人的那些话都说，可是不动手。我们维族有一个性格，那种站在路两边，瞪着眼睛一两个小时互相骂来骂去的事情没有，骂两三句以后就动手了，要么你打掉我，要么我打掉你。可汉族人一旦别人动手，他说：「哎呀，你动手啦！」其它人也说「你怎么能动手？」可是动手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动手？

「皮帽子」和「草帽子」的区别

王力雄：那你觉得这些矛盾里面，有没有因为是不同民族，由于不信任造成的敏感呢？

穆合塔尔：不是，不是那种问题。现在的确出现不信任，可是最主要是现在新疆汉族人的意识是，你们是我们的殖民地民族，二等民族，嘴上没说，可是他行为上表现得很明确。很多汉族人如果维族人不在场，不说「维族人」，说「皮帽子」。

王力雄：你听见他们这么说了？

穆合塔尔：那次我一进办公室他们正在说皮帽子什么什么的。我说：哎，你们这些草帽子讲什么呢？你们蠢不蠢？皮帽子和草帽子之间有多大的差距？草帽子嘛，任何人都能弄出来。皮帽子有着技术的东西，羊皮拿过来你穿不上，要用工艺处理才能弄出来一个帽子。你看哪个老板冬天不穿皮帽子？东北那些地方，北方的大老板还穿皮帽子是

吧？长城一带戴狐狸皮的帽子是吧？皮弄的帽子你们以为很愚蠢是吧？

王力雄：然后他们怎么说呢？就说开玩笑？

穆合塔尔：说是开玩笑，口头语。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行为辩护成开玩笑或者是说一说而已。可是你反过来这么说他们，他们就会说成是民族情绪的问题。

汉族人一般就是这样，道理太多了。比如说有些交通事故什么的，车轻轻碰了一下，人好好的，他还去医院看 CT 什么的，维族人一转过身起来，看看没什么事，说一句「怎么开的车」，然后就走了。汉族人动不动不行了不行了，到医院去吧。医生说没问题，哎哟，疼啊。怎么会疼呢？你想看 CT 是吧？查一下。一出现这种情况就赖皮。

有些很小的事情，也是赖皮的，想给人找麻烦。我朋友的出租车，停在一个平房院子门口，一个汉族娃娃从里面跑出来，跑得不慢，砰地撞上他的车，娃娃父母出来说，车为什么停在这？朋友说这里不能停车吗？父母说你停车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得负责，要上交通大队。去了交通大队，交通大队一看，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女的汉族人说：「娃娃可能有问题。」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他有问题？」女的说，必须要查一查胳膊腿有没有问题。交通警跟我朋友说，以后如果那个娃娃有病，他们还是得找你的麻烦，将来打官司不如现在带他去医院。到了医院，把娃娃的手、腿在机器里查了，没任何事情，那汉族把娃娃带走了，费用都是我朋友出，花了五百多块钱。维族人一旦遇到汉人这种事情，比遇到任何人都麻烦。汉人总是互相不让的那种样子，想办法整你。

王力雄：你觉得汉族人在新疆自以为比本地民族地位高，看不起本地民族的现象很严重吗？

穆合塔尔：很严重。大部分盲流一吵架，马上打一一〇电话，他们以为政府保护他们。这种意识从九七年以后就提高了，以前没有。现在一旦稍微有麻烦，马上打电话，意思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警察保护我们。从报案比例来说，维族人很少，汉族人的比例可能是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民族冲突谁会占优势

王力雄：你觉得现在如果发生民族冲突的话，占优势的是哪一边？

穆合塔尔：可能乌鲁木齐、石河子这两个地方汉族占优势，阿克苏、库尔勒可能平衡，其它地方还是维族占优势。汉人主要在城市里面的

多。

王力雄：汉族人过去一般不太抱团，不团结，互相之间不帮忙，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民族人互相之间帮忙，所以尽管人少，也能和比较多的汉人对抗。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化？

穆合塔尔：有变化。不少黑社会电影，香港那些片子，打呀，杀呀那种一群一群的打法，他们学会了。汉族娃娃现在玩都是好几个在一块。开出租车的或者是社会上流浪的那些汉族人里面，现在带刀的比较多些。

王力雄：不同民族之间的青少年打架斗殴这种事多不多？

穆合塔尔：这种事情，有，可是并不多，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互相不来往，他们的活动场合可以说是分开的。

王力雄：有没有哪个民族中一伙人专门打对方民族，有意识的，像东德那种光头党的有没有？

穆合塔尔：没有。汉族没有，维族也没有这种。

王力雄：你说从政府角度存在保护汉族，压制当地民族的现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穆合塔尔：现在大多数维族人都认为，到了派出所，吃亏的只能是维族人，所以这边有个概念，最好不要跟汉人去理论，不要去派出所，打架就打狠一点，把他打倒起不来你就跑掉，一旦到了派出所，反正倒霉的是你。

王力雄：那是什么原因?是语言说不清楚吗？不如对方会讲？还是因为警察会有偏向？

穆合塔尔：维族人说不上两句就说出一句「黑大衣」，一旦说了「黑大衣」就是民族情绪问题了。可是过去的维语一直讲汉人就是「黑大衣」。农村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场合，比如我们朋友一起喝酒说话，一般也是不用汉族这个词。因为汉族这个概念，在新疆也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王力雄：维语里面讲汉族就是「黑大衣」吗？有没有更正规的词？

穆合塔尔：没有，从古代就这么说。现在说「汉族」的就是国家公务员，或者他们的家属这样说。国际上现在也使用「黑大衣」。美国之音也用「黑大衣」。可是他们非说这是骂人的词。维族一说黑大衣。警察一听就气了，你说什么？黑大衣？好像骂了他们一样，气氛就变了。你说汉族不行吗？「汉族」这个词在维语翻译的话，是汉族民族。汉人不是汉族人，而是汉族族人，成两个词了。没有人会这么说的。

而说汉语发音的「汉族」，「族」这个字维族人是说不来的吗。「黑大衣」跟俄语说汉人的发音也相似。维族人说「黑大衣」是习惯性的，争论中随时会说，但一下性质就变了。

新疆汉人「无奈」

叫「萨达姆」的新生儿

王力雄：维吾尔人认为自己的地位低下，受汉人压迫。但是生活在新疆的汉人也有认为自己在新疆是二等公民的，因此指责政府的政策。这里有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很广。作者用的笔名叫「无奈」，自称是在新疆生活的汉人写新疆问题。咱们看一下这篇文章，针对里面的段落，你觉得哪里可以点评一下，就说两句。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新疆的恐怖主义自始至终都同民族问题、疆独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三区革命」、五十年代的新疆剿匪（疆独）、六十年代的「伊塔事件」、七十年代的喀什事件、八十年代后的「伽师事件」、「巴仁乡暴乱」、九十年代的「乌鲁木齐二二五事件」、「伊犁事件」等等，无一不是打着民族独立、反抗压迫的旗帜，民族分裂、恐怖主义在新疆有着生存的环境和沃土，并非「仅会引起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的兴趣」。海湾战争一爆发，新疆许多维吾尔青年就要到伊拉克参战，一时间叫「萨达姆」的新生儿遍地都是，萨达姆是伊斯兰的英雄，这种影响当然在新疆高校高素质人群中也是普遍的。**

可以说，当时到伊拉克参战的没去过一个人。那不是马路，那是边界，他们怎么去得了？是吧？他想去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随时可以去，可是伊拉克他能随时跑出去吗？那我们的国防！边界那么温柔吗？当时的确有出生的婴儿起过「萨达姆」的名字，可是中国政府当时也支持萨达姆的嘛，也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嘛。当时维族在这个问题上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怎么举这个当作民族分裂的例子呢？难道我们中共也变成民族分裂主义者了？拿这个当民族分裂的例子是很不理想的，可是他还说：「这种影响当然在新疆高校高素质人群中也是普遍的」，这是假话。农民里面有给孩子起名萨达姆的，我也听说过。可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的高素质人群里，给孩子起过萨达姆名字的一个都不存在！知识分子对萨达姆没好感，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一边赞成独裁者，一边喊民族独立，那就是胡扯淡嘛！

（读文章内容）**实际从上层到下层，「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

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而赛福鼎都已将「东突厥斯坦」的大印刻好。新疆高校教室的黑板上也不时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口号，散发传单也不是什么秘密。正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在这些精英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这是真的，可是他后面说的「赛福鼎都已经将‘东土耳其斯坦’的大印刻好了」，哎，赛福鼎刻好了印，那我们政府把他调任中央，还给他职位吗？不抓起来吗？这个人从哪儿听到的？这不是胡扯淡呀！东土耳其斯坦的大印刻好了，如果他这么做，政府不会辞去他的职位吗？可如果政府不知道，这个人从哪能知道呢？

王力雄：你们过去任何渠道都没有听过类似的传闻？

穆合塔尔：根本没听说过，头一次在这看到。如果出现这样的事，那中央政府是干嘛的？这种人还当人大副委员长？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不是什么英雄，中央也知道这一点，处理他很容易呀！

政府对少数民族有优惠吗？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过去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今天看来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给「恐怖主义」势力在中国新疆的生长，提供思想意识和物质上基础和空间。使得中国政府直到今天才不得不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将疆独问题暴露给世界，以期在打击疆独势力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也认可了这是政策问题，这不是我们的错误，或者是汉族人和维族人的错误，主要是政府行为，这点他承认了。

（读文章内容）**自新疆一九四九年和平解放以来，民族矛盾就一直存在，除去王震在执行共产党民族政策时出现严重错误以外，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自毛泽东时代之后，新疆的政局也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百分之四十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这是对的。

（读文章内容）**七十年代后期在新疆强行推行所谓的三个百分之六**

十，即招生，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十；招工，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十；招兵，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十（计划经济年代，当兵复员可立即安排铁饭碗的工作），以至于后来演化成什么事情，少数民族都要占百分之六十。立即将以往的政策倾斜变成了量化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种族歧视，加剧了民族矛盾，汉族与穆斯林民族由不平等到歧视、由嫉恨到仇视。以高考招生为例，新疆的汉族考生不但要忍受新疆分数线高于内地许多省区的事实，还要忍受不得超过占招生人数百分之四十的种族歧视！

这全都是胡扯淡，招生，全疆的民族学生一九九〇年的时候是六千。当时老师跟我们说过：你们必须限制在六千人之内。

王力雄：你就是那一年参加考试的？

穆合塔尔：是的。当时全疆高校招生学员数字多少我不知道，可能不止一万吧。

王力雄：如果要有招生占百分之六十这样指标的话，你们应该是一定能够听到的吧？

穆合塔尔：肯定。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的，全新疆民族学员里面，招生范围是六千个人，你们必须进到六千个范围。你进不去，就是你没有入大学或是大专的权利。限制就是六千人，有明确的限制。

王力雄：会不会他那年就是招一万呢？其中百分之六十就是六千，因为给你六千限制的话，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比例的。

穆合塔尔：可是汉族学员还可以考内地学校呀，我们不能考内地学校。

王力雄：不能考吗？

穆合塔尔：不能考。我们考内地学校只能填大学预科班，那是有明确限制的。汉族学员考新疆境内的大学可能有比例限制，可是新疆以外他们任何地方可以去，全国各省的任何大学他可以考啊。我们呢？七门课都是一百分，我们都进不到清华和北京。因为招生范围没有我们，我们只能在新疆的范围之内。要考新疆以外的学校的话，得先考上新疆大学或者是师范大学的预科班，一两年以后才正式考大学。

王力雄：招兵更不会少数民族百分之六十了吧？招工呢？

穆合塔尔：招兵？招兵是很严肃的问题，不用说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十的民族人都没有，枪和子弹还能交给维族人？连维族警察都不给枪，只给汉族警察带枪。

王力雄：招工呢？

穆合塔尔：这个可以调查，比如说，八十年代有多少职工，其中汉族人维族人的比例是多少，马上可以查出来。工人的比例可能维族人多一些或者是一样，可是干部里面汉族人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原来那个单位，当时三十七个人，其中八个人是维族，交通处有二十几个嘛三十个人，其中五个是维族，其它都是汉族人。你到哪一个单位，一进去马上就感受到基本没有维族人。除了对民族学校这个比例是不错的，因为汉族老师上不了民族语言的课。

「麻雀东南飞」是谁的责任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新疆的高校中不同民族同级、同系、同专业，却不能同教，教师、大纲、教材完全是两套。**

是这个情况，教材不一样。当时我们教的是维语课程。但是教的内容一样啊。数学、物理那些东西，不能讲两种方式吧？名字不一样，可是内容一样。概率的内容全世界通用的，什么是概率，概念是一样的吧？难道汉族的概率和维族人的概率不一样？他说的意思差不多就这样了。

（读文章内容）**中央政府的这些政策在新疆穆斯林中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在汉族（新疆事实上的少数民族）中却引起了强烈的不平。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到新疆考察工作，在新疆屯垦戍边几十年汉族干部群众纷纷向中央抱怨：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要知道，高考招生、招工、招兵在当时是这些普通民众之子女的唯一出路呀！正是中央的这些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的社会动荡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孔雀东南飞」到现在「麻雀东南飞」，难道政府不因该对以往的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吗？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制，但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

这纯粹是一个侵略政策的拥护者嘛，他是想更多的汉族人来新疆，他的出发点就是种族主义，希望政府应该出一个好的政策，让很多的汉族人扎根在新疆。你要在别人的土地上扎根那么多人，目的是什么？他的出发点就是为帝国效劳，一个爱国者的思想，要把四川人全搬到新疆了，他才高兴。

（读文章内容）**而今，在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中，在新疆实施的这种百分之六十的政策，更是助长少数民族憎恨政府、仇视**

汉族民众的情绪，「东突」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回应。过去的计划经济，政府可以强制地将百分之六十的少数民族安排进机关、工厂、部队，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可以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管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岗位，但是少数民族的确得到了广泛的优待。然而，随着国营企业步入困境，大量职工下岗，合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开始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买方，为了经济利益他们首先雇佣技术工人和素质较高的人，尽管政府也在做工作，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地增加少数民族的岗位，但是行政的干预影响逐渐被市场生存的影响所取代。于是，大量的工作岗位被汉族人占据了，高校毕业生不在被国家包办分配后，由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少数民族毕业生再就业市场上明显不如汉族毕业生，军队实行义务兵制度后，由士兵直接提干几乎不可能，复员后也不再包分工作。政府所能行政安排的地方，只有行政事业机构，可是年年的精简机构，早已使这些岗位人满为患。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变化，政府过去推行的百分之六十除了在机关事业学校外，已没有社会意义。

他的意思就是汉族人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实内地的知识分子，文化素质、技术这方面高的，一个都不会来新疆。我一个朋友，在乌鲁木齐一个厂里工作，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干了十年。十年过程中，厂长给了他三个徒弟，都是四川来的中专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的人。他每个人带了两年三年，那些徒弟后来都已经是技术员了，可我的朋友呢？还是在基层干。他到领导办公室说：「我培养的三个人已经当技术员了，他们跟我学的，难道我不能当技术员吗？」领导说：「你们民族同志暂时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他就不干了，辞职自己开饭馆。

王力雄：有没有解释理由，为什么民族同志不要考虑？

穆合塔尔：说是有语言障碍。可是他培养那些汉族徒弟的时候怎么没有语言障碍？他们是跟他学的，已经当技术员了。

只有维吾尔人有懒汉吗？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新疆许多穆斯林的生活的确还处于困境（当然，新疆许多兵团农场的汉族农工生活也很窘迫），这些都使得民族仇视、「东突」问题有了滋生和想象的土壤和空间。笔者就接触到许多维吾尔人，他们普遍认为：汉族人是来抢新疆的东西的，如果汉族人不来，光靠新疆地下的石油，我们也可以像沙特一样，让外国人来开采，然后给我们钱，我们并不需要干什么活，生活却会很富裕。当你反驳不劳而获是不光荣的时，他们会告诉你，石油是真主赐予的。

这有什么可责备吗？他责备的理由是什么呢？——不劳动获得财富不光荣！可是他在单位干工作的话，比他干得好的干得多的人，拿的工资比他少的话，他会同情那个人吗？他工资会分给那个人吗？他觉

得不光荣吗？哪个国家认为自己有财富觉得不光荣呢？他的理由是说你必须劳动了以后才得到这个东西。劳动是什么？中国也学外国的技术呀，那你就自己开发嘛，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技术？这样光荣吗？这样说可以吗？你用劳动得到的技术才应该是光荣的啊！

（读文章内容）**中国政府的确每一年都在为新疆的少数民族作一些具体的实事（譬如，每年入冬在新疆和田都要大批的棉衣救济给维吾尔人，不过第二年开春，这些维吾尔人大多会将棉衣拿到巴扎上卖掉，然后买几串烤羊肉吃掉，入冬时又无棉衣，伸手需要政府救济），但是这些实事并没有改变很多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看法，相反，他们却将对共产党的仇视转化成对新疆普通汉族民众的欺辱。**

这种现象谁看过？如果政府在每个地方都给维族人棉衣、吃的住的，政府需要这个地方、这片土地干嘛？好像这里是汉族人或者是中央政府养活的地方，什么都不做？这种不顾自己的政府很蠢吧？这样一个民族也很蠢吧？为什么要帮别人？你们自己在陕北山沟里生活困难的人也不少，你顾不上他们，来帮忙我们，世上有这样善良的人吗？自己吃不饱，自己所有亲戚朋友饿着呢，还赞助别人？

他这么说，意思就是新疆人靠政府赞助才能过日子，如果政府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还差。那为什么中国内地那么多的人养不起，生活水平提高不了，政府来考虑到这么一个戈壁滩上养这么多的人。其实从我们这里拿走了多少东西？那个不算吗？

王力雄：你能说明从这儿拿走了什么东西，怎么来算这个价值吗？

穆合塔尔：比如说，矿物资源属于国家的，地方管不上，如果把这些算进地方财政，那就是一大堆数字了。石油天然气、铜矿、阿尔泰的金矿，新疆的煤每年内地拉走的是五百万吨。

王力雄：另外你是说没有人把棉衣卖了⋯⋯

穆合塔尔：不是给人人都送棉衣的，而是春节那个时候，或者是入冬的时候，给贫困农民送一些东西。象征性的，年年都送。那在内地也有呀！难道全部和田人都是夏天把棉衣卖掉吃烤肉，冬天盼着政府的救济吗？

王力雄：可能有个别的懒汉⋯⋯

穆合塔尔：懒汉肯定有，全世界都有，可能这个文章作者的亲戚里面也有这种人。不要说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各种各样的人嘛！接受救济的不是也有汉族人嘛。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给日本人当兵的人也有是吧？这不能代表汉族人都愿意中国变日本的殖民地吧？同样情况，最发达的民族里面，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里面，没有懒的人吗？德国那么发达的国家，那么发达的一个民族，每天晚上警察

都得把一部分人送回家，他们喝醉就躺到街上。

四五岁的维吾尔娃娃也打汉人？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在新疆，许多维吾尔人从小就对孩子培养对汉族人的憎恨和仇视。**

是吗？谁会给娃娃讲这些，按照反对一个民族的这种程序来培养一个孩子？比如说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说日本人，而是日本政府做的。当时很多中国人还收养了日本人的娃娃，是吧？很多日本人也救了中国人。

（读文章内容）**如果你大白天走在新疆喀什的大街上，有个四五岁的维吾尔小巴郎**[1]**向你抛石子或跑过来踢你一脚，你千万不要奇怪……**

你去的时候遇到过这个事吗？每年来喀什旅游的汉族人那么多，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偶尔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事，也是很正常的，那个娃娃也可能会把这个石头扔维族人。一两个小娃娃的行为能代表什么呢？他认为任何四五岁的维族小娃娃一看见汉族人就扔石头，可是你看过吗？或者你认识的人到喀什遇到过这么回事吗？八十年代遇到过吗？九十年代遇到过吗？现在遇到过吗？

（读文章内容）**……也不要对他的行为进行呵斥，否则，顷刻之间周围的维吾尔人会将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侥幸能活着跑到公安派出所报案，他们会教训你：谁叫你惹是生非？谁叫你不赶快跑？行了，悄悄回家养养吧！这种事情甚至可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发生在新疆的高等学校中。**

一个小娃娃给你扔了一个石头，你跑过去把他打一巴掌？大人可能会生气，哎，你怎么打人，这么点个小娃娃你能比吗？汉族不是这样吗？一个汉族小娃娃给我扔一个石头，我跑过去打他一巴掌，他的父母、周围的年龄大的汉族人也好，任何人看到的话，肯定会说，哎，他打了石头不对，可他是四五岁的小娃娃，你那么大的人能打他吗？

维族贼比汉族贼的法律地位高？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走在闹市区中，你会经常发现一些维吾尔族小男孩从你的背后直接地、明目张胆地拉开你的挎包，拿里面的钱财……**

---

[1] 巴郎是维语中男孩之意。

难道外地没有吗？偷钱的哪一个不是这么做的？维吾尔小偷从别人挎包里把钱拿了，那汉族小偷怎么弄呢？不是也用同样手段吗？这能代表什么呢？

（读文章内容）**新疆自治区检察院的官员讲：如果按照刑法规定，偷盗五百元就够判刑的标准来判，那么新疆再修几座监狱恐怕也不行，所以少数民族的偷盗行为，判刑标准比汉族人高得多！**

他的意思就是维族小偷太多太多太多了。小偷这么多你抓嘛，难道维族人喜欢他们的娃娃偷东西？是他们的光荣吗？他的意思是说汉族人偷五百块可以判刑，可是维族人偷了一千块不判。有这种情况吗？谁能相信有这种标准？

如果是在内地出了案子，也许有可能，因为把小偷放进监狱或是看守所，里面没有清真的吃的东西，咋办？他们的生活怎么安排？警察一想太麻烦，得了，放掉，但那不是因为法律地位上维族贼比汉族贼地位高。连普通汉族百姓的位置都比维族人高，哪儿能维族的贼就位置高啊！

（读文章内容）**一九九三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的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笔者以为凶手有什么背景，后了解到，其父母不过是巴扎摆烤羊肉摊的，他本人也只是无业游民而已。**

杀了一个人就判了两年，这符合事实吗？在法律上认可喝醉以后杀人或者作案吗？你认可吗？喝醉代表什么呢？他也说了，杀人那个娃娃的父母是卖烤肉串的，他也是一个无业的人。难道新疆确实存在这种对少数民族优惠的法律政策吗？如果是这样，那法律就没有威望了嘛。

（读文章内容）**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仍然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

名汉族妇女下班后去巴扎买羊肉，在一个羊肉摊上看过肉后，其中一个妇女指着另一个摊上的羊肉对同伴说，那边的肉好，我们买那家的吧，话音未落，这个维吾尔摊主勃然大怒，大骂：你们这些黑大爷（侮辱汉族人的意思）敢说我的肉不好，我杀了你们这些汉族人，于是他操起牛耳尖刀，向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刺来，两个女人夺路而逃，这个手持尖刀的维吾尔人一边追，一边向碰到的每一个汉族人挥刀行凶，连续五六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吾尔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了警，一一〇接警后赶到现场，此刻，这个维吾尔族歹徒，已丧失人性，对警察也大开杀戒，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其继续行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杀伤，警察无法赤手制服他，只好一边疏散人群，一边将情况上报，得到批示后，才取枪将其就地正法。如果按一一〇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这个事情我听说过，他在编。事情是这样子，一九九八年八月份有一个女的和另一个女的去市场上买肉，当时她说买这一块，切了以后又说不要了，要那一块，然后按她说的切好了，也称好了。她又说不要。卖肉的问为什么不要？她说不要就不要！你怎么着？那个人气得，哎，我把肉按你说的都切好了，一会儿别人要不要还是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欺负人吗？就这样争起来了，争起来了以后，可能互相骂了吧，他气得捅一刀，那个女的就死了。死了以后警察来了，当时又捅死了一个警察，一个警察受伤了。他想反正要把我枪毙，他妈的我多杀几个人。这个作者说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没有立即执法的权力，必须请示上面，那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胡扯淡！当地任何一个汉族人不会同意他这种说法。

汉人自己的家园已经成天堂了吗？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正是由于政府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不务实的民族政策，既没有笼络到穆斯林的人心，也大大伤害了为支持边疆、建设新疆流血流汗的汉族群众。尽管有各种政策卡压，但是新疆越来越多的人才还是流向了内地，新疆许多部门由于汉族职员的流失，已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

支持边疆什么意思？建设新疆什么意思？他们难道是无偿的贡献吗？他们在这里纯粹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支持和建设来了吗？他们自己的家园已经变成天堂了，没有可以建设的了吗？他们就是那种很善良的感情跑到新疆来，无偿的贡献？这种好人，中国现在有几个？他们是来打工挣钱的嘛！

他的意思是新疆没有汉族人，就干不了正常工作了。汉族人回内地，不是什么政策问题对汉族人不利，是因为他们认为内地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比新疆好，而不是因为民族问题，或者因为他们在这里事业上比维族人难。他们本身就不想来！因为他们都不喜欢这里的气候。这个人这么写，意思是没有汉族人，正常的工作秩序就没有了。难道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秩序都不正常？就是因为没有汉族工作人员？难道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工作人员都应该是汉族人，才能工作很正常？不然的话就乱了？按他的道理，就可以这么解释。

维吾尔人和新疆其它民族的关系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新疆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视集中表现在以维吾尔族泛伊斯兰主义者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新疆其它民族的敌视上。众所周知，新疆主要由十三个民族构成，但是泛伊斯兰主义历来认为维吾尔族在新疆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歧视甚至仇视……**

我们把新疆其它少数民族比如说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都不看成外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都是突厥族人，信仰共同的宗教。他哪儿听到的这个话？比如说三区革命的时候，回族、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共同在一个战线。乌斯满当时也搞新疆独立，跟共产党打仗，打到最后。乌斯满[①]是哈萨克人，是吧？连三区革命的政权都跟中共联合了，可是乌斯满还没放弃武器，全是为了新疆。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说其它任何民族都被维族人当敌人，哪有那样愚蠢的民族？！

王力雄：维族有没有一些对哈萨克人看不起的呢……？

穆合塔尔：一般人里面肯定有，不是没有。不用说两个民族，一个民族之间，城市的把农村的看不起的情况也有啊。说人家脏，或者，啊呀，文化素质太低了！或者身上有臭味什么的。不同的人里面出现一些矛盾，看法不同，看不起什么的，永远避免不了。哪个民族里面都有啊，可是这不是局势，是吧？大局面不是这个。

（读文章内容）**四十年代新疆「三区革命」（中国共产党给定义的革命运动，其实质是疆独运动的武装活动，只是因为他们的矛头指向当时统治新疆的国民党政府，所以新疆和平解放时，许之以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加以安抚和收编。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新疆，自然，泛伊斯兰主义的「革命」矛头要指向现在的政府当局），其中一个口号就**

[①] 乌斯满，一八九五-一九五一年，哈萨克族，生于新疆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参加了一九四四年的三区革命，后与三区政府对立，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中共进入新疆后，乌斯满带领哈萨克人暴动。一九五一年二月被解放军俘获，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处决。

是：「杀回灭汉」，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民众也遭到他们的杀戮，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歧视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其它同样很早就居住此地的民族。

前面说的是真的，当时三区革命肯定不是为了中国革命。但是「杀回灭汉」这个口号他从哪儿听到的？当时提出过把移民赶出新疆。这个移民不包括全部汉族人。是政府强制带来新疆的移民。可是「杀回」这个口号，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也不会有。这可能是政府为了制造民族矛盾编造出来的。新疆近代历史最大的事情就是三区革命，回族人也加入了三区革命。很明白的嘛。我们的近代历史，有回族人用宗教名义欺骗，把农民起义带到很危险地步，那种情况出现过。一九一七年哈密农民起义，有个回民是杨增新的什么代表，当时他说，我也跟你们一样念经，以后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把你们带到乌鲁木齐，当杨增新的什么官，农民不满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不是杨增新大人干的。这个回族人用伊斯兰的名义把起义的人欺骗了。所以有些人这方面有一些看法，唉，这些回族人看到汉族人就说我们鞋子一样，看到维族人就说我们帽子一样。反正心理不稳，哪边有好处跑哪边，不可靠！可是「杀回」那种口号从来没有出现过。

王力雄：维族和回族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穆合塔尔：听说在十九世纪有过矛盾。回族这个民族感情上接近汉族人，历史上内地和新疆之间没有发生对抗的时候，内部暴乱的重要因素就是回族。可是一旦互相残杀的局面出现，民族问题出现了，他们把白帽子戴出来，那样的话汉族人也同情他，说回族不是维族，维族认为他是穆斯林，他们从双方都受利。

王力雄：东土人士有没有考虑过联合回族，比如说要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联合起来，要闹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有个缓冲了？

穆合塔尔：这个历史上有，比如说马仲英。

王力雄：马仲英实际上是打维族人的嘛。

穆合塔尔：不是，哈密农民刚起义的时候，他们把他邀请来的，他有才能，来了以后一看，兵多了，野心就大了，篡权了。可是刚开始，是吐鲁番、哈密的人把他邀请过来的，和他联合的，这个历史有。

王力雄：你觉得将来回族会站在哪一边呢？跟东土联合还是跟汉人联合？

穆合塔尔：三区革命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联合的。将来我看他们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大，回族历史以来没有国家，保持中立对他们有利，他们失去不了任何东西。

区分两种新疆汉人

穆合塔尔：（读文章内容）**似乎在主流社会里，大民族总是欺压弱小民族，小民族会引起广泛的同情。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大民族也会变成倍受欺压的少数民族。在新疆生活过的汉族百姓，对目前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处境，有着切肤感受。**

他的意思就是汉族在新疆受欺压。这个我估计在新疆定居下来的汉族人百分之九十五不会认同。可能他们认为这里的人不友好，少数民族仇恨咱们，可是他们没把自己看成被欺压的位置。外来民工可能例外，

王力雄：民工为什么不一样？

穆合塔尔：因为对民工不光是维族人的反感，新疆当地定居下来或是呆了二三十年的汉族人，也反感汉族民工。因为他们来了以后，社会治安不好。比如他们每年冬天春节以前回家嘛，能挣钱的挣钱，挣不到钱的呢，抢东西，偷东西。快到春节一个月以前开始，就是社会治安更乱了，抢东西、偷东西的人特别多。大多数都是民工干的。

王力雄：你说的是民工对社会的破坏性，刚才是说民工认为他们在这里是受欺压，你是从哪个方面这样看呢？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他们吗？

穆合塔尔：大家不喜欢他们。包括新疆的汉族人，所以他们很容易遇到的事就是被人看不起，受到侮辱。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很容易受到这种侮辱。

王力雄：那是，哪儿都是这样。

穆合塔尔：这篇文章看完，我最后的结论，这个作者是为政府出面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写新疆问题上存在民族不平等的情况，政府可能想，那好，我们也找个作者，写一些汉族人的情况如何不好，平衡一下。

王力雄：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作为在新疆呆过一段时间的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也不奇怪，因为的确有类似的看法。

穆合塔尔：如果他长期在新疆，来了二十年以上的话，他就是政府的人，因为他不可能不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是在新疆只呆了两三年、三四年的人，有这样的看法也可能。

反抗者与反抗组织

哈里发必须是穆斯林

王力雄：你介绍了民族主义人士在新疆问题上的主张，能不能再谈谈有宗教意识的那部分人，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穆合塔尔：他们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跟民族主义接近的。伊斯兰教的一个原则是哈里发[①]必须是穆斯林。由外宗教的人统治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激进的，要成立伊斯兰国家。

王力雄：你说的伊斯兰国家就是那种政教合一的，由教法统治的国家？

穆合塔尔：是。可是这部分人也就占到百分之二三十吧。他们总体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宗教修养也并不高，宗教知识不多，性格一般比较固执，具有爆炸性，很难说服。

王力雄：你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能提出独立建国要求，出发点在于历史，宗教人士的目标也是独立建国，但出发点是宗教，能不能从宗教出发点来谈一下？

穆合塔尔：宗教人士也是懂历史的，他们也认为这地方历史以来就属于咱们，他们要求独立的理由是根据历史，可是他们的政治立场或口号是宗教性的。他们不能够接受异教徒的管理，他们的统治者必须是穆斯林。

王力雄：这些宗教人士的代表人物是什么人呢？

穆合塔尔：现在他们大部分在监狱。政府把他们判刑了。他们的力量很分散，国际上也没有多少影响。有名气的是艾山•买合苏木，中国政府公布的十一个东土恐怖分子，他排在第一号，已经死了。他是宗教势力的代表。

王力雄：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说他是宗教势力的代表呢？

穆合塔尔：他以前也是个宗教人士，在乡里，学宗教的。可能没人认识他，也没见过他，但他的影响大。他在阿富汗训练了那么多的人，人们互相传说有这么个人，很多人就崇拜他，宗教人士认为他是他们的代表。

王力雄：为什么他不是民族主义的代表，而是宗教的代表呢？

[①] 哈里发，伊斯兰教社团领袖的称谓，原意为代理人、继任人。主要职责是执行教法，捍卫信仰和领土，行使政治权力，为穆斯林社会的世俗统治者。

穆合塔尔：他的口号是成立伊斯兰国家。

王力雄：其它的海外东土组织都是民族主义的吗？跟他的区别只在是要建世俗的独立国家，是吗？

穆合塔尔：是的。他们的区别在这里。

王力雄：艾山·买合苏木死了以后，他的力量就散了？

穆合塔尔：散了。宗教意识的人现在没有带领者，他们大部分在国内，是一个个分散的小组织，没有联合起来，所以很容易有过激的行为。

地下宗教组织的反抗

王力雄：你说有权威、有影响力的宗教领导者在监狱，是否在民间还会自发地产生一些宗教领袖，以宗教方式继续进行凝聚或煽动？

穆合塔尔：有，可是他们没有暴露自己，互相暂时也不了解。

王力雄：他们不进行组织和串联吗？

穆合塔尔：他们的方式换了。以前他们选择清真寺，在大城市里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政府知道他们，统统控制或者是被捕了。现在他们转到地下，用保密的方式，找有宗教意识的、信仰比较深的那些人单独谈，一两个人谈谈，另外一两个人再谈谈，不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前几年政府破了一个宗教组织，全疆有十万个教徒。

王力雄：是一个派别吗？

穆合塔尔：对，那个派别是伊朗传的。

王力雄：他们仅仅是传这个教派呢？还是为了用这个传教来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穆合塔尔：他们的目的是用传教的方式，把对政府限制宗教不满的人集中在一块反抗。可是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是全心全意地传教，就是为了宗教，不反对政府，也不反对国家，可是这种人也没有空间。如果他们在宗教上不能有自由，唯一的出路就是先把这个政府推翻，才能有出路。

王力雄：你认为这种人已经走到要推翻政府这条路上了呢，还是仍然认为可以不涉及现实政治，只管传教？

穆合塔尔：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希望了，百分之九十九没有这个希望了。八十年代还有希望。巴仁乡暴乱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这个空间已经没

有了。一九九七年伊犁事件以后，基本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全心全意宣传宗教的人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就只能进行反抗，只有在现政府不存在的条件下，他才能达到目的。他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传教，但当只是传教的人都没有机会，就会和政治上反抗的人联合了。

王力雄：按你的说法，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单纯的宗教人了，这些人都已经合在一块了？

穆合塔尔：他们没别的路，只有反抗这个政府，脱离了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政府倒下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别的路没有了。他本来不想别的，光传教，他把几个娃娃带过来讲一些宗教上的课，同样被当作非法宗教活动。现在清真寺的伊玛目[①]是什么人，是政府派的，政府自己选，每个月政府给开工资。清真寺在库尔班节、肉孜节，或者主麻那一天，信徒捐款的钱要登记好，然后要交给政府的民政局。需要用钱的时候，如维修，或者是需要花钱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清真寺要把用钱理由写报告，民政局批示后才能取钱。连清真寺得到的捐款自己都不能随便用，还有什么宗教自由呢？

王力雄：你觉得现在做宗教活动，即使在村里的清真寺，也都是在监视之下吗？

穆合塔尔：对。不是上面来人监视，是村里的人监视。

王力雄：你的意思是拿政府钱然后汇报情况的眼线？这样的人每个地方都会有吗？

穆合塔尔：应该有。现在去清真寺的人不多，因为去清真寺的人的目的是做礼拜。礼拜后伊玛目一般还会用十几二十分钟讲一些古兰经，讲道德上的问题和现实中对宗教不利的问题。现在不让讲了，政府的伊玛目也不敢讲什么，大家就觉得去清真寺没什么意思，就家里做礼拜吧。现在老年人还去清真寺，年轻人不太去，自己做。

王力雄：是不是年轻人实际上真做的也不多？

穆合塔尔：多，现在他们做礼拜的比八十年代多。以前进清真寺的人除了戴帽子，还要留胡子，现在能看见那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帽子也不戴，系着领带，看着很知识分子样子的。

维吾尔反抗者是否团结

王力雄：你认为将来宗教的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力量是会相互矛盾、斗争呢？还是会联合在一起？

[①]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阿拉伯语意为领袖、师表、表率、楷模等。现指那些以宗教为专职，率众礼拜和主持一地或一寺教职工务者，如清真寺伊玛目、圣地伊玛目等。同时，专门从事宗教研究并获得一定成就，或在某一宗教学科有突出贡献者，也称为伊玛目。

穆合塔尔：联合。

王力雄：在哪方面联合？是怎样的联合方式？如果暴力斗争宗教人士做，民族主义的人士不做，那么宗教人士会不会认为民族主义人士光是说，不行动、不牺牲？或者说民族主义人士反对恐怖活动，那么除了说和开会以外，他们还会采取什么行动？

穆合塔尔：民族主义一般尽量使用和平方式，比如示威游行、写文章。宗教人士之间不会指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团结才能达到目的，有了民族国家，宗教自由也有了。民族主义者也是信教的嘛！

王力雄：我觉得是理想化的一面，现在的现实是，即使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吾尔人中，那些海外组织都是分派的……

穆合塔尔：民族主义也不是不行动，也可能使用暴力，可是他们不使用那种自杀式的暴力。

王力雄：分开讲这个话题，是否能保证未来的维吾尔反抗力量都会识大局，保持团结呢？在我们外人来看——也许看得不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互相斗争、分派，无休无尽的内斗。

穆合塔尔：新疆没有派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宗教派别对抗，就是阿拉伯世界内部有。其它伊斯兰国家不出现这种局面。

王力雄：别的我不清楚，我知道中国的回族的教派斗争也很厉害。

穆合塔尔：回族有。回族已经产生一千三百年了，历史以来没过自己的统治。是很分散的一个民族，就是因为内部矛盾。维族人现在不搞派别。但是阿帕克[①]的时候，黑山、白山互相争了三百年。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局面，任何人脑子里面没有派别，连农民脑子里面也没有。我的老师在八十年代解剖这些历史，一个一个写，发表到「新疆文化」杂志上。不停的写了三年，写到了阿帕克，写到一八三〇年的时候，政府就不让发表了，他一半还没写完。

我的老师在文章中批评了霍加家族。霍加是领袖的意思。他的权威传给他的后代，延续了大概二百五十年。他们说是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代。但他们为自己家族的利益，经常利用外面的力量，例如和清朝联合，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现在被政府看作是对中国统一有贡献的。吐鲁番那个伊敏王，还有哈密王，这些王全都是霍加后代。政府一看我的老师开始批评对国家统一有贡献的人了，就不让老师的作品再发表。

[①] 阿帕克本名依达也提拉，是十七世纪中晚期伊斯兰教依善宗白山派的开山鼻祖，曾以喀什噶尔为基地，创建过第一个政教合一的「霍加」政权，在天山以南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力雄：当年阿富汗反对苏联的那些组织，他们之间也是占山为王。

穆合塔尔：阿富汗不一样，阿富汗不是单民族的国家，是几十个部落。他们还没成为一个民族，语言也不同。他们的每个部落有一个首领。而我们不是。阿拉伯世界也是部落和家族，一千年两千年的家族也有存在，像崇拜宗教一样崇拜家族的人还有呢。可是新疆不存在这个局面。

王力雄：你觉得现在海外流亡的维吾尔人之间团结吗?

穆合塔尔：年轻人之间团结。老一代说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们的发言权比你们多，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他们是这种看法，可是老的毕竟会不存在，现在一半已经死去了。

王力雄：那时候年轻人也会变成老人了，到时他们又会这么说。

穆合塔尔：不会。因为以前出去的，比如说一九八〇年以前出去的，或者是很小时候就跟父亲出去的，已经脱离家园几十年了，他们没看过新疆的实际环境，没看过这边人受的压迫。他们有些人搞这个活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名气。也有些人考虑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一些赞助，赞助里面有些钱他可以花掉。老的人里面有这种想法的。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出去的人不是，他们有牺牲的精神。他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活不下去或者挣不到钱、找不到工作，他们可以找到比任何人好的工作岗位，他们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得多，可他们放弃了这些，他们把家人亲戚和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全部放弃了，出去，为了啥？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跟那些老一代不能比，老一代已经不多了，有的人是七十岁以上。现在海外组织，重要人物或者干重要事情的都是四十岁四十五岁以下的。

海外反抗者有多少人

王力雄：你说的这种人能有多少呢？是几个？几十个？还是成千上万？

穆合塔尔：出去的人，除了去日本的以外，去其它国家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留在外面了。有些人回来在工作岗位上干了几年以后，这种环境的空气受不了，就办护照，以做生意的方式跑出去。德国大概有一千个家庭参与这种活动，每个家庭有两个或三四个人。在土耳其的人比较多，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城市，有五万多的维族人，是一九五几年出去的。

王力雄：还有伊塔事件去哈萨克的人。

穆合塔尔：对，那是一九六二年，当时去哈萨克的人大概有六十万，

还有一八八几年俄罗斯侵略伊犁的时候，出去的有十万家庭。

王力雄：那些人现在不参与这些事情了吧？

穆合塔尔：他们也参与。因为他们的亲戚还在这边，八十年代开放以后，就过来过去的。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到一九九五年，中亚的很多年轻维吾尔人搞这些活动，特别活跃。然后中国加强了对中亚国家的关系，那些国家的政府开始限制，不让他们搞活动，现在有些人就到西方国家去。

王力雄：目前国际上对维吾尔人的运动了解还是有限。

穆合塔尔：一九九七年伊犁事件以后，欧洲议会和美国议会头一次对新疆问题表态，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和平解决的愿望，宣布了一个决议。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从此以后，他们多次在新疆问题上，如热比娅问题上、关塔那摩的维族牢犯问题上表达了态度。一九九七年以后新疆问题开始国际化，中国政府对此也帮了很多忙。尤其九一一以后，中国政府电视新闻联播上公开东土问题，开记者招待会，在世界各地的记者面前大讲东土，通缉了十一位恐怖份子，在促成新疆问题国际化方面，帮助维吾尔海外流亡者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光靠流亡者，他们没有能力做那么大的宣传，政府帮了他们。

王力雄：维吾尔人相比之下还是缺少一个像西藏达赖喇嘛那样的有国际威望的领袖，将来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领袖？

穆合塔尔：肯定会形成的。我估计是在海外，顶多五年，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王力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①]现在是海外维吾尔人的统一组织吗？

穆合塔尔：是。大家都认可，要做任何一个行动，或者有什么意见，都会先通知大会。

维吾尔人现在能做什么

王力雄：从东土耳其斯坦建国角度，到现在为止都是从外部条件谈，如国际力量肢解中国，或是中国发生动乱等，但决定的因素还应该在内部，就是维吾尔人自己怎么做，做什么？还是光等着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或中国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外部变化，或是把外部因素当成辅助的，那么从你们自己角度怎么做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

穆合塔尔：内部现在能做的只是传播民族意识，利用各种场合、各种

[①]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为统一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由世界各地维吾尔组织组成的国际上唯一合法的最高领导机构」。于二〇〇四年四月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热比亚·卡德尔当选为第二届主席。http://www.uyghurcongress.org/cn/AboutWUC.asp?mid=1095738888

团体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一旦出现有利的国际形势或中国内部动荡，能够对思想纲领形成统一看法，不出现内部分化和派别。

内部工作只有在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才会有作用。现在失业情况严重，人们找不到工作，学生毕业后没有就业机会，会促使人们形成民族意识，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下降，重要原因是外民族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和生活空间。在和平的时候，中国没有经济上、政治上的波动，不会出大事，一旦出现波动，人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起来。刚开始我估计是用和平手段，不会出现暴力，但随着政府的镇压，会逐步形成反抗的暴力。后面的发展，目前还没有更多答案。

王力雄：你说到要防止出现内部分化和派别，但是我觉得民族主义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理念，在世俗理念中没有一个绝对权威，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要有逻辑的推论，谁的合理，谁的不合理，靠这个来取得大家认同。但是因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都会说自己的最合理，别人的有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派别？当争论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就会各自干各自的，形成不同的派别。而在宗教号令之下，可以高度统一，就是不争论，教主说了就听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西藏人有很多争论，究竟跟中国政府合作不合作？谈判不谈判？是要独立还是要高度自治？很多不同观点。但是最后大家都是一个说法，就是一切听达赖喇嘛，他怎么说就怎么干。只要他活着，就全听他的，等到他去世了，就各干各的。所以我在想，如果维吾尔人能整合成一个整体，宗教的力量可能要比民族主义的力量更大。宗教领袖的特点就是能出来整合所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服从他。但是一旦出现这种宗教领袖，又出来问题了，导致的结果就会变成伊朗式的革命，神权的……

穆合塔尔：我给你说，你对伊斯兰的理解不够。伊朗是一个特殊国家，伊朗的宗教是什叶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本不一样。古兰经是同样的，但是对宗教的管理方式不一样。现在伊朗军队、自卫队，那是正规军，一旦爆发战争，每个清真寺都要出几个兵。他们的军队还是以清真寺为主。他们的阿訇有职称，一步一步提高，绝对服从。他们是阿里的后代，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里面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他们的宗教是阿里的路，是最正规的，应该统治伊斯兰世界，所以伊斯兰的哈里发应该是他们那里出来。伊朗霍梅尼搞的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不一样吧？只能在伊朗出现，其它地方绝对不会出现。什叶派跟逊尼派有很大的差异。

新疆没有什叶派。新疆的穆斯林里面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什叶派，都说自己是逊尼派。历史以来，伊朗是邪教最多出现的地方。逊尼派的派别不多，什叶派对真正理想的伊斯兰看法不一样的各种团体特别多。可是他们为宗教牺牲的精神比逊尼派更强。新疆肯定不会出现伊朗那种什么都由阿訇管的局面。

王力雄：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从你所说的，我感觉民族内部能做

的事情并不多，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变化基本上只能靠外部形势的变化？

穆合塔尔：等待外部局势的变化，可是内部该做的事情也不少，重要的是宣传，把意识统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因为一旦出现合适的气候，出现有利条件，内部不能出现矛盾，不能出现派别。

监狱里的自由亚洲广播

王力雄：你觉得那时的领导核心是谁呢？会是境外的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吗？领导者的出现必须借助一些事件，比如某些大的运动。这些人现在都没有出头露面，境内跟境外的沟通也很差，受到重重封锁，大多数的人对境外组织的情况不会很了解。

穆合塔尔：可是你注意一点，我估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语广播。干扰有，可是他们不停地换位置，往前或往后稍微推一下，又好了，百分之七十可以听懂。京戏什么的在放着，嗒嗒嗒嗡嗡嗡，两种声音一块出来，我们可以分着听，只听一个声音（笑），没问题的。所以海外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以前我还不知道自由亚洲的维语广播，是到了监狱以后听到的。

王力雄：用谁的收音机听的呢？

穆合塔尔：监狱里的人的收音机，听的短波。

王力雄：大家都在一块怎么能听呢？

穆合塔尔：耳机呀，听的人如果信任你的话，会说你来一下，听听是什么。我那时才知道，在内地呆了两年不知道。前不久我去乡下的时候，在一个牧民家里，他也听。我一听就是这个声音。

王力雄：牧民是每天听吗？

穆合塔尔：乡下没别的事情，他们就听，还互相争论。国家公务员里面也有听的。他们对海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实话说，我是不听的，我觉得听那些不重要。我是从别人嘴里听到昨天自由亚洲说了什么，今天又说了什么。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听说，比如乌鲁木齐今天中午出现了什么事情，消息还没传过来，喀什的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从哪里知道的？国外电台公布的电话号码，不收费，这边人看到什么情况，打过去说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打这种电话的人多，所以电台能够很快播。

基地组织的维吾尔人

穆合塔尔：你注意到，美国没有把在阿富汗俘虏的维族人还给中国，

最早释放的还是维族人，其它阿拉伯人放得还不多，头一批放的是维族人。因为他们认识到，维吾尔人到阿富汗的目的，不是为了跟随本·拉登。他们是在本·拉登那里锻炼自己，进行培训，然后回到新疆来搞活动。这点美国在审讯过程中也认识到了，所以就把他们放了。放了以后，中国要求遣送，可是美国认为遣送中国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

王力雄：你觉得这些去阿富汗的维吾尔人是怎么回事？

穆合塔尔：他们的目的在于本·拉登提供资金给他们。他们在那训练，最终目的是到新疆搞活动。他们不是为了去巴勒斯坦或者车臣，他们都会回新疆。如果有必要，让他们去巴勒斯坦或者车臣，他们可能去，可是他们更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新疆。

王力雄：你有没有知道什么人去了呢？我的意思是说在生活中你们只是抽象地知道有人去了，还是具体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去的呢？

穆合塔尔：我在监狱里碰到一个小伙子，他去过克什米尔，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争的地方。当时是吉尔吉斯一些维族人提供资金让他那里训练，训练后回到境内，然后被关进监狱。他说他去的目的就是训练，那个训练基地是本·拉登提供资金的。

王力雄：米泉看守所原来有个外号叫「国防部长」的，他不是去过车臣吗？

穆合塔尔：他是怎么去的呢？是做生意亏了，在莫斯科有人欺负他。这个时候好几个车臣人过来，莫斯科车臣人特别多，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维吾尔，车臣人一听就赶走那些俄罗斯人。如果他们不帮他的话，俄罗斯人会把他打得不是人样，说不定还抢他东西，把他杀掉。车臣人问他干嘛来的，他说做生意怎么赔了，车臣人就问他想不想参加军队？他说好！就去了。

出了九一一以后，中央电视台上问了七个人，那天这个「国防部长」出现了，电视上问他在哪儿，他说我在阿富汗训练，我们的资金是本·拉登提供的。但他连本·拉登都没看见过。可能在训练上本·拉登确实给这家伙赞助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王力雄：当时判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穆合塔尔：他在车臣训练了一段，然后带着一些地图呀制造枪支的图纸呀想去巴勒斯坦，在莫斯科被克格勃的人抓了。克格勃的人发现他是新疆人，就把他交给了北京国家安全部。

王力雄：谁让他去巴勒斯坦？

穆合塔尔：车臣人。是他当时想学一些东西还是有什么需要。可是中国政府说他的目的是要到新疆制造事情，用国家安全罪的一百零三条把他判了七年。

王力雄：有没有那样的人，在这边犯的事本来不是太大，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犯了一点小事，容易被扣上分裂或恐怖主义的帽子，所以害怕了，跑出去就真变成这样的人？

穆合塔尔：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的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跑到外面，参与了一些活动，或是国外活动的人赞助了他们一些钱。国内安全局的人把他们家里人找去问：听说他在外面干了些什么。家里人告诉他这些情况，他一想回去麻烦了，不能回了，咋办？就投奔本·拉登了。

王力雄：在九一一之前，维族人中很多人就都知道本·拉登吗？

穆合塔尔：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培养的人大部分去车臣和波黑、塞尔维亚科索沃，或者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那打仗嘛！但谁都没想过他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把美国的大楼炸掉了。

恐怖主义与暴力斗争

遍地开花的自杀爆炸

王力雄：将来容易采取恐怖主义方式战斗的，主要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宗教人？

穆合塔尔：我刚才跟你说了，刚开始的时候会是和平手段，游行啊，宣传活动、造舆论，发传单。如果这时发生冲突，或是政府镇压，或者是汉族人担心维族人实现独立对自身不利，因此帮助政府，那时就会发生暴力。而进行暴力反抗的主要是宗教人士，比如那种自杀式爆炸，不是民族主义者能干得了的事情，一般人做不到，只有宗教人做得来。

现在的气候这样延续下去，如果政府的宗教限制更加严厉的话，他们也可能选择这种恐怖方式。因为用别的手段反抗，得到的效益很少，代价太大。他们会想，伊拉克或巴勒斯坦那种爆炸有很好的影响效果。我说过，最怕的就是他们模仿海外的活动，但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

王力雄：不过，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塔里班也好，基地组织，都是有很强大的组织在背后提供支持，才能形成有声势的恐怖主义活

动，但是在中国，你也说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一个凝聚核心，做起来是不是很困难？

穆合塔尔：不，我们听说伊拉克有很大的组织，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大的组织，有些是个人行为，那样的爆炸单独一个人就可以干，找到四五公斤炸药就够了，不一定非得有人支持或者帮助。可是媒体和世界舆论都认为是组织支持干的。

王力雄：一个人是可以干，但不一定会形成那种前赴后继，遍地开花的状况吧？

穆合塔尔：我跟你说，找不到道路的宗教人，考虑到底能做什么，只要出现了一两次这样的事情，让他们看到效果，就很容易变成你说的遍地开花。

王力雄：宗教人士选择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后面是什么宗教理念支持他呢？

穆合塔尔：如果他为了伊斯兰教发扬光大，为消灭伊斯兰的敌人而死的话，他会进入天堂。另一点，他会成为圣人，就是那种一二百年尸体还正正规规放在麻扎的那种。

王力雄：他都被炸碎了，怎么会……？

穆合塔尔：他的灵魂炸灭不了，他求的是灵魂世界。

王力雄：在古兰经里有这样的说法吗？

穆合塔尔：古兰经说自杀是不能接受的，是罪，可是伊斯兰教不是死的东西，特殊历史条件下，伊斯兰的阿訇毛拉可以宣布暂时的条规，比如说，传染了一种病，只要每人一天喝三杯酒，这个就病不会扩散，我们的阿訇就会宣布，人人可以每天喝三杯酒，不是罪，直到传染病结束为止，他有这个权力，可以这么做。

王力雄：我跟阿克在宁夏参加礼拜时，阿訇也讲过，如果是在荒野上饿得快死时，遇到一块猪肉的话，可以吃。

穆合塔尔：如果确实是没有吃的，为了生存，他可以吃，吃饱了就不能再吃了。可是如果有别的东西吃，别的生存方式有，他选择这个不行。当他们认为，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家园无法生存下去了，为了保护宗教和家园，选择自杀爆炸的路，没别的办法，是可以的。这种自杀不是杀自己，而是杀别人。现在伊斯兰世界，比如巴勒斯坦、伊拉克有很大的伊斯兰学者，可是还是选择这种自杀式爆炸。他们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

天堂仙女不是性的问题

王力雄：西方对此有一种解释，也许是一种丑化。一个法国女记者对我说，那些人之所以要当人肉炸弹，是因为阿訇告诉他们这样做，会有多少处女在天堂里给他们享受，意思就是说那些人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享受。包括丹麦的漫画风波，其中一幅漫画上穆罕默德对自杀爆炸的人说，天堂的处女已经不够了。

穆合塔尔：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老婆伺候你不是性的问题，吃饭的时候女人把饭拿过来是女人的义务吧？进入天堂的人，接待你的……不是处女，天堂那些很美的女的叫啥？

王力雄：仙女。

穆合塔尔：很多仙女会服务你。

王力雄：那你觉得这些人是为了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享受呢，还是为了……？

穆合塔尔：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享受是短时间的，而另一个世界——灵魂世界的享受是永久的，他们追求的是这个。尤其是那些极端的人，他们完全是为了灵魂世界的享受。肉体世界顶多八、九十年、一百年吧，可是灵魂世界是永久的。

王力雄：如果维吾尔人选择自杀爆炸，主要是从古兰经里认定这条路呢？还是看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这样做，学习他们？还有一条路就是他们崇拜的阿訇号召这样做，这一点我想在现在可能做不到。

穆合塔尔：能做到，也有这种人。我们的教派一般不会选择这条路，可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选了很多的方式和道路，可是都失败了，他们可能会想，在伊拉克，那么强大的美国也遇到了那么多麻烦，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温和派不得不接受巴勒斯坦的要求，做一些让步。看来我们也可以走这条路，学习他们。

我个人的看法选择这条路的可能性是有的。主要是宗教人士，因为宗教人士的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空间。政府现在对宗教的限制太多了，留胡子要强制刮掉，还收二十块钱。一个成熟的、诚恳的穆斯林受到这种侮辱，怎么办？做什么才能得到反抗的效果，死了也值得。想来想去，对中国、对国际社会，最有影响的就是自杀式爆炸。如果有威望的宗教人士在社会上能发挥影响的话，他们不一定选这条路。宗教意识达到一定程度，就不那么容易冲动。大多数宗教领袖的心是比较软的，宗教意识层次越高，就越善良、越软。可是有威望的宗教人士要么被控制，要么进监狱。而文化素质低、宗教修养也不高的人，性格比较倔，容易冲动。

王力雄：不过我觉得南疆乡下遇到的那些老百姓，给我的印象都是特别温和、善良、老实。

穆合塔尔：对，是这样。可是文化素质低的宗教人士不是那样，平时他很温和，可是你要跟他吵起来，他冲动最快，很容易冲动。

维吾尔民众对恐怖主义不赞成，可是不反对

王力雄：恐怖主义——现在这是很难听的一个词，但是会有它的迫不得已、它的合理性。维吾尔是不是也产生了这样一种势力？我想知道一般维族人怎么评价恐怖主义？

穆合塔尔：恐怖主义像你说的那样，是弱者使用的一种方法。实力不平衡的时候，力量相差悬殊不成比例，不可能用符合规则的那些方式。这里面最危险的，就是自杀性爆炸。大多数维族人还是不赞成这种方法，所以对新疆来说恐怖主义现在还没形成一种趋势。知识分子搞暴力反抗的话，可能只是针对公共设施的破坏，比如爆炸通讯设施，或者是石油管道、铁路这些。

王力雄：你认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参与恐怖活动会变成现实？

穆合塔尔：可能在失业的人中出现。他们不会把暴力用在移民身上或是公共场所，不去伤及人民百姓。可是宗教人士容易针对公共场所，我估计首先是针对移民。

王力雄：你说维吾尔人大多数不赞成恐怖主义，你觉得他们是从哪个角度出发？是从人性角度吗？还是认为没有作用？

穆合塔尔：是人性角度。他们认为这个有作用。他们大多数是不赞成，可是不反对。

王力雄：因为这个是有用的？

穆合塔尔：对!有用！另一点，对他们有利。

王力雄：有用在哪里？有利在哪里？能讲一下吗？

穆合塔尔：因为在社会有秩序，社会治安状况很安全的情况下，搞什么活动都很难。如果一天和田爆炸了，另一天伊犁又出现恐怖活动，政府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是吧？这种情况下，做一些事情，搞一些活动就比较方便。

王力雄：你是说那些不想搞恐怖活动，但是要搞独立的人，如果社会发生恐怖活动，他们就不会受到太多注意，就容易有空间？

穆合塔尔：政府的注意力分散了，把主要的目标放到抓恐怖活动上，有些活动就会比较安全。

王力雄：你说的还是想搞独立的人，对于一般老百姓呢，恐怖活动对他们是有利或者有用的吗？

穆合塔尔：一般平民百姓不会赞成恐怖行为，刚才说的，他们不赞成，可是也不反对。

王力雄：恐怖行动如果是在公共场所，有可能伤及各族人。针对汉族移民的恐怖活动，那些移民也是普通老百姓。在维族人眼里，认为是恐怖活动呢？还是属于正常的反抗？

穆合塔尔：他们认为这是恐怖活动，可是他们……我刚才说的，不赞成，不反对。

王力雄：是不是他们认为这种恐怖活动会使一些移民不敢再来了？

穆合塔尔：是的。另一点，增加对政府的压力，可以让政府调整政策。

王力雄：那会不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政府反而加强镇压？

穆合塔尔：肯定镇压，任何政府不会不镇压，那是肯定的。

王力雄：一般维族人看来，这是可以接受的吗？宁愿接受这样的代价？

穆合塔尔：可以接受。因为很多人说，现在的压迫、镇压还不够，政府应该更加严厉，更多压迫，就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未来处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不希望政策越来越好，如果政策越来越坏，人们的处境越来越难，对还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未来的人来说，可以说也是一堂课吧。

王力雄：就是所说的「促使人民觉醒」？

穆合塔尔：嗯，促使人民觉醒。我看到的人就是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部分人现在认识还不够，对未来的危险认识还不够。我跟你说过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不赞成暴力，主张和平，可是现在他们看到了，在他做和平活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暴力活动，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是有协助作用的。

如何区分恐怖主义和暴力反抗

王力雄：也就是激进派为温和派开拓空间。激进派往前打，温和派的空间就越大，政府就会愿意和温和派对话。因为只有激进派出现，才能显示出温和派的温和。没有激进派，温和派就被看成激进的了。这是搞政治的规律吧。那么，在维族人眼中，是否区分恐怖主义和暴力反抗？

穆合塔尔：是分开的，不赞成恐怖活动，赞成、支持暴力反抗。

王力雄：他们认为的暴力反抗是什么内容呢？既然恐怖主义和暴力反抗是分开的，你已经讲了恐怖主义是针对平民的，但只要是在公共场的暴力就可能伤及很多无辜、甚至伤及本民族的百姓……

穆合塔尔：这里面不考虑本民族。因为在城市里，你在哪个场所想搞爆炸，不能保证不伤害本民族，比如说新疆乌鲁木齐汽车爆炸[1]事件，维族人也同样受到了伤害。

王力雄：所以这是恐怖活动！

穆合塔尔：这个行为，当地人并不看成恐怖活动。

王力雄：那我就不是特别明白了，你说的恐怖主义到底是什么活动呢？

穆合塔尔：恐怖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当中产生的种族清洗。比如说不分对象杀汉族，或是针对居民区的一般平民进行这种行为，他们认为是恐怖活动。现在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里面，一半以上人的生存我们应该承认。但是针对那种政府组织一群一群来种地或者打工的移民的暴力反抗，他们认为不是恐怖活动。

王力雄：我现在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这个说法，会认为你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反抗二者基本是一样的。也就是理论上对恐怖主义不赞成，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恐怖主义都可以纳入到暴力反抗当中。你说的种族清洗现在基本不会出现，除非是到了真正天下大乱的时候，由军队去进行。

穆合塔尔：宗教人士进行暴力反抗的能力和技术都很低，比如他们设计一个爆炸的东西，可靠性或者力度也不够。他们的活动只能针对普通人，因为他没有能力针对政府。他们针对的人是各村的书记、乡长，对政府特别协助的那些人。或是针对新来的移民，想办法把他赶走，那不是恐怖活动。如果针对妇女儿童或者老年人的话，或者是针对已

---

[1]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乌鲁木齐市二路、十路、四十四路公共汽车发生爆炸，九人丧生、六十八人受伤。

经居住了二三十年的普通汉人的话，应该被认为是恐怖主义。

王力雄：比如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他们认为是恐怖活动呢，还是一个暴力反抗？

穆合塔尔：那个事件不是单纯的一个汽车爆炸，那是二月二十五号，刚好邓小平葬礼的那一天，爆炸时间也是北京时间十点，就是把邓小平的尸体送到八宝山[①]那个路上的时候，特别准确。当时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国会有很多改变，可能内地很多人也这么想过，新疆也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有这种看法：天下会大乱的！我估计他们想天下大乱。

王力雄：是用爆炸发出一个信号，点导火索？你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活动，不是一个恐怖活动？

穆合塔尔：对！

王力雄：当然任何一个恐怖主义活动，在任何场合进行爆炸，都是有政治目标的。你如果要说那不是恐怖活动的话，那么所有的都不是了……

穆合塔尔：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而是我们这边大多数人的理解。

王力雄：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的结论，就是从维族人眼中来看，只要是从政治目标出发的暴力活动，都是属于暴力反抗，而不是恐怖活动……

穆合塔尔：为了政治目标，但是有一种纪律性、有长远目标的、组织性的行为，不是那种盲目的行为。他们不看成是恐怖活动。

王力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和你刚才说的有矛盾，爆炸公共汽车肯定会伤及妇女、老人、儿童，你说过伤害老人、小孩是恐怖主义，但你的另一种看法，又是是必要的代价……

穆合塔尔：他们顾不了那些了。

王力雄：包括本民族人受伤害也都不在意了？

穆合塔尔：他们既然想成为点火人，就只能选择那个时间。

[①] 八宝山位于北京西郊，有中共高级官员的墓地和骨灰堂。

非暴力斗争的道路

王力雄：那么，主张以和平的、非暴力道路来追求民族独立，在维族中有没有？

穆合塔尔：有，可是很少。因为空间没有，环境没有。一九九七年二月五号的伊犁事件证明了，和平游行受到镇压，大部分人都进监狱了。所以那些想用和平方式、非暴力方式的人也认识到了，这个社会里，这种做法行不通。

王力雄：但是非暴力抗争并不是只有在政府不进行镇压，允许进行非暴力抗争的时候才去做的，那并不是非暴力抗争的理论。抗争遇到的必然是镇压，但是即使镇压，即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可是我们不用暴力来回答，这才叫非暴力抗争。

穆合塔尔：对！这种非暴力是甘地当时做的。但是印度的情况和新疆根本不一样。印度的英国人顶多是五六十万吧，军队和平民加在一起也就是这个数字。另一点，一九九七年伊犁那个活动中，我估计几千人被关进监狱。他们做的事没那么可怕，也没有做多少事，但是判刑最少三四年，多的十多年。进了监狱的人，政府还要给他们家里施加压力，进行威胁。

有个人把当时场面拍下录象，交给 BBC 的记者。BBC 记者出境的时候，中国政府把录象带查出了。那人仅仅为这个事就被判了十五年。他不是为了钱，他是商人，最起码有两三千万资产。

如果我们像你说的那样非暴力，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效益怎么衡量？如果中国内地能用和平方式转变成民主政治的话，这边用非暴力有可能，否则用非暴力，不会有任何效益。

通过暴力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来

王力雄：如果用暴力反抗，你说过双方力量差得太悬殊，维族人进行暴力活动的手段很缺乏，技术性很低，那么怎么能对付有上百万军队、垄断了全部武器的政权呢？

穆合塔尔：暴力也好、非暴力也好，或者是搞民主也好，参与这种活动的人，从全民族的比例上来说都是很少的。可能一百个人里有一两个、三四个吧，不会是全民族同一天行动。那就对抗不了政府。可是，很多人没有这样思考——如果政府和民族的关系，和民众的关系，摩擦越扩大，就会促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参与到政治中。如果这么看，就应该想办法把很多人拉进这个政治活动中。

王力雄：你说暴力反抗是把其它的人拉进斗争的一种方式?

穆合塔尔：因为他们使用暴力，政府就要镇压。在镇压过程中，会把不该镇压的人也镇压了。扩大了镇压，或者是镇压了无辜的人，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对政府的不满。一九九〇年以后，正是因为很多暴力事件出现以后，民众对政府统治的信任大大下降了。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搞政治活动，一方面是在把政府和民众的、民族和民族的矛盾加大。

王力雄：那么新参加进来的人是继续做暴力反抗，还是做非暴力的反抗呢？

穆合塔尔：看他们的不满到了哪个程度。

王力雄：我开始问的是如何用低级的暴力去战胜国家机器的暴力，你的回答是通过暴力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来，那么拉进来以后，还是要走暴力的路……

穆合塔尔：可能那时候社会大部分人用非暴力的方式、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另一部分人可能还是继续使用暴力方式，那样会使很多汉族人不满政府，认为政府的镇压不够，对本民族的利益保护得不够。如果政府提高镇压，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如果新疆形成中东的形势，国际社会也这么认为，就会参与进来，把新疆问题变成国际化的。的确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有牺牲，可是希望以后能得到的东西更多，现在不愿意付出代价，以后的日子会付出更残酷的代价，所以他们愿意付出这种代价。用暴力方式把全民族、全社会拉到这个政治环境之中，让温和派的活动空间又大了一些。或者政府到时候可能允许一些非暴力的反抗手段，愿意让局势向温和的方向转变。

王力雄：从你的角度归纳一下，这样是不是比较明确：就是说，应该把暴力反抗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启动这个民族争取独立运动的开始手段。当通过暴力反抗吸引了国际注意，唤醒了境内民众，扩大了抗争空间，全民的运动发动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把全民运动引向和平道路上。

穆合塔尔：对。

王力雄：但是这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阿拉法特就是这样，他是以恐怖活动开始的，也成功于恐怖活动。正是因为他的恐怖活动，巴勒斯坦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自己也成了巴勒斯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上台执政以后，开始跟国际社会打交道，这时候他需要变成和平形象，转化成和平方式，但是他培植出来的恐怖暴力已经不能由他控制了，新的恐怖主义者不断出现……

穆合塔尔：不！阿拉法特不希望把恐怖活动全停下来。哈马斯的存在，对和平进程的发展有好处。他也不想控制这个局面。一旦他控制了，他的地位，他对美国对以色列的重要性就不存在了。对哈马斯的存在，美国、以色列不想用自己的力量镇压，希望靠阿拉法特处理这个问题。阿拉法特的重要性就在这。他的地位、国际威望更加提高，慢慢形成了这么一个民族英雄和领袖人物。阿拉法特处理不了哈马斯吗？开个会就把他带回来了！不是抓不到！可是他做出在办的样子，每天说不要搞恐怖活动，可是他没有实际行动。

王力雄：那好，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即使将来出现和平的大规模的民间运动，暴力反抗同时还是要继续，两手同时存在，才能够达到最终目标？

穆合塔尔：那要看大的局面是否定好，就像一九九四年阿拉法特和拉宾为巴勒斯坦地位签了和平协议，类似那种协议不产生，就会像你说的那样，和平和暴力一起实行的情况会延续下去。

东土力量可以利用的国际条件

错误在伊斯兰统治者

王力雄：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有一种对立。这种对立被称为文明的冲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了一套理论，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世界的主要冲突。九一一之后，这个理论似乎得到印证，现在西方的很多战略也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基础。那么，我想问的是，维吾尔一方面是属于伊斯兰宗教和文明体系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在争取自身权利和未来的过程中，主要对手是中国政府，在和中国政府进行抗争时，东土独立人士是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同盟，并且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未来蓝图。从平时接触中，能听到很多维吾尔人对美国极其称赞，表示向往和羡慕。而美国却被伊斯兰世界普遍视为魔鬼。那么从维吾尔的角度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来摆平这种关系？将来是更多地希望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支持、联合呢？还是得到美国与西方的联合和支持？这中间是存在分歧的，你们的民族主义人士和宗教人士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不同路线？

穆合塔尔：现在不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立，因为伊斯兰世界大多数是独裁政权，和中共差不多。他们搞的是伊斯兰社会主义，也是纳赛尔主义。纳赛尔主义想走社会主义和伊斯兰的中间路，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文明引起的，而是伊斯兰社会党对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

王力雄：那你认为在目前状况下，错误是在伊斯兰这边而不是在美国那边？

穆合塔尔：错误不是在伊斯兰这边，而是在伊斯兰的统治者，由他们的错误政策、错误判断引起的。如果伊斯兰世界二十年以前或者十几年以前能走到民主的路上，我估计现在的局面不会出现。他们都在互相争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比如说纳赛尔、穆巴拉克、卡扎菲、萨达姆、叙利亚的阿萨德。他们个人的政治理想往往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名义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名义，但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或拥护宗教的人。

现在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家族统治，阿拉伯国家都是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有政党的国家大部分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复兴党里面还是由一个家族当权，像伊拉克萨达姆家族、叙利亚阿萨德家族、埃及穆巴拉克家族。比如说穆巴拉克，他掌握权力二十五年了，没有放弃，阿萨德把权力交给儿子，萨达姆本身也想把权力交给儿子。所以阿拉伯世界所走的路，对时代潮流，对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概念来说都是错的。民众也不拥护他们。我去过叙利亚，叙利亚人当时都在等待阿萨德死亡。他们希望阿萨德死后国家政治上能出现一个转折点。可是他儿子上台政治上照样抓得很紧。所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代表民众的意愿。九一一事件导致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对立，造成这种后果的人应该是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不是阿拉伯民族，也不是伊斯兰世界。

王力雄：为什么这些统治者既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又不符合阿拉伯或者是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心愿，但是这样的政体、这样的独裁者却是伊斯兰国家的主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没有自己走向民主道路的内在逻辑……？

穆合塔尔：有。比如说一九八〇年叙利亚发生了大规模民主运动，可是当时阿萨德使用了全部军队包括空军镇压。民主人士流亡避难，去了美国、欧洲、巴西这些国家，现在巴西的叙利亚人比较多。伊拉克也出现过民主运动，可是也被镇压了。另外阿拉伯人有一个民族性，他们家族概念特别严重，家族地位他们认可。比如说哪个家族的威望高，他们就跟随他，盲目的跟随。阿拉伯民族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很明确，可是是很不团结的一个民族，没有长远眼光的民族。

王力雄：你是仅指阿拉伯世界呢？还是指包括突厥民族在内的伊斯兰世界？

穆合塔尔：阿拉伯。比如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了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是从伊斯兰的利益出发，而是从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出发。协助英国、俄罗斯或者法国那些国家。其实奥斯曼帝国当时是世界比较民主的帝国，这是西方人也认可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方式是你管自己可以，我只管军队……可以说当时就给了当地人高度自

治。但阿拉伯人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跟着英国和法国，可是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一下降，伊斯兰世界全部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地了，就出现了巴勒斯坦问题。如果他们确实走伊斯兰道路的话，不应该那么做。处理一个宗教内部的问题不应该连手其它宗教的人，阿拉伯民族这样做，可以说是没有正确世界观的一个民族。

伊斯兰需要改革

穆合塔尔：美国现在的行为对伊斯兰世界不利，可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是很好的。如果美国把阿拉伯独裁政权全都消灭了，阿拉伯人民就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比如说萨达姆政权，没有美国参与，伊拉克人自身的力量推翻不了萨达姆政权。

阿拉伯社会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但不是民族主义者，过去他们是民族主义的，可是以后就跟中国共产党变了一样，他们也变了，是为自己家族的政治经济效劳，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他们是不管的。所以阿拉伯世界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前途并不光明。阿拉伯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抗里面会失去很多东西，他们会失败，这是肯定的！

王力雄：你是说这些独裁者会失败？

穆合塔尔：他们会失败，包括伊朗。

王力雄：那会不会让伊斯兰世界觉得又一次被西方征服了？

穆合塔尔：肯定！

王力雄：那他们会更加不满和仇恨，也许原教旨主义更加被人接受。

穆合塔尔：可是这也使他们会思考自己呀，反思，他们肯定会反思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然后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王力雄：他们会找到错误和缺点吗？我觉得，恰恰每到遭遇挫折的时候，更多的人是在向回归传统的方向走，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说现在的错误是因为违背了过去的传统，我们应该往回……

穆合塔尔：可是过去的那个传统，按原来的形式拿过来，不适合现在的潮流。我们好几个朋友曾经谈过，伊斯兰本身需要一个改革，这意思不是改变古兰经，而是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概念需要改革。

王力雄：你说的哲学概念指什么？

穆合塔尔：比如说，基督教是一直不断自己改革的一个宗教，例如新

教的出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基督教也在很大方面让步了。伊斯兰世界也可以说是从一种封建状态下进入现在的世界，他们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也没有文化革命，什么都没有。所以伊斯兰世界需要按现代的生活方式来解释古兰经的概念，不是改变古兰经。这是可以做的。穆罕默德都说过，不要把我的概念解释得更复杂，规矩不要太多太严厉，这样我的教徒会烦，尽量方便一些，要适合当时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情况要结合。可阿拉伯人把自己当成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似乎他们代表伊斯兰。可是其它伊斯兰世界的人不这样看。

任何民族都有缺点，不过阿拉伯人团结的意识特别差，往往是为了家族，出现很多矛盾。埃尼·阿里去世以后，伊斯兰世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种家族争吵，自己不能好好地治理自己。八世纪、九世纪、十世纪，阿拉伯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实力，可是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如果阿拉伯世界在科技方面跟不上欧洲、美国和西方基督徒世界，永远也别想和他们平起平坐。现在他们光靠用石油武器，说石油是真主给我们的，可这是有限的呀。阿拉伯世界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富，一种是特别穷。穷人没有思维能力，穷人能想啥呢？我们维族人有句话，吃饱的人没有不想的，吃不饱的人没有不吃的。但是人太富了本身的感觉也会失去。维族人的话来说就是：眼睛周围装满了油。

王力雄：为什么叫装满了油？

穆合塔尔：一般情况下眼睛里面不会装满油的，可是他太富了，很容易把眼珠周围装满了油，看不清外面。阿拉伯世界就是这种局面，有些国家特别富，眼睛里面滴了油了。有些国家特别穷，想象不到更远的东西。现在阿拉伯世界和美国对抗，其它伊斯兰世界也和美国对抗，可是引起这种对抗的还是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出现的反美，煽动他们的还是阿拉伯人。

王力雄：伊斯兰教宗教方面的最高权威和解释权是不是在阿拉伯世界那里呢？

穆合塔尔：这个不是定死的，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往往阿拉伯人看成这是他们的地位。

王力雄：是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他们的声音能够传得比较远，能够操纵一些穆斯林知识界和群众？

穆合塔尔：对。比如说沙特，他有钱。

王力雄：你说阿拉伯人自己没有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的话，改变这个局面靠什么？

穆合塔尔：比如现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抗出现了，很多人使用各种反抗手段，可是都是无效的，他们就会给他们的领袖、宗教人

士提问：你们选的这个路没有效果，为什么？是我们做得不够吗？还是你们选择的方向不对？有些阿拉伯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更多的人会思考这个问题。

王力雄：你刚才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或哲学应该有变化，靠谁呢？新的先知会出现吗？谁能有这个权威？

穆合塔尔：穆罕默德说过不会再出现先知了。新的权威不属于哪一个民族。马丁路德出现在欧洲，为新教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在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对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人。可这个人在哪，哪个民族里面出现，这个很难说。

王力雄：他需要先被大家认可、接受，是一个类似圣人的地位。

穆合塔尔：伊斯兰教不认可任何圣人的地位。一个大清真寺阿訇，只能在礼拜时候是阿訇。其它时候跟其它老百姓一样，自己干活，自己吃的自己找。

王力雄：这是不是也是造成伊斯兰世界派别林立相持不下的一个原因呢？

穆合塔尔：和平年代出不了领袖。现在阿拉伯世界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了，是吧？战争时代出现很多领袖，很多政治家、哲学家，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思考的新的哲学概念就会出现了。

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有利于东土独立

王力雄：维吾尔人的目标是建立独立国家，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穆合塔尔：有。只是时间问题。九十年代后世界范围民族国家形成的速度加快了。世界各地以前没出现的很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这也刺激了维吾尔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片土地能独立的可能性有。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形势、世界范围的反恐浪潮，眼下对我们不利，不过是暂时的。

王力雄：你认为不利的国际形势会怎么转变到对维吾尔独立建国有利呢？

穆合塔尔：在伊拉克、伊朗，或者是中东国家、伊斯兰国家，美国希望改变他们的面貌，把他们变成民主国家，这种推行民主对我们的长远有利。因为当那些国家实现民主化后，民族意识会更强，民主和自由的广泛传播，使我们更容易得到那些国家人民的同情，并获得他们的资金援助。

王力雄：就是说这些国家一旦民主化，会更支持你们……？

穆合塔尔：我们在那边可以自由的活动，他们不会限制，因为民主国家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言论自由；我们利用宗教的共同点给他们宣传，进行政治活动，可以引来他们的同情心和各方面的协助。这在现在是不行的，因为伊斯兰国家大部分和中国关系好，和中国一样都是专制国家。统治者从个人利益考虑，只能靠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对抗美国方面的压力。毕竟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面，中国是可以投否决票的。而一旦实现民主化，那些国家就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他们会同情和接受维吾尔，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而中国和他们的文化是不一致的，因此中东的民主从长远看对我们是有利的。

你注意过没有，全世界跟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就是阿拉伯世界，因为他们性质很相似。如果中东现在不出现这种局面，比如不出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抗，阿拉伯世界的独裁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只发生一个九一一，光打阿富汗，把本·拉登抓走，阿富汗奥马尔政权倒台，美国就回去了，不打伊拉克，其它地方也不动。如果是那样，阿拉伯世界对我们一点好处也不会有。

王力雄：你是说对维族不会有好处？

穆合塔尔：不会有。而现在这样会有好处。如果正确的政权在阿拉伯出现，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阿拉伯的赞助。以前的阿拉伯政府对我们没有支持，以后会有。维吾尔流亡者现在为什么不到伊斯兰世界，而是跑到西方世界？

王力雄：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反而对维族流亡人士采取打压吗？

穆合塔尔：他们没打压，可是他们在政治利益上和中国是一致的，在国际舞台上的看法、出发点，都是一致的。

王力雄：那他们对维族人是支持还是镇压呢？

穆合塔尔：民间组织、个人、人民是拥护支持的，政府不支持。但是其它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不一样。比如说土耳其，政府表面不支持，上台的哪一届政府都说我们不支持，可是民间组织，反对党提供帮助，政府可以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是民间组织干的。我们进入土耳其的人，签证时间到了，不会被赶出去。但是像阿拉伯国家，签证时间到了，就让你到别的国家去。土耳其不会那么干的，可以给延长签证时间，到你自己离开为止。

土耳其有艾沙的纪念牌[①]，在伊斯坦布尔索非亚教堂后面，纪念牌上

[①] 一九九五年，九十四岁的艾沙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土耳其朝野政党领袖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参加吊唁的民众近百万。艾沙被葬在土耳其两位前总统的墓地旁边。土耳其政府还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座艾沙纪念公园，并在园中树了一面东土旗帜。东土国旗和土耳其国旗都是一个月牙，只是底色不同，东土为蓝色，土国为红色。（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268）

面有土耳其和东土的国旗，那是铁做的。中国外交部抗议，土耳其外交部说，拿掉吧，纪念牌还留下，把东土的国旗拿掉。派了几个人，正要拿的时候，一个酒鬼看到了，过来问：「你们干嘛呢？」

王力雄：酒鬼是维族吗？

穆合塔尔：不是，是土耳其人。干活的人说，外交部的事情，你管啥呢？——什么，外交部的事情？这是突厥人的国旗，不是外交部的国旗。

王力雄：突厥人的国旗是指哪个？有一个全世界突厥民族的旗帜吗？

穆合塔尔：不是，但是我们都是突厥族，我们的旗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旗，他们的旗我们也认为是自己的旗。酒鬼说，突厥人的旗只能升起，不能落下！你们他妈的搞什么？来啊！来啊！来啊！他就喊。那时候土耳其出现了大概十万人的游行，抗议政府这种行为。

我那次去土耳其，入境官员用英语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是东土耳其斯坦来的。他们表现同情我们，很关心，说你们是在汉人手里吧？情况怎么样？告诉我们在土耳其应该注意什么。所以我们在伊斯兰世界，在阿拉伯世界，以前得不到政府的赞助和帮助，只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可等到那些国家实现民主，我们有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伊斯兰和西方的对抗，短时间内对我们来说是耽误了事情，可是长远看还是有利的。

隔着一个国家会使中亚更安全

王力雄：目前同为突厥族的中亚国家为了减弱俄罗斯的影响，也在接近中国。这也是东土独立的不利因素吧？

穆合塔尔：他们接近中国的目的，是想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保持着平衡，他们想脱离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因为他们在一百年左右是在俄罗斯的影响范围生存下来的 ，一下子脱离出来是不可能，而且俄罗斯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在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以此保持自己的稳定。

上海合作组织[①]对东土在中亚的活动可以说已经限制到高峰点了。可是中亚国家也是会转变的，他们都是独裁政权，是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共产党的书记当了总统，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放弃权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都是突厥国家。吉尔吉斯经过颜色革命，把阿卡耶夫赶出去了。可是它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还保持在两个大国家里面，走中间道路。长远看，他们不希

[①] 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SCO) 由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二〇〇一年成立。蒙古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为观察员。

望有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的人口的一个国家当邻居，对他们有威胁。如果他们和中国的边界能够远一点，中间隔着一个国家，会使他们的国家更安全。

王力雄：你说他们希望新疆是独立的？

穆合塔尔：对！他们一直允许流亡的维吾尔人设立维语电台，办维文报纸。但是光靠感情不行，他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好，国际地位不高，因此他们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放弃了支持东土独立的事业。可是他们的经济搞好了，民主实现以后，人们的感情还是在咱们这一边。

美国会利用新疆问题肢解中国

王力雄：可是对东土独立人士，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即使那些国家感情上站在你们一边，可是他们并不敢跟中国对抗。

穆合塔尔：对，不敢对抗，他们不会以出兵的方式帮助我们，但是会允许他们国家的维吾尔独立事业活动者自由活动。

王力雄：仅凭能够自由发表言论、进行境外活动，就能战胜中国吗？

穆合塔尔：可是我们还会有国际上各方面的协助。中国现在可以说是美国唯一的威胁，对日本、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威胁。

王力雄：你觉得这些国家都想肢解中国？

穆合塔尔：对，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肢解南斯拉夫利用波黑冲突一样，他们唯一能利用的是新疆。美国和任何国家都不会是全心地帮你，而是利用。能利用的王牌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所有民族问题中，新疆问题容易利用。

王力雄：但这只是猜测，人们说美国有肢解中国之心，但美国到底有没有切实的计划，不知道。

穆合塔尔：那是肯定有的！

王力雄：肯定？这个你没法肯定，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计划，必然是绝密的。

穆合塔尔：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他们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肯定会向周围扩张的。他们扩张的唯一出路就是中亚和俄罗斯，没有别的地方。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美国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的话，要么是坚持现在的

路，要么变成民族社会党。一旦变成民族社会党，它就会往国外扩张，没别的出路。

从中国现在的趋势看，多党制是做不了的，他没创造这种环境，没有一个形成多党制的空间。可是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直线，像现在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九，这是暂时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五年或十年以后，发展的步伐慢下来或者停止以后，社会的不满马上就出现了。他靠什么把不满的情绪给控制下来呢？只能用民族社会党的形式。

王力雄：什么是民族社会党？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

穆合塔尔：社会党知道吧？希特勒的党就是社会党。

王力雄：国家社会主义党？

穆合塔尔：对，国家社会党，不过他们不会以国家的名义，而是以民族的名义。

王力雄：你的意思是中国会走上法西斯道路？然后会引起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反对，把他肢解掉？

穆合塔尔：对，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会和美国，还有日本冲突的，也会跟俄罗斯冲突。在中央政权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肯定内地中央政府也是动摇的，那时候西方国家、美国或者是俄罗斯，就会以民族的理由肢解中国。

我们一、二百万人会死去

王力雄：假定你说的肢解情况能出现，也早有人指出，即使是被肢解后的新疆，现在也已经有了八百万汉人，比维族人的数量少不了太多。新疆汉人掌握着军队、财政、经济、石油等主要的资源。新疆不像西藏，汉人在西藏进行战争，必须从中国内地运送战争物资，比如燃料、石油、包括粮食等，而新疆本地可以解决这一切。

穆合塔尔：一旦爆发内战，新疆汉人的百分之六十不到一年就会自觉自愿的回去。最起码退休的人、经济情况好的人都会回老家。汉族现在老了、退休了，都回老家，是趋势。汉人娃娃能考上内地大学的，百分之九十不回新疆。

王力雄：但是也有不同的，新疆汉人现在也有第三代、第四代……。

穆合塔尔：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去，我们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可是汉人有老家，会想离开，一边打枪一边往东走。有枪，可子弹有限，一百发，两百发，打完了怎么办？还是老家去吧，有亲戚朋友，在那里呆着算了。另一点，新疆的汉族人文化素质低，现在共产党宣传中国国力发达，是民族自大的时候，汉人把中国看得很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以用民族情绪控制社会。可是一旦老百姓有一天发现这个民族的实力不是那么强，会失望得更快。

汉人有军队，新疆的建设兵团也有武器，刚开始可能我们亏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二百万人会死去。但塔利班也不是全靠自己，伊斯兰志愿军历史以来就有。车臣从来没有花钱邀请过人，有很多人志愿帮助车臣打仗。全部突厥人口有一点五亿——土耳其快到八千万人，乌兹别克有两千五百万人口，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族也有一千万以上，吉尔吉斯有四百五十万，然后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还有俄罗斯的塔塔尔。车臣也是突厥族，俄罗斯境内有七个嘛八个突厥族的共和国，都会支持我们。

让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首都

王力雄：这之间有没有冲突？一方面要借助伊斯兰世界的帮助，一方面又要依靠西方和美国。而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对抗。

穆合塔尔：很多中国人把伊斯兰世界看成是阿拉伯人，研究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他们往往研究阿拉伯世界，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其实阿拉伯人可能全世界穆斯林的十分之一。阿拉伯总共人口是一点一亿还是一点二亿。

王力雄：不过和西方的对抗并不局限在阿拉伯世界，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有嘛，即使有些国家的领导人站在美国一边，下面的民众还是很多人是反对美国和西方的。

穆合塔尔：民众主要是同情巴勒斯坦事业。本•拉登和西方作战的原因也是为了巴勒斯坦问题。美国的立场是支持犹太人一边，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比较强，影响也特别大。本•拉登的目的是想用恐怖行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希望冲击美国，然后让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我估计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这个。可是他判断错了。

全世界穆斯林同情巴勒斯坦的重要原因就是耶路撒冷问题。新疆大部分人对巴勒斯坦比较同情，主要原因也是耶路撒冷问题。耶路撒冷是伊斯兰的第二个圣地，现在只能由巴勒斯坦要求耶路撒冷的主权，其它阿拉伯人或者其它穆斯林国家不能要求，因此阿拉伯人利用伊斯兰的名义，煽动其它穆斯林。为巴勒斯坦事业做贡献。伊斯兰世界所有人是脱不了身的，虽然阿拉伯世界不是咱们的事业，但是为了耶路撒

冷的事业作贡献是任何一个穆斯林的义务。阿拉伯人利用了这种心态。所以中东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也不是有害的事情，是暂时的，美国人肯定哪一天就会回去，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肯定会退兵！一旦耶路撒冷的问题解决，阿拉伯世界就难以再用伊斯兰的名义煽动全世界穆斯林，其它问题就不存在了。

王力雄：可是目前看起来，耶路撒冷问题似乎看不到能解决。

穆合塔尔：对。西方协助犹太人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耶路撒冷问题，因为耶稣是耶路撒冷出生的。基督教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这个方面犹太人和基督教有共同点。基督教也想把耶路撒冷夺回去，当年十字军的主要目的也是耶路撒冷。现在欧美无法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又不希望耶路撒冷全属于伊斯兰世界，比起在伊斯兰世界手里，还是在犹太人手里对西方来说比较合理。所以重要问题是耶路撒冷。

王力雄：当年耶路撒冷要是由联合国来管理的话，会不会好一些？

穆合塔尔：这样解决是最好的方式。把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呀、海牙国际法庭呀全部组织和总部搬到耶路撒冷，变成国际化城市，由联合国管理这个城市，变成一个世界的首都。这是解决的最好方式。

维族人赞成资本主义

王力雄：你周围的维吾尔人是怎么看本·拉登的呢？

穆合塔尔：伊斯兰世界同情他，可是他们不赞成他。大部分维族人认为他把我们的事业发展阻挡了。他可以用别的方式。他当时要是炸掉了五角大楼或者白宫，肯定是英雄。可是他炸的是帝国大楼，那个名声很难听。里面也有一个维族女的，是从哈萨克到美国去的。

王力雄：但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穆合塔尔：可是我们赞成资本主义呀！我们不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性质就是资本嘛！

王力雄：但是古兰经里更多的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吧？

穆合塔尔：有。所以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利用这个，把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混在一块，弄出自己的党。听上去似乎很符合古兰经，可伊斯兰教本身不赞成这种行为。

王力雄：你觉得维族人多数是赞成资本主义？

穆合塔尔：赞成资本主义。因为资本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活动中，交流过程中，全都是资本的交流，资本的活动。这个社会的运转就是资本的运转，还能考虑什么别的因素吗？

突厥人不会联合成一个国家

王力雄：现在当局说「双泛」，一个叫泛伊斯兰主义，一个叫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指宗教方面，而泛突厥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你觉得这两个潮流是存在的，并且在发展吗？跟新疆和维吾尔族有什么关系？

穆合塔尔：宗教人士以前大部分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不符合世界的潮流。泛突主义一直存在，民族主义者就是泛突主义。可是他们也不会从泛突的角度出发，因为西方、阿拉伯世界、俄罗斯，不希望看到泛突。如果全世界突厥人联合成一个国家，从中亚到土耳其、西伯利亚到新疆这边出现一个统一的突厥族国家，那对俄罗斯、对阿拉伯世界来说，不是威胁吗？政府正在制造泛突的这个概念，但我们的名称是东土。我们现在没说全世界突厥人建立成统一国家，自己还没有独立，他妈的哪来那个全世界突厥人建立一个国家的概念？没出生的娃娃，哪有走路、跑步的事情！

王力雄：那你觉得从长远来讲，这是不是一种理想呢？

穆合塔尔：那不可能！在文化的对抗中，突厥人站在一边，可是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他们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说没有。这只是个理想，按中国的话说是达到共产主义的事。

王力雄：像欧洲联盟那样也是有可能的吧？

穆合塔尔：有可能。欧洲联盟那样有可能。帝国式的或者是中国说的统一国家，那种可能性没有！他们周围的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中国，人口多，国家力量也大。中亚国家的唯一出路是互相团结，进行联盟，不然对抗不了周围的国家，任何一个单独国家对抗不了周围的国家。分散开，中亚国家人口少，军队花费出不了很多，形成军事联盟，才有能力对抗任何一方。所以中亚国家今后的出路还是团结，对这一点中亚国家也认识到。可是现在中共为了新疆问题，给了他们很多的钱。好吧，暂时新疆问题他们也解决不了，那就拿钱吧。中国政府给的钱一停止，他们就把中亚国家的维族人活动放开，中国政府又跑过去给他钱。

王力雄：成了要钱的手段了。

穆合塔尔：嗯！得到外资的一种手段。他们不是为了联合中国，而是一种利用中国的手段。

苏联解体东土才能独立

穆合塔尔：本来伊斯兰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伊斯兰世界各方面没有参与的意识，可是在九一一以后，他们变了。他们说为了保护伊斯兰的利益，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们同心协助的那种意识比前强了。

王力雄：九一一事件对东土建国的努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是苏联解体是不是对东土建国很有利？

穆合塔尔：有利。穆罕默德•伊敏，就是一九三一年和田起义的领袖，他那时就说过：苏联不解体，我们独立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出版的记载新疆历史的文史数据，上面有文章记录这个。

和田起义以前，伊敏把全疆转了一遍，他说我们目前暂时不能要求独立。有苏联在，一旦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国家，会影响到中亚的稳定。苏联当时把中亚叫做西土耳其斯坦，所以东土独立，苏联会担心西土也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肯定会出兵。独立不会达到目的，即使蒋介石把我们放了，让我们独立，苏联也会把我们吃掉。因此他说还是暂时留在中国好，高度自治。当时那些维族的领袖和蒋介石的关系为什么好呢？因为比苏联来说，蒋介石政府好一些，暂时留在中国，比面对苏联好一些，因为苏联太强大了。

王力雄：六十年的时间，他等来了苏联的解体。

穆合塔尔：历史朝着他的预测走。

王力雄：不过他不是也参加了建立当时的东土国家吗？

穆合塔尔：是，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伊斯兰国，当时他在和田，农民起义的人都请他，他为了保护大局，就接受了。等到苏联开始进军协助盛世才镇压的时候，他就把军队解散，避免牺牲。

王力雄：你不是说他不赞成……？

穆合塔尔：不赞成，但是口头要高度自治，盛世才不会给呀。还是得有一种威力，有军事力量，形成优势，才能有成功。光带几篇文章去盛世才的办公室，盛世才不得把他抓起来嘛！如果他有两万军队，占领和田、喀什、阿克苏，然后和盛世才谈判，和中央政府谈判，局面就会不一样。

东土在什么基础上建国

承认汉人在东土的存在

王力雄：如果有这种明智的判断，能够把眼光看到全球，放远到历史未来定位自己民族应该如何行动，即使形势出现突然的大变局，也应该不会产生民族杀戮的暴力和打砸抢状况。

穆合塔尔：将来新疆出现暴力的可能性在哪呢？就是政府不改变现在这种政策，继续宣传民族仇恨，说东土分子、伊斯兰分子主要针对的就是汉民族。那样的氛围形成，促使汉族人在民族情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可能会出现暴乱。我说过尤其是宗教人容易使用自杀性暴力。

王力雄：自杀性爆炸是一种，还有类似一九九七年伊犁事件时针对移民的攻击，也是一种。

穆合塔尔：那是会有的。现在各个乡的书记都是汉族，承包土地的时候首先搞的是亲戚朋友关系。因为民族人经济情况不太好，给不了多少贿赂，所以他就把承包合同交给内地来的承包商。汉族承包商一般都是两千亩五千亩来包地，那样的合同民族人签不了，能力不够，就全部包给汉人了。或者就是招标，你出多少钱，他又出多少钱这么争。内地老板可能带了一大笔钱。那个地本来是正常情况下是二百元包一亩，他说我出二百五，不可能不给他吧。但是那地方的农民就不会满意，会把矛头对准那些人——他们占用了我们的土地！他们可能把方向指着那些人，用暴力对待占用了土地的外来人。

王力雄：那时候会不会出现不分青红皂白，满大街看见汉人就攻击的情况？

穆合塔尔：唔……满大街攻击的局面我看可能不大，农村有可能出现，城市里面不会那么严重。

王力雄：城市里面有警察控制的话，当然可能不会这样。但是如果那时社会秩序已经失去了稳定，城市里街头上的人、流浪者或民间青年会不会做呢？

穆合塔尔：那种局面可能有，可是比农村来说，还是不大。汉族人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人，自我保护的意识会出现。

王力雄：农村的可能性大是因为汉人少吗？

穆合塔尔：不是汉人少的问题，是他们很分散。而且农村那种居住环境下，人的理性也差，容易冲动，不懂法律，不会考虑怎么做对自己有利，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差。城市毕竟还是好一些。城市里面是维族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考虑这个民族的前途，会阻止那些很极端的行为。

王力雄：但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怎么能让汉人尽快离开？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理性，恰恰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不理性的方式，造成恐惧。

穆合塔尔：把汉人全部赶走不现实，因为现在交通工具全都能动用的话，也得一年才能搬走吧。往内地去的火车飞机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能拉走十万个人吧。

王力雄：（默算）可能拉不了。

穆合塔尔：我们必须承认汉人的存在。现在政府宣传东土搞民族独立活动是要把汉人赶出新疆，或者杀光。这不是事实。汉人的生存权利我们认可。是政府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希望出现矛盾，互相不信任。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样消除这个不信任的成分。

当然，我们追求经济独立，资源必须全部收回到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往外卖，按照国际价格。我们有的资源中亚都有，周边国家不需要我们的资源，最大的客户还是中国，这是地理位置决定了的。

东土的政治体制

王力雄：那时会实行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

穆合塔尔：西方式的，多党制、选举，宗教和政治分开。

王力雄：有没有考虑这一点，在一个多党制、代议制、言论充分自由的社会里，并不是总能搞好民族关系，甚至可能使两个民族更加对立。因为人们能充分表达自己意愿，媒体也是自由表达，而媒体要人们掏钱去买他的报，往往搞煽动，要人们激动，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性。那么新疆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和维族之间，他们有各自不同的……

穆合塔尔：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能不能把权力分开？比如说黎巴嫩就是这样，黎巴嫩以前是两个派，然后又有基督教，三种势力，总统是一个派的，总理是一个派的，外交部长是一个派的，权力分开，由法律定死什么职位属于哪一派。你的意思是不是权力这样分开比较合理？

王力雄：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对此也可以探讨，你觉得这种方式可行

吗？

穆合塔尔：这种方式民主体现得不够，全民投票不落实，因此民主体现得不充分。

王力雄：假如说汉人那时已经迁走了一部分，在这里剩三百万人，维吾尔人是一千万人，那么在任何全民投票当中，永远是维吾尔人占上风。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如何来保护三百万汉人的利益呢？

穆合塔尔：一个是在教育方面，政府必须保证汉人教育体系的存在，资金上、法律上有一定的保证。比如他们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教学。汉族人集中的地方，可以同时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比如新疆十五个地区，规定哪个地区要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他们的电视台、举办各种活动政府也会协助，保障他们的文化教育。在重要问题上，人数少不是问题。你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那么少的汉人在里面，照样把经济抓得紧紧的。所以他们的语言文化各方面……。

王力雄：即使语言文化能保证，政治权利上怎么保证？用什么样的体制？你刚说过，按照族群分配权力的制度民主体现得不够充分。

穆合塔尔：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说石河子那一块，汉族比较多，官方要用两种语言，任何文件，政府机构的任何工作，两种语言同时使用。

王力雄：问题是他在决策机构里能说上多少话？

穆合塔尔：议会按地区的比例，比如十五个地区，每个地区按汉人比例，给两三个到四五个议员的名额。汉族人多的地方，到议会来的人也是汉族人呀。每个县有汉人议员的名额，汉人多的那些县肯定议会是他们的。

王力雄：但总体还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只不过那时是在普通人民中一方是一千万，一方是三百万，现在是议会里头一方是一百个议员，一方是三十个议员，比例还是一样。

穆合塔尔：新疆的其它民族，比如说那个时候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可以和汉族联合。在一些民族问题上，比如说维族做了极左行为，他们联合可以制约呀 。

王力雄：那基本上制约不了，因为哈萨克才一百万人嘛，其它民族更少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谈，因为比较专门了。另一个问题是对兵团怎么解决？

穆合塔尔：兵团必须改制，改成县，保持现状，可是人口减少，因为他们开的土地全是破坏生态的，尤其是南疆的。必须恢复生态，有些地改成种树，不能盲目地考虑粮食产量。兵团的一个团可以改成一个

县。

王力雄：兵团团场占地范围相对很小，构不成一个县。

穆合塔尔：可以合并到一块，把接近的团合并在一块当成一个县。那样的话他们的权利更有保障了。中央政府不是什么事都直接管，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可以出一些自己的法律法规，做自己想的。地区的经济也可以独立，各地区的财政交了应该交中央的以后，其它的自己用。那样就可以保证汉族人有自己的权利。经济权利有了，教育权利有了，我看基本上权利就已经有保障了。

维吾尔人的理想国家

王力雄：你觉得宗教人士在最终的目标上和民族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穆合塔尔：宗教人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民主派希望建立民主国家、法律国家、宪法国家，跟宗教分开。

王力雄：如果将来有一天维吾尔人可以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做哪种选择的人会更多？

穆合塔尔：选择宪法的人多。

王力雄：为什么呢？

穆合塔尔：因为关心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人不喜欢受限制。宗教人士里面也是一半以上的人不是极端的，他们看得出世界的潮流。在阿富汗成立的那种伊斯兰国家，跟时代的潮流不符合。

王力雄：在大部分维吾尔人心目中，世界上哪个国家是比较接近理想的国家政体？

穆合塔尔：对知识分子是美国，对伊斯兰教中比较温和的人是土耳其，对宗教狂热的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了。

王力雄：沙特呢？

穆合塔尔：我们的人反对沙特，反对独裁，不认可君主制。伊斯兰教不认可君主，因为穆罕默德去世时也没有选过自己的接班人。他得病的时候，跟随他的人问过他，他的接班人是谁，他说就在你们当中自己选吧。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世代哈里发全是人们选的，所以真正的伊斯兰教是不赞成独裁政权的。塔里班、本·拉登也反对沙特，本来本·拉登是沙特公民，他反对沙特国王，要求改变制度，选举国家领导，所以沙特阿拉伯把他赶出去了。

代议制民主是否有利于东土建国

王力雄：你提到未来实行民主制度，你认为现在世界通行的代议制民主可以解决新疆问题吗？

穆合塔尔：对。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出现民主，互相谈成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没有民主，维族只有用暴力，让外国人参与，得到国际势力的参与。这是中共存在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如果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民主的体制，中间道路也好，谈判也好，各种可能性都会出来。

王力雄：但中国实行代议制民主的话，也有可能利用民主发动战争啊。一般汉族老百姓在民族主义驱使之下，一听到维吾尔人要独立建国，用民主的舆论和选票要求政府进行镇压，武力解决。俄罗斯现在也是民主的，也用投票方式了，他照样打车臣，反而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敢于说我们让车臣独立吧，我们没有必要去……

穆合塔尔：反对党说过。

王力雄：反对党这么说，就不可能被选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现在这种民主模式不见得是民族独立运动的福音。反过来在维吾尔族这边也是一样的。如果新疆实行了现在这种民主模式，因为不同的政党参加竞选，那些激进的政党会煽动说，我们被汉人欺压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必须独立！这样的煽动最容易得到老百姓的共鸣，于是就把票投给说这种话的人和政党。至于后果会怎么样，那还离得远，普通老百姓很少考虑，不见棺材不掉泪嘛！只有等到自己家在战争中死了人了，才知道这事代价太大了。但是在这之前，他却可能用自己的选票推动战争。极端势力是可以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上台的，就像希特勒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的法宝也是煽动民族主义。所以我认为，恰恰是现在这种世界通行的代议制民主之下，解决民族问题反而有更多的困难。

穆合塔尔：毕竟比现在好啊！

王力雄：难说。我跟台湾人这样说，台湾人为什么现在可以有恃无恐，认为大陆不敢把他怎么样？因为民主制度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台湾是民主的，大陆是专制的，如果大陆要打他，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会认为是一个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发动进攻，会起来保护他。可是，如果大陆也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政权也是通过合法程序，由人民选票产生的，就跟哈马斯也是合法民主程序产生的一样，那时怎么办呢？西方用什么理由保护台湾？就像现在的美国，你说应该实行民主，哈马斯是民主选出来的政府，你又不承认，就很被动。那么未来的民族冲突之中，双方都是民主的，一方要独立，一方要打，这个时候……

穆合塔尔：一个民主国家，比如说美国，他派兵去伊拉克是暂时的，

十年五年反正得回来。伊拉克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不离开不行，是吧？如果中国民主了，他手上有民主的旗，那时候就不能强调国家统一，因为新疆不是属于中国的地方。

王力雄：只是你说不属于中国……

穆合塔尔：（激动）中国人说属于中国，可是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不认可这一点。

王力雄：不会吧，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新疆……

穆合塔尔：因为中国跟他们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敢说，可是他们的历史学家写了一些书，那些书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不称呼新疆，他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版的那些历史书上，根本不称呼新疆。

王力雄：我觉得你还是想得太乐观了。

穆合塔尔：不是不是！你看那些外国的……

王力雄：历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那些政治家们、各国政府怎么表态，和他们的历史学家怎么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穆合塔尔：我跟你举个例子，欧盟一九九七年对伊犁事件表态的时候，没有说新疆，明确写：中国政府和东土方面协商解决伊犁事件，避免发生暴力。我在土耳其看过欧盟的文章。美国国会的文章也是这么写的：希望东土势力和中国方面解决伊犁问题上，用和平手段，不要发生流血。现在东土在国外还没变成一个大的势力，新疆问题还没有具体的暴露，一旦暴露出来，像西藏那样，你说中国以民主的方式进军西藏的话，国际认可嘛？在西藏问题上那些国家把西藏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王力雄：现在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都承认这一点了。

穆合塔尔：外表上承认，可是他还拥护达赖。他拥护达赖的理由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内心还是认可西藏独立的，只是在现实中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王力雄：那你为什么认为到了那时候他们就不会这么认为呢？为什么他那时候就不会用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了呢？那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呀！他为什么要冒着和中国闹翻的风险呢？这是一样的问题呀。他并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专制的，他就害怕了，那时候中国民主了，他就说可以让中国分裂啊，不一定是这样的！

穆合塔尔：我感觉是这样。（王笑）

最吃亏的就是新疆本地人。

穆合塔尔：我跟你说一点，民主也好，专制也好，任何一个中国的周边国家，或者是西方哪个国家，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现实。

王力雄：无论中国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

穆合塔尔：对！会尽量压缩他的空间。

王力雄：你说这就是未来东土耳其斯坦独立所能寄托的最终希望？

穆合塔尔：对！比如说车臣问题，俄罗斯也民主了，可是在车臣问题上西方还是给俄罗斯压力。西方没直接插手车臣，因为没有参与的空间，车臣是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那些国家和俄罗斯保持比较温和的关系。可是在外交上、财政上也支持车臣。可是俄罗斯是民主的呀，它吃掉车臣，西方为什么不考虑，算了，我们跟俄罗斯争干吗？跟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不值得，于是就不管了？他们没这么想，还是用各种各样手段要把俄罗斯继续分裂。现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俄罗斯关系紧密的国家，都希望俄罗斯再解体，因为俄罗斯手上还有很多殖民地。我也认为俄罗斯可能还有一次解体。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也会解体的。俄罗斯里面有很多共和国，逐渐那些共和国会解体的，但不一定是现在。一样的道理，世界也不希望中国很强大。在这个过程中，最吃亏的就是新疆本地人。

王力雄：为什么？

穆合塔尔：因为世界支持也好、帮助也好、同情也好，干实际事的还是新疆本地人，是吧？流血的话，死的还是新疆本地人。这是一个现实。

你说新疆本地人不希望用别的手段解决问题吗？想呗，可是躲不过去，也不能希望中国实现民主以后，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可以解决。汉人不会同意给我们高度自主，更不能给独立。按照中共现在的宣传力度，汉人的思维不能一两年改变过来。统一国家这个概念可能中国人脑子里五十年都肃不清。如果全民投票的话，还是百分之八十、九十的票是汉人的，可能那个时候会说把新疆快拿过来，他们用全民投票的方式把这样的口号喊出来：汉族人、天下的华人联合在一起！大华夏，全华夏人联合在一起！

王力雄：（笑）大中华圈嘛。

穆合塔尔：现在最危险的是中共的大中华宣传，这种思维太严重了！重要的是怎么样把中共宣传形成的思维改变，对国内的民众解释这种宣传的坏处，这比在外国做活动、搞暴力反抗更应该受重视。

王力雄：由谁解释？

穆合塔尔：肯定由国内的或国外的我、你、他。汉族人维族人联合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华侨！对国内存在的思想问题，增加宣传力度。

能不能选择「中间道路」

未来新疆的冤冤相报

王力雄：我觉得你在谈到建立东土独立国家的时候，基于的都是你设想的有利一面，但同时还要看可能有不利的一面，光看好的是过于乐观。首先即使是汉人有一批人要往回撤，留下的人还是会相当多。因为很多人在内地已经没根，房子、土地什么都没有，亲戚甚至都很少了，所有的生活基础都在这里。

穆合塔尔：虽然新疆问题的根源是民族问题，但我们提倡的不是把汉人全部赶出去，独立并不是赶走全部汉人，我们认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那部分人，他们有在这里生活的权利，这个我们不否认。按照任何道理，按照意识形态也好，这是很合理的要求。

王力雄：当然这样是好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上当受骗太多，已经对很多东西不相信了。他们会想，你们现在说得好听，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反抗呗，让我们放下武器，接受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你变成独立国家了，我们是什么样的命运就不知道了。

穆合塔尔：我跟你说过，在本地出生长大的汉人讨厌内地来的人，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就是盲流不断到这里来，他们也受政府移民政策的不利影响。我们在国外的人，工作做得最少的就是这一部分，应该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们认可，他们以后在社会上的地位又是怎么样，从现在就明确表态，把宣传工作做到新疆来。

王力雄：你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穆合塔尔：一点都没做，可以说。

王力雄：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到底会不会被新疆汉人接受，还是令人怀疑的。在新疆独立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没法控制的。你下了命令不许侵扰汉民，老百姓管吗？他们还是可以去做的，对吧？

穆合塔尔：对，还是可以去做。

王力雄：只要他们一做，这边就会冤冤相报。你打了、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要打你，一打你，你那边又会报复。波黑那些冲突不都是这样升级的吗？

穆合塔尔：都是这样做的。

王力雄：那些人原本都是邻居呀，从小在一块玩的，然后变成了仇人。

穆合塔尔：所以问题的核心在哪？能不能避免暴力？必须有一个方式。

调回军队才能避免暴力

王力雄：你有什么方式避免暴力？

穆合塔尔：避免暴力的方式在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

王力雄：你的意思是中央政府把军队调回去？

穆合塔尔：调回去！如果不调回去，也得把军队控制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高度自治也好，独立也好，先形成一个临时政府，他们能把局面控制住，同时和中央政府保持联系。

王力雄：这就有点矛盾了，在中国中央政府能够控制新疆局势的时候，他怎么会允许你独立呢？

穆合塔尔：任何国家在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军队还是稳的，比如说波黑那么乱，军队还是能控制住的。

王力雄：只要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军队，会允许独立吗？

穆合塔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如果出现全民的反对，中央政府即使能控制军队，也不能去镇压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吧？比如内地民众对政府不满，要求民主，多残暴的政府都不会出动坦克飞机，把所有汉人全部消灭吧？也许能镇压两三天，可是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它还能镇压吗？

王力雄：他不需要镇压全部。他认为只要对一部分人开枪，全民反抗就会瓦解，就像六四那样。

穆合塔尔：六四毕竟是个学生运动，光是学生。国家工人、公务员或者是农民，他们没参与运动，各行各业还正常上班工作，农民还种地。

再现波黑的种族清洗

王力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担心——至少我是担心的——如果暴力活动一直扩大发展，涉及到移民和越来越多的汉人，会导致仇杀升级。升级到一定程度，当局或是组织起来的汉人认为，用有节制的镇压是镇压不住的，暴力反抗到处不断，对汉人的袭击也是四处都有，那么怎样才能制止这种行为？就有可能发展成种族清洗。比如像波黑战争，实际上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这样的愿望，会出现种族清洗。但是局势变成了只要不同民族在一块，双方就不能够和平共处，就要进行暴力冲突，那么只有我把你这个民族的人全部赶走，赶到另外的地方，让这块土地全部是我这个民族的人，我才能有安全。你不走，我就杀你，通过杀，把你吓走。这就是种族清洗嘛，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会变成双方的。因为维吾尔人也会一样，我想让你走，你不走，就用暴力活动吓你，开始可能只是吓，如果没吓住，那就真杀你！最后，在维吾尔人势力强大的地方，汉人跑了，跑到汉人势力强大的地方，又去杀维吾尔人，要把维吾尔人赶跑。这样的话，波黑的局面不就又出现了吗？我担心，暴力活动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穆合塔尔：我跟你说了嘛，如果形势按现在这样延续下去的话，我们所说的局面都可能发生。

王力雄：你认为是可能发生的吗？

穆合塔尔：非常有可能。我们很多人谈话中、聊天过程中都认为以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王力雄：一旦进入这样的局面，不会是双方都有组织，都服从自己的领导人。那时很多局部都是各自为战，彼此没有什么约束。他们的所作所为会逐渐激化，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双方都能有一个那种说一句话能顶一万句的权威核心，说打全民一块儿打，说停全民一块儿停，那还好办。可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从维吾尔族的领导力量来讲，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这样一个核心。虽然海外在整合，可是海外和境内的联系也不是很广泛，到那时会不会迅速成为一个领导核心？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前景？

穆合塔尔：在新疆的宗教人士里面没有。但是新疆境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同国外的组织者，认同他们的政治地位，会接受他们的领导。

王力雄：民间的老百姓会怎么样？

穆合塔尔：知识分子往哪里带，他们就往哪个方向去。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刚开始干事的是农民或者是平民，可是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邀请知识分子领导自己，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维吾尔人会以少胜多吗？

穆合塔尔：你刚才提到我们对抗不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可是共产党当时也是三、四万人，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追他们，他们还很有信心的跑，跑到延安，恰好抗日战争开始了，运气好。

王力雄：对！运气好！可他那时并没有信心，当时实际上是逃亡。（笑）

穆合塔尔：可是他没有投降。那就是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没有放弃希望。抗日战争一爆发，他们就搞联合抗日。其实他们有多大的联合资本？对几百万军队来说，三、四万人算什么？可是他们还是那么做。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还有西藏，还有内蒙、宁夏这些地方，这些少数民族的观点也很重要。中共宣传汉族人的民族精神，他们的华夏、炎帝、黄帝，但是蒙古不是炎黄的子孙，藏族人也不是，维族人也不是。中共的宣传很危险。这样下去，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会变成极端主义者，中共把他们带到那个方向走下去了。

王力雄：所以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能单纯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例做比较，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汉人，共产党三、四万人，但是他可以争取把国民党那边的汉人转到自己这边来。而维族对汉族的比例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例，但十三亿汉人你是拉不过来转到自己这一边的，所以我说力量的对比不会有大变化。

穆合塔尔：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个逃犯，一旦被抓住可能枪毙，就会比追你的人跑得快。你反抗、保护自己的意识特别高。平时你打不过一个警察，可是到那时候两三个警察收拾不了你。新疆的汉族，到时候能回的都回老家了，可是当地民族的人呢？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别的路！他们没有别的家园，要么生存，要么死。这种心态和力量，是不能比的！

王力雄：那是。可是逃犯跑的时候，他可以一个人打两个警察或者打三个警察，顶多如此喽。维吾尔人一千万，顶多算两千万吧，一个维吾尔人打十个汉人的话，你也才打两亿汉人嘛。

穆合塔尔：可是汉人也不会全部跑到新疆来跟我们打嘛。（两人笑）

王力雄：不是说他都跑到新疆来，但是他有一个强大的基地，在他后面供应、组织、运转。

穆合塔尔：我跟你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旦垮了，就顾不上外面的人了，历史以来就是这样。经济一旦衰弱，内部矛盾马上就爆发，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互相之间打的历史。

王力雄：你也要看他的另一面，一旦互相打的过程过去了，重新统一了，他又开始扩张。

穆合塔尔：可是他花的时间太长。

王力雄：也难说呀！你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国分裂了，然后是西藏独立，新疆杨增新自立为王了。但是没有多少年，蒋介石把军阀初步解决，从三几年就准备重返西藏，那时班禅跟达赖有矛盾，跑到汉地了，他就要以护送班禅的名义派几千军队进西藏，如果日本人那时没有打来的话，蒋介石的计划真实行，西藏根本抵挡不住。然后新疆那边，蒋介石也开始要解决……从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因为有日本人进来，延缓了这个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可能会很快，只要中国有能力，他又会开始扩张。所以我说你对前景充满理想，看到光明，但是我从中看到更多的是困难。我觉得要面对那些困难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假如两方面势均力敌，那么可以通过战斗……哪怕敌人力量比我大一倍两倍，甚至七八倍，我也有可能去进行一番战斗，利用各种条件和资源，维持自己的独立。但是敌对力量比我大上一百倍，就不一定有必胜信心了。

独立后就允许美国驻兵

王力雄：如果往不好的方面想的话，第一个，留在新疆的汉人可能还会有很多，而且担心新疆独立对他们的生存安全有威胁，所以为防止新疆独立战斗；第二点，中国内地如果还保持一定控制能力，那么仍然是有可能从内地派遣军队镇压新疆，这就像波黑战争，塞尔维亚也去支持波黑塞族一样；第三点，即使是天下大乱，中国中央政府完全失去控制力，而且维吾尔人确实有能力把新疆本地汉人打败，宣布成立独立国家，但中国不会永远无休止的乱下去呀，中国的局势一稳定，就会重整旗鼓，再来收服新疆。他不会承认新疆独立，说那是一个叛乱，是分裂，要来收拾这个局面，重新拿回来。

穆合塔尔：如果中国对新疆的独立不认可，那也不应该认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了。中国可以说，我们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只能在那么小的地方活动？但不是，中国不是对外蒙独立认可了吗？蒋介石认可了，共产党也认可了。

王力雄：新疆的问题不能那么比呀。因为新疆是临时出现的独立，没有历史。要是新疆独立能够维持十年二十年，可能会有你说的情况，但是也许才过一年半载，中国就已经稳定下来了。

穆合塔尔：如果中国不认可新疆独立，也会面临长期的内战。就像车臣和俄罗斯的战争一样。而且国际不会允许中国那样做，如果外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会受不了。

王力雄：但是外国到底制裁不制裁……？

穆合塔尔：肯定会制裁的！（王笑）反正现在还没出现那个局面是吧，如果那个局面出现了，新疆独立后就允许美国驻兵，建立军事基地，汉人还敢进来吗？

王力雄：美国会不会这样做呢？

穆合塔尔：美国人特别喜欢安排军队（王笑）。新疆是亚洲的中心，他过去不能驻军。这个中心地带的地理位置，对部署军队是最理想的。

王力雄：这是你这么想的，对于现代战争来讲，不一定需要那么中心嘛，它的机动力量随时可以从任何地方去调。

穆合塔尔：对，可是他打伊拉克，还需要用土耳其的基地，还要协商嘛。另一点，新疆周边的中亚国家也会尽量帮助新疆独立，他们不想边界挨着中国边界，中国的边界离他们的边界越远，他们越安全。

王力雄：你这样想，好处是能对未来带来信心。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危险，一旦把胜利的把握看得太大，就不会有另外的安排，就不会考虑困难有多大，牺牲有多大，能不能承受得了，需不需要去这样承受？能不能再想另外一种办法和另外一条道路呢？

穆合塔尔：中国的历史是同化的历史，他们不停的同化，蒙古人进来被同化了，满族人进去也同化了，如果维族和汉族在一个环境下生活，最后也会被同化，结果维族不存在，也灭亡。

王力雄：你认为只要在一块的话，维族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吗？

穆合塔尔：对，灭亡！两个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太不平衡，而如果没有平衡，维族逃不过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

王力雄：你认为怎样实现人口数量的平衡呢？

穆合塔尔：停止汉族移民！

王力雄：对啊，这可以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出路，不一定非要独立啊。

穆合塔尔：汉族人不接受。

王力雄：那也不一定呀。你得考虑怎么能让汉族人接受这样的一种安排。

穆合塔尔：如果汉族人接受这样的安排，新疆可以不独立。为避免牺牲、避免暴力、避免战争，可以不要求建国，实行高度自治，就像现

在的巴勒斯坦那样的高度自治，绝大部分人也可能会接受，

高度自治是不是香港模式？

王力雄：你认为在中国做出什么承诺，或者和维族之间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维族人会同意用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再追求独立建国？

穆合塔尔：政治独立，政治上自己管自己；现有的汉族人里面，要区分有合法性的人。来打工的要离开新疆，这里不需要那种素质特别低的人。在这里出生的，户口在这的，在新疆生存了最起码二三十年的以上的，留下来，其它人回去。每年用人的话，按定额临时可以从内地招人来工作，但必须回去，不能办移民；然后是经济上独立，自己的财政自己用非常重要，外贸上有自己的权利；中国在新疆可以有边防军，但不能太多，比如说吉尔吉斯和哈萨克那边，没必要部署军队，能够威胁中国的就是印度，巴基斯坦轻易不会……因为它是和中国友好的嘛。只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可以部署军队，其它的不能部署。然后就是法律各方面的独立性。

王力雄：旅行的人呢？从汉地进入新疆要办签证吗？要拿护照吗？

穆合塔尔：拿护照，不签证，免签证（王笑，穆提高声音）现在到香港还要护照呢！如果没有护照的话，流动人口怎么控制？身份证通用，跑来跑去，那怎么控制得住？香港不也有护照嘛，中国国旗还飘扬呢。

王力雄：新疆人进中国也一样吗？

穆合塔尔：也是免签证。中国是否同意进，海关的人说了算。

王力雄：按照什么标准呢？什么人可以进什么人不可以进呢？

穆合塔尔：那个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而是内地的标准。

王力雄：我的意思是按照新疆的标准，什么样的汉人可以进，什么样的汉人不可以进？有什么法律条例？

穆合塔尔：现在最重要限制就是移民。移民是最刺激人的一个问题。前几天新疆日报登了一个新闻，伊犁河周围搞开发，国家投资一百二十个亿，开发一千万亩土地，中间四百五十万亩还是五百万亩是种地的土地。开发这个土地，可能为的就是移民。可是在伊犁河周围开荒种地，会不会破坏生态，我想一想，五百万亩地的土地，算的话是一公里宽，两千五百公里长的一个走廊。

王力雄：限制移民不一定非用护照的方式呀，因为移民是要工作嘛。未来一是不再搞那种移民项目，二是可以用发放工作证的方法进行限

制。凡是内地人到新疆工作需要有工作证，工作证由当地政府来签发，没有工作证就是非法工作，是违法的。这样两边的人员可以自由往来，只是工作需要获得许可，进入新疆就不需要非得用护照了。

穆合塔尔：高度自治体现在民族独立性上。虽然外交是中央政府管，可是没有护照，移民问题解决不了。

王力雄：我的意思是你要把双方达成共识的难度尽量降低，你要是要求用护照、建立边界和边检，就已经接近于独立了。

穆合塔尔：每个省之间都有边界呀，两个县之间都有边界，难道……。

王力雄：但那种边界没有人员来往要过关口的。

穆合塔尔：护照的目的就是避免移民。旅游的人没有理由拒绝。旅游时间到了，给你一两个月或三个月时间。如果你想在这打工，就去有关部门申请在这打工，如果谁想试用你，那就担保和试用你，试用期到了以后，就回家。

王力雄：看来香港模式给后面带来很多问题，一些未来的政治结构会提出用香港模式解决本地区问题。

限制移民是否一定用护照？

穆合塔尔：香港用护照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流动人口。欧洲都是独立国家，但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不让我们成为国家，你不承认，那好，我认可你这个国家地位，那对你来的人我靠什么限制呢？

王力雄：我明白这个意思。

穆合塔尔：新疆最温和的人也害怕移民。

王力雄：控制移民不一定非用护照，我刚才提的用工作证的方式。因为移民只有靠工作才能生存，他如果自己带着钱到这里来住，那等于给这送钱来了，他也不会无限期的住下去。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才可能成为移民。希望工作的人可以去申请工作证，如果当地有需要，工作证由当地政府签发。当地政府不签发，就不能工作，或者你工作就是违法的，会受到法律处置。这样的话，只有当地需要的专业人士可以在这工作，其它人你不给他签发工作证，他就不可以在这里工作，也就限制了移民。用这种方式来做，已经可以解决移民问题，为什么非得用护照、签证、进关检查的方式呢？

穆合塔尔：我们去香港要签证的。我还可以说香港没必要签证……。

王力雄：先说这个方式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没有给他签发工作证，他就不能成为移民，除非是打黑工。而打黑工可以罚款拘留、驱逐出境。

穆合塔尔：那样就会发生民族矛盾。

王力雄：你说我要建个边界，进来都得拿护照，那才会真正发生民族矛盾。这在我看是谈不通的，等于不是真地要谈判了。

穆合塔尔：那我提一个问题，按你说的自治方式，对新疆怎么称呼，还是称呼新疆？

王力雄：名字问题可以下一步再讨论。

穆合塔尔：这不仅仅是个名字问题。再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出国，如果这里高度自治的话，不能开大使馆，只能开领事馆，我们去领事馆办签证，我们拿什么护照？还是拿中国的护照？

王力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是一个护照。

穆合塔尔：高度自治应该有自己的护照。

王力雄：（笑）没有这一说吧。

穆合塔尔：高度自治应该有护照！

王力雄：像美国和瑞士这种联邦制的国家，每个联邦下面的州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立法什么的，美国的各州法律不一样，但他可以用同样的护照。

穆合塔尔：可是美国人不一样。

王力雄：你现在要想的是未来的中国也不是现在这样的中国呀。

穆合塔尔：继续使用现在的身份证那就是一样差不多。（大笑）

王力雄：这不一样，你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自己制定自己的地区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有经济上的权利，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用工作证限制内地人来工作。对西藏我也这样提议，法律上的解决方式是设立「文化保护区」，因为移民多了会威胁到这个特有的文化存在和延续。这在一个国家内的法律架构中就容易解决。否则一个国家内建立不同的边界、用不同的护照，就不是一个国家了。除非是说，你不让，那就打，我们死多少人不在乎。但恰恰能说这个话的人是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喊「不自由，毋宁死！」可是他们不死，死的是人民。

（两人长久沉默）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双方不容易找到共同点，因为历史造成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双方的要求、可能性和合理性差距越来越大。

维吾尔族在战争中损失更大

穆合塔尔：汉族历史以来最强大最有势力的时候应该是现在吧？

王力雄：历史上中国有时可以排在世界前一两名的。从生产总值论，唐朝，宋朝大概都可以达到。

穆合塔尔：可是唐朝一直不稳。

王力雄：在历史书里，一百年的稳定一笔就带过去了，主要写的都是不稳定的时候。现在的中国才五十多年，历史中是很短的。其实也不能说他现在很稳定，过去的王朝经常是几十年上百年什么事都没有。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我的意思是说，避免战争就是要用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式，就应该多想一点有没有另外的道路。没有另外的道路，硬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的是老百姓。而在汉族和维族两个民族之间，维族受的损失会比汉族更大，因为即使汉族人死的人比维族人多一倍，可他的总人口要比你多很多倍，所以我从来都是……。

穆合塔尔：那我们可以协助你们减少人口吧，打仗的时候你们死的人多，那对你们不是一个打击，而是协助你们减少人口了。（两人笑）

王力雄：但对维吾尔族失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从我个人而言，我对新疆是不是独立并不在意，只要人民生活得好，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没关系。但是在汉人中这样想的很少。那么就要考虑怎么面对这种状况？我只是提问题，不是想说服你，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说「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要打仗，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英，会尽量地考虑避免人民的牺牲。

穆合塔尔：这个问题肯定考虑的，如果能避免战争和牺牲，那是最好的路了，我们失去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

王力雄：那么我想问，你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是哪些，在这方面能够接受的限度到哪一步？

穆合塔尔：就是刚才说的高度自治。一个问题是名称问题，一个是国旗问题，新疆这个名字任何人都不会接受，因为你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哪有什么自治呢？另一个就是国旗问题，美国联邦有每个州自己的国旗嘛。然后是经济上的独立问题，再有避免移民的问题。这四个问题

我认为是最大的问题。

东土耳其斯坦的名字

王力雄：你们要的旗帜是原来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帜，就是三区革命的那个旗帜吧？

穆合塔尔：那是我们的国旗呀。

王力雄：认可的名称就是东土耳其斯坦？

穆合塔尔：这个名称没有人有任何异议。过去中亚的人提过维吾尔斯坦，但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乌兹别克人似乎就被排除了，他们会说我们的地位不被认可了，削弱了。名称对新疆稳定起很大的作用。用东土耳其斯坦可以囊括所有突厥族，哈萨克、柯尔克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都体现在这个名称中，因为他们都是突厥族。

王力雄：麦斯武德原来提过叫突厥省。

穆合塔尔：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的新疆日报登了一个文章：「好消息！蒋介石认可中国土耳其斯坦」。报导说蒋介石同意既可以称中国土耳其斯坦，也可以称新疆，两个名字通用。当年的新疆日报那个文章我看过。蒋介石认可中国土耳其斯坦，意思是中国手下的土耳其斯坦。可是过了还不到两个月，包尔汉和阿合买提江联合反对麦斯武德，包尔汉当了省长，那个名称就用不上了。

我们不应该制造一个地名，既然历史以来就已经有了地名。外国人一直把我们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俄罗斯作家和英国作家，还有美国作家写那些书上都称为东土耳其斯坦。

王力雄：那你觉得按照当年和国民政府已经谈下来的，叫中国土耳其斯坦怎么样呢？

穆合塔尔：（思考）叫中国东土耳其斯坦可以，这个「东」字不能去掉。因为我们是在突厥的最东边。没有“东”字，等于把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大了。

王力雄：将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许会取消了。

穆合塔尔：不会！不会！（王笑）中国东土耳其斯坦可以很明确地表示不是中华民族。因为这里不是中国的东边，是中国的西边，因此属于突厥民族，这种明确就是因为「东」字的存在。

王力雄：当然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我为什么这么提呢，现在「东土耳其斯坦」这六个字已经被当局充分妖魔化了，变成一个在十三亿的

中国人的心目中很难接受的东西，如果考虑双方容易达成共识的话，不妨把这个名字变一下。

穆合塔尔： 有很多人不会接受。

王力雄： 接受不接受要有一个互相的考虑。

穆合塔尔： 可是那时的中国现政府肯定不存在了，他现在这些妖魔化的宣传可以改过来呀。

王力雄： 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正因为那个时候现政府不存在了，新政府要靠人民投票选举，而人们不会因为只要给了他投票的权利就变成理性和明智的，该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人。就跟俄罗斯人会投票要求出兵打车臣一样。那时的政府受老百姓的牵制更大。

穆合塔尔： 那是汉族老百姓，他们对中国土耳其和中国东土耳其的差别不会很敏感。

最好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光明前景

王力雄： 你对所有事情都看最有利的一面。你最希望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事情就会那么发展，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包括你刚才提的那些：汉人离开新疆回老家、中国会承认新疆独立、美国会肢解中国等，都是把最好的因素结合在一块，因此会显得前景很光明，但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不会像你想象那样。

穆合塔尔： 也可能比我想象得更好。

王力雄： 但也可能会更坏！不要只考虑更好，更多的是应该往坏的方面考虑，有备无患嘛。总往坏处考虑，顶多是多虑了。但总往好的方面考虑，会让你有很多地方准备不足。

穆合塔尔： 我说的是维族人里最温和的观点，不是说我个人看法。我告诉你的是我估计温和派能接受的底线是怎么样，我应该把这些说出来，如果我对你说的都表示同意，那只是我个人的立场，你这个考察就没意义了。

王力雄： 是的，我觉得困难就在这。确实在我接触的维吾尔人当中，跟你谈是最温和的，还能进行讨论。但是在国外遇到的维吾尔人……。

穆合塔尔： 他们认为自己有代表性，把自己看成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在话题上尽量避免让步，只能坚决保持立场。而我没有任何代表性，我只代表自己，从我所了解的情况表达自己的看法。

王力雄：这是我特别担心的。谈判需要灵活性和妥协性，但我发现维吾尔人立场上非常坚定。灵活性和妥协性少，我担心的是将来谈不成，没几句就崩了。

汉人接受是前提吗？

穆合塔尔：我们讨论的时候，你经常提的问题是汉人接受不接受，当成你反对我说法的理由，好像汉人接受是前提，只要汉人不接受就不行。可是在有些问题上，即使汉人不接受，还是会出现，不一定全部问题都得汉人接受才行。这不是现在我们两个谈或者你跟别人谈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到时候拖上几年的局面肯定会有。

王力雄：我那样说的意思，并不是出于站在汉人立场，担心汉人对我有什么看法，这个不重要。而是因为要解决问题，不是跟我解决，也不是跟美国人解决，解决新疆问题面对的不是别人，最终要面对的是汉人。

穆合塔尔：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希望能达到汉族人接受的要求和角度。

王力雄：是双方都接受。

穆合塔尔：但是你把汉族人是不是接受考虑得多了一些。你总是考虑你们汉人亏不亏。你们接受了我们的要求的话，是不是亏得太大，代价太大了？你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一些。

王力雄：我是在这方面考虑得多呀（笑）。

穆合塔尔：怎么就不多考虑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不接受怎么办？

王力雄：因为我面对的是你，我跟你提问题，是在帮助你考虑这个问题。当我面对汉人的时候，我会说反过来说：「维吾尔人会不会接受？」

穆合塔尔：应该把两个方面同样对待。

王力雄：面对不同的人我强调不同的重点……。

新疆的蒙古人会不会也要独立

穆合塔尔：在你写的《递进民主》那本书上，你说如果维族能独立的话，蒙古人也会想独立，回族也想独立，这个问题，比如说蒙古人，他们有两个自治州，可人口有多少？——十二万[①]。

王力雄：不管他人多少，有他的自治州他就有法理基础——这是我的自治州！

[①] 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二〇〇六年》，新疆蒙古族人口是 17.17 万。

穆合塔尔：那是中共给的。

王力雄：别管是谁给的。比如维吾尔人曾经有过一个很短暂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历史，有几年对吧？那也是一个基础啊。

穆合塔尔：哪是几年，几百年的历史也有啊！

王力雄：我是说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蒙古族认为他的自治州已经有几十年了，你能独立，他也可以提同样的要求……

穆合塔尔：他们心里知道……比如哈萨克人都知道他们是外来人，他们到新疆的历史不长，他们是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民族，是逃避到这来的，他们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认可这一点，写在书上。柯尔克孜族也是一九一八年来的。所以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不存在，只会有汉族和维族的斗争。

王力雄：你总是相信你的愿望：他们会知道，他们会这么接受……但在实际中很多情况真的会不一样。我倒觉得应该把事情多往坏处想：事情可能会很困难，很麻烦，这是我的特点。藏族有一句谚语，说的是：「藏族人总是希望太多，汉族人总是疑虑太多」。

穆合塔尔：的确生活中就是这样。穷人经常做梦看到好的事情，在外面发财了，生活一下就搞好了，或是一夜间他成什么人了。可是富有的人梦中不会看到那些事，钱特别多的百万富翁，就是梦见自己得了病呀，企业垮了，破产了这些，光光的，什么都失去了，这是一种心理因素。

王力雄：那我现在是富有的人了！（笑）

穆合塔尔：你做的什么梦我不知道。可是我估计肯定的，富人梦不到穷人梦见的那些好事，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们的性格是不信任别人。少数民族，藏族我也看过，很容易信任别人。

王力雄：但是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穆合塔尔：我的老师当时跟我讲过：「你不信任别人，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你要信任别人。」

王力雄：现在不是信不信别人的问题，而是要更多地想发展前景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为此多做准备。另一种是对不利因素视而不见，就是不看它。但是它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不存在了，到时候它出现了，你没有做好准备，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我觉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宁可把更多不利的因素放在面前，面对它，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不去考虑它。

政治目标不能提得太简单

王力雄：所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从维族这边，有没有过考虑走「第三条道路」？就是达赖喇嘛提出来的「中间道路」。这个中间道路的含义就是在中国的框架之内，以民主的方式实现西藏人的高度自治。在维吾尔人的运动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中间道路」的力量？

穆合塔尔：有!很多外国人说嘛，要用非暴力……

王力雄：不仅仅是非暴力，现在国外的维吾尔组织有打出非暴力抗争旗号的，但还是要争取民族独立，要独立建国。但是走独立建国的路，我认为未来带来的冲突和造成的牺牲会非常大，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那么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同意留在中国的政治框架之内，但是由当地人民来实行本区域的高度自治？

穆合塔尔：现在没有很多人谈论高度自治的问题，因为现在不是谈论高度自治的时候。

王力雄：境内的维吾尔人还是谈论要独立？

穆合塔尔：对，谈论怎么做才能独立。

王力雄：他们都认为有可能独立吗？还是很多人认为没可能？

穆合塔尔：认为不可能的也有。

王力雄：哪个占多数？

穆合塔尔：在关心政治的人里面，认为能独立的人数比较多，不关心政治的人疑问多，有没有可能？或者是用多长时间？具体比例我说不上。

王力雄：所以你说境内维吾尔人基本没有考虑高度自治的。

穆合塔尔：只要中共把握权力，高度自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相信能够出现高度自治的局面。不过谈论这个问题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宗教人士。农民、市民一般不谈论这些问题，谈论也顶多就是两句话：独立就好了！独立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比现在好！多的他们不谈。

而谈这个话题的人，因为知识分子现在重要的工作是宣传，需要把目标放远一点才好啊！一开始把目标放在高度自治上，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高度自治？中国说现在已经是高度自治了，自治区主席已经是当地人自己选，可当地人有了什么权利吗？他们不信那些。因此要让

他们看见远一点的东西，他们才感兴趣。所以知识分子在宣传过程中一般不说高度自治。这就像做生意一样，把价格放得高一点，你说一千块的东西，买的人他不好意思还你五十块吧？如果你说一百，他肯定说五十。政治目标不能提得特别简单，那样的话没有吸引力。

王力雄：但这跟做生意还是有点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做生意是一个直线，就是讨价和还价。而这事呢，如果这边提出来的口号是独立建国，你觉得是提价，但造成的却是事先就被确定的敌对。汉人认为你就是要分裂嘛，要把这块领土割出去。所以他不是跟你讨价还价了，他认为就是要消灭你。而你说的如果是高度自治，说明你要考虑是在不分裂的前提下，在同一框架内我们怎么办，就会先把敌对的状态去掉，变成一个协商。

当然高度自治怎么解释可以重新定义。达赖喇嘛在高度自治方面说得很清楚，是由藏族人自己做决定。现在的自治是假的，因为官员都是北京任命的，即使他是藏族，也是听北京而不是听藏人的。如果官员是由当地人选的，那就不一样了。

达赖处境让维族人没信心

穆合塔尔：我跟新疆的很多汉族人谈到过达赖，因为我们和汉族人谈论达赖的问题，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民族分裂，以为是谈论政治问题。如果跟他们谈新疆问题的话，我们表达一些看法他们就会认为有民族情绪。可是新疆的汉族人认为达赖的目的就是想独立嘛，他们都这么看。他们不认为达赖是要高度自治的。我好几次，不是一两次或者四五次，每一次都跟他们说达赖不要求独立，他要求高度自治。可他们说这是一个口号，给他高度自治一两年以后他就会要求独立，那是很自然的。很多汉族人的反应就是这样。

王力雄：因为中国政府这么宣传嘛。你也说了，普通老百姓也就是这么说说而已，想得不多。你谈话的那些汉人还属于普通汉人，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汉人是一个不大的权力层和精英圈子，这些人可以知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非要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只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一种力量，走一条中间道路。我和国外维吾尔人讨论时，有人说到考虑过中间道路，但因为其它维吾尔人全都是主张独立建国，所以这种意见不敢露头，或至少认为时机、形势都不成熟。我不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人出现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穆合塔尔：这是不受欢迎的！我跟你说了，达赖提出高度自治的方案以后，汉族海外民主派也好，或是中共也好，都没有明确地表态，达赖的哪些要求能满足，哪些要求满足不了，或是满足百分之几十，什

么方案都没出来。因此可以说达赖的中间道路在中国还是不存在的东西。

王力雄：对，当然是不存在的。

穆合塔尔：要想避免暴力、避免流血，唯一的路是中间路，这个我也认可。可能我们一半人也是这种看法。可是到底什么是中间路，中国也好，未来的民主派也好，他们能接受的中间路是什么，他们给的高度自治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定义还没有显现、产生的情况下……

王力雄：这恰恰是需要双方先有这个意图，说我们可以讨论中间道路，才会在互相讨论、谈判中慢慢形成这个东西，不可能说一开始就先提出一个确定的东西，接受，就做，不接受……

穆合塔尔：达赖提出中间道路几年了？

王力雄：的确是很多年了，但不能光看眼下。他现在是跟中共谈。而跟中共谈，什么道路都没有希望。

穆合塔尔：对！根本没希望！

维吾尔人要产生一个代表人物

王力雄：但中国的社会政治是要发生变化的，未来的中国可能是由另外一些力量掌握政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大家来进行一种协商？

现在推进中间道路对少数民族有利的另一点在于，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国际威望，被人尊重的领袖，能够调动很多国际资源。如果新疆也能出现中间道路力量，和达赖喇嘛联合在一起的话，双方可以互为支持，成为扩大很多的一股力量。台湾的国民党也主张最终要统一，但是要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实现统一。台湾的力量就更大了，那是一个富有的、两千多万人的实体。海外蒙古人的力量现在弱小，但是如果加上蒙古国和布里亚特蒙古，也可以有一定声势。这些力量全部都能联合在一起的话，可以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穆合塔尔：很强大！

王力雄：在这样一种联合的状态之下进行探讨，未来的中国或者搞成一个联邦，联邦和每个成员体，各自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穆合塔尔：你应该知道一点，国外的维吾尔人刚刚联合，刚成立一个机构，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领袖，没有达到那种威望的一个人。以前是艾沙，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艾尔肯还没达到那个地步。在产生

这个民族领袖的路上，可能不会选中你这种思想，他们的口号肯定是独立的口号。等到领袖产生了，组织共同了，和达赖一样有了一定的国际威望，也许会考虑你说的那种，想法把各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共同目标。

王力雄：我觉得不一定非得等一个领袖去做这种事。

穆合塔尔：要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有一个代表人呀！维吾尔人如果跟哪个国家的代表见面，谈新疆问题，人家会问你们代表谁？是哪个组织？你们的代表人物是哪个？比如要跟克林顿见面，不能把我们在柯坪巴扎上买的那个霍炯[①]挎上，到克林顿前面说我是维族，想跟你谈一谈。你代表维族吗？你有那个份量吗？克林顿肯定不会见。我想去联合国人权组织表达意见，写一封信从喀什寄出，说我代表维吾尔全民族讲话，他不会认可我吧？不会让我去吧？要有一个代表人物，这很必要！代表人物产生以后，其它问题就好办。

王力雄：等你说的领导人产生的时候，他还能转得过来吗？

穆合塔尔：他会转得过来，因为任何人必须接受现实。

王力雄：如果那个领袖是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就不是达赖那样的人物，因为达赖是不可选举的。很多人是反对达赖的中间道路，但还是服从了。

穆合塔尔：对！达赖这样的领袖，除了西藏以外，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没人能同达赖比，因为他不是人，而是一个上帝。哪个民族有活的上帝？只有藏人。

王力雄：还有一个教皇。

穆合塔尔：教皇？教皇不属于哪个民族。达赖是特殊的，其它任何民族不会有。

中文发言人迪里夏提的作用

王力雄：你觉得有什么措施能够把民族仇恨减少？

穆合塔尔：现在减少仇恨的有效手段，国内没有，这个工作需要在国外的人做。国内的汉人能像我们之间这样谈的没有，谈不成。

王力雄：国外又怎么来做呢？

[①] 维族农民放在肩上装东西的褡裢。

穆合塔尔：国外有空间，使用互联网也好，或者是出版书籍也好，搞成汉语的，宣传思想、政策的东西，然后引入到国内。

王力雄：那么你觉得国外搞活动的维族人，为什么一直没有来做这个事情呢？

穆合塔尔：他们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是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一年，那时他们做得很不错，可是现在国际形式对他们不利。

王力雄：国际形势不利恰恰可以做消除仇恨的工作啊。

穆合塔尔：他们正在做，可是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他们的声音别人不容易接受。

王力雄：从我对他们的接触上，感觉只要是跟汉人有关的事情他们就排斥，似乎是只做自己的事情，不接触汉人。

穆合塔尔：因为……我跟你说吧，他们和汉人可能谈过，可是就像我说的那样，你们说理由、道理的时候，往往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思考问题。这样谈了几次以后，觉得没意思。汉人离不开自己的圈子，就不谈了。很多汉族人我和他们谈过，他们都有这个习惯。

王力雄：是，汉人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努力了。维族也要考虑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民族最有利的。除了你说的原因，现在海外维吾尔人是不是也害怕一旦这样做，会被别人抓住把柄攻击，因此即使有人有这种想法，也不敢说出来和实施？

穆合塔尔：也有这种因素吧。海外的老人们经常说，娃娃们，不要忘记历史。跟汉人谈判没有好结果，他们套子多，说来说去还说自己的，没用！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看过。不过现在海外的人正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开始想应该跟汉人沟通，可是目前还是保持距离，因为不想让别人抓他的尾巴。

王力雄：不沟通就出现目前这样局面，汉族人一提起维族人，或者维族人有什么诉求，就认为是恐怖主义。因为你没有去跟他交流，他听到的只有中国政府的声音。你需要把自己的态度摆出来，把你的道理讲出来，尽管他们在开始不接受，也要有耐心，这是一个过程。

你看，前几年海外维吾尔人设了一个中文发言人迪里夏提，尽管他的发言宣传性太强，不是黑就是白的，没有很多说服性，但即使是这样，因为他用中文发言，就使汉人的消息来源不仅仅只是政府，就会说维族发言人迪里夏提怎么说的，多了一个管道。所以我说这个方面应该重视。

双方都应该把对方当作矿藏来挖掘

王力雄：我觉得建立汉族和维族的对话管道非常重要，因为将来无论是什么状况，都必须要有对话，有沟通。现在这个管道非常不通畅。咱们两个是因为一块坐牢才建立信任，这样的对话现在几乎见不到。将来一旦遇到历史发生变化，有了某种机会，本来是可以对话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管道，没有这样的人脉，也许就会失去机会。

维族方面也应该有意识地接触汉族精英，发展人脉，与未来可能的中国掌权者建立关系。维族中间应该出现一批用汉语向汉族人传达民族要求、希望和论述的人。我不了解现在海外的情况，海外维吾尔人即使和海外汉人打交道，可能也是停留在表面上，开个会什么的，互相没有形成朋友关系，建立信任。如果有朋友关系和信任基础，到一定的时候可能起到很大作用。能畅通地传达信息，打破障碍。这种事情具体应该怎么做？需要仔细考虑。但首先双方应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这样一种沟通管道？

穆合塔尔：我跟一些维族高层次知识分子有来往，我们交谈的时候也比较信任，比较理解。但是我和汉族人没有来往。因为新疆的特殊情况，让维族人主动和新疆汉族人来往接触，可能性不大。因为互相不信任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高峰点。所以在新疆展开这个工作比较难。我看只能是海外流亡的汉族民主人士和维吾尔人先沟通，然后把这个影响扩大到内地和新疆，影响新疆的维族知识分子和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意识、心态上有变化，愿意接触。

西藏人成功地改变了形象

王力雄：政治上的交往即使存在困难，还有一个文化渠道。民族主义不一定非要从政治角度表达，可以用文化的方式表达。我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方面西藏人做得比较成功。

穆合塔尔：比如说呢？

王力雄：比如现在西藏已经成为汉人中的时髦，所谓的西藏文化热。中产阶级爱跟随社会潮流，汉族中产阶级现在标志之一就是爱谈论西藏，家里挂了西藏的什么东西，戴了什么西藏的首饰，背着一个西藏的包，去西藏旅游，然后讲藏传佛教……我说过这和西藏存在一批以汉语写作的知识分子有关系。

穆合塔尔：藏族和汉族文化上有共同点，都是佛教。西藏人和汉人的生活习惯，最起码在吃东西上面有共同点，他们任何场合都能在一起。另一点，西藏的地理位置也是很迷人的，不用说内地人，很多国家的

人都迷上西藏，因为它是全球最高的高原。喇嘛教是属于藏族人民的一种宗教，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很容易吸引人。可是新疆，我们文化状态和内地文化状态不相似。另一点，现在对伊斯兰的看法很负面。做文化交流的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可是难度比藏族来说大得多。可是，难，也必须有人应该做！

王力雄：难！更需要人去做！西藏也不能说和汉人是一样呀！仅仅二十年前，西藏在大多数汉人心里是什么？是最野蛮、最黑暗、最封建的农奴制度，什么挖人眼、扒人皮，类似当年《农奴》那个电影，还有在北京开的展览，把人皮挂在那儿。全是当年的宣传，对不对？就是二十多年发生的变化。其实新疆也有很多自己的文化，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文化载体来体现。

穆合塔尔：不是说了吗，双方给对方的都是最差的人。（两人笑）。

应该由汉人民主派先拿方案

王力雄：我感兴趣的一点是，未来中国如果开始政治转型过程，为了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混乱和冲突，成立一个临时过渡政府，各方各民族代表都参加，如果那时候推举达赖喇嘛为临时的国家委员会或者是过渡政府的元首，你认为维吾尔人是会接受还是不会接受？

穆合塔尔：这个可以接受。

王力雄：比由一个汉人来当呢？

穆合塔尔：比汉人来当，当然更接受达赖一些。那是肯定的！

还有一点，我认为既然达赖已经提了中间道路，不管中共怎么看，中国的民主派也应该拿出一个方案，是中国人比较能接受的，不一定全部接受，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接受就可以。不一定是完整的，因为以后还要谈判，可是先拿出一个方案，说明少数民族要求自治或者独立，从汉族方面能接受的范围是怎么样的。你们汉族人的势力、活动范围，比达赖来说，比新疆人来说还是广的，是吧？海外华人的实力也很强。所以首先你们拿出一个方案，然后我们再思考，这个方案能不能接受？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接受。也许你们拿出来以后，我们看了以后觉得中国有走中间道路的希望，最起码中国的民主派这么看，那我们也应该温和一些，在有些问题上，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不说，应该现实一些，也许会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拿出中间道路的方案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而是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因为他们要推动的不是哪个民族的民主，而是全中国的民主，是吧？这样的话，他们先拿出这个方案，带动其它民族，比如说新疆在

海外的维吾尔人，把他们争取到中间道路上来。

王力雄：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工作的确应该从汉人做起。

二〇〇六年四月至十二月 访谈、整理、编辑

致穆合塔尔的信

第一封信：恐怖主义与民族仇恨

穆合塔尔：

这些天整理和你谈话的录音，不时产生一些新想法，也想到一些新问题。因为无法面谈，随手写下来，当成给你写的信。

你不赞成九一一，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但是你有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你谴责本·拉登，你认为九一一使维吾尔人面对更困难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你在认为本·拉登的恐怖活动有在新疆再现可能时，又认为那是正义的。

我指出这个矛盾不是为了挑剔，而是为了理解你。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把「东土」建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支持上，本·拉登却是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视为敌人，这是二者的不同。不过二者又有相同之处，就是与对手相比都处于悬殊弱势，因此最终可能不得不把恐怖主义当成唯一有效的手段。

我同意恐怖主义是有效的。九一一后我在美国的旅行经历可以为证。

本·拉登在暗处笑

二〇〇二年五月，我参加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那是美国政府出钱，按照访问者兴趣在美国游历二十八天的一次旅行，有翻译陪同。访问者想去的地方，希望见的人，都会尽可能安排。总之访问者会觉得自己受到尊贵的接待，只有一个地方例外——机场。

那一行我走了不少机场，几乎次次要受周身搜查。程序是先让你在一个单独隔离的过道等待，然后站到指定的区域，双手向两侧伸开，安检人员用仪器在你周身扫描，随时用他的手摸你身上各个部位，还会要求你撩开衣服，把皮带扣翻开给他看，让你拉起裤腿看你踝部，然后脱鞋翘起双脚，用仪器在你脚底扫描，捏摸你的鞋，还要把鞋子送进 X 光机检查。

开始我想原因可能在我，于是过安全门前把所有东西都取出，包括皮带也抽下。但情况没有改善。在后面的几次乘机中，连我的翻译（一个美籍香港人）都跟我一块做特殊检查，次次不落。往往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会得到通知，我们二人已经被计算机认定为检查对象。我们托运的行李必须由专人送往专门检查区域，行李要求打开，除了看里面物品，还用测试纸擦抹，然后送进仪器看是否沾染了爆炸物质。检查通过后，我们不能再单独接触箱子，直接送去托运。随后人和随身物品要受两次检查，一次是在机场的安全检查口，一次是在登机口。

每次除了完成上述搜身程序，还要把手提行李的所有物品拿出。其中的每件电器产品都要启动，让检查者认定是以该电器的应有功能运转。如果行李打得紧凑，检查后就会很麻烦，必须重新恢复紧凑，否则箱包就难以合上。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这当然是美国的权力，但每次检查还是免不了表情尴尬。我的翻译试图弄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次次被挑中，谁也无法给他明确回答。他只能根据经验自我解释：一是我们的姓名不同于一般美国人，容易被计算机挑出，二是我们走一条曲折的单程路线（计算机已经把我们走过的每一站都做了记录），且是两个男人搭伴，在计算机判断中应该属于特别可疑的对象。翻译对此很恼火，因为他以后还要经常陪这种走法的国际访客，岂不要烦死。

到底是不是翻译解释的理由我无法判断，如果仅是针对我们这类人，机场负担还是有限。然而到处都能看到遭同样检查的美国人，其中有模样绅士的老人，有优雅女士，甚至连残疾人也照样被检查。以至被检查的人经常需要排队等待。为了安全检查，每个机场都增加了很多工作人员。不少机场还有身穿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警戒。而旅客为了应付检查，要比以往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机场。

我有时不禁要算，全美国为此增加多少麻烦，浪费多少时间，耽误多少事情。还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浪费总量又要增加多少？

这一切都是因为九一一。

九一一以前我也到过美国，那时在美国坐飞机和坐公共汽车的方便程度差不多。我很喜欢美国的机场。而将来却要考虑在美国尽可能少坐飞机。

那次访问结束后，我去居住西雅图的弟弟家。弟弟从机场接我回家的路上讲了美国媒体关于本·拉登在国殇日会策划什么攻击的猜想，种种招数，招招出奇制胜。弟弟说本·拉登一定藏在哪里乐不可支呢，有这么多人替他想招，他都不用动脑筋了。

我想本·拉登最乐的倒不是有人给他想招，而是他能用那么小的成本，换来这世界如此高昂且无止境的支出。

九一一让恐怖主义成为战争

本·拉登的成本是什么呢？——若干条人命。整个行动都以那几条人命为核心才能形成和实现。自古让手下人送命的情况并不罕见，在本·拉登那里不同的是，送命者不是被他强迫送死。在长期准备与执行的过程中，那些人完全脱离控制，凭自觉执行计划。其中若有一点不情愿，整个计划就无法延续。

让人一时冲动地接受死亡还好说，执行九一一任务的人却是经过

几年时间潜伏、学习和筹划。他们每天考虑的都是如何在最终一刻去死。那种对死亡的冷静程度和深思熟虑的认同，没有彻底的视死如归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从电视画面中飞机撞向大楼的姿态可以看出来，面对山一样的摩天大楼迎头撞去时，驾驶者把整个动作完成得坚定不移。

以往防止攻击利用的一个基本规则是攻击者要保存自己。只要攻击者想活，防范攻击就比较容易。过去的机场安全检查相对简单也是基于这一点。如那时遇到劫机情况，机组的标准反应是服从劫机者，便是出于劫机者要活的判断，只要对其配合，就可以避免机毁人亡。

那时即使有同归于尽的情况，大都是情急之下的反应，或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深思熟虑从开始就选定的目标。如慕尼黑奥运会的巴勒斯坦突击队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归于尽，是因为德国反恐部门发动了进攻。出现这种结果，事后检讨总是反思当时处置是否得当，是否可以利用攻击者想活的心理得到更好结果。

恐怖活动的初级阶段往往是出于报复，针对要报复的对象，即使不是严格避免伤及无辜，也不会故意针对无辜。在这个层次，恐怖活动和战争性质差不多，都是为了取得具体结果。但是一旦认识到通过大众传媒可以给社会造成震动的效果，恐怖活动就开始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目的已经不在具体结果，而在于社会影响。通过影响来表达主张，伸张意志，施加压力并获得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攻击平民会被认为更有效果。目标明确的报复不能带来人人自危的效果，攻击平民一方面容易得多，一方面能够更切实地触痛社会心灵，所以就成为恐怖主义的首选。

九一一事件是把恐怖活动可以利用的因素以极限方式组合在一起，达到迄今恐怖活动的颠峰。它针对的不仅是平民，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炸掉的不仅是两栋建筑，而且是美国的象征与骄傲，它付出的代价之小和破坏之大堪称奇迹，对媒体的利用可谓登峰造极，对美国社会的心理打击也是前所未有。仅从行动本身而言，达到了几乎完美的境界。

实现这种完美的，就是那群以自身生命为武器的攻击者。

人的生命可以成为武器的核心

人的生命可以充当怎样的武器，这在九一一之前没有被很好地认识。武器的本质就是把足以毁灭目标的能量运送到目标进行释放。而现代高科技武器的关键，在于以计算机和精密仪器的控制把能量准确运送到目标，从冷兵器时代面对面的「以命博命」，变成无需人与人接触的战争。

人的生命正是可以在高科技武器的核心——控制功能中发挥作用。工业时代已经提供了随处可见的多种能源和运送工具，其没有成

为武器，缺的只是实现组合、达到目标和释放能量的控制过程。而这种控制最困难的就在于释放能量时能够保存自己。如果人根本不要求保存自己，而是用自己头脑替代计算机，用自己的操作代替仪器，其生命就会成为凝聚武器的核心，通过组合与控制工业时代的能源和运送工具，实现现代武器的功能。

国家的功能之一是垄断武器。但是国家能控制的只是武器中把能源和运送工具组合起来的体系，并不是能源和运送工具本身。没有那种组合体系，能源和运送工具不会成为武器。以往观念认为人不会以自身生命充当武器的组合体系，只能依靠科技。而现代武器的高科技所依赖的财力、人力和知识，不要说个人和恐怖组织难以企及，连一般国家也难做到。因此才有对武器的垄断，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武器差距。

其实，人脑远比计算机更有智能，只要人肯于把自己当作形成武器的因素，为此思考和学习，琢磨出把能源、运送过程和释放组合起来的方法，然后以自身行动去实现组合，把自己当作武器的控制部分，不考虑保存自己，国家对武器的垄断就会在一定程度被打破，弱小群体也就有可能对强大国家实行震撼性打击了。这就是高科技时代自杀性攻击的力量所在。九一一的攻击者，无非是通过自己的控制，把民用飞机变成了精确打击的导弹，让飞机的油料释放出烧毁大厦的能量。说到底就是这么简单。

九一一让世界对恐怖活动重新认识。过去的规则不再适用。随着科技发展，能源和运送工具不断提高，只要有人肯用生命充当武器的组合与控制体系，可以形成的毁灭力量将会越来越大。九一一显示出的水平并未到头。阿克就曾经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核武器缩小到可以放进皮包，他愿意带着去炸掉特拉维夫。阿克也许只是口头一说，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样舍身灭绝以色列。如果有一天听到伊斯兰圣战者制造出比九一一更大的事件，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能否杜绝九一一？

对美国而言，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别的回答——九一一式的攻击必须被杜绝！然而这只是愿望，并非结论。

没错，我经历了美国机场的严密检查。我相信恐怖分子现在劫机会变得困难。但我也相信恐怖分子现在才不会劫机。如果他们想做什么，不如采取美国媒体猜想的方式——租下某公寓大楼的底层房间，不引人注意地分批运进炸药，积少成多，等到合适时机引爆，炸塌大楼，造成几百人死伤。还可以采用九一一手法，选择两栋相距不远的公寓楼，各自放好炸药，炸了第一栋楼之后，等记者们赶到再炸第二栋。场面就能被现场录下，在媒体上播放，取得更大的震动效果。

其实，恐怖活动的直接打击造成的破坏是小的。即使是曼哈顿世贸双子楼倒塌，损失也远不如扩散效应对美国造成的打击。而最大的

破坏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丧失。恐怖分子藏在暗处，防不胜防。为了提防少数几人不知何时可能进行的攻击，社会必须无止境地付出昂贵成本。二十五美分的一个公用电话，谎称某大楼放了炸弹，就需要出动上百名警察，几十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大楼停止办公，疏散人员，地毯式搜索，计算成本，可能是二十五万美元。恐怖分子可以动，也可以不动，主动权完全在他们。不动的时候，成本等于零。防范者却必须时刻警惕，不能有任何松懈，这时双方成本就更不成比例。恐怖分子以逸待劳，只需等待时机，久而久之防范必会麻痹放松，那就是重新出击的机会。如此下去，社会将永无宁日，人类也无法维系生存的意义与信心——而这，正是恐怖主义的策略所在。

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消灭恐怖分子，是否是终结恐怖主义之道呢？首先消灭恐怖分子并不容易。美国倾举国之力，本·拉登至今仍在逍遥。恐怖分子只要不实行恐怖活动，看上去和普通百姓一样，只要不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挖掘干净就不可能。其次并非消灭了恐怖分子就能消灭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一定非由恐怖分子传承，却可以随时制造新的恐怖分子。林肯当年说过这样的名言「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却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我改动一下：能在一定时间防范所有的恐怖活动，也能在所有时间防范一定的恐怖活动，但是不能在所有时间防范所有的恐怖活动——这正是目前反恐的困境所在。

制造九一一的两个前提

如果单纯的武力不能消灭九一一式的恐怖活动，那就要寻找其它途径。分析九一一得以执行和成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生命做武器的自杀攻击者；二是有足够资源为后盾。可以看到，一两个自杀者是搞不出九一一的，需要多人同时赴死才能做到；把现代社会的能源和运送工具组合成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也非敢死就能做到。九一一的行动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事先进入美国，办理合法身份，学习飞机驾驶，彼此协调配合，这些都需离不开组织和资源方面的支持。那么又是靠什么才能形成群体自杀攻击者和得到资源呢？

一种西方说法把自杀攻击者的动机归为向往被许诺的天堂，那里有无数美女供他们享乐，个个都是处女之身。且不说这种说法解释不了女性自杀攻击者的动机，即使是九一一攻击的核心人物穆罕默德·阿塔，生活中也根本不近女性。他父亲说他甚至不愿同女性握手。家里为他物色了漂亮的未婚妻，他却没有去享用那个处女之身，就走上了自己选择的死亡之路。

九一一后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一部汽车内发现了阿塔的遗嘱，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为我清洗身体的人必须是高尚的穆斯林，他们必须带上手套，保证不会直接碰触到我的身体。我的衣服必须是白色的三件套，但不要丝绸或任何昂贵的布料。」 他要求在葬礼中向他的遗体抛洒三次尘土，并念道：「你来自于尘土，你就是尘土，你将回归于

尘土。而一个新的生命将诞生于尘土。」抛洒尘土的仪式结束后，「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呼真主的名字，并向他证明我是以穆斯林的身份死去的，我信仰真主。所有人都要为我祈求真主的原谅……人们应该在我的墓前逗留一个小时，这样我能享受大家的陪伴。最后，杀死一只动物作为牺牲，并将它的肉分发给饥饿的人。」这遗嘱是在九一一事件五年前所写，那时他还不知道他将遗体无存，但是他把它放在九一一登机前所乘的汽车上，说明他仍然要以这份遗嘱为准。对于写出如此遗嘱的人，无法相信他是为了享用天堂处女而死。

九一一共有十九个自杀攻击者。他们都同阿塔一样，是多年准备，心甘情愿以自己生命充当攻击武器。对这样一个深思熟虑、视死如归的自杀群体应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本·拉登本人，他有数亿家产，本可以终生挥霍不尽。要享用美人的处女之身，何必去另一个世界？但他却如清教徒一样生活，全部财富都花在恐怖行动上。正是他，提供了九一一得以成功的第二个条件——组织与资源。这种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把制造了九一一事件的人视为英雄，但是要想防止未来再出现九一一的翻版，仅以憎恶对其进行漫画式的描述是不够的，那注定盲于歧途，找不到根源。

族群仇恨的「精神原子弹」

本·拉登和九一一攻击者都是穆斯林，这是九一一之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热起来的原因之一。文明冲突是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在我看与其说文明冲突，不如说族群冲突来得准确。族群是由人组成的，进行冲突的是人。宗教和文明是划分族群的因素之一，却不是族群本身。文明和宗教可以被当作族群之旗，就像军队在战场上跟着战旗冲锋，但不能说进行战争的是战旗。

族群可以按民族、阶级、信仰等做出不同划分，每个族群都被特有的命运、历史和感情，以及理想与追求所凝聚。族群由人组成，因此有人的情感。当一个族群受到挫折的时候，会产生共同的焦虑，继而凝聚为进行冲突的动力。尤其是具有强烈文明与宗教自豪感的族群，在现实中屡屡面对失败耻辱，甚至产生灭亡在即的危机感时，更容易化作强烈的族群仇恨。

仇恨是导致族群冲突的源泉。我相信本·拉登及其部下，以及整个九一一事件，都是在这种仇恨土壤上生长的。回顾一下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民族的近代历史，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族群仇恨。中东冲突展现着近代伊斯兰世界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人口、面积、军队、资源大出多少倍的伊斯兰诸国，被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打败。这对拥有荣耀往昔的穆斯林民族等于是一次次吞下耻辱苦果，是对民族自信心的致命打击。

仇恨是在弱者心里积累起来的。强者因为强，有仇就报，有恨就

泄，所以不会积累。而弱者在和强者对抗中，注定无法取得胜利。我不是说弱者一定拥有正义，但可以肯定一点——在强弱之间的对抗中，绝望只能产生于弱势一方，仇恨也最容易在弱者心里爆发。在无法找到出路时，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暴力。暴力虽然仍旧改变不了处境，但至少可以表达反抗，可以抒缓心中积累的仇恨，也可以洗刷被迫屈服的耻辱。而只有仇恨达到极度状态，才会促使人宁愿以自己生命换取对敌人的惩罚。恐怖主义炸药的爆炸，必然先是仇恨的爆炸。

的确，恐怖主义者漠视规则，往往以平民或民用设施为对象。然而正因为弱势，如果遵守规则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以弱者之力如何去攻击强大一方的军队和军事目标呢？本·拉登如果强过美国，何必搞恐怖活动，挥兵攻打美国就是了。

我们谴责恐怖主义者，但如果说他们是没有任何道德感的流氓无赖，那就错了。能献身的人不会缺乏道德的支持，只不过那是另外立场的道德。九一一攻击者把矛头对准美国，是因为他们把美国当作站在以色列身后的万恶之源。做一下换位思考，当世界谴责九一一攻击者杀害平民的时候，攻击者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回答——美国对伊拉克的封锁造成了数十万儿童死亡，只杀掉几千美国平民远不够偿还！

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定程度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正义性，帮助复仇者用更为神圣的道德压倒良心层面的道德。尽管那正义和神圣可能虚假，却使复仇者可以安心地从事不分对象的毁灭，使其从事的报复达到最大化。这种极端主义往往会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以允诺另一个世界的嘉奖和报偿来吸引不惜生命的献身，制造出毛泽东命名的「精神原子弹」。

恐怖主义必有族群基础

我提出族群仇恨，是因为类似九一一那种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只有在族群仇恨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九一一的成功要具备很多条件——严密的组织，巨额资金，系统的安排与配合，绝不出卖的忠诚，一呼百应的支持等，是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或黑社会式的团伙罪犯无法拥有的。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自杀攻击者，更要有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激励。恐怖主义是一个系统，需要在族群中形成和保持，也只有整个族群的仇恨能驱动，以及靠族群凝聚的资源来供养。

以总是与恐怖主义共生的极端宗教势力为例，如果没有族群仇恨驱使，宗教在本质上总是鼓励和平，反对杀戮。正是族群仇恨使极端势力成了正义化身，把宗教当成复仇武器。恐怖主义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舍身求死的战士。九一一袭击者受的是西方教育，平时温文有礼，却能在最后时刻带着一飞机平民撞进钢架水泥中。他们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正是为了族群仇恨才踏上亡命之途。

所以，把九一一看成仅出于本·拉登所为是不全面的。尽管本·拉登有钱，死士却不是用钱买的。重赏之下可以有「勇夫」，但「勇夫」

是要活着享用重赏。在阿塔的遗嘱中，没人能看到一点钱的影子，通篇只有信仰和决心。

即使是本·拉登，也不能被视为凭空而降的恐怖魔王。追逐财富是人的本性，舍出几亿家财的动力只能源于历史性。本·拉登是在族群土壤中产生的，被族群文化和历史滋养，由族群耻辱和仇恨驱使。他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体。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不能不正视他。尤其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九一一后他在穆斯林世界得到更多崇拜和爱戴。这种和西方世界相反的爱憎显示了什么？——正是族群仇恨。

制造九一一恐怖袭击的能力产生于族群仇恨，这应该是我们从九一一中得到的启示，这个启示很简单，却指出了避免再发生九一一的途径——必须靠消除族群仇恨，而不是继续加深族群仇恨。

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

九一一之后，中国政府利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迫切反恐的心理，宣布新疆地区的反抗活动是和本·拉登、塔利班联系在一起的恐怖主义，加强镇压，并以此堵住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指责。

这样做倒不见得全是利用形势，九一一确实也让北京受到惊吓。谁曾想到恐怖主义有如此威力？局部的爆炸、杀人甚至暴动，对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都构不成威胁。但是九一一让人看到，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上海，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打击？若是有飞机撞进中南海、天安门、奥林匹克体育场……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而谁有可能在中国复制这种九一一的翻版呢？唯有新疆的伊斯兰分离势力。

海外「东土耳其斯坦」组织则极力否认新疆独立势力与本·拉登之间的联系，表示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只是人民自发抗暴的孤立行为，不会成为新疆独立运动的手段和宗旨。北京的指控不可全信，海外「东土」发言人的辩解也可以存疑。恐怖主义不可能不是一种选择。今天的维吾尔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与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非常相似，处处败在下风，屈辱挫折，无能为力，甚至陷入绝望。而这种族群状态正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条件。站在维吾尔人的位置去考虑，如果不是甘于屈辱，除了诉诸恐怖主义，还能做什么？从情感方面，恐怖主义至少能表达不屈服的意志，安慰一下民族自尊。从实效方面，恐怖主义能引起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增加中国统治新疆的成本，有希望走上阿拉法特的「巴解」之路。维吾尔人既没有自己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认为非暴力原则是一条成功之路。达赖喇嘛坚持和平抗争那么多年，并没有实质性地前进一步。即使是具有无限佛心的西藏人不是也在说，中国人懂得的语言只有暴力吗？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

曾在蒋介石政府做高级警官的蔡孟坚有这样一段回忆：

某日自首共犯路遇一个行动诡秘共党分子华夏，即加逮捕，经密审供出大案，要求负责铲共人亲自听供。我即闭门审讯，该犯供称：中原大战，南京胜利后，且蒋公即将莅汉，汉口工商组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公将出席演讲，共产党趁机打进该组织，并主管发入场证，他们已拿到二百张，共党已自鄂西共党根据地，秘密来到汉口，分配二十五组，每组五人，预定当蒋公莅临讲台时，共党入场分子一齐向讲台投弹，同时由秘密入场者另行投弹，分别炸出几条逃路。[①]

按这样计划执行，也许可以炸死蒋介石。但是在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齐投弹，肯定伤及众多无辜。还有那些「炸出几条逃路」的炸弹，基本是要扔在人群之中。即使在恐怖主义登峰造极的今日，这计划也够得上惊心动魄。当时若真得以实施，历史上肯定可以和九一一齐名。

中共当然会说那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然而东土人士也可以同样说是为了「解放东土人民」。的确，恐怖主义和为自由而战不易区分。如果说谁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谁进行的暴力活动就不是恐怖主义，而反抗暴力的就是恐怖主义，那便没有正义可言，历史上底层人民的反抗就统统都成了恐怖活动。

即使如东土发言人所说，「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只是人民自发抗暴的孤立行为」，也不意味将来会一直是这样。只要族群仇恨继续积累，新疆形成有规模有体系的恐怖主义是迟早之事，和泛伊斯兰、泛突厥的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也是必然。

一位新疆警方人士讲过这样的事：一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的地毯卖，警方审查时却发现偷地毯的维吾尔人贴身绑着四十万元钱。最终得知那维吾尔人是为一东土地下组织送款，因为没接上头，自己钱花光了吃不上饭，才偷地毯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处，而是明明有那么多钱，他挨饿时却宁可偷地毯也不花其中一分钱，可见忠诚的程度和纪律的严格——这才是让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我对此事也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影子，却让人不得不想，如此信仰和力量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九一一那种恐怖事件怎么会没有可能！

我认为中国需要从恐怖主义的另一面重新思考新疆问题。如果说九一一能给世人什么正面提醒，就是实力再强大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重大伤害。如果强者不屑弱势族群的仇恨，仇恨加绝望说不定何时就会配制出惊天动地的恐怖，让强者也尝到苦果——很多恐怖主义

[①]蔡孟坚，《有关周恩来杀顾顺章灭门血案之澄清》，《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三期【总 448 期】，15 页，一九九九年九月。

仅仅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而已。

一个海外维吾尔人问我「三峡大坝怎么样」时，面带神秘微笑。也许他本无深意，但是我和他眼光相遇时却似乎心领神会，使我从头到脚掠过一股寒气。我之所以敏感，是因为那时我正在琢磨一个可能。听我讲过的人担心对恐怖分子构成启发，都劝我不要往外说，但我却相信恐怖分子只能比我想得更早更细，因此从防范角度，反倒更应该公开。

想象：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

以往对三峡大坝安全性的争论，主要针对正规战争。认为可以保证安全的理由，一是战争会有预兆，可以提前降低蓄水水位；二是常规打击难以破坏三峡大坝；三是中国具有核威慑能力，敌方因此不敢使用核武器打击大坝。三峡大坝通过安全论证，就是以这几个理由。那时对恐怖袭击基本没有考虑，因为对三峡大坝，传统的恐怖袭击只如蚊子叮牛角。

九一一之前，如果有人说恐怖分子可以让世贸双塔同时坍塌，一定会被认为是妄想。九一一之后，对恐怖分子可能做到什么，想象力不得不扩展许多。因此对三峡大坝，必须把恐怖袭击也当作威胁安全的因素。这时上述通过安全论证的理由就有了疑问。首先，恐怖袭击完全没有预兆，反而会选择在蓄水高的时候进行；其次，核威慑对恐怖主义不起作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恐怖分子在哪。剩下的只是恐怖分子有没有能力摧毁三峡大坝。对此以九一一为例还是不够的。三峡大坝毕竟是用二千七百万吨混凝土和五十五万吨钢材铸成，比世贸大厦大很多。即使是成吨炸药扔到上面，也不伤筋骨。

在大坝表面炸毁三峡大坝，有计算认为需要五千万吨爆炸当量[①]，这是恐怖分子无能为力的。但如果不是在表面炸，而是到大坝深处炸，需要的爆炸当量就会大大减少。三峡大坝不是一个死心的实体，为了泄洪和排淤，坝身开了很多贯串的洞孔。一篇专业水工文章这样介绍三峡大坝：

坝身孔数之多、尺寸之大实属罕见，泄洪坝段 23 个，总长度为 483m，分表孔、深孔、底孔 3 层布置。表孔 22 个，单孔尺寸 8m×17m，挑流消能，最大流速 37.9m／s；23 个深孔布置在坝段中间，尺寸为 7m×9m，设计水头 85m，挑流最大流速 39.5m／s；22 个底孔，尺寸为 6m×8.5m，设计水头为 84m……[②]

[①]《从人民防空角度看三峡大坝的安全》，http://www.ccad.org.cn/thjs/new_page_3.htm

[②]郦凤山，《我国坝工技术成就》，

我请一位前美军炸弹专家帮忙计算，如果爆炸是在这六十七个孔内发生（越靠底部效果越好），只需要五千吨爆炸当量就可以摧毁大坝，也就是说，比在表面爆炸需要的当量减少一万倍。那位炸弹专家告诉我，五千吨当量的战术核武器，直径只如小汽车的方向盘，长短只有几十公分，一个人可以抱着走。除了战术核武器，美军还发展出各种可单人背负的大当量炸弹，供伞兵降落携带，专门用于炸大坝大桥。这些武器被恐怖分子偷走或买去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解体后这位炸弹专家曾在前苏联中亚地区搞过一个时期核武销毁与监察，深知漏洞很多，黑幕重重。而新疆分离主义者在中亚关系密切，活动频繁，不是没有获得这类武器的可能。

炸弹专家的计算在我看来是比较保守的。对他而言，大坝被摧毁的概念是爆炸能量足够把几十米长的一段大坝整体抬起若干米，才算导致大坝的崩垮。其实水库上百米的水深，等于在每平方米坝体上都施加着上百吨压力。二千三百三十五米长一百七十五米高的大坝在整体上承受着几千万吨的压力，因此只要在坝体底部炸出哪怕是不大的开裂，上千万吨的压力也会导致那些开裂迅速扩大，继而导致大坝崩塌。从这样的角度看，摧毁大坝真正需要的爆炸当量也许可以大大少于五千吨。那么恐怖分子即使得不到高科技的小型核武器或高当量炸弹，用比较低的技术也有可能摧垮大坝。

比如说，用一船普通炸药（炸药当量会随技术发展不断提高），把船改造成半潜水状态，利用大坝开闸泄洪或冲淤之机，从上游接近大坝，开进大坝底部的泄洪孔，然后在孔内引爆炸药，很可能同样导致大坝崩垮。而那样一种袭击，几乎没有复杂的技术。最难的也许就是控制爆炸时间。贯串大坝的洞孔长度只有一百多米（三峡大坝底部宽一百二十一米），水流在其中的最大流速可以达到 39.5m／s，也就是说装载炸药的船三秒钟内就会被冲出大坝。爆炸必须在这几秒钟内引发，而且应该在最有效的位置。这个控制如果是由技术来实现是很难的，需要相当于巡航导弹的水平。然而由人实现就变得简单了，只需一个与炸药一同封在船内的人按一下按钮，技术仅是几根电线而已。

前面说的小型核弹也是这样，没有精密导弹往大坝洞孔中送核弹头，就只能以人代替。那会比用炸药更简单，连船都不要，目标极小，只需一个自杀者背负核弹随水流潜进泄洪隧道，然后做一个引爆动作。

我相信有人对此会发笑，太像故事了。的确我是在使用构思小说的想象，其中细节也是胡编乱造。然而并不妨碍这构思中大的方面具有可行性。对此我们最好居安思危，因为三峡大坝如果垮掉，带来的灾难非同小可。请看这样的描述：

---

http://www.google.com/search?q=cache:PcZARpySB4wC:www.sp.com.cn/chinawp/sdlt/sdlt05.htm+%E4%B8%89%E5%B3%A1%E5%A4%A7%E5%9D%9D+%E5%9D%9D%E5%AE%BD&hl=zh-CN&ie=UTF-8

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 100-237 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 31 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 65 公里，溃坝 4-5 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 64-71 米。

……宜昌城已在水下 20 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 50 万。

……当三峡水库里装满水，自然水流在 60000 立方米 / 秒时的溃坝情况将是怎样的，393 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黄河一年的水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溃泄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汉平原保不住，武汉也保不住，京广、京九铁路也保不住，洪水影响范围一直到南京。[①]

中国顶尖科学家钱伟长说的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有人批评钱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我宁愿重视这种悲观论调，也不愿轻信对灾难的轻描淡写。即使达不到几亿人陷入绝境，只死几十万人难道就可以忽略不计吗？三峡溃坝即使淹不到南京，淹到武汉不也足够可怕？对于社会矛盾月积年累的中国，照样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说不定会导致整个中国发生「溃坝」。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讨论这个话题，只是希望提醒：九一一改变了以往的战争规则，它表明进行打击的能力与强度不再只取决于实力。九一一是美国的梦魇，而对很多感到遭受压迫的族群，却成了辉煌的榜样和信心的来源。他们不一定是为九一一本身叫好，也不是仇恨美国，只是从中看到了弱者可以达到的力量。强弱不再是过去的概念。在这个时代处理族群之争，如果强势族群还是把实力当作一切，说不定哪天就会使九一一的梦魇落到自己头上。

因此，在思考中国的新疆政策时，我认为应该排在前面的考虑就是，九一一到底有多远？怎样才能不让九一一在中国发生？

[①]王维洛，《三峡大坝悠关台海战事》。

移民能否「淹没」原住民？

对新疆进行移民，是中国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要思路之一。在决策者眼中，新疆汉族人口越多，新疆问题就会越小。如果真能用汉人移民「淹没」当地民族，固然缺乏道义，也不能不算一条保证主权的可行之道。但汉人要达到怎样的规模，才算把当地民族「淹没」呢？内蒙古被认为达到了「淹没」的程度，那里的民族问题也因此的确较少浮现。二〇〇〇年内蒙古有四百零三万蒙古族人口，汉族人口是一千八百八十二万，后者是前者的四点六七倍[①]。如果以此标准推算，新疆汉人要想「淹没」九百多万维吾尔人，需要达到四千五百万，如果要「淹没」一千一百五十万穆斯林[②]，要达到五千四百万，而目前新疆的汉人将近八百万，还差四千六百万。

新疆地盘看上去很大，但多数是沙漠戈壁，适于人类生存之地只有少数绿洲。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目前新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百分之三点五的绿洲上，绿洲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高达每平方公里二百零七人以上，与中国内地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接近[③]。因此新疆可供移民的空间已经接近饱和，指望汉人移民数量再增加几千万是没有可能的[④]。

这是中国不可能靠移民解决新疆问题的要害所在。如果不正视这样一种现实，盲目推行移民政策，将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最终实现的移民数量不足以「淹没」当地民族，同时移民政策和增加的移民却加剧了当地民族对汉族的敌意。从长远看，可能是最不利的状况。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新疆有很多可开发但尚未开发之地，有丰富的水源，汉人移民去开发固然会引起当地民族精英的批评，但因为可以不和当地民众直接争夺利益和资源，民族冲突就不会向下延伸。然而今日新疆已经存在人口压力，绿洲荒漠化，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仅一个缺水，就决定了任何新来者都会成为原住民的威胁[⑤]。目前新疆原住民就把生存环境的恶化归咎汉人移民，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类殖民组织。近年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原住民生活环境，与当地人发生利益争夺、文化冲突及种族偏见。这种接触和互动几乎会涉及当地民族的每个人，产生大量日常摩擦，于是民族之间的对立不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也不再只是精英关注，而成为原住民的族群上下一致的感同身受。这便是移民政策最糟的恶果。

[①] 内蒙古政府网站：http://www.nmgtj.gov.cn/myshow.aspx?id=782&cid=545

[②] 新疆政府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xinjiang.gov.cn/1$001/1$001$001/12.jsp?articleid=2004-3-30-0001

[③] 天山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11/50/200112/13/13843.html

[④] 不过也有人在谈论从西藏调雅鲁藏布江水，可以把新疆戈壁变为耕地的想法。

[⑤]新疆的人口密度目前已达到每平方公里 9.6 人，而世界干旱地区人口居住标准为每平方公里不超过 7 人。（见新疆新闻网http://www.xjnews.com.cn/zhuanti/news/lianghui/jj/jj13.htm）

武器消灭不了仇恨

九一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我看就是迫使强势民族打开视野，原来只要国家没有分裂危险，可以对弱势民族不屑一顾。现在却必须时刻睁大眼睛，紧盯弱势民族的一举一动，担心九一一从天而降。

但以为只要瞪大眼睛，用武器对准弱势民族，加强镇压就能避免九一一重演，却是错的。前面一直是在论证：能在一定时间防范所有的恐怖活动，也能在所有时间防范一定的恐怖活动，但是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防范所有的恐怖活动。如果把恐怖主义单纯理解为邪恶，唯以战争对待，最终效果一定是南辕北辙。战争可以消灭物质的恐怖营地和武器，却不能摧毁恐怖主义的源头——人心的仇恨。仇恨无法被武器消灭，反而战争只能增加新的仇恨。恐怖主义不会随恐怖分子一块死亡。反而在恐怖分子被消灭的一刻，新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同时产生。就像车臣的「黑寡妇」们，原本只是妻子，当她们的丈夫被当作恐怖分子消灭时，她们自己就成了恐怖分子。

只有我们这个世界不再有族群之间的仇恨，恐怖主义才会不复存在，九一一那类大规模恐怖活动才能不再发生。没有主义支撑的恐怖活动或属于个人报复，没有系统，成不了规模；或出于黑社会团伙的利益之求，不会舍身求死，容易把握和防范。那类恐怖活动过去就有，未来也构不成大威胁。而只要没有了族群仇恨和恐怖主义，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就会安全得多。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不管镇压在眼前多么有效，也不等于可以保持永远。被沙皇俄国征服的民族，也曾在上百年看不到任何希望，却在一个历史机会到来时，一夜间纷纷获得独立，巨无霸的苏联帝国顷刻瓦解。民族问题真正解决与否，在日常过程是难以衡量的，需要在特殊的历史关头考验——那时各民族仍然愿意留在同一个国家，还是会揭竿而起，趁机分裂？从人心和从镇压角度解决民族问题，效果的不同在那时一目了然。

对中国，那关头是迟早要来的。如果知道这一点，就更应该意识现在的镇压有害无益，因为所谓的关头，就是无力再进行镇压，那么现在的镇压越狠，到时人家就越要跟你分裂。

图图主教所说「自由比镇压更便宜」，这句话放在消除仇恨方面，体现得特别明显。以往强势族群的典型手段是「大棒加胡萝卜」，在镇压之余补偿一些物质，认为就可以平衡。但事实却是，送出去的物质似乎不发生作用。这世界美国提供的物质援助最多，可是挨骂也最多。中国政府无论对西藏还是新疆，都输送了可观的物质，却无法挽回人心的渐行渐远。仇恨不是物质，因此不是物质可以消除的。弱势族群首先要在精神上感受正义与平等，而不是征服、侮辱和歧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即使有再好的吃住条件，囚犯会感觉幸福吗？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自由当作一切之前的「1」，物质的好处没有这个「1」，不过是没有意义的「0」，而有了这个「1」在前，跟在后面的「0」就会有扩大十倍百倍的作用。

穆合塔尔，这信刚写不久我就发现，与其说是写给你的，不如说主要是写给我的汉人同胞和汉人当权者的。维吾尔人并不需要看这样的信，武器消灭不了仇恨的结论，你们当然最清楚。不过我还是这样写下来了，至少供你有机会和汉人进行讨论时，可以引用一下我的观点。你不是说汉人最爱「讲道理」吗，那你就和他们讲讲另外一个汉人说的道理吧。

王力雄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一日（九一一四周年）

第二封信：独立不是最好选择

穆合塔尔：

上封信被我写成了给汉人看的，这封信我要收回来，是真正写给你的。我想试着从维吾尔的立场对未来选择做一下思考——新疆是否一定需要独立？争取独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怎样做更符合维吾尔人的利益？

汉人的国家概念

古代中国对国家的观念，主要不是建立在领土、资源、边界等「物」的事物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礼」上，是「天下」、「朝廷」的概念，与今日世界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概念有很大区别。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汉人）而言，真正具有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才开始的，并且在一系列贯串二十世纪的「救亡」、「抗敌」和边境争端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所谓「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主要是指领土，而非民族。这可以解释中国的其它民族为何没有被列入「共和」范围。而「五族」中的「回」，领土上指的就是西北，主要是新疆。

因此，尽管从新疆本地民族的角度可以说新疆不属于中国，是被中国侵占，历史角度的论证也可以有不同解读，但是仅从中国人的心理而言，从最初开始有主权国家概念的那一刻，新疆对他们就已经是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国的概念就是由「五族共和」构成的。因此在他们心理上的效果，等同于中国政府所称的「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这并不符合历史，但是世上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历史？即使是历史专家也说法纷纭，百姓的历史知识更是超不过民间传说水平。民众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其实主要是根据心理需求——他们愿意相信什么，或是他们认为应该相信什么，而不会下功夫研究真相，并且真去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一直举着两面旗，一面是马克思主义，另一面就是民族主义。它靠这两面旗夺取了中国政权，在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同时，也一直把民族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家机器对全体中国人不停重复旧中国遭受的耻辱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罪恶，树立「民族英雄」形象，鞭打唾弃形形色色「民族败类」。迄今几代中国人都是从出生就浸淫于这种民族主义氛围。相当程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人身上已经具有条件反射的性质，成为集体非理性，可以随时从潜意识层面被激发。在毛后时代，

尤其是在六四之后，中共在行为上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将其当作表面文章，民族主义便成为唯一能动员和凝聚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在以往革命中被摧毁了大部分共同精神纽带的汉人，目前只剩下一个「国家」符号是集体共识，因此唯有这一符号能让汉人群起。「国家统一」成为不可触动的底线。「五族共和」中的任何一族企图脱离，都会导致十多亿汉人做出激烈反应。虽然新疆是否独立对汉人大多数并不构成直接影响，但附和民族主义呼喊甚至战争叫嚣同样也不需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也许可以认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起哄，但民族冲突和战争往往就是由起哄开始。连专制政权都不能无视这样的「民意」，何况未来「民主化」的中国，靠选票上台的政权就更不敢忤逆最大的「票仓」——汉人（当然那时的政权也主要是汉人掌握）。所以，民主化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释放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那种情况下，想说服汉人同意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面积的新疆分离出去，几乎不可想象。

中国为何行不通苏联解体的模式

前苏联以解体解决了民族问题，应该不失是较好方式，至少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苏联解体给期望从中国分离的少数民族人士带来鼓舞，他们盼望同样一幕也能在中国上演。那种独立几乎等于从天而掉，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夜之间就摆在眼前。

然而中国和苏联有一个很大不同。苏联是实行联邦制，其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在专制统治时代，这种宪法权利是意识形态的装点，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专制垮台之时，如果那时政权不是被武力集团夺取而是和平转型，就只能以原来的宪法为基础。过去许诺的空头支票马上就变成确切的合法性根据。但中国却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对国家的定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要小看是否有联邦名号，它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和平解体几乎有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专制权力突然垮台后的民主转型期，社会既没有成熟力量，也没有明确纲领，权力却必须重新分配组合，那时最能被多数力量认可，也最容易被权力角逐者利用的，就是社会长期认同的公理——哪怕那公理过去只停留在口头。有联邦制名义的国家和大一统国家，两种社会在应该解体还是统一的问题上，认同的公理可能完全相反。苏联可以实现顺利解体，绝不意味中国也能如法炮制。未来中国的政坛，政客们倒可能更多地需要高举反对分裂的旗帜，才能赢得占压倒多数的汉人选民。

大一统除了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于维系非联邦制国家也是一种必要条件。因为联邦制国体即使解体也会有限，一般只是联邦成员之间解除联盟关系；但是非联邦制国体若开始解体，却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如果大一统框架下的民族地区可以分离，同为大一统框架下的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如果分离与否仅仅依据

住民自决，广东百姓多数会认为广东独立可以过得更好，珠江三角洲居民又可能认为脱离广东最妙，上海市民也会认为自立的上海可以成为另一个新加坡……中国很多地方都可能产生独立的要求与动力，也会获得多数本地住民的赞成。那时的中国会不会四分五裂，无法维系呢？

除了宪法和国体的区别，中国和苏联相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不同。俄罗斯在前苏联只占人口一半左右，但却占有 76%的领土和大部分资源。从分财产的角度看苏联解体，俄罗斯人平均分得的财产远高于其它独立出去的民族；另一方面，与其它民族分开，对俄罗斯也等于是甩掉包袱，这一里一外的算帐，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是「合算」的。因此俄罗斯人没有非常强烈地抵制苏联解体。这是苏联得以和平解体的重要因素。

而汉族人口虽然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只有中国领土的百分之四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点几，却占有百分之六十的领土，百分之九十的草原，拥有近百分之四十森林和一半左右的木材积蓄量，以及一半以上的水利资源，还有更多的矿产资源。这笔帐非常清楚，如果中国按照民族区域解体，汉人明摆着要吃大亏。除了财产上吃亏，还有国家安全因此面临的威胁。缩小一半以上的生存空间，抵御外敌的屏障也随之丧失，由此带来的恐惧感足以让汉人政治家和战略家否定一切中国解体的可能。而如果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默许，一个国家靠协商来实现和平解体是不可能做到的。

新疆汉人的保卫战

穆合塔尔，也许你们可以说，汉人不给新疆独立，我们也不指望恩赐，那就靠战斗去实现！的确，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通过战争打出民族独立的先例，但是在新疆实现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

在中国的专制权力稳固时，新疆独立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政治反对派也好，地下组织也好，恐怖活动也好，都不会有实际进展。现代国家机器拥有的能力是反对派无法抗衡的。新疆独立力量真正可以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一切大权集于中枢，稳定时中枢无孔不入地管制一切，一旦中枢出问题，整个体制的功能就会一块丧失。那时新疆本地政权将随共产党垮台而瘫痪。当中国自顾不暇，原本积累的社会矛盾会一同爆发，导致一个不断趋向崩溃的循环。

但中国出现乱局只意味给新疆独立提供了起事机会，却不意味新疆就能独立。那时的新疆肯定会涌现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活动，成立或大或小的地方权力机构、政党组织乃至武力集团。但因为事先没有

足够准备和培养，多数都不会有实质性力量，不过是趁乱起事，跑马圈地。能否搞出名堂，取决于有无力量把各个山头整合在一起，形成有领袖、有纲领的统一阵营，并能获得民众拥戴。我们在谈话中，你不断提到需要形成一个领袖，类似达赖喇嘛那样成为民族的代表，有万众归心的威望。这是对的。目前的世界维吾尔大会能否担当起那个角色，又是否能产生那样的领袖，还待观察。

但即使推动新疆分离的势力能够整合起来，也要面对中国和汉人的因素。虽然出现严重动乱的中国可能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然而新疆和西藏的不同在于新疆有八百万汉人。占据了新疆大部分城市，其中还有二百多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汉人，分布在新疆大部分农村。汉人控制着新疆的油田、企业、铁路、机场、金融和口岸，现代社会的所有主要环节，几乎全部由汉人掌握。还有军队、警察和武器也都被汉人控制。因此不管中国内地怎么乱，即使共产党政权垮掉，新疆汉人也会在军队、兵团，以及城市市政当局领导下与新疆分离势力对抗。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早就把新疆当作家园，别无去处。对他们而言，反对新疆独立是在保卫自己和家人生命，那种背水而战的压力足以让他们一致对敌。

新疆汉人不仅会有战斗决心，也有打赢的可能。新疆是适于发挥现代化优势的地方，广阔地域需要机动性，平坦地形适于大部队作战和重武器施展，这种优势正是在新疆汉人一边。同时新疆有丰富的资源和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就地筹措燃料、给养与后勤保证。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使没有中国内地的支持，新疆八百万汉人也可能成为新疆独立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然，当地民族可以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得到支持。但那些支援主要来自民间力量，不太会以国家方式介入。因为国家大都是世俗政府，不会仅仅因为民族和宗教原因轻易介入别国——尤其是一个大国——的事务。陷入混乱的中国总要重新稳定下来，那时还是得做邻居或打交道。乘人之危为自己树立一个未来的强敌，可能并不值得。

的确如你所说，只有一种情况下新疆脱离中国可能成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决定利用中国动乱肢解中国，并为此提供实际支持。但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打算，不一定如你想象那样确定。某些角度看肢解中国也许对美国有利，从此不会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具有威胁性的大国。但如果眼光看得宽阔一些，中国的失衡可能对整个世界带来更大威胁，最终也会危及到美国自身。

暂且假设有一天西方真对中国进行肢解，我们来看那时会发生什么。一方面西方对急需国际支持的中国当局（如果那时还存在当局的话）施加压力，使其步步退让；一方面扶持新疆本地的分离势力，提供资源，帮助其形成阵营，扩大控制范围；同时再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说、国际组织的认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等，给分离创造条件，提供合法性。在那种情况下，新疆周边国家、泛伊斯兰势力、泛突厥势力都会趁机插手，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一旦资源滚滚而来，分离势力可以迅速壮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东

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曾拥有过苏联装备的数万正规军，未来可能有更大规模的军队，足以与新疆汉人的军队抗衡。如果那时有明智而具高超手腕的政治家，给新疆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证，给愿意撤回中国内地的汉人让开通路，并给他们足额甚至超额的补偿，瓦解汉人斗志，促使尽可能多的汉人返回中国内地。汉人走得越多，新疆独立的障碍也就越小。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新疆从中国分离才有可能。

穆合塔尔，出现这样的前景，如同我说，是把所有最有利的条件集中到一起。不能说可能性完全没有，但是概率的确很小。我们不妨假定新疆就是按这种前景实现了和中国分离，获得了独立，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新疆内部可能出现的问题下一节再谈，新疆对外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中国。只要新疆的土地不能搬走，和中国连在一起，就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影响。而那时的中国无非有两种前景，一是逐渐摆脱动荡重新稳定下来。被肢解后的中国尽管无法再去追求世界强国地位，对新疆而言仍然是庞然大物。一方面国家被肢解给汉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总会伺机反弹；另一方面领土的缩减使汉人生存空间遭到过分挤压，反而会导致其扩张性增强。美国和西方充当的世界警察只能在一时防范中国，却不能让中国永远不去体现自己的意志。中国是不会放弃重新收回新疆的，因此独立后的新疆不会有安宁日子。未来的新疆要想保持住独立，将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和财力用于对付中国威胁。

中国的另一种前景是动荡不断，最终陷入社会崩溃。虽然那时中国作为国家而言可能不再有威胁，但是另一种威胁对新疆照样可怕——不得不自己寻找生路的汉人流民会像洪水一样流向四面八方。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古老的丝绸之路，继续历史上的「走西口」。面对那样的洪流，新疆可能会发现，好不容易赶走的汉人又回来了，甚至比原来更多。

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区域

新疆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汉族相对而言分布最均匀，在全新疆十五个州地市中的十二个州地市比例超过 20%。但最多的汉人集中在新疆中部亚欧铁路经过的几个州地市，在那里比例占到60%以上。而在维吾尔人集中的南疆，汉人比例大大下降，如和田地区的汉人只占到 3.1%。

维吾尔人所占比例超过 20%的有七个州地市，都在天山以南。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 96.7%，几乎是单一民族地区。而在新疆最北的阿尔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 1.6%。维吾尔人超过 50%人口比例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五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 80%以上。那五个地区的面积只占新疆总面积的三分之

一多一点（37.51％），见表[①]：

维族主要聚居区	维族人口	维族人口比例％	面积（万平方公里）	占新疆面积％
和田地区	1764306	96.7%	24.79	14.93%
喀什地区	3324302	90.0%	11.37	6.85%
阿克苏地区	1651149	72.9%	12.41	7.48%
吐鲁番地区	410034	70.2%	6.97	4.2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304752	64.0%	6.73	4.05%
总 计	7454543		62.27	37.51%

哈萨克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尤其是聚居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阿尔泰、塔城和伊犁三个地区。南疆维吾尔人聚居区几乎没有哈萨克人，如在近 370 多万人口的喀什地区只有 750 个哈萨克人（估计都是国家分配的干部或职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新疆虽然称为「维吾尔族自治区」，但新疆境内还有四个民族另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州（或地区），其中哈萨克族有一州二地区，蒙古族有两个州，回族有一个州，柯尔克孜族有一个州。各族自治区域所占面积[②]如下：

	面积（万平方公里）	占新疆总面积％
哈萨克族自治区域：		
伊犁州直辖县市	5.68	
塔城地区	9.39	
阿尔泰地区	11.62	
合计	**26.69**	**16.08%**
蒙古族自治区域：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4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47.42	
合计	**49.87**	**30.04%**
昌吉回族自治州	**7.76**	**4.6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6.73**	**4.05%**
总 计	**91.05**	**54.85%**

[①]以上人口数引自《新疆统计年鉴·2006 年》82-87 页；各地区面积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分县地图册》计算。

[②] 各地州面积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分县地图册》计算

新疆独立是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

上述数字不能不让人考虑：即使新疆未来真有独立的一天，将是什么样的独立？又是谁的独立？仅仅与中国内地分开就完了吗？新疆其它民族是愿意和维吾尔人共建统一国家，还是可能继续寻求本民族的独立，甚至宁愿归属相邻的同民族国家？

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十个州直属县市和塔城、阿尔泰两个地区）与哈萨克斯坦有上千公里接壤。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二百七十二万平方公里，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八百八十六万是哈萨克族[①]。哈国政府一直推行大哈萨克主义，号召全世界哈萨克人回归。如果新疆与中国分离，对新疆哈萨克人而言，与其归属维吾尔人国家，很可能不如归属哈萨克人自己的国家；何况哈萨克斯坦也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新疆哈萨克人连同富饶的北疆土地一道并入。

蒙古国与新疆的接壤比哈萨克斯坦更长。新疆境内的蒙古族自治区域占新疆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其中仅一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是四十七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英国。维吾尔人一直认为建立蒙古族自治州是中共对新疆分而治之的伎俩，因为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占 4.1%，维吾尔人却占 32.2%；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比例仅为 5.9%，维吾尔人却为 12.6%。但即使新疆未来独立，维吾尔人想撤销蒙古人的自治领地也不会那么简单。一是原来的法统已成定式；二是如果以住民投票的方式决定，维吾尔人虽在两个蒙古自治州超过蒙古族人口，却达不到总人口多数。两州占绝对多数的都是汉人。他们可能宁愿支持与汉人宗教接近的蒙古人，也不愿把自己置于维吾尔人的直接统治之下。

现在的昌吉回族自治州，虽然回族人口只占 11.7%，却高于只占 4.0%的维族人，所以回族人也会希望继续当昌吉州的主人，而不愿意服从维吾尔人的号令。回族人散布于新疆各地，许多人世代在新疆生活，对新疆极为熟悉。靠近新疆的中国西北地区还生活着几百万回族人，与新疆回族来往密切，他们联起手来，力量也不可小觑。上世纪西北回族军阀就曾在新疆耀武扬威。[②]

当新疆穆斯林共同反抗中国统治的时候，可以争取到国际伊斯兰力量援助，如果斗争转移到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回族人之间，都是穆斯林，国际伊斯兰社会又该援助哪一方呢？而一旦失去国际援助，维吾尔人的力量又会减弱很多。

当然，最难办的还是在新疆的汉人。新疆大部分城市都是以汉人居民为主。石河子那样的纯汉人城市不必说，即使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汉人比例也高达 73.7%。因此新疆的多数城市都不会服从「东土

[①] 维吾尔在线网引自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布的资料。http://www.uighuronline.cn/ZY/HSKST/200602/316.html

[②] 以上两段的人口数字引自《新疆统计年鉴二〇〇六年》82-87 页。

耳其斯坦国」的管辖。更不要说辖下上百块“领土”分布新疆全境，总面积达到 7.43 万平方公里的「生产建设兵团」。

设想一下，新疆维吾尔人如果不能控制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以及汉族控制的地域，「东土耳其斯坦国」就只能稳定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一带的新疆西南。而原本被认为可以作为东土耳其斯坦立国之本的石油，主要产地在哈萨克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只有吐（鲁番）哈（密）油田在维吾尔人属地，却又靠近汉区（哈密与甘肃接壤），被汉人（无论是在新疆割据的汉人还是中国汉人）占据的可能性很大。新疆的另一大资源——棉花，在维吾尔人稳定控制的区域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产量。「东土耳其斯坦国」一旦缺少了被称为「一白一黑」的经济支柱——棉花和石油，建国实力会大大削弱。

维吾尔人难以控制全境

当然，维吾尔人会要求「东土耳其斯坦国」控制新疆全境，不可分裂和割据，不过这需要解决法理问题，还要看维吾尔人的能力。

新疆独立的法理依据之一是当地民族「自古居住于此」，那么哈萨克人、蒙古人也在当地住了几百年，不是可以同样要求独立于维吾尔吗？独立的另一个依据——民族自决，其它民族也一样可以如此要求。如果维吾尔人不同意其它民族自决，要求在全新疆范围公决，那就破坏了新疆独立自身的依据。因为按照那种道理，新疆能不能独立也得通过整个中国范围的全民公决了。因此在法理上，只要「东土耳其斯坦」能立国，就没有理由阻止新疆其它民族和区域要求独立。

届时「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是也会打起「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旗帜呢？可想是必然的。那除了会被指责与当年殖民者的腔调一致，还涉及第二个问题——维吾尔人有没有维护统一的能力？如新疆哈萨克人虽然比维吾尔人弱小（二者人口比例约为 1:7），但其背后的哈萨克国家却不是维吾尔人可以战胜的。同样，蒙古国及相邻的内蒙古是否会援助新疆蒙古族人，也可能带来复杂变量。更不要说新疆的汉人。

我一直认为，新疆未来的民族冲突可能很暴烈，但新疆实现独立的条件却不如西藏。西藏基本是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政府。新疆则是民族关系复杂，地域交错，界限不清，变量过多，一旦离开原本的框架就会发散，导致一环比一环更难解决的问题链条。复杂的民族关系使民族问题在新疆比在西藏更难解决，需要的智慧也更高。

寻找「中间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对维吾尔人更有利的不是独立，而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新疆的高度自治。这可以完好地保存和利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法统，保证维吾尔族在新疆的主体地位，避免新疆被不同民族分裂。同时以中国为后盾，防止外国势力对新疆的觊觎。

独立当然是民族精英的理想目标，但是民众的安危和幸福比英雄人物的追求更重要，负责任的民族精英应该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独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不独立也能实现人民幸福，独立却需要人民付出高昂代价，那么放弃独立就是更明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达赖喇嘛是一个表率。

穆合塔尔，你也同意「中间道路」可以避免流血。你的怀疑在于高度自治的概念不清楚，老百姓也不好理解，因为当局总是狡辩说现在就已经是高度自治。你在谈话中，提出了几条衡量高度自治的标准，那可以作为进行讨论的基础。其实真正的高度自治除了没有外交和国防权力（也没有相应的负担）外，其它方面都是由新疆当地人民自主，和独立达到的自主没有多少区别。在那种情况下，新疆当地民族的地位和新疆人民的利益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不过，高度自治的核心，是当权者必须由本地民众推举产生。中国目前的民族自治之所以是假。就因为当权者都是由北京任命。那种被任命的当权者即使全都长着维吾尔人的面孔，也不可能真正为维吾尔人服务，而只是充当北京统治新疆的工具。因此，实现高度自治的第一步应该就在这里。

不过问题也会出在这里。当权者如何由本地居民推举？这就要靠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解决如何产生和制约领导人。然而如果采用目前通行的代议制民主，却很可能在民众推选领导人的过程中偏离中间道路，把对立的民族引向冲突，而且不断趋于极端。

写到这儿，需要探讨一下新疆未来的政治制度。你认为新疆应该选择的政体是西方民主制，我对这个选择却深为担忧。西方的代议制也许适合处理一个族群社会的内部关系，但是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民族冲突方面，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冲突总是和民主转型如影相随的原因。

无限放大的「广场」

没有充分演进过程而照搬代议制，是目前专制社会进行民主转型的普遍特点。在这种代议民主之下，一方面权力仍能继续愚弄和压迫民众；另一方面民众也能在某些特殊时刻裹挟权力。前者是专制操纵民主，后者是民主进行专制。这种民主的典型形态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方式表达支持和反对，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多数暴政。而未来中国，包括从中国专制权力下解脱的民族地区，初期的民

主恰恰最可能是这种广场式的民主。

倒不是说民主真会在广场上进行，但发生的效应和在广场上是相似的——典型特征是精英、大众和媒体之间产生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获得大众欢呼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精英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一般共同躁动。

成熟的民主社会偶尔也有「广场效应」，如对伊拉克动武时的美国。但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政党相互反对、媒体立场多元、大众观念分化的格局已成常态，基本会按相互制约的原有惯性运行，不太容易出现一面倒的失衡。然而对民主转型期的社会，政党和媒体都是刚得到自由空间，制衡格局远未形成，主要目标在于跑马圈地。最可能出现的是各方争抢同一个制高点，什么话题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话题炒作到极致，以达到赢家通吃。这样的结果，就是促使社会情绪趋于同一方向。

面对「广场效应」，理性只能沉默，异议只能退缩，最终决策往往疯狂。「群众人」的特征是从众，而非认真思考，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们或是被「广场」的热闹吸引，或是被周围的压力驱使，或是惧怕不合群的孤独。而当群众聚集得越多，善言辞、会煽动的政客就越是如鱼得水。在广场上欺骗十万个陌生人，要比欺骗身边十个熟人容易得多。

民族问题在专制统治时被镇压和掩盖，到了民主转型时就会爆发，在民主转型初期，民意采集、传递、疏解和约制的渠道必定不畅，利用「广场」会成为表达民意的主要手段，不仅对需要表达意见的群体方便易行，政党和媒体也会出于自身需要推波助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造成国家整体性的狂热。那时无论议会、内阁、执政党或总统，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再加上「民主的发作」和「广场效应」，转型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催化剂。

民主转型催化民族冲突

在民主转型到来时，少数民族人士会认为民主的含义首先应该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选择前途。那时会出现一个趋于极端的互动链条。首先，活跃于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是「议」者不是「行」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坚持「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民主转型是一个权力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的时机，对于图谋获得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抢占道德制高点是有效途径。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响应社会质询，很多意见领袖都会立足道德立场进行煽动，而煽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清算中国，鼓动与中国分离。

民主化必定会揭开当年专制统治的黑箱，暴露多年秘史，从而进

一步加深民族积怨。擅弄舆论的意见领袖无论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反过来媒体和大众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舆论形成潮流，意见领袖就得反过来追赶舆论，力争跑到舆论前面。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更是要与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可能利用民主制度掌权。

民主转型会催生大批新媒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份额，每个新生媒体都需要展开争夺公众的比赛。而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情感。情感能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而在民族地区，诉诸情感的最大热点莫过于控诉中国的迫害，鼓动与汉人的对立。反之，在汉族地区，热点又会集中到对少数民族的诉求进行妖魔化，煽动大汉族主义。

媒体擅长炒作和煽动，市场竞争使炒作形成风气。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的道路并不反常。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民主转型的社会并不具备。

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缺少表达和释放渠道，往往采取对社会事务的漠然态度，而在民主化来临时却会形成激烈爆发。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变成墙倒众人推的暴民，传媒炒作往往构成主要煽动。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传媒煽动最易得到群众呼应。新疆当地民族的人民经受多年迫害，一有发泄可能，爆发能量不难想见。在这种情绪中进行的选举，极端民族主义者当选的可能性最大。

在代议制民主中，政治竞争者的惯用手法是攻击在位者的妥协软弱。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所有有志按代议制民主规则取得成功的竞争者，都只能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情绪，还要力争跑到大众和其它竞争者前面。

代议政治对善于迎合大众的政客有利，却不利于敢以真知灼见警醒大众的智者。在争取选票的竞争中，投机取巧的政客几乎总是压倒高瞻远瞩的智者，而在一个社会的民主转型初期，不成熟的选民更容易被政客迷惑甚至操纵。

反过来，在选民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时，当选领导人也无法不追随其后。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未来的维吾尔选民很可能形成一种同仇敌忾要求独立的氛围，当选领导人即使明知是灾难也无法扭转，如果不想下台的话，自己也只能被裹挟着滑向灾难。

因此，按代议制方式进行民主转型，社会各种角色都会被卷进独立的追求，形成鼓噪的广场。而汉人中的民族主义势力也会打起保卫国家统一的旗号，利用民主提供的广场进行煽动蛊惑。当这种势力赢得选举之日，就会是汉人对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之时，法西斯主义也就会在中国卷土重来。

那时的新疆将出现和当年波黑相似的格局。各方都采取种族清洗的手段。目的恰恰是为了将在最后时刻实行的「民主」。因为关于地

区独立的争端，最终可能会由国际社会进行裁定。而国际社会的依据主要是当地居民的表决。因此每一方都要抢在国际社会介入前尽可能多占地盘，用屠杀、暴力、强奸的手段把所占地盘上的其它种族居民赶走，以保证在进行自决之时，只剩下本民族的人参加投票，从而就能「民主」地取得那些土地的主权。

穆合塔尔，难道那真是理想的民主吗？真是维吾尔人民期待的未来和所盼望的幸福吗？这个问题需要慎重地思考。

王力雄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第三封信：递进民主制能做到什么

穆合塔尔：

当我们看到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转型社会的民族冲突，却不能由此认为可以不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代议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缺陷，不是民主的问题，是代议制的问题，体现了代议制对内民主、对外强权的弊病，最终原因还是在于没达到更充分的民主。

这就需要我们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探索。这时的问题归结到，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它既符合现代民主的所有理念，又能避免代议制民主造成的问题。我认为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给你大致讲过递进民主制。那是我多年思考的一种政治体制。不过当时我并未清晰地把它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正是我们在监狱进行的讨论启发了我，在试图拨开解决新疆问题的重重迷雾时，苦思冥想的我突然发现，钥匙其实就是递进民主制。

关于递进民主制我出了两本书。一本名为《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 1998 年），是在新疆入狱前出版的；一本名为《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台湾大块 2006 年），是出狱后写的。在后一本书里，我把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考写了进去。其中一些段落我会直接引在这封信里。不过关于递进民主制的更多内容，你还是看我寄给你的书，这里只简略地涉及必要部分。

什么是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的「递进」，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虽然也包括那种含义），主要指民主的一种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更多的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递进委员会制」；一个是「逐层递选制」。以直观方式，可以这样举例描述递进民主制的大概面貌：中国农村组织的基本单元是「自然村」，由村中每个家庭出一

位代表，组成自然村自治委员会。委员会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自然村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委员会主任（或按目前的称呼叫“村民组长”）作为委员会决策的执行者。当选主任同时自动成为上一级组织——「行政村」自治委员会委员，代表本自然村参加行政村事务的协商和决策，并选举行政村委员会主任（也可叫“村长”）。

这里提出一个「层块」概念。「层块」是由直接选举者和当选者构成。自然村的家庭代表和当选的村民组长构成一个层块。行政村各村民组长和当选的村长又构成一个层块。其中村民组长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自然村委员会和行政村委员会，是自然村委员会的主任，是行政村委员会的委员；是自然村层块的当选者，是行政村层块的选举者。递进民主制的层块之间，正是靠这种双重身份连结起来。

往下也是一样。一个乡的各村长共同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本乡大事和选举乡长。依此类推，再由乡长们组成县的自治委员会，选举县长……一直到各省省长组成国家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这种层块从最基层一直搭建到最高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

可以看出，在上述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二者相互支撑和互为因果。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为整个社会的民主。

弥补当今民主制度的缺陷

穆合塔尔，我们在讨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高度自治」如何实现？自治应该是民主的根本标志。但是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包括代议制）中，真正的自治仍停留于理想。虽然存在各种冠着「自治」旗号的权力机构，但那种所谓的自治只能叫「自己统治」。因为其即使对外能保持自主性，对内仍是统治结构，由当权者自上而下进行统治。中国现在这种写在纸面上的「民族自治」，就更不要说。

理论上，只有实现真正的自治才能最终消灭压制。自治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这毫无疑问，但是有民主却不等于就能自治。在间接民主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通过「代表」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间接民主不是自治的。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必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民主。但是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只能在一定的人群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社会如何实现自治，当今民主制度没有提供方法。

我称递进民主制的自治为「全细胞自治」。那是从每个社会成员开始，层层自治，自下而上，囊括所有的社会单元。同时那也是一种

「递进自治」，即从社会最小单元开始自治，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在这种结构中，保证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每个自治体的内部事务都不受外部（包括其所属的上级层块）干涉。但每个自治体同时又是更大自治体中的成员体，需要服从上级层块制定的法律和决策。这是自治结构得以不断递进、自治规模不断扩大的保证。

举例说，A 自然村由 n 个家庭组成，每家出一个代表，组成自治委员会，自行管理 A 自然村的内部事务。同时，包括 A 自然村在内的 n 个自然村又组成 B 行政村。B 行政村也构成自治体，由下属自然村的当选村民组长组成自治委员会，管理 B 行政村内部事务。这种管理只限于下属自然村之间的合作事务，不能干涉各自然村的内部事务。但是 B 行政村委员会做出的决策，下属自然村作为成员体都要执行，自然村的决策不能与行政村决策相抵触。

同理，一个乡镇有 n 个行政村，由 n 个村长共同组成乡镇自治委员会，管理本乡镇下属各行政村之间的合作项目，但不得干涉行政村内部事务。行政村作为自治乡镇的成员体，必须执行乡镇委员会决定，不得与乡镇委员会决策抵触。这时乡镇层块包含了下属行政村和各行政村下属自然村两层自治体，自治体总数＝n 个行政村＋n 个行政村包含的所有自然村。以此类推，自治结构递进地延伸扩大，最终由 n 个自治省的省长组成国家委员会，包容整个社会。

有人会问：如果必须服从上级层块制定的决策，能算自治吗？对此要这样看：在递进民主制中，上级层块本身就是由下级层块的当选者组成。上级层块制定的决策，正是下级层块协商——我称为「向量求和」——的结果。虽然那结果不会和任何一个下级层块的意志完全一致，却是所有下级层块的意志之向量和，把每个下级层块的意志都综合在一起，成为共同意志。因此下级层块对上级层块的服从不是被强制，服从的是包括自身意志在内的共同意志，是每个层块的自我意志在更高一层的体现。如果连这样一种服从都不接受的话，就只有「自」而无「治」，社会只能是一片散沙。

在「递进自治」结构中，每个层块的自我意志不会与其它层块的意志格格不入、相互对立，而是在递进过程与其它层块的意志相互融和，最终把所有层块的意志融汇成整体意志。正是这样一种结构，使自治可以不再与无政府主义纠缠一体地沦为乌托邦或假自治，而是真正把个体与整体、分散与集中、自由与秩序、自我意志与统一意志结合在一起。

民族主义是民族精英操纵的结果

前面谈到民主转型期导致民族冲突。有人会认为那是双方民众的选择，跟民主制度无关。事实上，双方民众之所以选择了冲突，正是当今代议制的「数量型求和」结果。深入汉人百姓的日常生活，会看到他们大多并不在意少数民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

系。同样，少数民族百姓也大多不关心是否独立，主权归属对他们很遥远。两方民众最需要的只是自己和家庭幸福平安。如果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向量求和」，是不会为了统独之争开战的。

进行「数量求和」则不同。数量求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统一在共同的主义、纲领或方案下，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方案，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而在求和过程中，也需要对求和结果进行表述与解释。正是在这些环节，民族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就用自身意志主导了「民族意志」。民族精英总是把反对分裂或争取独立说成民族利益，是全民族人民的要求。然而在「数量型求和结构」中，即使最后结果是多数民众投了赞成票，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

⑴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包含众多取向（针对不同问题）。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如民族独立），那取向在其完整的个人意志中有可能会被其它取向（如反对战争）抵消。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在只问一个问题，然后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其它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

⑵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务，大众难以准确把握。他们无法得到充分沟通，于是只能对精英的说法被动表态，按照精英提供的狭隘选择回答「是」或「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完全自愿，甚至哪怕是狂热，也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被精英操纵。

⑶专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客也可以利用媒体对民众进行蛊惑，那时民众表现出来的不是民族意志，而是众多个人受到的煽动与欺骗，再被简单的数量求和迭加在一起。

⑷何况在更多时候，不同意见找不到表达渠道。因为言论渠道由精英控制。沉默的多数被排斥在舞台之外。而在外界看，有机会表演的少数就成了整体。

民众对精英的追随有时只因为别无选择，精英却可以打着人民旗号追求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精英表达的汉民族意志就看不出汉人百姓对新疆去留不关心；维吾尔精英表达的维吾尔族意志照样看不出维族百姓对主权归属不在意。两个民族精英集团的对立与较量，在世界面前成了不同民族人民的势不两立。

使民族失去独立动力

与数量型求和相反，向量型求和无需精英介入。递进民主制的当选者虽然也是精英，但作用只是充当「向量和」的载体，而非充当主导者。在递进民主制中，民族意志无需民族精英也能自行体现。那时

各族人民会发现共同的人性高于不同的民族性，解决民族问题会比现在容易得多。

因为递进民主制社会的任一单元都是自治的，按自己意愿管理，因此有利于保护异质性。在同一国家框架下消除不同族群矛盾的方法，不应该是要求融和，而是让不同族群保持自治。随着人口流动增强，单一民族聚居同一地区的情况越来越少，其它民族人口不断增加。如新疆汉族在不少地区已超过本地民族。这种情况下实行代议制，沦为少数的本地民族就无法取得决定权。多数裁定原则将造成本地民族边缘化，甚至受压制，促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而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村庄、乡镇等基层单元的自治。即使在民族混居状态下，基层单元往往还是按民族聚居，如维族村、汉族村、蒙族乡、回族小区等。各民族可先利用基层单元的自治权保证本民族特性，然后再利用递进委员会把自身意志作为向量加入到整体求和中。那种求和结果将不是赢家通吃，而是总和为正数的多赢。

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衡量标准有两个，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中国不能被肢解。递进民主制可以同时保证这两点。既然高度自治已经普及到社会每个单元，民族异质性得到最好保护，独立与否就不再重要。独立主权能给民族精英提供舞台，带来荣耀，却不会成为民众目标。

前面谈到过意见领袖→传媒→大众→当选领导人的互动链条，形成激发民族冲突的「广场效应」。而实行递进民主制，首先意见领袖的激进会收敛。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以往靠煽动大众情感获得选票，变成需要通过参加逐层递选。「议」与「行」合一了，「议」也就需要负起责任。

意见领袖的理性会反映到媒体上。虽然媒体总有追求市场的动力，但如果能摆脱政治正确的束缚，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形成观点平衡，就会降低对大众的单向煽动，给大众多样选择，反过来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压力，形成正循环效果。

更重要的是递进民主制使大众和当选领导人相隔层次，从而切断大众对当选领导人的直接制约。即便「意见领袖→传媒→大众」的链条仍形成激烈情绪，也可以被阻隔在社会决策之外。递进民主中由各地区当选领导人组成的新疆自治委员将会具有最高程度理性，充分认识到独立带来的危险，保持理智行事并这样要求他们选举的领导人。有了这种理性的提升，当选领导人就能以民众的长远利益决策，而不受民众短视或狂热的制约。其放弃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打不过中国，而首先是因为递进民主制已经很好地实现了「高度自治」，从而不再有独立的必要。

新疆在中国之内「合纵连横」

穆合塔尔，独立有好处，但是也有难处。有一天新疆能独立，狂欢过后马上得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非常具体，全要靠自己。因此，与中国保持统一并非是委曲求全或迫不得已，也可以使其给少数民族自身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好处。其实只要实行了递进民主制，即使没有独立之名，独立的实质也差不多都能实现，同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一体弥补自身不足。尤其在中国也同样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情况下，留在中国就更是利大于弊。

有人会这样质疑：即使整个中国都实行递进民主制，以维吾尔族人口与汉族人口相差之悬殊，难道不会被汉人意志淹没？然而民主制首先形成的是自治体，而不是形成民族或其它什么事物。所谓自治体就是从本体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汉民族联合成一个自治体，维吾尔族作为另一个自治体，才会形成两个民族相对的关系。维吾尔族自治区如果仅作为中国三十一个省区之一，汉人为主的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在一起对付新疆。每个省追求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事务时，如果有意见分歧，那不会是出于民族不同的分歧，而是出于利益不同的分歧。面对利益分歧，有的汉人省可能和新疆意见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新疆意见一致。汉人省与新疆的关系不是民族关系，而是视新疆为三十一票中的一票，是各方都要争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对维吾尔族最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的位置，而是去做中国之内的一个省区，才能把对应的汉民族分割为若干份，使自己得以「合纵连横」。

另外，新疆虽然在三十一个省区首脑组成的国家委员会里只有 1/31 的权力，却也得到了加权。因为两千多万人口的新疆，在国家委员会中的权力与数倍于自己人口的大省是一样的。何况在涉及民族问题时，新疆在中国的递进民主政体中并非孤立，至少可以有西藏、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这种联盟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神权操控民主的专制

穆合塔尔，宗教广泛地影响穆斯林民族的世俗事务，你多次提醒我这个问题。在宗教的背景下，实行民主制并非能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如果多数人都是服从少数宗教人士的精神指挥，民主就成了一种形式。

有人认为维吾尔人搞民主选举，将有很多宗教人士被选上台。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即使法律禁止政教合一，不允许神职人员参加选举，也会有很多百姓按宗教人士的指示投票。法律不能管人的思想，假如民众意志是被宗教主宰，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

过掌权，恰恰通过民主就可以做到。

不错，信仰宗教正是个人选择，但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理社会的权利都交给宗教人士代行，那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如果有一天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甚至可能发挥出专制的作用（类似文化大革命那种在毛泽东神意下的「大民主」）。

这样说不是为了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对穆斯林民族的重要地位，又能防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递进民主制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递进民主制的政治都是在经验范围内，尤其对基层那种微观环境，宗教除了作为伦理背景，不可能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如果让民众置身大规模的选举范围，人们因为不了解该选谁，就会把宗教人士的指示当作依据。而类似村庄范围的选举却不存在不了解的问题，人们会以谁当选对自己更有利作为投票标准。何况宗教一般也不会深入到选举村长那种微观政治中去。至于高层次选举，选举者首先是对自己所代表的自治体负责，递进民主的「隔层」又使其不必顾虑宗教界态度，即使基层民众可以被宗教界调动，只要能获得本层块委员会理解，当选领导人就不会被宗教界牵制。

递进民主制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能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可以对强势的宏观事物（如神权）进行阻隔。这两种功能都是重要的。当今通行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宏观政治，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无法避免重迭，要么受神权制约，要么就得想法破除神权。递进民主制却可以在不损害宗教的同时把宗教阻隔在政治之外。这种阻隔不需要以挑战宗教权威为代价，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在两个不发生重迭的范围，从而避免二者产生冲突。这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文明的穆斯林，意义应该是很大的。

适合底层民众的选举方法

美国有二百年选举历史，公民从小受选举教育，但是选举仍然问题丛生。二〇〇〇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的选民把布什和戈尔的政策搞混。最后决定谁当选的佛罗里达州投票争执，起于一种「蝴蝶」式选票使一些选民未能在正确位置打孔。其实那种选票上有明显的箭头指示。如果在美国仍出现如此错误，在新疆可想而知。

一位藏族基层官员向我描述他在农村组织选举的经历。那只是选举乡级「人大代表」。他在那个村庄呆了三天，「口水说干」（他自己的原话），老百姓仍然搞不懂怎么在票上打钩，连续三次不得不从头再来，因为投到票箱里的选票大多是废票。对农牧民占绝大多数、存在大量文盲和缺乏政治训练的西藏和新疆，未来采取西方民主制投票方式，出现比佛罗里达错票更严重的问题是毫不奇怪的。

新疆的地广人稀使大规模选举的动员、竞选和投票增加诸多困

难。多数基层选民无法了解应该选谁，更无跋山涉水去投票的动力。既然家家有汽车的美国人都有一半选民不投票，新疆不参加投票的比例更高不是没有可能。而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投票（且不说投票质量如何），民主岂不成了徒有虚名？

递进民主制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分散于农村牧场的农牧民只选举身边村长，无需奔波，也不需要内容复杂的选票，口头表态、举手表决，都可以容易地实行；有没有训练、是不是文盲也都无关。对经验范围内的事务，没有人比农牧民自己更有智慧。竞选者在经验范围内无需电视报纸也能与选民充分沟通。选民在经验范围内则不会被巧言令色、空谈许诺所迷惑。他们了解每个人的底细，知道应该选谁。而只要最基层的选举能够良好完成，往上所有层次的选举也就顺理成章，并且得到不可停顿的动力与良性循环的保障。

多民族共处的「异质同构」

新疆的多民族共处正是递进民主制最能体现优越之处。递进民主制的「全细胞自治」保证社会所有单元都是自我管理。如哈萨克族自治州虽在维吾尔族自治区内，却不会受维吾尔族统治，因为它也一样是高度自治。哈萨克族经过逐层递选产生的行政首长会进入新疆自治区的管理委员会，与其它州地市当选的行政首长一道，制定整个新疆的大政方针和选举全新疆的行政首长。如果说哈萨克族自治地区也要服从自治区委员会的决策，那不是受到压制，而是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决策，仍然属于自治。

同时，在哈萨克族自治州内部还有以其它民族为主的小区。如有些城市可能以汉人为主，有些村庄是蒙古族村庄。在递进民主制中，那些单元也一样是高度自治，不会受到哈萨克族压制。新疆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别适宜发挥递进民主制的长处。先是在单一民族的小聚居区实现以民族划分的自治，然后在更高层块实现多民族共和，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

以民族划分社会单元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再以递进民主制把异质民族的单元组合进同一架构，这种「异质同构」将是既有利于不同民族，又能维护国家统一，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式。

穆合塔尔，你坚持使用「东土耳其斯坦自治区」作为新疆未来的名字。从递进民主制的角度，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字比「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更可取。递进民主制不主张以民族名称对自治区域进行冠名，也不赞成以法律方式规定必须以哪个民族的人担当何种职务。因为靠强行规定突出民族因素是人为制造民族隔阂。很多民族矛盾本来可以没有，反而是因为对民族的「照顾」才被突出和制造出来。新疆多数地区都不是单一民族，很多地区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超过半数，强行规定由哪个民族的人掌握主要权力都会引起反弹。而只要有了递进民主制，愿意保持民族特性的人可以按照民族单元凝聚，那时的当

选者一般就会是本民族人；再由当选者进入上级层块，组成更大的本民族单元；或者达到一定层次时，和其它民族单元的当选者组成共同委员会，进行向量求和，实现不同民族单元的汇合。

不过未来新疆到底会用什么名称，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意愿，也不会由哪几个政治组织决定。未来新疆人民的代表需要以符合程序的方式产生。如果实行递进民主制，那就只有递进民主产生的新疆自治委员会可以决定未来新疆的名称。当然必要的话，再经过所有的新疆居民公决通过。

穆合塔尔，我知道这封信读起来比较无趣。人们总是嘲笑试图开药方的行为，并且没人愿意认真地对待药方。但我还是把我的思考写给你。因为只要不是仅停留于抱怨，还想对改变这个世界做些努力，就总是得有人去考虑应该怎么办。新疆的未来不能靠自然而然，也不能指望车到山前自有路，因为那种自然而然走下去的路，现在已经能看到逃不过流血和灾难。要想避免那种惨烈的未来，只能在今天就开始寻找另外的道路。既然不能自然而然，那就唯有靠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然后怀抱希望往下走，鼓起勇气，绕开血光，去走出通途。

王力雄

二〇〇七年一月八日